高师政教专业系列教材

『十二五』人文社会学科系列规划教材

GUOWAI MAKESI ZHUYI GAILUN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

主编　铁省林　房德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一级出版社

高师政教专业系列教材

1.中国近代史纲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

3.中国传统经典文献导读

4.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

5.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理论与实践

6.教师职业技能与训练

7.教师职业道德

8.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程

责任编辑　王 晶
封面设计　张 晋


ISBN 978-7-209-06074-5
9 787209 060745 >
定价：38.00 元

山东省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高师政教专业系列教材
“十二五”人文社会学科系列规划教材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

主　编　铁省林 房德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铁省林,房德玖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3
ISBN 978-7-209-06074-5

Ⅰ.①国...　Ⅱ.①铁...②房...　Ⅲ.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国外　Ⅳ.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7018号

责任编辑:王　晶
封面设计:张　晋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
铁省林　房德玖　主编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开　(180mm×240mm)
印　张　24
字　数　410千字　插页2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
ISBN 978-7-209-06074-5
定　价　3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633)8221365

前 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高师政教专业所承担的培养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了要培养中学政治课师资外，还要承担起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培养人才、为社会培养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但是目前高师政教专业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材体系老化、教材内容重复、师范特色不鲜明、针对性和时代感不强、课程内容稳定性不足等问题。能否使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关乎政教专业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关乎青年一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培育。为了加强山东省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我们根据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形势下高师政教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的规划设计，选择了目前已经开设但没有合适教材或者应该开设而又没有教材的课程，组编了本套“高师政教专业系列教材”——《中国近代史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中国传统经典文献导读》、《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教师职业技能与训练》、《教师职业道德》、《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程》、《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理论与实践》。

我们将在公民素质教育与政治素质教育相融合原则的指导下，建构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高师政教专业课程体系，以推进大学生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发展为目标，力争使整套教材结构合理、内容新颖、符合时代要求。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的原则，加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反映现代科学文

化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的要求和中学教师一专多能的需要。

希望这套教材的出版和推广，能够提高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效，能够适应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使政教专业培养的人才既能胜任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同时也是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从而为高师政教专业课程建设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编者

2011年1月

目 录



第二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潮

绪 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纪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马克思主义就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者、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地传播开来,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革命运动、建立了革命政权、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乃至 20 世纪成为世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纪。

国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格雷泽和沃克尔对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极好的描绘:

> 20 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世界上许多政权都宣称是马克思主义政权: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哥拉、贝宁、保加利亚、中国、刚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匈牙利、柬埔寨、老挝、蒙古、莫桑比克、朝鲜、波兰、罗马尼亚、索马里、苏联、越南、也门以及南斯拉夫都一度在 20 世纪建立过马克思主义政权。数以百计的政治组织和政党亦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例如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南非共产党、世界国际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第四国际、红色高棉以及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等。
>
> 20 世纪还见证了受马克思原创思想的启发而建立的词汇体系,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思想流派,例如,最重要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卡斯特罗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ist Marxism)、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Marxist Humanism)等。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远远超出了政治学的范畴,不仅在社会学、经济学、

> 历史学和哲学等我们意料之中的领域应用(马克思在这些领域有很多著作),还被广泛应用到了心理学、人类学、生态学甚至地理学等形形色色的学科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影响力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组织和政权也有了相应的迅猛发展,信仰马克思主义者日众,马克思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内被普遍运用。可以说,无论我们怎样高估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世界的影响都不为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上世纪政治和知识格局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政治思想——如果有例外的话,也只有自由主义可以与它相提并论。①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它就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批判,甚至围剿。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几乎一夜之间进入了低潮。

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权在东德的结束,随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垮台,其他东欧国家也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加入资本主义阵营。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权已经垮台或屈从于外部压力而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著名的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大谈"马克思主义之死"的论调。1989年,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的灭亡不可避免。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说资本主义已经击败了它的意识形态敌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信誉破产"并且"山穷水尽"了。

"马克思主义之死"这个命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破产。然而,宣扬"马克思主义之死"的那些人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其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依然存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余个年头,现在仍然快速地发展;其二,在世界范围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依然十分活跃;其三,在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来自民间调查、选举调查和民意调查的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怀念共产主义时代那"过去的好日子",共产主义政党和他们的政策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其四,马克思主

---

① [南非]格雷泽、[英]沃克尔:《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王立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2页。

义依然深深地吸引着世界上的左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还应该指出,尽管苏东剧变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导致了苏联的倒行逆施,而是意味着苏联和东欧本身的缺点导致了它们的垮台。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死”是危言耸听,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远远没有死去,而是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传统,从这个传统中仍然在不断地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堆僵死的教条,它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有目共睹。萨特曾说:“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①

21 世纪已经到来,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仍然具有光明的未来。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世界人民的最佳选择。21 世纪还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什么是国外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指中国之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对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从时间上来说,它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从区域上来说,它包括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占主导地位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流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另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包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研究。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家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梅林、拉法格和希法亭为代表,他们活跃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和马克思、恩格斯有过直接接触,有的甚至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或学生。他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虽然他们的学说并不一定完

①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 页。

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但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占据主导地位，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它们强调国家、阶级、革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实践。除此之外，在东欧一些国家里还出现了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如南斯拉夫实践学派、布达佩斯激进学派和波兰意识形态学派等。它们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提出了批判和质疑，在这些国家里属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一直发展到今天。在前期的发展历史上，它包括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赖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德拉一沃尔佩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站在与第二国际和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立场上，吸收了西方世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许多内容，以此来取代、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国家又兴起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柯亨、福柯、德里达、齐泽克、詹姆逊、拉克劳和墨菲、阿格尔、德勒兹和瓜塔里、哈特和奈格里、鲍德里亚等人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风云人物。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也很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并把这种普遍理论应用于他们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第三世界发展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所到之处都跟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了结合——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与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在拉丁美洲、胡志明在亚洲、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和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在非洲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地化。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主要指以法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以古巴、越南共产党、朝鲜劳动党等为

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强调重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主张建设包括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内的群众性政党,凸显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道等价值观念。越南共产党在越南的特定条件下,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越南革命和建设的系统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冷战"结束后,古巴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经济体制上坚持计划经济并利用市场机制,认为没有计划就没有社会主义,不能放弃一切计划,不能把社会经济发展交给市场的盲目指挥。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在经济指导思想中,计划经济仍起主要作用,同时国家的调节已给市场机制打开了一个空间。

考虑到国内学术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尚处于初创时期,本书没有包含这一部分内容。此外,鉴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众多,其理论也十分繁杂,需要对此进行更加专门的研究,所以,限于篇幅,本书也没有涉及这一部分内容。

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时,既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又要灵活地运用各种方法。

首先,就基本原则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研究的客观性。

列宁曾在《辩证法的要素》中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①]所谓"考察的客观性"就是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不附加任何的主观成分。而要贯彻"考察的客观性",就必然掌握事物的本身、事物的全体。

只有坚持"考察的客观性",才能和主观主义划清界限。主观主义往往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在,至多也不过是抓住一些表面现象或个别事例,以表为里,以偏概全。如果是从客观现实中挑选一些事实材料来证明某一观点的正确性,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容易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尤其如此。因为社会现象是极端复杂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任何

---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明任何一个论点。当然，为了证明某个论点而引用一些事实材料，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完全有必要的。问题在于用来作为论据的是什么样的事实，是怎样收集来的事实，以及怎样看待和把握这些事实。列宁就说："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的个别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

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贯彻研究的客观性，就是要求我们认真地阅读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呈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解原著就是要搞清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怎样说的。研究的客观性还要求我们在阅读原著的时候，应该做到全面、系统，而不要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仅仅为某种观点作注解、论证。阅读和理解原著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第二，坚持正确的立场和观点。

坚持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认识和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其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比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遇到危机时明确地提出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坚决捍卫马克思的学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德里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其二，即使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并不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还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以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补充、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其三，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这些新的理论和观点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是否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考察。

坚持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与研究的客观性并不冲突。其一，马克思主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义的立场和观点本身就包含着研究的客观性，研究的客观性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研究的客观性不是纯客观主义的，研究者在理解和研究的时候不能不带有某种“先见”甚至“偏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先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当代哲学解释学对理解者的“先见”和“偏见”作了说明。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指出，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解释是把已经理解了的东西明朗化，任何解释都有已经理解了的东西作为“先见”。哲学解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偏见”的原意是指被最后判定之前的判断，如法律的裁决是 judice，而在这之前的临时的判断是 prejudice。因此，“偏见”不是“虚假的判断”、“主观的意义”，而是“先前的判断”。凡理解者都具有“先前的判断”，理解者就是“偏见”的存在。任何解释都是基于现在和未来对过去的理解，都是一种偏见，都不是纯客观的复现文本的原来意义。承认偏见的合理性并不导致主观性，相反，却能避免主观绝对性。偏见的视域是开放的，随时准备接受检验、调整和修改。总之，理解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其次，灵活地运用各种方法。

尽管每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这并不否认方法的多样性。即使在一门学科之内，由于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等的不同，也会有多种研究方法，呈现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主张“方法论的多元主义”。他说：

> 当面临历史研究的结果时，一种关于方法的观念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这种观念认为，这种方法包括一些固定不变的和必须绝对遵守的原则，它们指导科学事业的进行。这时我们发现，任何一条法则，不管如何有道理，如何在认识论上根据十足，有朝一日都终会被违反。显然，这些违反并非偶然事件，也不是知识不足或可以避免的掉以轻心所使然。相反，我们发现，它们是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其实，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最新讨论的最令人瞩目的特征之一是，人们认识到，古代原子论的发明、哥白尼革命、现代原子论（分子运动说、色散理论、立体化学、量子论）的兴起、光的波动说的渐次涌现这类事件和发展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某些思想家决定摆脱某些“明显”方法论法则的束缚，或者只是因为他们于无意中打破了这些法则。①

① ［美］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

所以，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唯一的方法论规则就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走上了极端。具体来说，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应该注意两种常见的方法。

第一，描述的方法。描述的方法就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描述。它重在介绍，而不在评价；它往往比较全面、系统，在描述国外马克思主义时力求做到客观、真实，其目的是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描述方法从19世纪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在19世纪的思想家看来，描述的方法（descriptive method）是对“事实”（fact）予以纯客观地描述，他们也把这种方法称做“现象学方法”。当代现象学哲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将之提升到哲学层面，提出要“回到事物本身”，对事物（即现象）要进行描述的研究。

第二，批判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就是按照一定的立场观点来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分析批判。与描述方法不同，它重在评价，而不在介绍，对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有所取舍。通过批判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价值、优劣，并可由此提出新的观点。

当然，不能机械地对待这两种方法，主要原因是：其一，这两种方法不是绝对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其二，这两种方法也不是界限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而是相互过渡的，是存在着中间地带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既不存在纯粹的描述研究，也不存在纯粹的批判研究；描述研究离不开批判，描述中有批判，批判研究离不开描述，批判中有描述。存在的只是或者以描述为主的研究，或者以批判为主的研究。

四、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拓展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进入21世纪，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如火如荼，步入新的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宽阔，研究领域广泛，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个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涉及哲学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问题，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且还涉及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学说，如罗默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施韦卡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赖特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布伦纳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福斯特的马克思

的生态学理论、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理论、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等。

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纯理论的探索，也有对现实政治的关怀。诸如帝国主义的新扩展及其困境、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执政困局、欧盟及其认同危机、经济金融化与经济民主问题、中东问题特别是伊拉克及伊朗问题，以色列殖民主义及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墨西哥总统大选、拉美左派执政现象、美军虐俘事件、人权问题、劳资矛盾与阶级对立、腐败及国家司法机构的蜕变、全球性公民社会的滞后与全球无政府状态、生态环境以及女性主义、大众文化的泛滥及其物化，等等，都上升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而深化了对相关理论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支持和参与左翼组织及其活动，利用一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与资产阶级政权进行斗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复兴马克思"、"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深化了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比如，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了新自由主义、帝国及新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与阶级对立、资本积累、劳动和剥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技术与消费异化、政治参与、承认政治、社会正义、话语霸权、意识形态、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解放与政治解放、后现代时代的去国家化与去民族化、女性主义、生态环境和生态政治等问题。

我们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虽然不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拿来就用，但可以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性因素，从中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比如，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道路、全球化的实质和趋势、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作用、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制度、妇女解放、美国的霸权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等问题的探索，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论启示。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尤其是对外军事干涉的增多，"帝国"或"帝国主义"成为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和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成为这一方面的代表作，为我们认识现时代的帝国主义提供了资料。

再次，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大多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它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借鉴作用。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相反，他们认为苏东剧变恰恰是背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结果。他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究竟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必须依据本国的传统、历史、文化等国情来决定。

古巴、越南、老挝、朝鲜以及印度共产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建设的问题，不断积累宝贵的经验。苏东剧变后，古、越、老、朝等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实践中，他们还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使他们站稳了脚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原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反帝反霸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耀眼的亮点。

总之，深入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编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

要点提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和主要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
◎卢卡奇的总体性、物化、主客体辩证法、阶级意识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国家和社会、文化领导权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同样的成功。在这种历史情况下,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地总结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积极地探索不同于俄国革命的道路,重新解释和竭力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一词通常用来描述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尔施最早提出来的。1923年，柯尔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在这本书中，柯尔施论述了一种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该书出版后，遭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严厉批判。

为了回答和反驳该书出版以来所遭受到的批判，柯尔施于1930年发表了一篇长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在该文中，柯尔施首次提出和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在柯尔施看来，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考茨基的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联合新俄式'列宁主义'正统派为一方"），另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两种马克思主义遵循着不同的思想路线，彼此相互对立，没有调和的余地。柯尔施认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出版于同一年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虽然柯尔施正式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初步界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但在当时这一概念并没有迅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直到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梅洛一庞蒂于1955年出版《辩证法的历险》一书，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才流行开来。

梅洛一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专辟一章来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梅洛一庞蒂继承了柯尔施的看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明确地将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梅洛一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流行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成为公认的思潮。

在柯尔施和梅洛一庞蒂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的基础上，后来的许多学者进一步地进行了改进和界定。归纳起来，西方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当然，这两种用法也并不是严格对立的，它们之间经常有着交叉和融合）：

第一，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潮。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要么强调特定思想内涵，突出它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向列宁主义政治体系挑战的哲学理论体



系;要么强调主题的转换,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问题转向了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提出者柯尔施和梅洛－庞蒂就突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汤姆・巴托莫尔(Tom Bottomore)主编的比较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反映了这种观点。在该书中,拉塞尔・杰可贝(Russell Jacoby)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条目着重强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对立和分歧,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理论体系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①。

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明确地指出:"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②换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国家和法律,而是文化和意识形态。

还有的西方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学者眼中,只要是与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特别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不管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如苏共二十大以后,在东欧理论界出现的一些"异端"理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等。

第二,从地域上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国家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

在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而东方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东方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主要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而是注重地域的区分。按照这种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西方国家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包括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理论。除此之外,他们认为世界上还存在着"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亚非拉各洲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例如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等。

---

① *Tom Bottomore(ed),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Blackwell, 2001, pp. 581－584.

②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5 页。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内外的一批领导者和知识分子根据时代变化，并以西方哲学的视野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区别于第三国际；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又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有地域性限制——产生并发展于西方；又有特定思想内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又批判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多元化，主张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又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最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并没有明确地标称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一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共产国际所属的西方国家某些共产党内的一股"左"的思潮而出现的。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沉重的打击，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更加深刻和空前尖锐，使得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迫切地希望摆脱压迫和剥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谋求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17年，在沙皇统治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最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形成了欧洲革命的高潮。其中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有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和芬兰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的保加利亚和波兰的革命起义等。但是，中、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遭到失败，特别是德国，它虽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但革命仍没有成功。到了1924年，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欧洲的革命高潮结束，欧洲的革命从此走向低潮，西方国家



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开始了。

为什么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而如火如荼的欧洲其他革命却失败了？如何总结欧洲先进的国家革命失败的原因？这是摆在当时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当时苏俄共产党内和第三国际的主流观点认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建立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欧洲其他各国无产阶级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在欧洲其他各国共产党内强行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强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按照俄国的模式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当时欧洲国家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却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他们那里行不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所属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内产生出一股"左"的思潮，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批评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批评共产国际，乃至批评列宁的一些观点，矛头指向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就政治思想而言，这股思潮的一些代表自称继承了德国共产党"左"派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卢森堡在战前和十月革命中，曾就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等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批评意见。在西方革命失败以后，卢森堡的这些思想观点为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潮所进一步发挥。例如，柯尔施认为，他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分歧，从渊源上说，就是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策略的批评一脉相承的。

在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看来，欧洲革命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是因为以下两点：

首先，无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意识。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但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主观条件，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却失去了。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消除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另一方面通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欺骗，使无产阶级不再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不再有革命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强调客观因素和经济条件，似乎只要坐等经济条件成熟，革命的胜利就会自动到来，这是行不通的。第二国

际的理论家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使工人阶级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对无产阶级重获革命意识的未来并不乐观。所以，德国、匈牙利、巴伐利亚、奥地利、波兰和巴尔干的例子告诉我们，危机和苦难是不够的。在这里有最可怕的经济危机——然而革命没有来到。还必须有把革命带来的另一个因素，而如果缺乏它的话，革命就将流产或失败，这个因素就是群众的精神，因此，必须总是以一种唤醒和加强工人的阶级意识的方式去行动和说话。

其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已经改变了其统治形式，它们的统治日益带有"总体"的性质，所以不能照搬十月革命所采取的暴力革命的模式。如果要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革命成功，必须采取"总体革命"的道路。所谓"总体革命"，就是不只是进行政治革命，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而是从"总体"上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政权、暴力和经济剥夺，而且更多地是依靠意识形态的控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欺骗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无产阶级日益认同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因此，这些国家的革命不只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更重要的还是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心理革命。

这股欧洲共产党内的"左"的思潮首先在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 1923 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因此，卢卡奇就自然地被视为这股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人。除此之外，同样于 1923 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德国共产党人柯尔施和写下著名的《狱中札记》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也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和主要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一股影响广泛的思潮。在其发展过程中，它逐渐从欧洲共产党内的一股"左"的思潮演变为超越党派范围的多种多样的流派。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欧洲共产党内的一股"左"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站在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领导人和理论家相对的立场上批判他们的思想观点，



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找欧洲革命的出路。但由于这股思潮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相对立的，因而在它出现不久之后，其代表就遭到了理论上的批判、抨击和组织上的纪律制裁。如卢卡奇和柯尔施在其著作、文章发表的第二年，就被共产国际斥责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柯尔施坚持和发展自己的观点却因此被德国共产党开除出党，卢卡奇在先是保持沉默、继而多次公开检讨之后得以继续留在党内。

鉴于这种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逐步远离了有组织性的共产党组织，独立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一些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甚至从来没有与任何共产党有过接触的西方学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他们自己所属的立场或学派“发展”、“补充”或“改造”马克思主义，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独立于任何党派的纯粹理论思潮。例如，法国的戈德曼、梅洛－庞蒂和萨特，德国的布洛赫等许多人就都没有参加过共产党。长期在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基本上是一个学院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从思想上来说，这个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从黑格尔主义的角度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力图确定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表现出了某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末经历了形成时期之后，在20世纪30至60年代末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成时期还没有产生独立的流派，但在鼎盛发展的时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在这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重点寻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分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反思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致力于对发达工业文明的批判；构筑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并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国际共运内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逐步演化成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社会思潮。

在20世纪30年代，当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在德国崛起，而德国工人阶级未能起而制止它时，从政治、经济、法律、特别

是从心理学上分析其原因，在一个时期里，成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研究课题。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研究，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西方一些人的心目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者”，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密切联系的法国的马勒和高兹等人，更根据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的分析，提出了“新工人阶级论”和相应的劳工战略，从而加重了这种外观和印象。

从哲学观点上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单一的，基本上都是按照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针对着西欧一些共产党内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会道路和人道主义的宣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又产生出另一股相反的倾向，这就是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转向时期。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他们重点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后现代社会和文化、妇女解放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批判转向研究市场社会主义；前苏联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靠近。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和一贯的学派或思想体系，不同的流派和代表人物的主张和观点相差很大，所以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特征，但其主要特征有两点：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紧密地结合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而西方马克



思主义却将理论和实践分离了开来。从整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理论学说,很难算得上是一种实践的指南。安德森指出:

> 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线。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他们在各自所属的东欧和中欧党内,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这两者(理论与实践)在西欧却越来越脱离。①

虽然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参加并且组织了当时革命群众的斗争,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他们都先后脱离了革命运动。由于革命斗争的失败和背离党的观点,卢卡奇和柯尔施分别流亡到苏联和美国,在研究院或大学里从事学术研究,完全与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断绝了联系。葛兰西则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意大利法西斯当局判刑入狱,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狱中札记》是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监狱里写成的。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这三大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流亡生活和与世隔绝,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西方政治组织和工人运动的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越来越远。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些学院派人士,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实际的活动家,而只是一些学者、教授。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具有教授职称。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人物霍克海默从未参加过任何工人阶级的政党,他虽然在政治上相当激进,但既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批判德国共产党。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力干将阿多诺对工人阶级运动毫无兴趣,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毫无个人联系。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们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法兰克福学派的组织机构——社会研究所本身只是一个典型的学术研究机构。1933年纳粹上台后,社会研究所成员被迫流亡他乡。该所于1934年迁往美国,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该所迁移美国,就使它转移到一个连形式上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或具有任何实质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巨大工人阶级运动也不复存在的政治环境。在新环境下,该研究所稳步地倾向于适应当地的资产阶级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秩序，并对自己过去和现时的著作加以检查以适应当地的学术气氛或集体的感情，进行带有通常实证主义特征的社会学调查。该所为了在新的住地掩饰它自己，在实际上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研究所迁回德国，但它的社会作用和方向在美国期间发生的变化再也不能变更了。社会研究所当时在西德已经彻底地非政治化，彻底地割断了与工人组织和运动的联系。它不仅融入了主流学术界，在学术界声誉日隆，而且受到了"官方"的喜爱和保护。霍克海默本人甚至从一个激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者堕落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拥护者和辩护者。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虽然建立了各种名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大都并不想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不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工人组织，大多数人也不参加现有的任何党派活动。他们的学说也主要只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产生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它在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是不统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国际性的行动组织，也不开展国际性的实践活动。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成员各自进行独立的理论研究，著书立说。他们之间除了属于同一流派的研究者相互间进行理论讨论外，彼此很少交流。

尽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但这主要是说他们不亲身参加革命的组织和运动，并不是说他们不关注实践问题、否定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刻关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不管人们已经或将对他们的理论作出怎样的评价，有一点不可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几乎都进行了探讨，并作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

此外，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对革命的前途和未来持有悲观态度，但他们仍然没有完全放弃革命的希望。他们寄希望于在理论中求证出革命失败的真实原因，力图阐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通过新的手段和途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

---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6－47 页。



第二，研究重心的转移。

本来，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有机整体，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哲学却成了唯一重要的因素，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被或多或少地弃置一旁。“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①在主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虽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有所论述，但要么没有任何创见性，要么抛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范畴和原则。

“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②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等都是从属于哲学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志是方法。卢卡奇所说的方法指的是辩证法，特别是主客体的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只要忠实于这种辩证的方法，即使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命题都抛弃了，那么也不失为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卢卡奇和柯尔施这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观点对于所有的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众说纷纭，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甚至可以归结为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柯尔施到科莱蒂，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从德里达到福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性优势，他们在大学里任教的学科无一例外的全是哲学。他们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西方著名的哲学家，他们的代表性著作要么是典型的哲学著作，要么是从哲学角度谈论各种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也大多是哲学流派。

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心转移的决定性事件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1932年分别在苏联和德国第一次发表出来。西方马克思

---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1页。

②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主义者对这部手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们从这部手稿中着重阐发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他们认为，《手稿》是“新的福音书”，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包括了马克思的全部精神视野的唯一文献”，“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前提找到了完全成熟的完美表达”。

马克思本身思想的发展轨迹是从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极端推崇来看，他们似乎倒转了马克思本身思想的发展轨迹。与马克思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从政治经济学走向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走向黑格尔哲学。所以，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从黑格尔哲学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哲学，归结为认识论和方法论。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哲学，主要从事哲学的研究，因此他们的思考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脱离普通大众，对革命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用的语言往往深奥晦涩，难以理解：

>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古怪深奥是形形色色的，卢卡奇的语言繁琐难解，充满学究气；葛兰西则因多年遭到监禁而养成使人绞尽脑汁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本杰明爱用简短而迂回的格言式语言；德拉一沃尔佩的语句令人无法捉摸，并喜欢反复地自我引证；萨特的语言则犹如炼金术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词汇的迷宫；阿尔都塞的语言则充满女巫般的遁词秘语。这些作家中大部分人是能够用明晰而直率的语言从事写作的。其中有些人，如萨特、阿多尔诺、本杰明，本身都是文艺界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们中几乎没有人用平易、直率的语言来写作他们常为人提及的主要理论著作。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心转移还包括从研究物质因素向着研究精神因素、从研究经济基础向着研究特定上层建筑的转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定性的物质概念，转而探讨精神因素所起的巨大甚至决定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时欧洲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意识，所以应该着力研究工人阶级的意识倾向，首先进行心理革命。正因为此，许多

---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1 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试图用精神分析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借用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和学说来分析大众心理，从而提出了一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对特定上层建筑的研究，特别是强调对文化现象的研究。“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而且，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和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①

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社会中，不是经济基础单向地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中的许多因素也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自卢卡奇以来，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倾心于研究文学艺术问题。卢卡奇的《审美特性》、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名著；而戈德曼、列斐伏尔、德拉一沃尔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萨特、詹姆逊等人都有许多洋洋洒洒的关于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论述。

此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探讨了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区分了科学和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进行了深入的意识形态批判。虽然阿尔都塞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观绝少相同之处，但他们两人的观点都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在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并且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缺陷。但是，由于它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没有能够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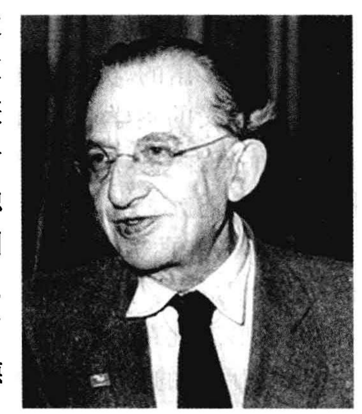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卢卡奇

(一)卢卡奇的生平和著述

乔治·卢卡奇(György Lukács, 1885—1971)是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位投资银行家。他先后在布达佩斯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906 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布达佩斯上学期间,卢卡奇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圈子,初步接触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德国上学期间,他结识了乔治·西美尔、马克斯·韦伯、恩斯特·布洛赫等学术大师。这时,他除了受到当时在德国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康德主义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了柏拉图、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狄尔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乔治·卢卡奇(1885—1971)

卢卡奇 1915 年从德国回到布达佩斯之后,组织了一个知识分子小组——周日小组,讨论成员共同感兴趣的文化等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卢卡奇突然转向了共产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卢卡奇成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于 1918 年加入了刚刚诞生的匈牙利共产党。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里,他担任教育和文化人民委员一职。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卢卡奇流亡到维也纳。在那里,他结识了著名小说家亨利希·曼和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葛兰西。在此期间,卢卡奇试图从哲学上发展列宁主义,为列宁主义奠定哲学基础。卢卡奇在此期间的成果结集为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1923),但该书在 1924 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的激烈批判。



纳粹在德国兴起后，卢卡奇移居莫斯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莫斯科期间，他退出了政治活动，专注于理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卢卡奇作为匈牙利共产党员参与了新的匈牙利政府的筹建工作。从1945年起，他是匈牙利科学院的院士。1956年，卢卡奇成为反对苏联的纳吉政府的一员，并参与重建匈牙利共产党。纳吉政府倒台后，卢卡奇宣布放弃自己先前的立场，公开批评自己的早期观点。卢卡奇于1971年去世。

除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外，卢卡奇的主要著作还有《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1916）、《青年黑格尔》（*The Young Hegel*，1938）、《欧洲现实主义研究》（*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1948）、《理性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1954）和《社会存在本体论》（*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1978）等。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表达

卢卡奇是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历史与阶级意识》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该书由八篇论文组成，分别写于1919年至1922年间，提出了关于总体性、物化、主客体的辩证法和阶级意识的观点，试图从黑格尔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1. 总体性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第一篇文章《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针对当时关于“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了以下界定：

> 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①

在卢卡奇看来，即使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放弃了马克思的全部论题，只要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不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7－48页。

失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呢?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的是辩证法,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是总体性。卢卡奇说:“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①

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早于马克思提出了总体性的范畴,认为总体包含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优于各个部分之和,总体是各个部分的有机整体,所以,总体就是真理。然而,虽然黑格尔已经提出了总体性,但他并没有从这种认识中阐发出一门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总体性这个范畴,又进行了唯物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就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理解人类的社会生活,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总体来认识,全面地把握社会现实。这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了解社会的某一因素或现象,就必须把它看成是总体的一个部分或成分,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或过程。卢卡奇强调,总体在逻辑上先于事实,只有把事实置于总体之中,才能理解其意义。比方说,一架纺织机,其自身只是一种生产工具,只有置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之中,才能显示其资本的意义。

卢卡奇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观点。在他看来,正是总体性的观点,而不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科学区别开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如生产者同生产总过程的分离,劳动过程被肢解为不考虑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些部分,社会被分裂为无计划、无联系、盲目生产的个人等,深刻地影响了资产阶级的思想、科学和哲学,造成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孤立性特征。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科学则维护了总体性方法的革命性本质,以革命性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科学相对立。卢卡奇说:

> 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实际分离,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分工和专门化,产生了专门科学和方法论上必要的和有用的某些抽象概念,资产阶级科学或者朴素现实主义地把某种“现实”或者“批判地”把某种自律归因于那些抽象概念;相反,马克思主义却通过把它们提升为和归并为辩证的因素而扬弃了这些分离。当然,诸因素(不仅某一整个研究领域,而且一系列彼此联系的个别问题,或者某一研究领域内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76 页。



的一些概念)的抽象孤立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决定性的东西始终是,这种孤立化是否只是认识整体的方法,就是说,这种孤立化是否总被并入作为认识的前提和由认识所要求的真实的总联系,或者,对孤立了的局部领域的抽象认识,是否保持着自己的"自律",是否始终是目的本身。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①]

然而,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认识的对象,也规定认识的主体。资产阶级科学只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从而只能产生出一些零碎的事实和个别的现象。例如,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从个别的资本家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陷入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和虚假的问题之中。因此,只有将主体设定为总体,才能将对象设定为总体。在现代社会中,作为总体的主体只能是构成它的诸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看成是作为总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问题。

2. 物化

"物化"(Verdinglichung)是贯穿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自马克思以来第一次通过物化概念来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和黑格尔一样,将物化、客体化和异化当成同义词。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物化的论述,是在人们还不知道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著作的情况下作出的(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 1932 年才付印出版)。卢卡奇以其非凡的理论洞察力,天才地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中推导出了物化问题。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强调过商品结构的本质:"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道: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77 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43—144 页。



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出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①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描绘了物化的基本现象。从这一现象中可以得出，物化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②。

物化既发生于客观方面，也发生于主观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物化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市场世界。虽然人们逐渐地认识了它的规律，人们却无法制服它，无法通过人们自身的活动改变它，它仍然通过自身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从主观方面来说，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也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同人本身相对立。作为一种商品，人的活动服从客观自然规律，和其他商品一样不依赖于主体而进行自己的运动。

卢卡奇认为，物化的表现就是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③。劳动的物化和劳动者意识的物化将作为主体的人客体化，变成了物。

最可悲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除了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而工人要生存下去，还必须作为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把自己想象为商品。将自己作为商品，也就是作为物，这种自我客体化就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命运。

3. 主客体的辩证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9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7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9页。



如上所述，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一种方法，即辩证法，并且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所在。那么，卢卡奇所说的辩证法是什么呢？

卢卡奇在这里所说的辩证法，并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是所谓"主体一客体辩证法"。这种主体一客体辩证法的根本点是：辩证法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之中，其中心内容就是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即人与人所创造的社会世界的相互作用。至于自然界，仅仅是作为被人的活动所改变的，包含在社会关系范围内的产物才是有意义的，在纯粹的自然界中，不存在什么辩证法。卢卡奇强调，这种"主体一客体辩证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过来的最宝贵的遗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

卢卡奇认为，辩证法之所以异于形而上学，就在于它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而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就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这种辩证关系构成了辩证法的中心内容。

卢卡奇认为，只有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才能正确地理解辩证法。黑格尔第一次将人类历史看作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作为主体，人创造了社会历史；作为客体，人是这个辩证过程的产物。因此，在社会历史的客观辩证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统一了起来。但是黑格尔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未能找到实现主体和客体同一的现实力量，只好求助于绝对精神的概念游戏。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指出无产阶级提供了主体和客体的现实的同一。

马克思要求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 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①

---

① ［匈］卢卡奇译：《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0页。

所以，无产阶级是促使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解体的现实力量。只有无产阶级既能认识自身，又能认识社会；既能认识现实，又能改变现实；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人，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无产阶级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卢卡奇指出，这个同一的主体－客体，这个行动的主体，这个发生中的"我们"，就是无产阶级。

卢卡奇据此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和"宿命论"。新康德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伦理的选择"，一种属于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而"宿命论"则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两者都抹煞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抹煞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从而造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导致了欧洲革命的失败。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不仅存在于绝对精神之中，而且贯穿于绝对精神展开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过程之中。而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仅仅存在于人类的社会历史之中，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由于自然界不是人所创造的，而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在自然界中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因此，最重要的是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从这一观点出发，卢卡奇指责恩格斯追随黑格尔的错误先导，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然而，辩证法的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在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中是没有的。所以，恩格斯在辩证法中排除了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消除了辩证法的革命性质。

4. 阶级意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主要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走向。因此，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功能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卢卡奇认为，研究阶级意识必须明确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阶级意识？阶级意识的实践意义是什么（或者说阶级意识在阶级斗争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 这首先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利益决不可能以十分清晰的（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任何一个这一类社会的本质使然，社会结构分为等级、阶层等，随之而来的是在社会的客观经济结构中，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因素不可分地结合



在一起。①

而资产阶级实现了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时空障碍，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在法律上的区分，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变成了明显的事实。

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映，而这种反映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

> 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②

资产阶级虽然在最初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在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不能解决关于危机的理论问题。即使有着科学的理论解决办法，它也无法掌握。“因为接受这种科学的解决办法，即使是理论上的，也意味着是不再用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来观察社会现象。”③资产阶级由于受着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局限，其阶级意识必然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地位，必然会罔顾事实。

反之，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的优势在于，它有能力实事求是地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相互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够采取行动，改变现实。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区别在于，它不拘泥于个别的历史事件，不单纯受它们所驱使，而是自己就构成了推动力量的本质，对社会发展过程起着决定性影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不是无产者全体的心理意识，而是整个无产阶级对其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一方面，能够揭示社会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能够把理论与实践内在地统一起来，它能自觉地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射到社会历史过程中。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相反，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极其巨大的作用。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不同于别的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特殊功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战斗的旗帜，它本身就是目标和武器，它本身就是一种改造社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09－110 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04－105 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08 页。

会制度的力量。“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①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②。

二、柯尔施

（一）柯尔施的生平和著述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与卢卡奇一样，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卡尔·柯尔施（1886—1961）

柯尔施于1886年8月15日生于德国汉堡附近托兹泰特的一个银行官员家庭。中学毕业后，他先后求学于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日内瓦大学和耶拿大学，在耶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求学期间，柯尔施学习了法学、经济学和哲学，并参加了“自由学生运动”，主张学术界要同社会主义建立联系。

在旅居英国期间，柯尔施参加了著名的英国工人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受到工团主义运动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很快转向了左翼，首先加入了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后来又与许多从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成员一起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他积极地参与了工人委员会运动，主张每一个工厂都要有一个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机构。当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后，柯尔施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缺乏意识形态的准备和政治领导，这一分析贯穿于他后来的著作中。自1920年至1926年，柯尔施是德国共产党内的重要成员，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并编辑党的机关刊物《国际》，而且还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选进议会，担任图林根政府的司法部长。

由于柯尔施反对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及其思想纲领，加之他所提出的理论与苏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因此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激烈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9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6页。



批评。在共产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被季诺维也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但他拒不放弃自己的理论，所以1926年被开除出党。此后，他在政治上仍然积极地参与各种各样的分裂派别的活动。1936年流亡美国，直到1961年去世。在美国，他任教于新奥尔良的杜林大学，并为纽约国际社会研究所工作，逐步远离了主流马克思主义。

柯尔施最著名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 and Philosophy*, 1923)，该书分析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衰落和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状况。柯尔施的这本书当时引起的轰动比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还要大。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进行了批判和反驳。除此之外，柯尔施还撰写了《〈资本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Capital*, 1932)、《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Why I am a Marxist*, 1935)、《再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Leading Principles of Marxism: a Restatement*, 1937)、《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938)、《今日马克思主义十论》(*Ten Theses on Marxism Today*, 1950)等著作。

(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

毫无疑问，柯尔施最有创造性的著作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正是这本书使他成为与卢卡奇并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柯尔施宣称，该书旨在理解自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时代的必然产物创立以来，它所经历的变化、发展和修正。

1.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柯尔施说：“直到最近，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这一事实，都没有较多的理解。”①

资产阶级思想家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哲学史中一个不重要的分支，而宣称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们”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却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哲学。后者不仅认为马克思主义克服了资产阶级的哲学，而且也克服了全部哲学。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研究哲学问题无助于无产阶级斗争，只不过是浪费精力罢了。

资产阶级思想家之所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最重要的原

---

①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是：

>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史的著作，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它已经返回到这样一种哲学的和写哲学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它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象中得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①

而更深的根源是，在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在社会实践上已经失去了革命性，因而也就不能在思想上把握观念与现实或哲学与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了。

但是，观念领域中的革命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在19世纪中叶，而是经历了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变化。这就是从代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德国古典哲学转变到了代表进步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柯尔施的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试图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黑格尔的继承者的历史品格。在柯尔施看来，黑格尔哲学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随着1848年左右黑格尔哲学的衰落，资产阶级丧失了进步性，不再是一个普遍的阶级。进步性从资产阶级那里转移到了无产阶级身上。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进步观念。正如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哲学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被继承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不只具有理论的目的，也有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并不说明它就不是哲学。

> 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就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11条中和在其他出版过和没出版过的那个时期的著作中系统地阐述的那样。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②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手里正在失去其准确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被"庸俗化"了。他们虽然自封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残缺不全的和庸俗化的。庸俗化的

---

①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②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页。



马克思主义者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似乎意识不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性，即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决定性意义。在柯尔施看来，第二国际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危机，而他自己的使命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从这个危机中拯救出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2.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阶段*

柯尔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唯一真正的唯物主义的，因而是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曾经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历史的研究，我们今天应该将它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上。只有运用这种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才能弄清马克思主义沦落为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根源，才能理解第三国际力图恢复"马克思的真正学说"的意识形态意义。

柯尔施将他所说的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分析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843年前后，在思想上对应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结束于1848年革命，对应于《共产党宣言》。

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态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①]在这个阶段上，不存在把这个整体的经济、政治和精神要素划分为知识的各个分支的做法，甚至在把握每一个分支的具体特征时，也是以历史的真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当然，构成"革命实践"的活的统一的，不仅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也有历史过程和自觉的社会活动。

总之，柯尔施认为，这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直接建立在现实的无产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意识，因而，由此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口号，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848年革命的失败，延续到19世纪末。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个阶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里，由于缺乏前一阶段的那种火热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理论而发展。理论独立于革命运动之外，当然导致它的内容发生了改变。马克思在1864年起草《国际

①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

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告工人阶级书》时，完全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①。

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来说，在 1867 年至 1894 年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这种一般理论比之前一阶段《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的内容，是更为发展了的。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

>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较后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决不会产生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这仅仅是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另一种结合开始以更大的科学精确性发展起来，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②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体系自身从未消溶在各个知识分支的总和之中。

> 而且，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人们只须想一下著名的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③

但是，事情并不仅止于此。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还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 页。

②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 页。

③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 页。



因此：

>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它遭受了由它的追随者们带来的所有这些歪曲以及一系列其他不太重要的扭曲。这些歪曲或扭曲可以用一个包容一切的公式概括起来：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或文化的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来说，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它们同样地能够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这些企图基本上仍保持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之内，并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也确实如此。①

在柯尔施看来，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演变成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的危机。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延续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柯尔施认为，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社会革命的现实摆到了人们的面前，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完全瓦解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复兴和重建。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的列宁适应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需要，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从第二个阶段的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中解放出来。“第三国际中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显复兴，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在新的革命时期，不仅工人运动自身，而且还有表达它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都必须采取一个明确的革命形式。”②

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意识地重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回复，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③

虽然柯尔施在后期脱离了实际的革命斗争，但他并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在其后期著作中，柯尔施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并试图改造马克思主义以适应新的历史处境。他宣称，今天所有将马克思主义学说重建为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理论的企图，都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非正

①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②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③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学说影响了许多人〔如马克思主义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瑟·罗森伯格(Arthur Rosenberg)〕，特别是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西方反抗运动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创办人费利克斯·韦尔(Felix Weil)曾受教于柯尔施，正是通过韦尔，他极大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

三、葛兰西

(一)葛兰西的生平和著述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意共总书记，被认为是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葛兰西生于意大利撒丁岛上阿莱斯村的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家庭的贫困不仅使他很早就离开学校打工糊口，而且导致他的身体营养不足、发育不良，终生罹患多种疾病。中学毕业后，葛兰西于1911年进入都灵大学，学习文学和语言学。在大学里，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还阅读了大量的哲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逐步培养起了革命思想。在都灵这个工业发达的城市中，他有机会接触到了生机勃勃的工人运动，参加了社会主义者的活动。1913年底，葛兰西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



安东尼奥·葛兰西
(1891—1937)

除了经济和健康方面的原因之外，葛兰西参加的政治活动也越来越多，因而他于1915年放弃了大学学业。从1914年起，葛兰西就为一些社会主义的报纸撰写文章，描绘了都灵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著名的记者。此时，他还积极组织工人运动，宣传法国革命、巴黎公社和妇女解放等革命思想。1917年8月都灵革命暴动失败之后，许多社会党领导人被捕入狱，葛兰西便成为都灵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都灵社会党机关报《人民呼声报》的编辑。1919年4月，葛兰西发起创办了《新秩序》周报。围绕着《新秩序》的社会党人被列宁看作是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新秩序》派的突出特征是拥护工人委员会，主张工人委员会应当是“无产阶级的权力机关”。

工人委员会的失败使葛兰西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一个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1921年1月，在葛兰西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虽然葛兰西是新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并不赞同当时的总书记博尔迪加主张的党的组织原则。1926年，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葛兰西提出实现意共的布尔什维克化，组成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葛兰西的主张获得大会多数代表的赞同，他也当选为意共的总书记。1926年11月，法西斯政府以墨索里尼的生命受到威胁为借口，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法案。警察随即逮捕了葛兰西，把他投入著名的罗马圣母监狱。监狱的虐待使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虽经保外就医，但他仍然于1937年去世，年仅46岁。

在法庭上，检查官宣称："我们必须让这个大脑停顿20年！"但事实上并没有如其所愿。在狱中，葛兰西仍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思索和写作。入狱8个月后，他就开始利用手头的纸片写作"狱中札记"。葛兰西10年的囚徒生活留下了2848页约100万字的"狱中札记"。这些"狱中札记"被偷偷地从监狱中运出来，然后通过苏联大使馆外交邮包寄给当时在苏联的意共领导人。1947年，葛兰西的《狱中札记》(*Quaderni del carcere*)由埃伊诺迪出版社出版。除了《狱中札记》之外，后人还编辑出版了葛兰西入狱之前的著作：《葛兰西政治著作选》(*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77, 1978)两卷本、《葛兰西狱前著作选》(*Gramsci's Pre—Prison Writings*, 1994)等。

(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尽管葛兰西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撰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直到入狱之后才深入系统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包含在他的《狱中札记》中。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实践哲学

葛兰西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独特的理解，这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单纯是一种理论，更重要的是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即"既是科学又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本身"①，因而他常常将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实践哲学"。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丰富了一定的文化思潮，因此研究实践哲学是一件非常有意

① 《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9页。

义、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成果。他说,"实践哲学是以所有以前的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全部现代生活观念基础的历史主义。"①它融理论和实践于一身,既是一种政治的哲学,也是一种哲学的政治。

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是超越了旧哲学的新哲学,因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独创的哲学。他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种新哲学:

> 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思想的绝对的尘世化和世俗化,是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必须按照这种方式来把握这种新的世界观的线索。②
>
> 只有当着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开辟了历史的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中的新阶段的、完整而独创的哲学的时候,才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和意义,而实践哲学则在其超越作为过去社会的表现的传统的唯心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而又保持其重要要素的范围内作到这点。如果只把实践哲学看作臣服于另一种哲学,那就不可能领会新的辩证法,然而,(实践哲学)却正是通过它(辩证法)来实现和表现对旧哲学的超越的。③

就实践哲学本身来说,它有两项主要任务。葛兰西说:"实践哲学担负着两项任务:战胜各种冠冕堂皇、天衣无缝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使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得以组成;对那些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状态的的民众进行教育。"④这就是说,实践哲学既在理论上反对、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在实践上启蒙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心智,赋予他们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思想武器。葛兰西特别强调第二项任务,认为第二项任务是实践哲学的根本任务。

2. 国家与市民社会

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葛兰西把寻找和建立适用于西方的革命战略作为思考的中心。在葛兰西那里,国家和市民社会同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是上层建筑的两个方面。他说,"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

---

①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1, p. 395.

②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p. 445.

③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8 页。

④ 《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69 页。



要层面:一个可以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可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①]

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是指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而政治社会是指国家和政府政治活动领域。在市民社会中,权力体现为"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而在政治社会或国家中,权力则体现为"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它们虽然都体现着权力,但前者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采取"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而后者则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采取暴力的形式。

葛兰西认为,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市民社会共同维护着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说:"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②]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所面对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而且还面对着市民社会。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包含了广泛的方面:

> 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与政治领域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③]

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即意识形态一文化方面)起着比政治社会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市民社会获得相对发达形式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的强制性开始弱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开始突出,革命重心从暴力夺取政权向争夺文化领导权转移,西方革命的核心是争夺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

3. 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主要是指一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手段,它是通过被统治阶级的积极同意取得的。

据葛兰西说,"领导权"(hegemony)这个概念来源于列宁。列宁曾经用领导权这个概念指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政治领导权。而葛兰西则用它来分析解释正统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

①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p. 12.

②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0 页。

③ 衣俊卿等:《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1 页。

么没有在20世纪早期发生。资本主义统治似乎比以往更为牢固。葛兰西指出，资本主义不仅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宰制维护其统治，而且还通过文化领导权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

资产阶级具有领导权地位的文化渗透着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而后者日益成为“普遍价值”，侵蚀着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念。因此，工人阶级日益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是反抗而是维护现存的社会，从心理意识上“自愿地”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具体到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革命，革命的失败就在于“工人阶级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①。

鉴于这种情况，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以无产阶级的新文化颠覆、取代资产阶级的旧文化，将被压迫者和知识分子吸引到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中来。葛兰西比列宁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更为重视文化领导权的作用。在列宁那里，文化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辅助手段，而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权力，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的领导权。

对文化领导权的强调使葛兰西特别关注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就是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没有组织的。”②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作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家”，发挥着使文化合法化即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功能。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需要能使自己的存在合理化的知识分子。对统治集团来说，知识分子就是其“管家”，其主要职能是在市民社会领域履行统治集团的“文化领导权”，以确保广大民众“‘自由’同意基本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③。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正是通过其知识分子的传播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从而巩固其文化霸权的。与之相反，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则在于揭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骗局，突破其话语霸权，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

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呢？葛兰西认为，“运动战”和“阵地战”是两种为夺取领导权而实行的策略。政治上的“运动战”就是对国家机器的直接进攻，而“阵地战”是在市民社会里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长期的进攻。这两种策略是相互依托的。“运动战”似乎摧毁了整个资本主义防御体系，“而事实上，只是破坏了它的外表，在攻

---

① [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②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泽，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③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425页。



击者进攻时，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一条仍然有效的防御线"[①]。由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占据了市民社会里的坚固堡垒，大多数公民在资产阶级的宣传下，高度内在化了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愿望、道德和习惯，因此，必须转入"阵地战"的策略。

葛兰西所指出的"阵地战"在发达国家的运用，是要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前，在市民社会里发动一场"精神革命"，也就是说，要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市民社会的内部堡垒里，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道德的这种新世界观的传播，一步一步地克服市民社会内无产阶级从属资产阶级的信仰的状态，从而逐渐瓦解与攻克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里形成的"堑壕"与"碉堡"，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鼻祖之一，而且也给马克思主义的右派以理论启发。不仅如此，葛兰西的思想还影响了当前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他的文化领导权学说是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研究的先驱和理论来源之一。

本章小结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内外的一批领导者和知识分子根据时代变化，并以西方哲学的视野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一股影响广泛的思潮。在其发展过程中，它逐渐从欧洲共产党内的一股"左"的思潮演变为超越党派范围的多种多样的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和一贯的学派或思想体系，不同的流派和代表人物的主张和观点相差很大，所以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特征，但其主要特征有两点：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研究重心的转移。卢卡奇是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他提出了关于总体性、物化、主客体的辩证法和阶级意识的观点，试图从黑格尔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柯尔施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将他所说的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分析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

①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p. 235.

史，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的结论。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突出强调了文化、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对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2.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3.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演变的？
4.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5. 卢卡奇是如何分析物化和阶级意识的？
6. 卢卡奇的总体性和主客体辩证法是什么意思？
7. 柯尔施为什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
8. 柯尔施是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的？
9. 如何理解葛兰西的实践哲学？
10. 葛兰西是如何分析文化领导权的？

阅读书目

1.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 [法]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

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4.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5.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6.《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7.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二章 法兰克福学派

▶▶要点提示

◎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和演变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特征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精神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民主
◎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概述◎——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持续时间最长、包含人物最多、影响最大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分析和批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阐释未来社会的构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和演变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是指围绕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形成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始建于1923年，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是第一个隶属于德国主要大学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研究机构。最初提出建

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人是费利克斯·韦尔(Felix Weil),研究所的建筑物和基金是由韦尔的父亲提供的。韦尔是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柯尔施的学生,支持和赞成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1922年9月,韦尔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一个《关于创建社会研究所的备忘录》。其中提到,提议建立的研究所的目标是"在总体性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所谓"总体性",是指从经济基础到制度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备忘录》提到要研究的迫切问题是革命、党组织、摆脱苦难等。《备忘录》还强调研究所的工作要"独立于政党一政治的考虑之外"来进行。

社会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格律恩堡(Carl Grünberg)。在格律恩堡的领导下,社会研究所以《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为机关杂志,注重从严格科学的意义上而非政党一政治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格律恩堡的主持下,社会研究所实际成了"西方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不论在社会研究所的人员组织上,还是在研究所的刊物《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所发表的文章稿件上,都贯彻了"兼收并蓄"的方针:既吸收共产党员,也吸收社会民主党员,还同莫斯科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持正规的联系;既发表属于第二国际传统的伯恩施坦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属于共产国际传统的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文章,还发表当时既同第二国际又同共产国际在路线上相对立的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文章。此外,还发表一些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

由于健康原因,格律恩堡的所长职务于1930年由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继任。霍克海默将社会研究所的杂志改名为《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将社会批判理论确定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霍克海默迅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领袖,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如经济学家和计划经济问题专家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学家阿多诺,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政治科学家和法学家纽曼(Franz Neumann),政治学家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者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政治经济学家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等。霍克海默就任所长,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正式形成。

纳粹的兴起使研究所的创办者于1930年9月决定将研究所迁出德国,他们先是在日内瓦设立了分支机构,把基金转移至荷兰。1933年,希

特勒上台后，研究所离开德国到了日内瓦，然后于1934年前往美国纽约。在纽约，研究所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的杂志重新命名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正是在美国流亡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撰写出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虽然研究所的成员得到了安全保障，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美国的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联邦德国政府的一再邀请下，霍克海默、波洛克和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的骨干力量重新回到德国法兰克福，于1951年重建社会研究所。在这个时期，霍克海默将主要精力投入了行政工作，曾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阿多诺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理论上的多产性，撰写了许多新论。而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则继续在美国开展了更广泛的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达到了鼎盛，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成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反抗运动的思想指南。

> 在德国，数以千计的“学派”的著作被售出，这些著作通常还是廉价的盗版。其他欧洲国家及北美的新左派常常受到它们的鼓舞。在世界其他地方，如阿兰德(Allende)的智利，人们也能感受到这些文本的影响。在圣地亚哥街头，马尔库塞的名字往往与当时政治标语中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批判理论成了新左派孕育和自我理解的一个要素。许多投身于新激进抗议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稀缺资源的私人占有和禁锢个人的创造性——的人，在这个“学派”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颖解释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极少探讨的主题与问题(例如，大众文化、家庭和性)的强调。①

1958年，霍克海默退休后，阿多诺继任所长。但随着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相继去世，原先意义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在组织上已经解体。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是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

从20世纪20至30年代形成算起，法兰克福学派至今的发展经历了三代。

---

①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utchinson, 1980, p. 13.

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波洛克、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成员是一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机械地模仿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念。同时，他们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恰当地解释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他们既批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赞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试图指出一条社会发展的新道路。霍克海默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时，在就职演说《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中指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就是进行社会哲学的研究，建立一种分析当前社会的社会哲学。

> 社会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寻找无可移易的真理的科学，还应理解为一种由经验工作补充和丰富的唯物主义理论；同样自然哲学也与个别科学领域辩证相关，因此研究所将继续在不同领域努力，不放弃其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目标。① 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研究所的成员们进行了综合的和实证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

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继承了老一代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拓展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领域，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哈贝马斯根据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扩展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理性化，但哈贝马斯认为不能将理性简单地归结为工具理性，社会生活中的交往理性可以使人达成共识，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建立起民主法治的合理性国家。

第三代的领军人物是霍耐特。作为哈贝马斯的学生，霍耐特以法兰克福学派遗产的最新传人自居。如果说哈贝马斯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理性化过程中的合理性可能，那么，霍耐特则在全球越来越明显的文化冲突和互渗中看到了走向这种可能的现实路径。霍耐特针对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阐释中较少顾及该理性本身内在机制的揭示，重新回到作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起源的早期黑格尔，从中挖掘出了规范主体间交往行为的相互承认理论，从而提出交往行为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①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名称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来自于学派之外的人，此后阿多诺欣然接受并运用了它。因为法兰克福学派人物众多、历史悠久、理论庞杂，所以从思想上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只是一个松散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名称是这个松散的学派的一种标签。哈贝马斯曾说："(法兰克福学派)从不存在一个始终如一的学说。"[1]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共有的基本特征。

根据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魏格豪斯(Rolf Wiggershaus)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暂时或长期的特征是：

(1)一个研究机构：社会研究所。在整个时期它都存在着，即使有时以松散的方式存在着。

(2)一位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他对新理论纲领抱有信心，能够并且愿意与合格的学者合作；作为一位"管理型学者"，他经常提醒他的同伴，"理论"的未来发展就掌握在他们这些被选中的几个人手中。

(3)一篇宣言：霍克海默的就职演说《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研究所后来一再回过头来重新领会这个演说，霍克海默本人也一再援引这个演说。

(4)一种新范式：关于社会存在一般进程的"唯物主义的"或"批判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特征是将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系统地将精神分析、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的某些观念整合进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批判理论"这个标签一直保存下来，尽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霍克海默本人也远离了他早期的批判理论观点。

(5)一份发表学派研究工作的杂志：《社会研究杂志》，由权威的出版机构发行。[2]

然而，根据魏格豪斯的看法，这些特征多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所具有。比如，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位核心人物，但这种核心人物只是就理论而言的，他并不像霍克海默那样具有组织上的"领

---

① Peter Dews,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Interviews with Jürgen Habermas*, Verso, 1992, p. 98.

② 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MIT Press, 1994, p. 2.

袖气质”,“管理”整个学派。自20世纪50年代研究所在联邦德国重建以后,《社会研究杂志》并没有复刊,因而再也没有一份专门发表学派研究工作的机关杂志了。

但是,无论如何,法兰克福学派却向世人展现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尽管从一开始就并不是所有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都认同“批判理论”,认同“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也不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它,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和主要代表却一直坚持他们的理论学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在其1937年的文章《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中,第一次从“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对比的角度界定了“批判理论”:传统理论是保守的,它肯定和维护现存世界,而批判理论则是革命的,它否定和改变现存世界;传统理论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从固定不变的事实出发,得出与现状相协调的“顺从主义”结论,而批判理论则采用的是批判的方法,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使人们意识到改变现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是孤立的抽象个体,而批判理论的思维的主体则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传统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批判理论则是一种批判的立场。

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彻底的、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批判实证主义提出的科学理论模式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中隐藏着的是实证主义与权威主义。批判理论不仅要求具体地、历史地考察总体的社会,而且要求综合各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来理解社会。

尽管批判理论家们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批判理论,他们却表现出了共同的理论旨趣:

第一,他们号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以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传人自居,试图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现代化”。但他们既不赞同以苏联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各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再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甚至经常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例如,他们批判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等。

第二,虽然他们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批判的内容、方法等方面与后者大异其趣。他们认为,马克思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所批判的是自由资本主义,而现在资本主义进入了发达资



本主义时期，马克思原来的批判内容已经不适用于当代，需要提出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批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本质特征是“批判”，马克思把他的许多著作的标题定为“批判”，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第三，他们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影响，强调对社会的整体或总体的理解。但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他们更多地注意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心理方面的批判研究。为此，他们吸取了许多现代西方学者的思想内容，如韦伯的社会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

第四，他们继承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许多思想，属于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并不赞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先验主义、绝对精神本体论、同一哲学，但他们接受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关于理性和辩证法的学说，用这些思想来阐释社会的发展，理解和批判现实社会。

第五，尽管他们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在现实生活中仅进行理论研究，远离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国际工人运动，但他们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他们将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解放学说，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理论能够指导新的社会的建立。

第六，他们的理论研究都不仅限于批判和理解当前社会，而是通过批判当前社会展现一种更符合理性的、更自由的、更民主的和更正义的未来社会。但在他们的心中，这个理想社会并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也不是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节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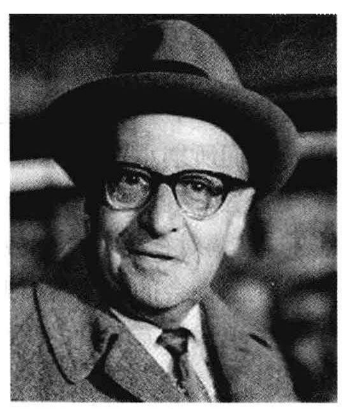
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生平和著述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

霍克海默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希

望子承父业，所以霍克海默在16岁时离开中学到了他父亲的工厂工作。1916年被征召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大学毕业后，霍克海默到了法兰克福，在此结识了阿多诺。



马克斯·霍克海默
(1895—1973)

1925年，霍克海默以《康德的作为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中介的判断力批判》获得大学任职资格。第二年被任命为编外讲师。1930年，霍克海默就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同时也升任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1933年，纳粹当局取消了他的教授任职资格。霍克海默与社会研究所先是移居到瑞士，而后迁往美国，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1940年，霍克海默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他与研究所又搬迁到了洛杉矶。1949年，他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并于1951年重建社会研究所。1951至1953年，霍克海默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1958年退休，其后仍然参加一些学术活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完全退休。

霍克海默的主要著作有：《权威与家庭》(*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1936)、《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1937)、《工具理性批判》(*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1967)、《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947；与阿多诺合著)、《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 1947)和《黎明与黄昏》(*Dawn & Decline*, 1978)等。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批评学家，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中的地位仅次于霍克海默。

阿多诺生于法兰克福的一个富裕的酒商家庭，自小接受了良好的音乐训练。中学时期阅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后，他学习了哲学、音乐学、心理学和社会学，1924年以论研究现象学家胡塞尔的论文毕业。在大学期间，阿多诺就写出了多篇音乐论文。他本来立志做一位作曲家，但他的音乐批评却更多地表现出了哲学才智，所以最终转向了哲学研究。1931年，在著名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指导下，他通过了大学任职资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



格论文。1932 年他开始在霍克海默主办的《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1938 年正式加入社会研究所。

1934 年，为免遭纳粹迫害，阿多诺逃亡英国，希望在牛津得到教职。在霍克海默的盛情邀请下，阿多诺于 1938 年也来到了美国，参与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在美国期间，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学术上进行了颇为有益的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多诺追随霍克海默返回德国，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新建的社会研究所里，阿多诺越来越多地协助霍克海默做管理工作，并于 1958 年接任所长一职。

20 世纪 60 年代末，左翼激进学生在以包括批判理论在内的理论为指导进行反抗运动时，阿多诺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场，批评学生运动。因而，阿多诺遭受了左翼学生的猛烈抨击。激进学生占领社会研究所里阿多诺的办公室，冲击他的授课教室，致使他不得不暂时离开法兰克福到瑞士休假。1969 年在瑞士休假期间，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 66 岁。

除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外，阿多诺的主要著作还有：《权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合著，1950)、《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1966)、《三棱镜》(*Prisms*，1967)、《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1970)、《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1974)等。

(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思想上最为接近，共同表达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些核心学说。

1. 启蒙精神批判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启蒙精神不是专指发生在 18 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所推崇的那种启蒙精神，而是指推动整个人类走向文明的根本精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精神批判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①

本来，启蒙就是走向文明，就是把人类从野蛮状态和被宰制状态中解放出来，“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②，“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③。然而，启蒙并没有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言第 1 页。

②③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达成它的目标，启蒙非但没有把人从野蛮和宰制状态下解放出来，反而重新使人进入新的野蛮和宰制之中；启蒙非但没有祛除神话，启蒙本身反而成了新的神话；启蒙非但没有用知识代替幻想，启蒙反而成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揭示的启蒙的内在矛盾，即启蒙辩证法。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早在近代，"经验哲学之父"培根就已经归纳出了启蒙的主旨。培根推崇知识的力量，盛赞知识对自然的控制。培根对知识充满了信心：知识改造了自然，改造了世界，文明的曙光普照大地。然而，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中就包含着"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培根绝不是仅仅希望用知识来展现真理，而是希望用知识来达成实际的效果，来操纵、支配、控制、改造。用培根自己的话来说，知识的真正目的、范围和职责不在于让人敬畏和羡慕的言论，不在于能够带来有启发的论证，而在于劳动和实践，在于能够更好地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生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

> 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①

与一般认为启蒙起源于近代的观点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启蒙的根源定位于遥远的古代——神话时代。在他们看来，启蒙是反神话的产物，也就是说，启蒙摆脱了神话，启蒙就是解神秘化和理性化。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演进表现了对神话的解神秘化和理性化过程。根据荷马史诗的描绘，早期的希腊世界是一个神的世界，整个世界由众神统治和主宰着。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众神的世界遭到了怀疑和嘲弄。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色诺芬(Xenophanes)曾嘲笑众神，因为众神不过是按照人的形象制造出来的，而且带有人的弱点，做出了许多不道德的行为。从前苏格拉底的宇宙论起，理性化的过程就开始了。近代启蒙运动接过了古希腊的解神秘化和理性化传统，启蒙的理想就是用理性建立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用秩序统一整个世界。"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不懈地摧毁诸神与多质。"②为了使世界同一和具有秩序，就需要逻辑和数学，因而逻辑和数学成了启蒙精神的基本准则。"形

---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 2 页。

②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页。



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柏拉图在其后期著作中把理念和数字等同起来，这点具有神话味道，但它体现了所有祛除神话的渴望：数学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按照这一准则，“各式各样的形式被简化为状态和序列，历史被简化为事实，事物被简化为物质”①。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能还原为数字和算计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对启蒙运动而言，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不能被还原为太一（Eine）的，都是幻象；近代实证主义则把这些东西划归文学虚构领域。”②在这种启蒙精神的推动下，自然被征服了，物质被控制了，社会生活纳入了秩序，市民社会由等价交换原则所支配，资产阶级的平等的商品生产具有同样可计量的特性。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并没有像它所想象和希望的那样逃脱神话的束缚，启蒙本身就是在神话中确立自身的。在神秘的祭祀仪式中，总是用象征物代替实际的东西。敌人的名字，他所使用的武器代替着他本人，神是用一种牌位来代替。“在祭祀过程中，替代物的出现标志着向推理逻辑迈进了一步。”③而科学正是以替代物作为其研究的预设的，没有了替代物也就没有了科学，只不过科学把祭祀所用的特殊的替代物换成了普遍的可替换性。虽然“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④，但是，“动物的图腾、占卜的梦幻和绝对的理念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界限”⑤，启蒙只不过是神话的世俗化形式和现代影像而已。

从神话到启蒙，对统治和权力的推崇并没有实质的改变。神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一种幻想，神话不仅命名、描绘、解释事物，而且在叙述中包含着道德说教，表现着确定的意识形态。

> 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这些神话，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力。代替各地神灵鬼怪而出现的，是天堂和天堂的等级制度；代替巫师和部落的天职而出现的，是分成不同等级的祭礼和以强制性命令为中介的不自由劳动。⑥

---

①②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页。

③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④⑤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⑥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6 页。

在神话中，众神已经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区分了开来，一边是神，一边是万物，神主宰着万物。无论是犹太教的创世纪神话还是奥林匹亚的众神神话，都表现出神的主宰性，这和地上的君主统治是一样的。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它们看成是一致的："造物主与秩序精神在统治自然的意义上是相似的，人类与上帝的近似之处体现在对生存的主权中，体现在君主的正言厉色中，也体现在命令中。"①启蒙接过了神话的统治性观念，并把它发挥到极致。"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这种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的统一性。"②所以，神话和启蒙共同塑造了一个不仅统治自然而且统治人的人类世界。

总之，一方面，神话为启蒙确立了基本的原则，使启蒙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启蒙又倒退回了神话，自身变成了神话。关于前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

> 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过程中，每一种特殊的理论观点都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就仅仅是一种信仰，最终，精神概念、真理观念，乃至启蒙概念自身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原则取代了神话中的英雄，同时也将自己看作是神谕启示的逻辑结果。这种原则一旦被形式逻辑的严密性所限定，那么它就不仅控制着西方哲学的所有理性主义体系，而且也支配着体系的结果：这些体系肇始于众神的等级制度，并且在偶像的黄昏中把对不公正的愤慨当作同一性内容而传承下来。③

关于后者，他们指出：

> 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为此它却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在神话中，正在发生的

---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 页。

②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③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 页。

一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的补偿;在启蒙中,情况也依然如此:事实变得形同虚设,或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①]

启蒙的这种内在矛盾在当代变得尤为明显,高度启蒙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一个新的野蛮社会而已。当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阐述的理性与启蒙的自我否定并没有真正地导向一个新的合理化的解放社会。虽然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和明确地阐述了启蒙的辩证法,并且也试图克服启蒙辩证法带来的消极后果,但囿于其理论的局限性,他们最终停留在启蒙辩证法面前,除了愤怒、指责和哀叹之外,没有能够向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2. 工具理性批判

重视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②]从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一直到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无一例外。法兰克福学派起初对理性的理解和界定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的强烈影响,认为理性是高于知性并能够把握现实的本质从而批判和超越现实的能力。正是由于理性所蕴含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以霍克海默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才把理性看成不仅是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任何一个人类解放的社会的基础。但是,霍克海默等人并不同意德国古典哲学封闭的、僵化的理性观,而是继承了韦伯的理性发展观,认为理性经历了一个分裂的发展过程,从而展开了对现代理性即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工具理性批判的思想来源之一是韦伯的学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大师。韦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近现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发展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在韦伯看来,本来理性包含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要素,前者是指信念和理想的合理性,实现这一信念和理想的手段也是符合价值的,而后者则是指一种基于目的的合理性,即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选择能够达到该目的的合理性的手段。然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了工具理性的追求,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外部世界的控制上,导致了理性的片面发展。理性主义的片面发展虽然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

---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②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明，但相对地忽略了人们的价值需求，“工具理性行为把功利的目的视为唯一目的，势必会漠视人们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价值，从而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常规化和僵固化，使社会生活丧失多元价值的创造性”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了价值理性，人们成了纯粹的经济机器和享乐动物。所以，所谓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和价值非理性”，是一种“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正是理性的分裂和片面发展，造成了西方文明的深刻危机，致使非理性主义乘虚而入。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具理性是启蒙的产物，是启蒙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康德曾把启蒙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指没有能力运用自己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康德的不经他人指导的知性，就是指由理性引导的知性。康德、莱布尼茨和笛卡尔都把理性看成是统一性、体系性的东西，而康德特别突出了理性的功能性特征。在康德看来，理性是一种从一般性中推演出特殊性的能力，“理性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体系同一性的观念和具体概念关系的形式因素”③。然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理性概念是含混不清的。

> 理性作为超越于个体之上的超验自我，包含了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由观念。在这种社会生活中，人类把自己组织成为一般主体，并且用自觉的整体协同来克服了纯粹理性和经验理性之间的矛盾。上述情况正表现出了真正的普遍性观念：即乌托邦。但与此同时，理性也构成了计算思维的审判法庭，计算思维通过把世界当做自我持存的目的，并且为了征服物质世界，它从单纯的感性材料中确认了客体的筹划功能。④

康德理性概念的两面性和含混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导致了理性自身的分裂，最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现为理性的片面发展，即工具理性的产生并且取得统治地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

> 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

---

① 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9 页。

② ［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22 页。

③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0 页。

④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2 页。

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的工具的夙愿。①

和韦伯一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工具理性首先表现在科学形式之中。康德所谓的理性的统一性和从一般推出特殊的能力,正是科学的自觉任务,科学的体系就是"既可以把握事实又可以帮助个体最有效地支配自然的知识形式"②。人们将数学中的推导方法运用于所有的学科,通过演绎的思维链条来把握世界的秩序,因此,理性化在科学中就表现为数学化、计算化和符号化。"作为理论要素,作为命题和结论的组成部分,实验的名称越来越少,而数学符号则越来越多。逻辑运算本身也已经相当地理性化了,以至于至少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内,理论形式已经变成了数学结构。"③法兰克福学派并不否认科学的认知力量和对自然界的支配力量,也不否认科学对于社会所有的积极功能,而是否认对科学的力量和功能的无条件的夸大和无限制的运用。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观与实证主义针锋相对。

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去世之后,欧洲的思想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实证主义的时代,实证主义成了欧洲的流行思潮。④ 霍克海默则揭示了实证主义的理论观点及其实质:

正如实证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现代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所涉及的是关于事实的命题,因此其前提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和特殊意义上的感知的物化。它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由事实和事物所组成的世界,因此也就没有把世界向事实和事物转变的过程与社会的过程联系起来。事实概念就是一个产物,是社会异化的产物;在这个概念中,交换的抽象对象被认为是一种适用于一切既有范畴意义上的经验对象。批判反思的使命不仅在于把握不同事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即便这点也比实证主义学究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而且也在于对事实概念本身进行阐明,包括它的发展过程和相对性。通过定量方法得出的所谓

---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 页。

②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2 页。

③ 《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9 页。

④ [德]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2 页。

> 事实，被实证主义者认为是唯一科学的事实，但它们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它们与其说揭示了，不如说遮蔽了现实的基础。一个概念不能被当作真理的尺度接受下来，如果它所追求的真理理想本身具有社会前提，而这些社会前提又不允许思想把它们当作终极定性。①

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实质，就是夸大了科学的作用，掩盖了社会的真实面目，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批判维度。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本身已经丧失了自知之明，而只是一种工具”②，即成为维护现实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工具理性成了生产的宗旨和标准，“理性的形式化过程也仅仅是机械化生产方式的智力表达”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工具理性“最终表现为工业社会的旨趣”④，“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⑤。在经济活动中，理性面对的不是一个个的人，而是根据社会职业分类而来的角色。每个人都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角色，都是经济运转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他只是职业群体中有用的或无用、成功的或失败的一员，他被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成了不同的类型。重要的人物对经济活动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最不重要的人物则成了社会救助的对象。“究竟谁死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外事故和公司的责任。”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从仅有少量财产的小资产者成长为拥有巨量财产的卡特尔巨头，他们的科学也变成了奴役大众再生产的概念工具。所以，霍克海默说：“让主体最大可能地适应具体化了的经济权威，便是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采用的形式。”⑦

在政治层面上，工具理性成了统治的合理性。随着工具理性支配自然的力量的一步一步的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⑧。对统

---

① [德]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转引自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9 页。

②⑥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3 页。

③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3 页。

④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2 页。

⑤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 页。

⑦ [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0 页。

⑧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 页。



治者来说，人变成了物质，就像整个自然对社会来说是物质一样。统治者运用工具理性来组织自己的权力机构，运用工具理性来行使自己对大众的宰制，一切以科学的效率为基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极权制度却任凭计算原则畅行无阻，并且惟科学是从。它的准则就是粗暴残酷的劳动效率。"①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是用来建立新的、更有效和更易让人心悦诚服的社会控制和社会调节的工具，因此，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政治统治的合理性。技术统治的表面现象掩盖了阶级统治，使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服从了统治，认同于新的宰制，一体化于发达工业社会，从而丧失了反抗的心理准备。

3. 大众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是其启蒙精神批判和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延伸。一般而言，大众文化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的受众面比精英文化广泛得多，它总是与大众化和通俗化联系在一起。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成了现代大众文化。现代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不再是通俗化，而是商业化和产业化，所以，他们建议用"文化工业"一词来称呼"大众文化"。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因为现代科学技术为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使大众文化成为文化工业。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工业所产生出来的产品没有了创造性，只不过是标准化、程式化的东西。他们说：

> 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细节是可以变的。在流行歌曲中，比较短的间奏可以产生某种效果，英雄突然间产生的失态（他可以把这种失态看成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情人从男明星那里所受到的粗暴对待，以及男明星对备受宠爱的女继承人的藐视，所有这些细节，都像其他细节一样，是早就被制定好了的陈词滥调，可用来安插在任何地方；在完成整个计划的过程中，这些细节能够完成的都不过是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它们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作为计划的组成部分来证明计划。只要电影一开演，结局会怎样，谁会得到赞赏，谁会受到惩罚，谁会被人们忘却，这一切就都已经清清楚楚了。在轻音乐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中，一旦受过训练的耳朵听到流行歌曲的第一句，他就会猜到接下去将是什么东西，而当歌曲确实这样继续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得意。对短篇小说来说，必须严格坚持适当的篇幅。甚至插科打诨、切身感受和开玩笑也得像它们所处的背景一样，都是被计算好了的。这些细节是专家们的责任，它们的范围不大，人们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很容易把它们配备好。①

文化的工业化使文化成了商品，成了人们的消费物。“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文化产品一开始就不是作为艺术产品来生产的，而是作为赚取利润的商品来生产的。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消除了人们的想象力，使人们把大众文化表现的东西与现实世界混同起来。

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正因为电影总是想去制造常规观念的世界，所以，常看电影的人也会把外部世界当成他刚刚看过的影片的延伸，这些人的过去经验变成了制片人的准则。他复制经验客体的技术越严谨无误，人们现在就越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外部世界就是银幕上所呈现的世界那样，是直接和延续的。自从有声电影迅速崛起以后，这种原则通过机械化再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真实生活再也与电影分不开了。有声电影远远超过了幻想的戏剧，对观众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想象和思考的空间。观众不能在影片结构之内作出反应，他们尽管会偏离精确的细节，却不会丢掉故事的主线；就这样，电影强迫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等同于现实。对大众媒体消费者来说，想象力和自发性所受到的障碍不必追溯到任何心理机制上去；他应该把这些能力的丧失归因于产品本身的客观属性，尤其要归因于其中最有特点的产品，即有声电影。不可否认的是，有声电影的如此设计，使人们需要借助反应迅速的观察和经验才能全面欣赏它；而电影欣赏者如果不想漏掉连续的事件，就不可能保持持续

---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9 页。

②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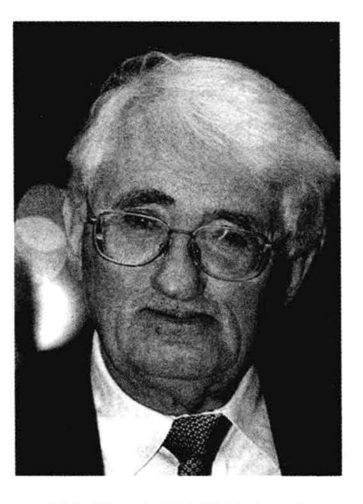
的思想。即使反应是半自动的，但也没有留给他们任何想象的空间。①

因此，文化工业不过是对大众的欺骗。“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②现代的大众文化实际上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它从外部祛除了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建起来。”③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产品成功地实现了对大众的“精神催眠”，达到了社会控制的效果。“文化工业把娱乐变成了一种人人皆知的谎言，变成了宗教畅销书、心理电影以及妇女系列片都可以接受的胡言乱语，变成了得到人们一致赞同的令人尴尬的装饰，这样，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便可以受到更加牢固的控制了。”④文化工业降低了人们的欣赏趣味，削弱了人们的敏感性，剥夺了人们的自由选择能力，培育了人们的机械反应态度。通过文化工业的洗礼，人们失去了内心反抗的向度，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服服贴贴的、顺从的人，达到了意识形态对大众控制和操纵的目的。

二、哈贝马斯

（一）哈贝马斯的生平和著述

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是德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

哈贝马斯生于莱茵省的杜塞尔多夫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哈贝马斯大体上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亲眼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德国的战败，亲身感受到了“道德意识被摧毁”，属于“1945 年后寻找新生活方向的一代人”⑤。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士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心理学。特别是在波恩大学读书期间，他接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1 页。
②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6 页。
③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1 页。
④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1 页。
⑤ [德]得特勒夫·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章国锋译，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7 页。

触到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深受其影响。1954 年以关于谢林哲学的论文在波恩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从 1956 年开始，哈贝马斯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任阿多诺的助手，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导下研究哲学和社会学。由于霍克海默的不同意见，哈贝马斯的大学任职资格论文在社会研究所未获通过。1961 年，哈贝马斯转往马堡大学任编外讲师。1962 年，哈贝马斯接受了海德堡大学专门为他提供的"特别教授"一职。1964 年，在阿多诺的强力支持下，哈贝马斯重回社会研究所，接替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教授职位。1969 年阿多诺去世后，哈贝马斯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

20 世纪 60 年代末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哈贝马斯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支持学生运动。但他同时对学生的过激行动表示不满，从而与学生领袖发生争执。他指责激进学生是"左派法西斯"，而激进学生则称他为"文化革命的叛徒"。1971 年，哈贝马斯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附近的斯坦堡就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1983 年之后，他又回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直至 1993 年退休。退休之后的哈贝马斯仍然笔耕不辍，关注社会现实。

由于哈贝马斯在学术上的贡献，他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终身客座教授、纽约新学院的豪斯荣誉教授。1981 年，哈贝马斯被选为匈牙利科学院荣誉院士；1984 年，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荣誉会员；1947 年，获得斯图加特市黑格尔奖；1980 年，获得法兰克福市阿多诺奖；1986 年，获得德国学术研究最高荣誉的莱布尼茨奖；2003 年，获得社会科学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04 年，获得京都艺术与哲学终身成就奖；2005 年，获得挪威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

哈贝马斯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62）、《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1963）、《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1968）、《认识与兴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1971）、《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1975）、《交往与社会进化》（*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1976）、《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1981）、《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1983）、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1985)、《后形而上学思想》(*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1988)、《包容他者》(*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1996)、《后民族结构》(*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1998)、《分裂的西方》(*The Divided West*, 2006)、《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Between Naturalism and Religion*, 2008)、《欧洲:动摇不定的规划》(*Europe: The Faltering Project*, 2009)等。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在当代西方,几乎很难再找出一个像哈贝马斯这样思想如此广泛而又深刻的哲学家。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哲学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同样杰出的社会理论思想家、政治理论思想家。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学者都把他视为自己学科的同道和专家。不仅如此,除了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之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涉及历史学、语言学、法学、文学、教育乃至社会现实问题等十分广泛的领域。哈贝马斯宣称:"已建立的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可利用的东西。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凡是具有认识论的、结构主义或者释义学因素的、凡是能使人们从内部来揭示客观事物的,都能够沟通联系起来。"①尽管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并且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以其巨大的包容性、综合性闻名于世,但是,他的理论的最终目标还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寻求人类的解放。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人类解放既是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也是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主旨。哈贝马斯的所有理论探索,如民主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为理论、现代性学说、话语伦理学以及宗教思想等,都是围绕着这个主旨展开的。

1. 公共领域与民主

在哈贝马斯看来,实现人类解放既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对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推倒重来,也不能像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那样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制度,并且只在理论层面上批判和否定旧的社会制度,对真正实现新的社会制度悲观失望,而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资产阶级民主仍然具有潜力,因此可以挖掘其已有的潜力,对其进行改造。所以,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的主旨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

---

① [德]哈贝马斯:《我和法兰克福学派》,载曹卫东选译《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

同时，挖掘资产阶级民主的潜力，重建规范的民主理想。哈贝马斯指出："根据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规范的自我理解，只有当它认真对待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要求时，才可以说它延续了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①

在康德看来，法律一方面必须保证公民的自由，另一方面必须得到全体公民的认同。哈贝马斯依据康德对法律的这两点规定，把它改造成理想民主的两个基本条件：所有公民的自由和权力的普遍认同。哈贝马斯说，民主"植根于这样一种意识之中：国家权力必须得到所有公民自由和普遍的认同。唯有如此，它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②。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呢？他指出，

> 在以下情况，个人的权威将转化为理性的民主话语：所有成年公民在形成一种政治公众舆论的条件下，通过自身意志的深思熟虑的表达，以及对这种意志的实现实行有效的监督，将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③

在哈贝马斯看来，民主只有在公众舆论的条件下才能充分表达出来。这说明对民主的研究必须研究公众舆论，而对公众舆论的研究则正是哈贝马斯接下来的公共领域研究中要做的工作。

因为公共领域是构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所以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哈贝马斯都相当重视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何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说：

>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④

从哈贝马斯的这个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么几点：第一，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第二，在公共领域中形成公众意见，即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第三，公众意见通过对话协商而形成；第四，公共领域是开放的，即具有公开性（publicity）；第五，公共领域由公众构成。

---

①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1990 年版序言第 19 页。

②③ 转引自［德］得特勒夫·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章国锋译，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13 页。

④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25 页。



什么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呢？哈贝马斯的界定是：

>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①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之中坚力量的公众”②，它由与公共权力机关相对的私人组成。公众(public)首先作为一个阅读群体而存在，在17世纪是指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这是资产阶级公众的雏形；到了18世纪，新兴的市民阶层构成资产阶级公众的核心。私人形成公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具有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的前提是“人之单纯作为人”的平等，而非交往者之间社会地位的平等，成员之间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第二，公众的讨论应当限制在一般的问题上，所谓一般问题即大家共同关心的与公共权力或机关有关的问题，而非纯粹的个人问题；第三，公众团体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逐渐确立了起来。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前提主要有两个：首先，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公共领域得以成立的基础，这个分离主要是指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分离开来。它一方面使公共权力从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建立了新型的公共权力机关，另一方面使生产从公共权威的职能范围中解放出来，形成了“社会”。所以，正是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才出现了与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相对立的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包括狭义上的市民社会(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和家庭及其私生活。在私人领域当中就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就是由私人所组成的领域。其次，市民阶层的形成。市民阶层是构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主体——公众——的核心和中坚力量。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正式确立。

18世纪的资产阶级建立了成熟的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满足它之成立的基础。“随后一百年是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资本主义渐渐‘组织起来’，而公共领域与私人

---

①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②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领域之间的原始关系事实上已经消失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蓝图瓦解了。"①本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出现了。国家干预主义消解了国家和社会的界线,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于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虽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力图揭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过程,但公共领域绝不意味着仅仅是一个历史范畴,而同时也是一个规范概念。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新一代的代表,哈贝马斯思想的主旨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重建,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重建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合理的法治社会。批判和重建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规范,因此哈贝马斯虽然在形式上局限于对公共领域的经验一历史研究,但实际上他在研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并没有满足于对公共领域概念只进行纯粹社会学和历史的描绘,而是在社会学和历史的阐述中注入了批判的要素,在批判中阐发了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规范。而且,越到后来,哈贝马斯越意识到构建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的重要性。

那么,理想的公共领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从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叙述、社会学描述和政治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理想的政治公共领域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和特征:其一,公共领域的前提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是在不受公共权力干预的市民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来说,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其前提条件。其二,公共领域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构成。公众是构成公共领域的主体,他来自于市民阶层。公众平等地参与公共领域,就具有公共性质的一般问题展开讨论和批判。其三,公共领域应坚持公共性原则。其四,公共领域通过公众舆论表现自己。哈贝马斯反对把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仅仅当作一种虚无飘渺的乌托邦,因为理想的意义正是在于它超越现实、高于现实,从而对现实起一种规范和导向的作用。

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阐述了规范的公共领域理想形式,这不仅为规范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人类的解放开辟了道路。

2.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①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受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的影响，哈贝马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看成是一种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一样，哈贝马斯把自己的理论定位在为了争取人类的解放事业上；和马克思一样，哈贝马斯强调社会的物质条件、社会实践、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自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员："我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梅洛－庞蒂曾经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霍克海默以及其他人那里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思潮。"[①]卢卡奇使哈贝马斯认识到青年马克思的重要性，而阿多诺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得感谢布洛赫（Bloch）和阿多诺（Adorno），是他们的著作让我们茅塞顿开，懂得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其传统远远超过了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影响，更适宜于进行系统的研究。"[②]哈贝马斯不断地将他的思想与马克思联系起来，自觉地认同于马克思主义。[③] 但是，他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美无缺的理论，因此可以拿来就用。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少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中，有滑入历史客观主义的危险。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不加反思地接受了历史哲学的遗产，为历史客观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埋下了隐患。后来，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那里，以及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那里，都表现出了历史客观主义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种纯哲学，也不是一种纯科学，而是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一种实证的科学，就会以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为样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反对在社会科学上借用弗洛伊德、米德、皮亚杰和乔姆斯基等人提出的研究纲领，从而堵塞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乏明确的规范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规范基础问题。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不是"科学的"理论，而是"批判的"理论。马克思曾经认为，占有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然后予以唯物主义的颠倒，就会使社会理论成为批判的。仅仅通过对古典

---

① ［德］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答克吕格问》，载曹卫东选译《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7 页。

②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 页。

③ Rick Roderick, *Haberma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6, pp. 19－20.

自然法的本体论要求进行革新，或者对事件进行科学性的描述，只能陷入自然主义，而不能使马克思的理论成为批判的理论。所以，要使马克思的理论成为批判的，必须首先避免做出自然主义的结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低估了文化上层建筑的作用。马克思把社会进化限制在技术与组织、工具行为与战略行为的局部领域中，即限制在生产力的领域中，然而，社会进化不但表现在生产力的领域之内，而且还反映在生产关系的领域内，反映在世界观、道德观、制度系统中，反映在实践知识、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调解行为冲突的领域中。因此，哈贝马斯既在早期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中明确地阐述了社会进化理论，又在以后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给予了深化。①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哈贝马斯以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为什么经常涉及宗教问题，就是因为他们都强调上层建筑在社会进化和发展中的作用。

哈贝马斯曾声称他比马克思本人还了解马克思："我们可以毫不谦虚地利用晚辈者的优势说，我们能够比马克思本人更好地理解马克思。"②

哈贝马斯把马克思主义大体上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重建"一直是哈贝马斯理论学说构筑的方法论意识。何谓重建？哈贝马斯通过比较"复辟"(restoration)、"复兴"(renaissance)和"重建"(reconstruction)三个概念对此作了解释：

> **复辟**似乎意味着回到在此期间已经腐朽了的最初状况上。但是，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兴趣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历史一语言学的。**复兴**似乎意味着对一种在此期间已被人们所抛弃了的传统的更新。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③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早已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为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社会进化，所以重建历史唯

① Michael Pusey, *Jürgen Habermas*, Ellis Horwood Limited, 1987, p. 40.

② Haberma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by Hohn Biertel, Beacon Press, 1973, p. 212.

③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

物主义就是重新解释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①,而且,"对于当代社会分析来说(它研究的是现存社会结构的革新和适应能力的枯竭问题),社会进化的理论具有一种可以精确说明的系统的意义"②。

与马克思侧重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不一样,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更重视由文化、道德、法律、制度和宗教等所表现出来的规范结构的发展。哈贝马斯说:

> 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摆脱目的论的世界观。要我说,这种目的论的世界观始终隐藏在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潜在规范假设当中。我信奉的不是生产力理性——所谓生产力理性,说到底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理性;我信奉的是集中表现在社会解放斗争中的交往生产力。交往理性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为争取人民主权和人权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最终积淀在了民主法治国家的结构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机制之中。③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社会进化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发展的逻辑:一是社会同一性问题,二是合法化问题。社会同一性和合法化共同表现了哈贝马斯分析社会文化的取向,哈贝马斯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

> 我对文化发展、宗教、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以及现代艺术的兴趣,一句话,我对文化价值转向的兴趣,并非只是消极的。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从文化发展、宗教、法律和道德意识以及现代艺术这个蓄水池中汲取的东西越多,政治和行政管理为了创造群众的忠诚,就越是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手段难以达到的文化领域上头,它们也就越是依赖于储藏在"文化资本"——请允许我在这里借用我的朋友布迪厄的概念——当中的学习潜能和丰富经验。……在不放弃唯物主义原理的情况下,我们同样可以在历史过程当中找到其具有重要文化内涵的先锋作用。④

3. 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

---

① Michael Schmid, "Habermas's 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 in John B. Thompson and David Held eds.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2, p. 162.

②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9 页。

③ [德]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答克吕格问》,载曹卫东选译《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7—508 页。

④ [德]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答克吕格问》,载曹卫东选译《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9 页。

哈贝马斯之所以提出合法性问题，目的在于揭示发达的或晚期的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化危机。在他看来，由于缺失了其原有的规范基础，晚期资本主义更易于陷入合法化的危机。通过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可以找到克服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途径。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受到韦伯的影响，哈贝马斯是从韦伯的合法性概念来研究合法性问题的。韦伯的合法性概念是在讨论合法统治时产生的。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关于合法统治的概念必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秩序的合法统治的信念。韦伯认为，虽然统治者依靠强制性的权力可以使被统治者屈服，然而，如果要维持统治的稳定性，单纯依赖权力的强制性是不行的。

> 稳定的统治必须从单纯依靠权力转变到以权威为基础的政治统治，这种转变是通过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合法性信仰"来实现的。这种合法性的信仰指的就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说服人们去服从统治者而非反抗统治者的思想体系，所以我认为信仰在权威性的统治形式里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它为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依据，决定什么是正当的、合法的，什么是不正当和非法的，让人不但服从，而且乐意去服从。权威性的统治体系就是由人们的自愿服从和信仰体系构成的，它是由有权力发布命令的人和有责任服从命令的人们具体组成的组织。①

为了使人们对统治权力保持合法性信念，必须对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或辩护。韦伯认为，一切权力都要求自身得到辩护。

> 在我看来，统治权力与统治的合法性是统治的两个必备要素。如果说权力是强迫人们服从统治的能力，那么合法性就是那个促使人们服从统治的动机，合法性或者说正当性是权威统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力一起构成了权威统治的基础。统治者之所以会服从命令是因为他们相信统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只要有了合法性，不管统治者发出什么命令，被统治者都会服从。而如果被统治者不相信现存统治系统的合法性，则这个统治系统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是注定要崩溃的；相反，如果人们相信现存统治系统的合法性，那么这个统治就会是稳定的和有效的。②

在韦伯那里，合法性的基础揭示了"一种统治的有效性基础。换言

---

① 王威海编著:《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7 页。

② 王威海编著:《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8 页。

之，即统治者要求官员服从，以及二者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基础”①。比如，在有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作为统治权力基础的是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占有，这种不平等占有受到统治权力的维护和强化。为了使这种统治长期有效，必须让不同的阶级感到统治的合法性，确立合法化信念。

沿着韦伯的思路，哈贝马斯把合法性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也就是对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给予论证。“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种政治制度的尊严性。”②

一种政治制度是否稳定，与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们在事实上承认这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往往是在一种政治制度遇到合法性争议的时候。即有的人承认它的合法性，另外的人否认它的合法性。在合法性产生争议时，就出现了合法性冲突。合法性冲突既可以促进合法性论证的发展，也可以造成合法性危机，即致使一种政治制度失去其合法性。失去合法性对一种政治制度来说，结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因为政治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它的政治结构为了应对危机必然会发生变化，政治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果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均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就会导致通常所说的社会革命。

哈贝马斯把合法性问题严格限定在政治制度上，只有政治制度才有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政治制度才需要合法性，也只有政治制度才会失去合法性。一般的社会性或经济性组织机构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如跨国公司等就没有合法性问题。当然这里所谓的政治制度不仅指具有严密组织和机构设置的国家政权，也包括国家产生之前的有一定组织的社会机构。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属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遭遇到了合法化危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阶级利益的冲突。哈贝马斯说：“由于一切阶级社会的再生产都建立在对社会生产财富的特殊占有基础上，因此，凡是这种社会都必须解决不平等却合法分配社会剩余产品的问题。”③因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阶级占有不同量的剩余产品，致使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统

①③ [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页。

②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2 页。

治阶级不再能在合法的范围内满足被统治阶级的要求，所以合法化危机就产生了。

哈贝马斯认为，虽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积极地避免危机，但并没有消除危机，而是转移了危机。哈贝马斯说：

> 文化系统越是不能产生足以满足政治系统、教育系统以及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短缺的意义就越是应该被可以消费的价值所取代。为非普遍利益进行的社会化生产所带来的分配方式，也受到同样程度的威胁。不可随意改变的规范结构，乃是获得合法化的明确界限。它们不能再给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提供意识形态资源，反而使之遇到无法满足的过度要求。如果这种诊断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说，只有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阶级结构得到改造时，或者，当行政系统所受到的合法性压力得到消除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合法化危机。①

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逐步失去民心：人民不再忠诚于它，不再跟随着它一起前进。不仅如此，只要对现存秩序合法性的信念消失，在制度系统中所蕴涵的潜在力量就会释放出来，人民不时地采取各种方式反抗这种制度。但是，哈贝马斯并不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最终会导致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设想通过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实践改造和完善现有的社会制度。

4. 交往理性

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来的社会批判理论一直把理性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研究，总是试图站在理性的立场上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用理性来构想和描述未来的充满正义的美好社会；并且区分了理性的不同类型，用实质理性来批判形式理性，用价值理性来批判工具理性。尽管早期批判理论的尝试没有成功，目标没有达到，理性却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就精神实质而言，哈贝马斯承袭了霍克海默等人的这一立场。因此，如果要从哈贝马斯的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中寻找一个最核心的范畴的话，那么这个最核心的范畴应该是（合）理性概念。可以说，哈贝马斯整个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理性建构起来的。例如，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思想、政治民主理论、规范伦理学学说都要求理性的对话和共识，而社

① ［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会进化和社会发展直至现代化则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虽然哈贝马斯继承了早期批判理论家重视理性的立场，但他并不赞同他们的狭隘的理性观念。哈贝马斯通过分析合理性概念，提出了他的交往理性学说。哈贝马斯从广义的知识论入手来界定合理性概念。他说："无论何时，我们一旦使用'合理的'(rational)这样一种说法，也就在合理性和知识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联系。"①从广义的知识论角度来看，"合理性更多涉及的是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如何才能获得和使用知识，而不是对知识的占有"②。从理性与知识的密切联系可以得出，一种表达的合理性取决于它所表达的知识的可信性；如果一种表达所体现的知识是可信的，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知识是否可信可以得到客观的检验，因此，表达的合理性可以还原为可批判性和可论证性。

从广义的认知意义上来理解合理性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理性类型：认知一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说：

> 我们如果把目的行为从非交往的角度对命题知识的运用作为出发点，就会作出一种有利于认知一工具理性(kongintiv—instrumentelle Rationalität)概念的预断；这种理性概念被经验主义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自我理解的烙印，具有丰富的自我论断的内涵，而且，通过对偶然的周围世界环境的深入占有和积极适应，这种自我论断还能够取得成功。反之，我们如果从言语行为对命题知识的交往运用出发，就会作出有利于另一种和古代逻各斯观念有着密切联系的理性概念的预断。这种交往理性(kommunikative Rationalität)概念的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到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③

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工具理性以成功为目的，而交往理性则以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为目的。交往理性是每一个有资质的主体的能力。为了达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主体必须采用可论证的话语；而可论证的话语必须满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要求。哈贝马斯说：

> 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

①②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 页。

③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 页。

解;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或陈述性内容,该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能信任他);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①

因此,满足了可论证话语的有效性要求,也就实现了交往理性。

本章小结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20世纪上半期,是围绕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形成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持续时间最长、包含人物最多、影响最大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是社会批判理论。迄今为止,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代: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霍耐特为代表的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试图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吸收西方历史和现代的各种思潮和各种学科的理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侧重于从文化和上层建筑方面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多方位批判,构建合理性的、民主的和法治的理想社会。

思考题

1. 法兰克福学派是如何产生的?
2.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3. 社会批判理论经历了几代? 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4.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如何批判启蒙精神的?
5.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如何批判工具理性的?
6.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如何批判文化工业的?
7. 哈贝马斯是怎样理解公共领域与民主的关系的?
8. 哈贝马斯是如何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的?
9. 哈贝马斯是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
10. 如何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①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阅读书目

1.[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霍克海默集》,曹卫东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5.[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6.《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8.[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9.[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第三章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

要点提示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性政治理论
◎新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
◎爱欲解放论

第一节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概述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试图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实际上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一、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之所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遇到了发展上的问题。

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学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主要观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无意识学说。

无意识(Unconscious)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出发点、理论基石和研究对象。无意识系统主要包括本能的冲动、被压抑的经验和各种欲望、情感、



意向等。这些本能的欲望并列存在着，它们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并具有强烈的心理能量，总是寻求各种时机渗透到意识领域，从而寻求满足。弗洛伊德不同意“心理的即意识的”这一常规说法，认为单纯用意识还无法完整地理解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如梦、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失言、精神病人的症状等心理现象只有通过无意识才能得到完满的解释。

第二，力比多学说。

力比多即人的本能，特别是指性本能。性本能作为一种本能、一种力量，其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不限于生殖活动，而是涉及一切有性意味的活动，它不仅是生理的，也是精神的；不仅是成人的，也是儿童的；不仅包括正常人，也包括变态的活动。到了后期，弗洛伊德又把性本能从作为一种动力的“力比多”概念泛化为一种包罗一切的生的本能，并认为它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内在驱动力。

第三，人格学说。

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构成。“本我”就是无意识，就是“力比多”的原始、本能的永恒冲动，它遵循“快乐的原则”，强烈地寻求发泄和满足。“自我”，就是意识或自我意识，它是一切感觉、知觉和理性思维的主体，是自觉活动的激发者。自我与外部世界直接相联系，它处于本我的欲望冲动(以求外界物质的满足)与现实的外部世界之间。它遵守“现实的原则”，即为了与外界现实相适应，对本我的欲望冲动与超我的压制欲望冲动这两种力量起调节作用。“超我”指的是后天的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所构成的下意识，它是一种盲目的是非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良心”。超我处于本我与自我之间，对本我的欲望冲动起抵制和压抑作用，它阻挠本我的欲望冲动任意闯入自我的领域。在正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这种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就会产生精神病。

精神分析学不仅是一种专业的心理学学说和精神病学学说，而且作为一种阐释人性、人格、人的本质的学说，还被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拓展到人类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哲学，一种社会历史学说，因此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

但当精神分析学被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领域时却遇到了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过分偏重心理因素，完全从人的本能、欲望中寻找人的活动、社会发展的动因；第二，把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人在本能满足和享受文明之间只能二者择一。在这种情况

下，一些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他们所需要的因素，因此试图综合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此找到走出弗洛伊主义困境的出路。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与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遇到的问题密切相关。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这个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不约而同地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意识和心理方面，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是导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去分析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心理意识，力图首先实现“意识转变”和“心理革命”。

为什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丧失了革命意识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如何分析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心理意识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那里找到现成的方法。此时，正值弗洛伊德主义在学术界风行，他们便在精神分析学那里发现了分析个人心理意识的方法，所以力图将弗洛伊德主义吸收、综合进马克思主义之中，把两者结合起来，以弥补马克思主义之不足，从而能够给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的心理意识方面的原因。

在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希，美国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成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20世纪20年代，以赖希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尝试综合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29年赖希出版《辩证唯物主义与精神分析学说》，标志着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36年，赖希在为他的《性革命》一书写的再版序言中，明确地使用了“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词，声称自己的学说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赖希之后，包括其学派领袖霍克海默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重要成员如弗洛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有关学说，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补充马克思主义，把两者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弗洛姆是最早综合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弗洛姆早年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极力主张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与法



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以建立“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致力于用弗洛伊德主义深化马克思主义，用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析、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哈贝马斯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看成是自我反思的科学。他利用精神分析学的相关理论探索了认识与兴趣的关系，创立了深层解释学，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20世纪中期，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框架内综合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研究了意识形态和主体问题。

除了上述学者的工作外，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革命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将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后殖民研究；最近，美国文化史家伊莱·扎列茨基(Eli Zaretsky)正在利用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世纪的文化史、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女性主义在西方盛行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又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发现了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她们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释了女性特点、性格、心理和社会地位，探究女性被压迫的深层原因，冲破女性天然从属和低等的意识形态迷雾，寻找女性解放的新途径。

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使两者相互补充，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并以此来理解、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基本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生物本能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规定人。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有生物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所以，人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既受生物本能控制，又受社会关系支配。

第二，将心理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是批判当代社会，但其社会批判理论既包含了心理批判，也包含了社会批判，将两种批判结合在一起。

第三，将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满意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注重社会革命而忽略心理革命，将心理革命纳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之中，把心理革命看成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是因为他们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有优点和缺点，而每一方的缺点正是对方的优点，所以两者具有互补的基础和可能。弗洛伊德主义以研究个人为主，强调了人的心理本能的作用，但忽视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马克思主义以研究社会为主，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但忽视了对人的深层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的分析。所以，无论是全面地理解人还是社会，都必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

为了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仔细地分析了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譬如，在他们看来，弗洛伊德主义主张个人的自我和超我是由无意识的本我塑造的，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社会的文化和制度是由根本经济制度塑造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功能类似于无意识的本我的地位和功能，社会文化的地位和功能类似于自我的地位和功能，社会的法律制度、警察和军队等类似于超我的地位和功能。

在分析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异同的基础上，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将两者综合起来。他们认为，弗洛伊德主义诊断的是个人的病症，而马克思主义诊断的则是社会的病症。因此，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借用精神分析的工具诊断社会病症，即通过分析其文化产品揭示一个社会的根本的经济制度的病症。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往往在“革新”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名义下，把弗洛伊德主义的有关内容吸收进马克思主义之中，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具体来说：

第一，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许多空白，弗洛伊德主义所具有的内容正是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内容，所以有必要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例如，赖希的性格结构理论就是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再如，弗洛姆对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就是用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力量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白”。

第二，用弗洛伊德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存在着缺陷，或者已经过时，需要用弗洛伊德主义进行改造。例如，赖希的“性革命”理论就是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改造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学说的结果。

第三，用弗洛伊德主义“深化”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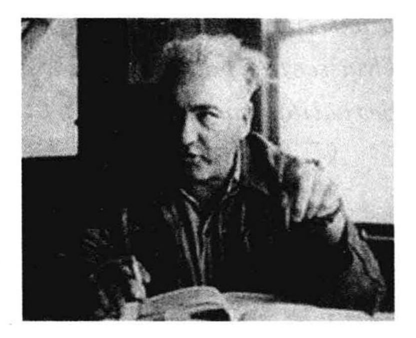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没有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应该用弗洛伊德主义来“深化”马克思主义。例如，马尔库塞认为，他的“爱欲解放论”就是用弗洛伊德关于爱欲是人的本质的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从而也“深化”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

第二节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赖希

(一)赖希的生平和著述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威廉·赖希(1897—1957)

赖希出生于奥地利加利西亚一个小村庄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12岁之前，赖希在家里跟随家庭教师学习，母亲去世后，他被送入中学学习。在中学学习时，他的拉丁文、希腊文和自然科学成绩优异。1914年，赖希的父亲去世，他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管理自己家的农场。1915年，赖希中学毕业。但正是在这一年夏天，俄国军队入侵了他的家乡，他逃亡到了维也纳，变得一无所有。1915至1918年，赖希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退役后，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读书。

在大学期间，赖希开始迷上了弗洛伊德的学说。赖希第一次见到弗

洛伊德是在1919年，当时，他为了获取性学讨论班的资料拜访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赖希成为弗洛伊德最喜欢的学生之一。1920年，弗洛伊德允许赖希见习精神分析的治疗。同时，赖希加入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成为其正式会员。1922年，赖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开始从事精神分析的实践，不久便担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诊所的副主任。

1927年，赖希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他在维也纳工人区建立了精神分析诊所，竭力把精神分析治疗和社会主义政治结合在一起。1930年，赖希移居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为了将性政治发展壮大，他在德国建立了更多的精神分析诊所。但1933年因其学说与德国共产党的理论相冲突而被开除出党，1934年因政治原因又被开除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同时，因纳粹的迫害，赖希离开德国，前往丹麦和瑞典。

1939年，赖希前往美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研究生命能的工作。1942年，他建立了一个研究生命能的研究所，制造了生命能储存器，开业医治一切肉体和精神上的疾病。1954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当局宣布赖希的生命能储存器是骗人的装置。1956年，美国法院判处他两年徒刑。1957年，赖希猝死于监狱之中。

为了表明他的思想，赖希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最能表现他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精神分析》(*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Psychoanalyse*, 1929)、《性格分析》(*Charakteranalyse: Technik und Grundlagen für studierende und praktizierende Analytiker*, 1933)、《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 1933)、《文化斗争中的性》(*Die Sexualität im Kulturkampf*, 1936)等。

(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性政治理论

赖希是第一位自称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是第一位系统地综合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赖希那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式形成。

1. 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曾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是不相容的”[①]。但赖希则反其道而行之，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

① Benjamin Nelson(ed.), *Freud and the 20th Century*, Meridian Books, 1957, p. 124.

为什么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可以结合起来呢？赖希从分析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和各自的缺陷出发，论证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赖希认为，精神分析学的心理结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非但不是彼此矛盾，而且还存在着许多相同点。

第一，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理论。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与之相似，精神分析学也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为什么说精神分析学也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呢？赖希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描述的过程具有唯物主义性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把焦点集中在真正的人类需要和经验上面，把爱欲和饥饿这样的具体物质事实作为理论出发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反对唯心主义，承认生物基础对于心理活动的优先性，全部心理活动，不论其性质如何，都是生物因素的产物。

第二，它们都是辩证的理论。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精神分析学同样也贯穿着辩证法的原则。赖希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是一种"冲突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在谈论自我和社会时，并不强调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一致，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对抗，这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原则。比如，弗洛伊德主张有意识行为和无意识生活之间、本能的动机和社会的法律道德之间均存在着冲突。弗洛伊德还揭示了一系列辩证的心理过程如爱与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和转化。

第三，它们都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精神分析学在本质上也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尽管从表面上来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一种"个人心理学"，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因为它为探索决定人的行为的神秘深度开辟了道路，为个人的自我启发和自我创新实践奠定了基础，为人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解放工具。正像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一样，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了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批判；正像马克思主义是用社会学表述的人意识到了的经济与政治压抑的规律一样，弗洛伊德主义是用心理学表述的人意识到了性压抑的规律。

其次，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但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还具有各自的缺陷，而它们的缺陷是由各自研究范围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第一，弗洛伊德主义的缺陷是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现象的深刻原因。

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主要是一种个人心理学，它虽然可以分析个人的心理现象，却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范围主要限于个人，限于个人的无意识。

精神分析学在研究物质基础与个人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时得心应手，但不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探索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精神分析学的这一缺陷使得弗洛伊德主义摇摇欲坠。赖希说："精神分析曾一度在生活的源头上进行工作，但它没有意识到它的社会本质这个事实，是它大灾变地衰落的主要原因。"①

赖希详细地说明了精神分析学的局限性：(1)忽视了任何心理过程、人的行为表现(无论是本能的还是自觉的)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忽视了精神病的社会根源；(2)把人的行为完全说成是由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决定的，抛开外部世界来理解人的活动动机；(3)认为艺术和科学能替代本能的满足，文化和文明是在某些受压抑的迫切欲求的推动下创造出来的，是某些无意识冲动的升华；(4)认为人类文明同人的本能是相对立的，从而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目标看作是乌托邦的梦想；(5)假设在人的原始本能冲动中存在着"死亡本能"，从而得出了人类不可能从无知、奴役和侵略中解放出来的悲观结论；(6)将性压抑与经济奴役和政治奴役割裂开来，不把性压抑看作是经济奴役的一个工具。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是不能充分说明个人的心理过程。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它虽然深刻地说明了社会现象，却没有深入分析个人心理现象。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限于社会方面，限于政治经济方面。

马克思主义虽然也研究个人的精神，但它的注意力主要在人的精神的理性方面，没有认真地对待人的精神的非理性方面、无意识方面。赖希认为，行为越是理性的，无意识心理学的作用场越窄；行为越是非理性的，无意识心理学的作用场越宽。

在赖希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它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革命学说上。

在意识形态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把意识解释成是各种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怎样变成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承认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自主性，但没有进一步解释意识形态在

① Reich, *Reich Speaks of Freud*,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 267.



实践中怎样反作用于各种经济发展过程。结果马克思主义者简单地用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来说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用被压迫阶级在经济上的相对软弱来说明革命的失败。赖希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粗陋的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革命学说上，马克思主义把革命归结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即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将其他社会领域（如家庭、学校、教会等）的变革排在政治经济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只关注整个社会的“宏观革命”，而忽视了个人的“微观革命”；只关注外部世界的革命，而忽视了人们心理意识的“内部结构”的改造。

赖希认为，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而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各自的缺陷则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必要性。

2. 性格结构

赖希把性格结构学说看成是沟通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桥梁。那么，什么是性格结构呢？赖希将性格结构规定为每个人把其有组织的习惯带到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的行为的内在化范型，它代表一个人存在的方式，并且是他的一般的过去的一种表现。

赖希认为，性格结构最初根源于针对外部的压力和威胁，由“规避态度”所组成的“自我陶醉的保护装置”，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它都反映出个人在儿童和青春期中所遭遇到的压抑，形成和发展性格结构的动力则是对惩罚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恐惧。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家长、教师、牧师都对其性格范型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性格结构在开始时是针对外部世界而建立起来的防护，但在成熟以后，却主要是针对着内部危险，即反对自身的难以控制的冲动的。在这种场合，性格结构堵塞冲动并使冲动的能量改道。这时，性格结构既是压抑的代表，又是对由于受压抑而产生的焦躁的控制者。

赖希认为，性格结构的功能不仅体现在生物学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社会方面。因此，每一种社会制度都会塑造出适应它的需要的性格结构。赖希说：

> 每个社会制度都创造出为保护自己所需要的那些性格形式。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借助于教育和家庭制度，通过使它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保证它的地位。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件把意识形态、态度和概念加诸社会成员的事情。倒

不如说，这是一件在每个新的一代中都是影响深远的事情，是一件在人民的一切阶层中形成符合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心灵结构的事情。[1]

赖希认为，他的性格结构理论是批判地继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产物，用性格结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就是实现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在赖希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不能正确地解释经济发展过程是怎样转化为意识的；二是不能正确地说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而性格结构理论正好弥补了这两个缺陷。

首先，关于经济发展过程向意识的转化。

在赖希看来，只要理解了性格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也就能解释经济发展过程如何转化为意识。家庭、学校、教会在性格结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它们都是特定经济状况的产物，都处于特定的经济关系之中，总与一定的经济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家庭、学校、教会创造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必需的那种样式的性格结构的过程，也就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过程转化为意识的过程。所以，家庭、学校、教会是经济发展过程转化为意识的发生地，它们促成和体现了经济过程向意识的转化。

赖希认为，把意识形态埋置在个人性格结构中的主要工具是家庭。他说，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发展得更好或者更坏，那全都是家庭生活的冲突和危机的结果。儿童及其父母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他成年经验的轮廓。不仅个人，而且整个民族、种族的命运，就是在家庭这个狭隘舞台的限制内决定的。所以，虽然家庭是特定经济状况的产物，但它又通过抚养儿童的过程创造出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必需的那种类型的性格结构。所以，必须注意一定历史时代的家庭结构和儿童抚养实践，才能理解经济现实是怎样反映到政治、伦理和宗教中去的，才能理解经济制度本身是怎样得到表现的。

其次，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根据赖希的观点，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地放进人的头脑中的，而是“被锚进个人的性格结构中的”。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内在化于性格结构之中，性格结构体现着意识形态。因为性格结构具有独立性，所以意识形态也具有独立性。

埋置在性格结构中的意识形态不是轻而易举地形成的，而它一旦形

[1] Reich, *Character Analysis*, New York, 1980, p. 17.

成，也不会轻易地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消失而消失，它还会顽强地起作用。一定的阶级或集团不按照它自己的经济利益来活动，是因为它的经济利益还没有来得及转变为埋置在它的性格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如果被压迫阶级不起来推翻压迫它的社会制度，是因为它的性格结构中还存留着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埋置在性格结构中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变革总是落后于经济发展过程。

3. 性革命

赖希认为，正是性压抑所造成的性格结构，才促成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及猖獗，维持着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所以只有实行性革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什么是"性革命"呢？赖希所说的"性革命"是一种微观革命，在赖希那里，微观革命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教育革命，甚至劳动条件的改善、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的变化等都属于微观革命的范围。性革命是微观革命的核心，其他方面的微观革命都必须围绕着性革命来进行。

首先，在赖希看来，性革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性革命能带来性健康，而性健康就是人的自由和幸福。

赖希认为，在现实社会里，绝大多数人的性生活是不健康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处于性压抑之中。家庭、学校、教会、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无不强化人们的性压抑状态，使人们形成"顺从"的性格结构。性革命就是创造条件，将不健康的性生活引入健康的轨道，使人们得到性解放，从而对爱情生活感到满意。赖希通过论证得出结论说："生活幸福的核心是性的幸福。"①

第二，性革命能创造新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助产婆。

赖希认为，统治阶级既不是靠手中的权力、军队、监狱这些镇压工具，也不是靠占有剩余价值这种经济手段，而是通过压抑人们的性本能创造出为保护自己所需要的那种性格结构，来奴役人民，维护统治制度和秩序。他认为，性压抑是政治压迫和经济奴役的一个主要工具，当经济条件需要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时，就要压抑广大人民群众的性本能冲动，使他们的心灵结构适应于这种经济结构，使阶级关系得到稳定和巩固。

在赖希看来，既然性压抑是统治阶级用于维护自己统治的主要支柱，

① Reich,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4, p. xxvi.

那么一旦性革命推倒了这根支柱，整个统治机构便会土崩瓦解。性革命不但是一种旧制度的破坏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新制度的建设力量；性革命不但破坏旧世界，而且也建设新世界。所以，“应当把性革命看作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必由之路”①。

其次，赖希用他的性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进行了改造。

第一，用微观革命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宏观革命论。

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革命是一种宏观革命，而他所讲的性革命是一种微观革命，仅有宏观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补充以微观革命。

根据赖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革命论的特点是：把革命的动因归结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压迫和在经济上受剥削，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不可避免的发展的结果而到来的；把革命的目标仅仅说成是使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获得解放，使无产阶级拥有像今天资本家所拥有的那么多的财富；把革命的方式仅仅理解成是一种政治战，即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他说：“不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发现是多么辉煌，多么具有重大意义，它本身尚不能解决人类奴役和自我征服问题。”②

因此，用性革命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既包含宏观革命，也包含微观革命。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一方面可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家庭、社会培养人、教育人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实现外部世界的革命化，另一方面可以改造群众的内部的心理结构；一方面可以组织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制度的斗争，另一方面可以解除人们的性压抑，使人们获得性解放。

第二，用本能斗争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论。

马克思主义主张，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一切革命斗争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赖希认为，把一切革命斗争都归结为阶级斗争的观点是片面的，它没有看到革命斗争不仅仅包含阶级斗争，还有其他方面的斗争。

赖希认为，阶级处境与性格结构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性格结构并不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产生于自然的、永恒的原始本能需求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有这些原始本能需求，原始本能需求危机所包含的矛盾实际上是社

---

① Reich,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4, p. 275.

② Reich,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4, p. xxvi.



会全体人员同压抑人们原始本能需求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他说：

> 在性格结构上，存在着经济和社会的压制，但没有阶级的区别，……在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有进步的思想和行为，同样也都有独裁主义倾向，（消除旧的性格结构的斗争）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具有自由结构的人与具有独裁主义性格的人作斗争，是有着自由能力的上层社会阶级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所有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营垒中上升起来的独裁者作斗争。①

这种本能斗争的实质就是性革命，性革命的手段是消除性压抑，性革命的目标就是性解放。

二、弗洛姆

（一）弗洛姆的生平和著述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

弗洛姆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家中的独子。1918 年，弗洛姆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的法律。1919 年，弗洛姆转入海德堡大学，在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Heinrich Richert）的指导下学习社会学、精神病学和哲学。1922 年，弗洛姆获得海德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弗洛姆（1900－1980）

毕业后，弗洛姆在海德堡精神分析诊所学习精神分析治疗，1927 年独立执业。1930 年，弗洛姆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一员。纳粹上台后，弗洛姆跟随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移居美国，加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弗洛姆在组织上同法兰克福学派脱离了关系，与著名美籍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等人创立了新弗洛伊德主义并发起成立了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学会。1943 年，弗洛姆

---

① Reich,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4, p. xv.

协助建立了华盛顿精神医学院的纽约分部。1946 年，他联合他人创办了威廉·艾兰森·怀特精神病、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研究所。1941 年至 1949 年，弗洛姆任职于本宁顿学院。1949 年，弗洛姆来到墨西哥，应聘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在其医学院中建立了精神分析部。1965 年，弗洛姆从墨西哥大学退休。同时，从 1957 至 1961 年，弗洛姆还担任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教授。1974 年，弗洛姆从墨西哥城移居到瑞士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上，安度晚年。

弗洛姆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从事精神分析的教学，自己还独立执业，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同时，为了推动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他还撰写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弗洛姆的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1941)、《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1947)、《精神分析与宗教》(*Psychoanlysis and Religion*, 1950)、《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 1955)、《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 1956)、《弗洛伊德的使命》(*Sigmund Freud's mission; an analysis of his personality and influence*, 1959)、《马克思的人的概念》(*Marx's Concept of Man*, 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1962)、《人心》(*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 1964)、《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Socialist Humanism*, 1965)、《人性》(*The Nature of Man*, 1968)、《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局限》(*Greatness and Limitation of Freud's Thought*, 1979)等。

(二)新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

弗洛姆既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许多学术活动都是在努力综合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综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共同前提。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两位思想家具有共同的基本前提，这是他们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的土壤，也是二者综合的共同前提。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具有以下共同的前提：

第一，“我们必须怀疑一切”。

这句话体现了批判精神。批判精神是现代科学的特点，在自然科学中，被怀疑的对象主要是有关感觉、道听途说和传统意见的证明，而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怀疑特指人对自身及他人所作的思考。



马克思认为，我们对我们自身和他人所作的思考绝大部分都是纯粹的幻想，是掩盖了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而弗洛伊德也以同样的批判精神进行思考，他的整个精神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怀疑的艺术”。弗洛伊德的试验表明，一个处于昏睡状态中的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相信显然是不真实的现实，那些不处在昏睡状态中的人的大部分思想也是与现实不相符合的，大部分实际存在的现实又都是没有被意识到的。

> 在马克思看来，基本的实在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弗洛伊德则认为，个体的力比多组织才是基本的实在。但是，两人对充满人们头脑的、并且被人们误以为是构成现实基础的那些陈旧思想、合理化和思想体系均持同样坚定的怀疑态度。①

第二，“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这句话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指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全部的人性，因此，人所具有的，每个人都具有。

> 马克思继承了以伏尔泰、莱辛、赫尔德、黑格尔和歌德为杰出代表的人道主义传统。弗洛伊德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无意识这个概念中。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无意识的冲动，因此，人们一旦敢于深掘无意识这个隐蔽的世界，人们就会相互理解。②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反对传统习惯势力，反对传统社会秩序，反对异化，捍卫人的自然和社会权力。所有这些，都是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范围。

第三，“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

这句话体现了真理的解放力量。马克思希望人类从异化和经济奴役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赢得大多数人的心。然而，赢得人心并不是通过煽动性的宣传来影响人们，而是求助于对现实的认识，求助于真理。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虚假意识的支配之下，靠幻想活着，而真理则揭示了各种幻想和意识形态掩盖下的现实。

弗洛伊德也相信，只有依靠理性的力量，揭穿假象、获得对现实的认识，才能达到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即使病人认识到他的思想具有虚假的性质，从而能够把握这些思想后面所掩盖着的现实。正是理性和真理使精神分析法在一切治疗方法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

---

① ［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 页。

② ［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 页。

弗洛姆认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都不是把真理作为最终目的，而是把真理看成是一种解放的武器。在马克思那里，真理是引起社会变革的一种武器，而在弗洛伊德那里，真理则是引起个人变革的一种武器。

> 马克思认为，"要求丢掉有关现实状况的幻想，也即要求取消需要幻想的这样一种状况"。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也作了同样的说明。他俩都希望人类从他的幻想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其目的正是为了把他唤醒，使他能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行动。①

第四，"都是运用动力学和辩证的方法来研究现实的"。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尽管都有其思想先驱，但都是第一次运用动力学和辩证的方法来研究现实的，他们各自对社会和人进行了研究。

>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这个结构具有各种不同的、矛盾着的，然而却又是可以被认识的力量。对这些力量的认识能使人们了解过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能预测未来——这种预测并不是指将来必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指人们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所必须作出的抉择。
>
> 弗洛伊德则发现，人作为一个精神实体，是许多动力的一种结构，其中有好些力还是矛盾着的，且充满着能量。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这些力量的本质、强度和方向，以便了解过去，预先对未来作出选择。②

总之，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思想乃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这种共同性为两者的综合提供了可能性。

(2)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贡献和局限。弗洛姆青年时代的现实经历为他热衷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创造了条件，使他在 20 岁一接触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时，便迫不及待地研究起来。

> 这些有关个人和社会现象的问题使我深感棘手。我急切地要求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体系中，我找到了答案。然而，这两个体系间的不同之处也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我很想解决这些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获得的知识越多，我就愈加怀疑这两个体系中的某些论断。我的主要的兴趣也就变得更明确

① [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 页。

② [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 页。



了。我要认识支配个人生活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也就是人在其社会生存中的规律。我也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那些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是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评这两位思想家后，我最终达到了一种综合。①

弗洛姆十分推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做了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最高的艺术性，最高地体现了人类渴求理解、渴求知识的需要。

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远远地超过了弗洛伊德，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不能望其项背。

> 马克思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型科学奠定了基础。这门科学既是经验科学，同时又具有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精神。尽管这一人道主义的精神遭到了许多挂着马克思招牌的理论体系的否定和歪曲，但是，我相信，西方人道主义的复兴一定会恢复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中的突出地位。②

虽然弗洛伊德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他的重要地位。“弗洛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无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因为它业已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③

在弗洛姆看来，虽然马克思从社会经济的方面考虑了“人类行为的愿望和志趣”，但是他的理论有其片面性。他过分地强调了人是理性动物的一面，强调了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人的行为的作用，而忽略了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忽略了心理因素，即本能的欲望冲动对人的行为的作用。

而弗洛伊德虽然对人的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关于“社会文明是社会病害的根源”这一观点的提出是他的“巨大的历史功绩”，但他的理论也有其片面性。他只强调欲望冲动对人的行为的意义，却忽略了社会环境或社会文化对人的个性的影响，这是其理论的不足之处。

---

① [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② [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③ [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因此，弗洛姆断言，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新人道主义”的理论，它们都对人的学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前者从个人的心理方面，后者从人类的社会方面，为人类解放指出了前途和方向。但两者各有局限，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完美的理论。因而他认为，当前迫切的任务是把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各取所长，互补其短，把它们融合成为一种“完美的”批判的社会理论。

2. 规范人道主义

弗洛姆在综合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人道主义学说。规范人道主义(normative humanism)是贯穿弗洛姆主要著作中的一条主线，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人道主义批判、人道主义伦理学和健全社会构想。

(1)人道主义批判。人道主义批判是对现代社会的病态和现代人的全面异化进行批判。弗洛姆在重新解释异化的基础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现代人的全面异化进行了剖析。什么是异化呢？弗洛姆说：

> 所谓异化，就是一种经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可以说，他同自己离异了。他不觉得自己是他那小天地的中心，是他本身行为的创造者——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则成了他的主人，他服从这些主人，也许还会对主人顶礼膜拜。异化了的人同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了联系一样。①

弗洛姆认为，虽然异化现象作为一种病态的形式自古就有，但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 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几乎存在于各种情况中，存在于人与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等关系中。人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构筑了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人建造的技术机器。但是，他所创造的一切却高踞于他之上。他没有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中心，而觉得自己是他的双手创造出的机器人的奴仆。人释放出的力越大，人越感到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无能为力。面对创造物体现着的他自己的力量，他同自己离异开来。他被他所造的物控制着，失掉了自控能力。②

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异化的情况相当严重，不仅存在着劳动异化，而且还存在着政治异化、科技异化、消费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等等。

---

①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1 页。

②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5 页。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结果造成了人自身的异化。弗洛姆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则是人可能成为机器。

(2)人道主义伦理学。弗洛姆在分析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异化的基础上，综合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观点，提出了系统的人道主义伦理学。

弗洛姆认为，一切伦理规范的确定必须以对人本身的认识为依据，而研究人性最终则是为确立伦理规范服务的。所以，"人道主义伦理学是以理论性的'人的科学'为基础的'生活艺术'的应用科学"①。

那么，什么是人性呢？弗洛姆认为，人性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动物性和社会性。首先，人具有动物性。人像其他动物一样，具有自我保存的本能，包括吃喝、性等方面的需求。这种自我保存本性是人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任何社会首先关注的就是满足人的这一方面的本性。其次，人还具有社会性。即使人满足了最基本的需求，但人并不由此感到幸福。除了要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之外，人还在不断地追求别的东西。所以，对人来说，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只是一个开始，他还要追求社会性的东西。弗洛姆说：

> 虽然有些需求，例如饿、渴、性，是人所共有的，但是还有些冲动，例如爱与恨、贪求权力、渴望屈从、对感官满足的津津乐道、对感官满足的恐惧害怕，则构成了人的性格的区别，而后者都是社会过程的产物。人的倾向，无论是最美好的还是最丑恶的，都不是人的固定的和生物学天性的一部分，而都是创造人类的那一社会过程的产物。……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一种文化的产物。②

弗洛姆认为，人道主义伦理学以人为核心。在形式上，它以这条原则为基础：只有人自己(而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威)才能规定善恶的标准；在内容上，它建立在这条原则之上：对人有好处的谓之"善"，对人有害处的谓之"恶"。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人的幸福。

以人为中心，弗洛姆在他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中详细分析和论证了人的性格、善恶、自私、自爱、自我利益、良心、快乐、幸福、人的道德力量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在弗洛姆看来，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一种"真正的人"。

> 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如果人活着，他便知道什么是可允许的。

① [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7页。

② [美]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而且，具有活力意味着具有生产性；意味着运用自己的权力，这并非为了超越于人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人自己；意味着认识人存在的意义，并成为真正的人。①

这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人：

精神健康的人是富于建设精神、没有异化的人；他与世界友爱地联系着，用理性客观地把握现实；他体验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别实体，与此同时，又感到同他人联系在一起；他不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而乐于接受良心和理性的合理权威；只要活上一天，他就不停地在诞生，并且把生命的赠礼当成最宝贵的机会。②

(3)健全社会构想。精神健康的人需要健全的社会，只有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人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弗洛姆的社会理想目标就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弗洛姆认为，人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各式各样的批判都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工业制度下人的处境："尽管他们以不同的概念表达了这一点，但他们都发现，人已失去了他的中心地位，变成了达到经济目标的工具，人已经同他人、同自然相疏离，失去了具体联系，人的生命已不再有什么意义。"③

人的这种处境实际上是由不健全的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而不健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等方面：政治上不自由、经济上剥削和精神上的压抑。因此，治疗现代人的病症的前提就是建立健全的社会，而建立健全的社会则必须使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发生变革。弗洛姆说："只有在工业和政治组织上、精神和哲学方向上、性格结构和文化活动方面同时发生变革时，才能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只注意某一个方面的变化而忽视其他各个方面，对整个变化来说是有害的。"④

弗洛姆认为，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迈进一步，也比在单独某一个领域中迈进一百步要重要得多、有效得多。以前的理论的缺陷正是在于只宣扬某一方面的进步，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进步。比如：

基督教宣扬精神更新，却忽视了社会秩序的变革；而没有社会秩

① [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224 页。
②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0 页。
③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5 页。
④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6 页。

序的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精神更新势必不起作用。启蒙时代提出，独立的判断和理性是最高的准则，鼓吹政治平等，却没有看到，如果没有伴随而来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化，那么，政治平等就不会导致实现人的友爱。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实现社会经济变革，却忽视了人的内心变化的必要性；而没有这种内心变化，经济变革也决不能导致"美好的社会"。过去两千年来的这些伟大的改革运动都分析强调了生活的一个方面而排除了其他方面；它们的改革更新的建议都是激进的，结果却几乎都完全失败了。[①]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呢？弗洛姆说：

什么样的社会符合精神健康这一目标呢？一个健全社会的结构会像什么样呢？首先，在这一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地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无法利用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必要的品质，而机会主义和纪律松懈则被看作是不合群的自私行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的事因而也成了个人的事；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也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再分离。此外，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和可观察到的领域内，积极而又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一个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成员友爱相处；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创建性活动，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②]

三、马尔库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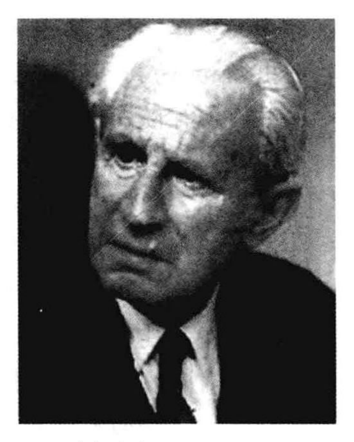
(一)马尔库塞的生平和著述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被称为"美国新左派之父"。

马尔库塞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军队中服役，加入士兵委员会，参加了流产的社会主义斯巴达起义。

①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6—267 页。

②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0—271 页。


马尔库塞(1898—1979)

1917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不满该党叛变革命、实施暴力的行径而于1919年退出。1922年,马尔库塞在弗莱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柏林出版行业工作了六年。1928年,他重返弗莱堡,在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指导下学习哲学,同时在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指导下撰写任职资格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Hegel's Ontology and Theory of Historicity*)。但因与海德格尔政治观点相左,他离开弗莱堡,到法兰克福加入了由霍克海默领导的社会研究所。

1933年,马尔库塞撰文评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同年,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马尔库塞跟随社会研究所迁往瑞士日内瓦。1934年,又迁往美国。1940年,他成为美国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库塞任职于美国陆军情报部门,负责反对纳粹的宣传工作。1943年,他转到战略情报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战后,他任美国国务院中欧处的负责人,直到1951年。1952年起,马尔库塞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布兰代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哲学和政治理论。

马尔库塞的思想对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本人也积极地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成为造反学生的代言人,因此被称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青年造反者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被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并称为三"M"(Marx、Mao、Marcuse)之一。

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有:《权威研究》(*A Study on Authority*, 1936)、《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1941)、《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1955)、《苏联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1958)、《单向度的人》(*One — Dimensional Man*, 1964)、《否定》(*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1968)、《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 1969)、《反革命与造反》(*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1972)、《审美之维》(*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1978)等。

(二)爱欲解放论

从思想渊源来看,马克思、黑格尔和弗洛伊德是对马尔库塞影响最大的三个思想家。马尔库塞从黑格尔思想的角度来诠释马克思的学说,形成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随后又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补充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尔库塞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赋予了他的革命和解放学说以不同的特色。

1. 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认为,他之所以把弗洛伊德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仅忽视个人的解放,而且忽视心理、本能,而这已经不能阐释发达资本主义状况下革命意识的危机。

马尔库塞将资本主义划分成两个阶段,以 1929 年为界,之前是古典资本主义,之后则是发达工业社会。马克思的理论是对古典资本主义的概括,在古典资本主义阶段是正确的;但 1929 年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所以马克思的许多理论在这一阶段就失灵了。

马尔库塞断言,马克思在考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时,提出了两个并行不悖的预言:一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将日趋崩溃;二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日趋腐朽,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将日益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将日趋高涨。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只证明了前一个预言的正确,而"否定"了后一个预言。这是由于马克思忽略了社会心理分析的缘故。因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由于实行国家干预经济和高生产、高消费政策,统治者对工人阶级的压制和统治,不再是经济的,而已转为意识形态的或心理的了。这时,人们不仅受统治者的外部的,即物质的压制和统治,而且,更严重的,还受内部的意识形态的压制和统治,即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以满足虚假的欲望,而不再有精神的追求,在心理上已麻痹消沉,完全失去"批判"精神了。因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再是与革命的高潮相适应,而是与革命潜力的低潮相适应的"。马尔库塞认为,这个事实恰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不足"的地方,必须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加以"补充"。

马尔库塞通过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把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

了爱欲解放论。

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和无意识，这是他的一大贡献。意识受现实原则支配，无意识则受快乐原则支配。无意识是先天地形成的，因而更能体现人的本质。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由生本能和死本能组成的。在马尔库塞看来，只有生本能才真正体现了人的本质。因为人首先是一种存在物，生本能与人的"存在原则"相一致。然而，马尔库塞不同意弗洛伊德将生本能归结为性欲，而认为生本能应该是一种爱欲(Eros)。爱欲是人的肌体追求快乐的普遍属性，它会使个人获得一种全面、持久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

马尔库塞赞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人的幸福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的思想。在他看来，既然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爱欲，那么，解放就是解放人的爱欲。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由于爱欲受到了压抑，使人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因此，为了使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本质，就必须解放爱欲。

第二，把弗洛伊德关于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被异化的观点相结合，发起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和摧残人性作了批判，但是由于马克思没有进一步明确地、具体地规定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他的批判也就缺乏可靠的标准。因此，必须用弗洛伊德的爱欲理论来补充，以便根据人的爱欲是否真正得到了满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劳动是否成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一种作为自目的的爱欲活动，从而确定人的本性在现代文明中是否受到压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压抑。

正是根据这一点，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表面的性自由背后是对爱欲的更严重的压抑。这种压抑主要表现为劳动的异化。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劳动分工的日益专门化，人们在劳动中从事越来越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操作，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在异化劳动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压抑着作为人的本质的爱欲，而且还把人的欲望和需要纳入整个资本主义秩序，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异化状态而麻木不仁。因此，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迄今达到的顶点，但同时也是爱欲受到压抑的顶点。



第三，把弗洛伊德对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根源分析与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分析相结合，论证了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

在弗洛伊德那里，文明与爱欲是对立的。弗洛伊德认为，爱欲的压抑是必然的、合理的，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提就是对爱欲的压抑，所以，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人类的爱欲被压抑的历史。但马尔库塞并不同意将文明与爱欲截然对立起来，在他看来，爱欲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凝聚力，它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因而也并不必然与文明相冲突。

为了进一步论证非压抑的文明的可能性，马尔库塞提出应该分析压抑的不同类型，以明确哪些压抑是基本的压抑，哪些压抑是多余的压抑。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克服这种贫困所需的劳动，要造就文化就必须对爱欲作一定程度的限制、克制或延迟。这是一种基本的压抑。而物质资料分配方式与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组织方式总是强加于人的，它们代表了特定文明阶段的统治利益，它们对人的爱欲所强行施加的压抑是在一般文明要求的基本压抑之外的、为维持特定统治形式所需的多余压抑。

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所以基本压抑已经基本不存在了。然而事实上，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的爱欲所受的压抑不仅没有消失和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地严重起来。显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压抑不是必要的压抑，而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多余压抑。因此，我们可以消除这种压抑，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性的文明。

2. 发达工业社会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为发达工业社会，所以必须将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发展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

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压抑社会，通过压抑消除了它的批判的基础，消除了它的对立面，使整个社会走向一体化。他说：

> 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着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当代社会似乎有能力遏制社会变化——将确立根本不同的制度、确立生产发展的新方向和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质变。这种遏制

> 社会变化的能力或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为突出的成就；在强大的国家范围内，大多数人对民族目标和由两党支持的政策的接受，多元主义的衰落，企业和劳工组织的沟通，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既是发达工业社会取得成就的结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①

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的单向度性或一体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领域里，它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因而消除了危害社会继续存在的政治派别。今天，不仅先前作为政治反对派而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放弃了暴力夺取政权的主张，而且一度是社会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也随着机械化对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的减低、随着蓝领工人白领化、随着非生产性工人的增加，而逐步丧失了其否定性和革命性，并与往日的敌手联合起来。

第二，在生活领域里，发达工业社会还使人的生活方式同化起来。工人和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游览同样的风景胜地，打字员和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连黑人也有了高级轿车。由于生活方式的同化，由于大家都分享制度的好处，以往那种在自由和平等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在文化领域里，高层文化与现实同一起来。高层文化本来与现实保持着距离，对现实进行超越和批判，但是今天高层文化与现实间的间距已经被克服。早期资本主义文学中那些反叛角色已经被征服，当代文学中那些歹徒、明星、荡妇、民族英雄、垮掉的一代、实业界巨头，都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只是想象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这样，表达理想的高层文化便不再能够提供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不再具有同现实有根本区别的另一向度。

第四，在思想领域里，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也标志着单向度思考方式、单向度哲学的胜利。实证主义、分析哲学把语言的意义同经验事实和具体的操作等同起来，并把既定事实无批判地接受下来，从而把多向度的语言清洗成单向度的语言。但是，既定的事实并不一定是应该接受

---

①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的事实，最重要的是，批判、推翻既定现实是哲学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去批判既定现实，那么就只能服从既定现实，顺从既定现实。所以，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也标志着肯定性思维的胜利。

总之，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不过，它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造成极权主义性质的主要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传播媒介而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简言之，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发达工业社会虽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但毕竟是一个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社会；虽是一个更有效地控制着人的极权主义社会，但毕竟是一个使人安然自得的极权主义社会。

3. 革命与解放

面对这样一个压抑爱欲的极权主义的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并没有悲观失望，相反，他论证了希望之所在。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富裕社会，人们过上了富裕的物质生活，不再贫困，然而，尽管人们的生活很富裕，但压抑、奴役和异化比任何时候都严重。所以，必须进行革命，消除人们所受的压抑，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

正是由于爱欲被压抑，因此当前的社会革命不再是推翻政权和改变经济制度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是改变人的心理结构，解除人的心理压制的"生物学的革命"或"心理学的革命"。他写道：

> 反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压制的革命具有奇特的非正统性质。它与历史上先前的革命很不相同，它反对的是富裕社会的人和事的商品化形式，和富裕社会所强加于人的假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原则，而并不涉及社会经济制度。①

在马尔库塞看来，政治解放离不开个人的解放，而个人解放归根结底只能是心理的解放。因此他认为，革命应当从"意识革命"或"本能革命"入手，排除人的心理上的压抑，使人们重新获得进行合理的批判的能力。

马尔库塞描绘了他的理想的社会"蓝图"：未来的理想社会不是建立

①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eacon Press, 1969, p. 57.



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而是一个没有任何压制，没有任何统治的爱欲解放的社会。他认为，到了那时，"多余的压制"已彻底消失，人们从现有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自由的时间变成个人生活的内容，工作变成了人的能力的自由发挥。爱欲关系将普遍化，并发展成为一种爱欲的文明，劳动则将永远废止而被游戏所取代。

马尔库塞承认他所描绘的这种理想社会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他认为乌托邦并不只是具有消极的意义，它还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乌托邦代表着对现实的批判，代表着超越现实，代表着美好的理想，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

那么，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革命力量是什么呢？马尔库塞否认无产阶级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力量。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的学说，是建立在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基础上的。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正确的。但到了今天，对于"发达工业社会"已经不适用了，因为它已经是"富裕的社会"了。工人阶级在物质生活方面已不再贫困，而是跟资本家一样"坐汽车"、"住大厦"，过着"豪华舒适"的生活，已经完全被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而是它的"肯定力量"了。既然工人阶级已完全丧失革命性，成了当前社会的肯定力量，自然，它不再是领导革命的阶级了。

马尔库塞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革命的主体力量是新左派。马尔库塞所说的新左派是一个庞杂的群体，既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包括社会的边缘人士。马尔库塞特别肯定了社会边缘人士的作用：

> 在保守的公众基础下面的是生活在底层的流浪者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生存在民主进程之外；他们的生活就是对结束无法容忍的生活条件和体制的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是从外部打击现存制度因而没有被该制度引向歧路；它是一种破坏游戏规则并在这样做时揭露该游戏是受操纵的游戏的根本力量。当他们为了争取最基本的公民权聚集起来走上街头的时候，没有武器、没有保护，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警犬、石头和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是每一次为法律和秩序的受害者举行政治示威的后盾。他们开始拒

绝玩游戏这一点，可能标志着一个时期终结的开端。①

马尔库塞认为，正是在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先知先觉的左派知识分子的鼓动，通过青年学生运动的催化，把发达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的革命力量，以及社会的边缘群体统统发动起来，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本章小结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是试图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使两者相互补充，创造一种新的理论，并以此来理解、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在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希，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成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赖希从分析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和各自的缺陷出发，论证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性格结构和性革命学说；弗洛姆从新弗洛伊德主义出发，指出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共有的思想前提，提出了规范的人道主义学说；马尔库塞则在综合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爱欲解放论。

思考题

1.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2.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基本特点？
3. 赖希是怎样论证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
4. 如何理解赖希的性革命？
5. 弗洛姆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共同前提是什么？
6. 弗洛姆的规范人道主义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7. 马尔库塞是如何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
8. 马尔库塞是如何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①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231页。

阅读书目

1.[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2.[奥]赖希:《性革命》,载《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4.[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5.[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6.[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7.[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四章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

要点提示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德拉一沃尔佩关于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关系
◎德拉一沃尔佩的科学辩证法
◎科莱蒂对物质辩证法的分析
◎科莱蒂的真正的唯物主义
◎科莱蒂的生产关系理论

第一节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概述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德拉一沃尔佩创立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个流派不同于此前的“人道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因而属于一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一、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大致产生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衰落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因素而得名。

从历史背景来看，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反叛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在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还是从第二国际到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都从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是典型的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方面用黑格尔哲学的术语解释马克思主义，挖掘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另一方面重视早期马克思的思想甚于重视成熟马克思的思想，因为早期马克思的思想表现了他们所赞同的人道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把黑格尔哲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直接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历史人学"和"人学辩证法"。

从第二国际到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把理解黑格尔哲学看成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在政治上，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党内和理论界开始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批判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苏共中央提出了"一切为了人"、"全民党"、"全民国家"等口号，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理论家也紧跟其后，从人道主义立场批判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摧残人的尊严、压制人的自由，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扯起反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股新的思潮。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意共党员德拉－沃尔佩。德拉－沃尔佩于 1944 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20 世纪 50 年代因提出重新从科学角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意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来自意大利共产党内，在意共中只能算是少数派。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在德拉－沃尔佩周围聚集了一批人。这些人包括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翁贝托·切罗尼(Umberto Cerroni)、马里奥·罗西(Mario Rossi)、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尼古劳·梅尔格尔(Nicolao Merker)、阿曼多·普莱比(Armando Plebe)、伊尼亚齐奥·安布罗焦(Ignazio Ambrogio)等人。他们赞同德拉－沃尔佩的基本观点，围绕着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份杂志《社会》宣传他们的观点，形成了一个重新科学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因此，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也被称为德拉－沃尔佩学派("school" of "Dellavolpians")。严格说来，德拉－沃尔佩学派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有着完全统一主张和核心学说的派别。正如戈尔曼所说："所谓德拉－沃尔



佩学派仅仅是几个对德拉一沃尔佩的观点有兴趣并加以发展的人，它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①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用含糊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解释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作了歪曲的理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之间存在着辩证法的连续性。前者强调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后者强调黑格尔的“总体论”和“异化”，都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

鉴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主张重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性文件，并对运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便从中引出正确的理论来，把潜在阶级斗争改造成为积极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试图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社会生产的具体过程进行批判和科学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阶级的历史发展进行具体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德拉一沃尔佩学派提出的观点一度强烈地影响了意大利共产党，致使党内一些人对意共的政策抱有怀疑态度。由于德拉一沃尔佩学派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与意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所以从 1961 年开始，意共中央将其斥之为“分裂主义者”。1962 年，意共解散了这个学派所把持的《社会》杂志。虽然如此，德拉一沃尔佩学派占据的《未来》和一些学生杂志仍然继续批评意共。为此，意共理论界也给予了理论上的反击，以维护意共的理论和政策。随着 1964 年科莱蒂退出意大利共产党，1965 年德拉一沃尔佩的退休，德拉一沃尔佩学派也就解体了。

虽然德拉一沃尔佩学派不再存在了，但他们所倡导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在意大利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65 年之后，德拉一沃尔佩学派的观点被意共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FGCI)的青年激进分子和罗马大学的共产主义学生逐步接受。这些人包括阿希尔·奥切托(Achille Occhetto)、米歇尔·费格拉里(Michele Figurelli)、奥古斯托·伊拉米那蒂(Augusto Illuminati)、皮奥·马库尼(Pio Marconi)和克劳迪奥·皮图西奥里(Claudio Petruccioli)等

① Robert A. Gorman(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Neo-Marxism*, Greenwood Press, 1985, p. 114.

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意共的领导成员。苏东剧变之后，意共开始重新考虑和评价德拉－沃尔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吸收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

二、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作为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理论观点，表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批判的人本学，不是非科学的人道主义。为此，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马克思早期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文本，特别是重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试图从《手稿》中挖掘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主张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不是截然对立的，应该统一地去理解马克思的整个学说。

第二，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否定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把马克思与黑格尔对立起来。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黑格尔式辩证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方法，辩证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尤其是否定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来源。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科学辩证法”，即“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的假设演绎法。在“科学辩证法”那里，事实的内在的真正的对立是非本质的对立，而黑格尔错误地把逻辑的对立与物质的对立、相互包含的对立与相互排斥的对立混淆起来了。

第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一般认为，自马克思去世之后，从恩格斯到第二国际再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是权



威的。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恩格斯以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成员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更倾向于对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

第四，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把伽利略、休谟、康德和卢梭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黑格尔哲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而是把伽利略、休谟等人的思想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把康德和卢梭的政治哲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的基础。

第五，新实证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证科学，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是实证科学的典范。新实证主义推崇从现代科学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实验方法，重视感性经验知识，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而得来的知识。新实证主义始终不遗余力地批判哲学和科学中的先验主义，认为从伽利略以来的现代科学巨匠无一例外地都反对和拒斥先验主义。新实证主义认为，诉诸经验，诉诸事实，诉诸实验，这正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逻辑和方法。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运用实证科学的立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坚持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奠定于严格的实验科学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作为实证科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实证科学一样，具有科学的精确性和预见性。

第六，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历史编纂学－文献学”的方式重建马克思主义。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必须以科学的精神，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力图免受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的影响。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大量地引证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原文，从原文中推导出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所以，从表面上看来，他们十分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他们的理论观点是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第七，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大关心现实的政治实践。

正因为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侧重于从理论和文本上重建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很少讨论现实的政治问题，极少说明他们的哲学和方法论问

题如何应用于现实的政治实践。

> 尤其是德拉一沃尔佩极少从高高在上的理论抽象层面屈尊探讨具体的历史或政治问题。他也不探索他的理论与政治实践直接关联的途径,他倾向于将政治实践留给职业的党的政治家。他的诘屈聱牙的文风使他的著作只限于一小部分精英读者的圈子里。①

后来他的学生科莱蒂描述他说:"一位老式的知识分子,他始终信守理论与政治之间的劳动分工。"②

第二节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德拉一沃尔佩

(一)德拉一沃尔佩的生平和著述

作为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德拉一沃尔佩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最有影响和最富创见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德拉一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 1895-1968)出生于意大利伊莫拉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军队中任下级军官。1920 年从波洛尼亚大学毕业之后,德拉一沃尔佩先是在中学教历史和哲学,后回到波洛尼亚大学教哲学史。1938 年起,德拉一沃尔佩任墨西拿大学哲学史教授。虽然他此后担任这一教职直到退休,但他本人并不喜欢,只是按照义务履行他的职责。在学术研究中,德拉一沃尔佩对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感兴趣,但 20 世纪 40 年代在对法国哲学家,尤其是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时,诱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



德拉一沃尔佩(1895-1968)

①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Polity Press, 1984, p. 430.

② Lucio Colletti,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 in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ed. by *New Left Review*, London, 1977, p. 323.



兴趣，使他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20 世纪 30 年代，德拉一沃尔佩逐步从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积极支持左翼政治运动。1944 年，他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一名成员。虽然在组织上德拉一沃尔佩并没有担任意共党内的重要职务，在理论上他却独树一帜，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成为意共党内一位颇具独创性的理论家。由于德拉一沃尔佩的独特学说和人格魅力，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意共党内一批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按照他的观点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德拉一沃尔佩学派”。

1957 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在许多教授纷纷脱离共产党时，德拉一沃尔佩是少数几个继续留在党内的教授之一。尽管德拉一沃尔佩尽力保持自己与组织的关系，但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意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相冲突，意共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解散了德拉一沃尔佩学派的思想阵地《社会》杂志。从此以后，德拉一沃尔佩潜心于理论研究，仍然继续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

德拉一沃尔佩去世后，他的学说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他的六卷本著作全集于 1972 年至 1973 年在罗马出版。德拉一沃尔佩的主要著作有：《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1950）、《卢梭和马克思》（*Rousseau e Marx*，1957）和《趣味批判》（*Critica del gusto*，1960）等。

（二）德拉一沃尔佩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德拉一沃尔佩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或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集中在他于 1957 年出版的《卢梭和马克思》一书中，正是这本书使他成为战后意大利最有影响、最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梭和马克思》包含两部分论文：一部分是政治论文，探讨了社会主义和自由问题；另一部分是哲学论文，探讨了科学辩证法问题。

1. 社会主义和自由

德拉一沃尔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自由问题。在他看来，自由问题是西方民主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德拉一沃尔佩说：

> 今天，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及随之而来的和平竞赛的可能性，这一现实指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的民族道路。为了清楚地表明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似乎比以往更有必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和自由（及民主）的关系问题。①

①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71.

德拉一沃尔佩首先提出了现代自由和民主具有“两个灵魂”的著名见解。他说：

> 现代自由和民主的两个方面或两个灵魂是：一个是公民的（政治的）自由，它是由国会的或政治的民主所建立的，在理论上是由洛克、孟德斯鸠、康德、洪堡和贡斯当提出的；另一个是平等的（社会的）自由，它是由社会主义民主所创立的，在理论上首先是由卢梭提出的，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或多或少地作了论述。①

德拉一沃尔佩所说的现代自由的两个灵魂实际上是指两种相互对立的自由：自由主义或没有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自由与社会主义或伴有社会公正的自由。

公民的自由或政治的自由即资产阶级的自由。从历史上看，公民的自由是“公民社会”（即由个体生产者组成的阶级社会）成员的自由或自由的组合。它包括个体经济自由的权利、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保护人身自由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等。其中的一些权利具有越来越大的普遍性，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公民的自由还包括法律上的政治手段，如国家的分权，将立法权确立为代表国家的权力，将资产阶级自由国家的议会制确立为一种制度等。

平等的自由或社会的自由表达了一个普遍的要求，它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要求他的个人的能力得到社会的承认。确切地说，平等的自由是一种体现社会公正的自由，是一种更大的、更有效的自由，是一种广大群众的自由。为了实现平等的自由，卢梭说，“培养出一些才能是防止贫困的最可靠的办法”，而恩格斯则提出了一种“保证（一切社会成员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公民的自由相比，只有平等的自由才是一切人的自由，充分发展了的平等主义的自由。

德拉一沃尔佩认为，平等的自由是由卢梭率先提出的。卢梭早在1755年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就已经详细地阐述了（平等的）自由。卢梭指出：

> 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

---

①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109.



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足、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①

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差别，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一个孩子命令着老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②

卢梭在这里明白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公民的社会等级必须根据他对社会作出的、同他个人的功绩和个人的条件——这种条件在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相称的贡献来具体规定，这意味着对一种有效的、普遍的平等问题的解决要求：不应当把平等同社会对任何人的潜力和自由毫无差别的认可等同起来，真正普遍的平等不应为此所决定和制约。

在德拉一沃尔佩看来，卢梭是马克思的先驱，卢梭的自由观是马克思的自由学说的来源。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自由的论点与卢梭的自由观的关系。平等的自由虽然是由卢梭首先提出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理论仍然是唯理主义的、人道主义—博爱主义的、阶级合作和调合的，这些使得它只能是一种不成熟的、多少带有猜测性的东西。只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后，关于平等的自由的思想才获得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德拉一沃尔佩提出公民自由和平等自由的目的不是把这两种自由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要在社会主义的平等自由中包容公民自由。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它们都需要一种去除了阶级属性的技术规范手段来达到政治稳定的目的，所以公民自由仍是整个自由观念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德拉一沃尔佩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法律中的平等的民主辩证地复兴了公民的自由。"③比如，苏联 1960 年颁布的宪法中就已经规定了公民不分民

①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70 页。
②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40 页。
③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73.

族和种族，权利一律平等，而且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组织工会的自由，以及人身保护权或者其他人身权利等等。所有这些自由本质上都属于公民自由的范围。

其次，无产阶级不能凭空去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必须巧妙地利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特别是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德拉一沃尔佩说："在欧洲大多数群众政党的政治斗争中，需要新的富有成果的渐进主义创造各种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例如，认为资产阶级议会有新的用途，可以作为实现民主的结构性改革及反垄断改革的工具等等。"[①]只有充分利用公民自由进行革命斗争，才能走出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总之，德拉一沃尔佩认为，社会主义的自由是一种平等的自由，但这种平等的自由是吸收了公民自由的先进的自由。

2. 科学辩证法

德拉一沃尔佩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实证科学，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要点在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其不同于先验辩证法的科学辩证法。德拉一沃尔佩通过研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认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先验辩证法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科学辩证法。他说：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所以是最重要的文本，是因为它以批判黑格尔逻辑学(通过批判黑格尔的伦理一法哲学)的方式，包含着新的哲学方法的最一般的前提。凭借这一批判，马克思揭示了先验唯心主义的以及一般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性"。这些神秘性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的逻辑矛盾或实质性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同义反复，这些矛盾和重复来自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结构的一般的(先验的)特征。与此同时，马克思建立了与之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的辩证法"。[②]

(1)马克思对黑格尔先验辩证法的批判。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德拉一沃尔佩坚决否认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存在着连续性，坚决否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理论来源。

德拉一沃尔佩认为，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成是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观点是恩格斯的论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①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73.

②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162.



哲学的终结》中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存在着方法和体系的矛盾：方法是革命的，而体系是保守的，马克思抛弃了其保守的体系而继承了其革命的方法。恩格斯的这种观点被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下来了。然而，德拉一沃尔佩否认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无论是在青年马克思那里，还是在成熟马克思那里，我们都没有发现马克思持有这种观点。相反，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先验辩证法、唯心辩证法、思辨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给予了彻底的批判。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彻底地批判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的呢？在德拉一沃尔佩看来，马克思主要是指出和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

德拉一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的第一本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我们指明了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方向，所以他首先引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批判。马克思说：

> 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如果理念变为独立的主体，那么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情势、任性等等）在这里就会变成和它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①

在德拉一沃尔佩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黑格尔泛神论的神秘主义逻辑。因为黑格尔在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论述中，把首要的东西，真正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等变成次要的东西，变成了宾词，而真正的宾词——国家，或理念却作为逻辑上首要的东西而出现。当理念、宾词被实体化时，现实或真正的主体就作为产物而出现，现实成了理念的结果。真正的、现实的规定“的存在形式没有改变，但是却获得了理念的规定的意义，获得了理念的结果、理念的产物的意义”，“黑格尔的论点只有像下面这样解释才是合理的：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国家的公民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所以，在现实中，“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②。黑格尔的这种观点集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1页。

其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他不是从对象中得出自己的思想，而是用思想来制造对象。所以，黑格尔颠倒了对象和思想、主体和客体、物质和意识、现实和理论的关系。

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揭示了黑格尔先验辩证法的这一秘密。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隐秘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的宾词、象征。因此，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①]黑格尔的这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首先把现实归结为理念，然后又把理念看成真正的现实，神秘化了理念与现实的关系。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还揭示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探讨方法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根源。马克思说：

>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②]

马克思从蒲鲁东运用先验辩证法探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看到了它所体现着的保守的政治含义：

> （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③]

所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包括蒲鲁东在内：

> 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合乎理性的）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2页。



> 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①

总之，在德拉－沃尔佩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先验辩证法的批判明确地揭示了先验辩证法的实质：赋予观念以实体的实在性，即使观念实体化。

(2)科学辩证法的含义和公式。德拉－沃尔佩指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先验辩证法的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即科学辩证法。德拉－沃尔佩说：

> 打开一般的“科学辩证法”之“奥秘”的钥匙已经作为一种逻辑的批判的形式的阐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一般的“科学辩证法”的革命需要赋予《哲学的贫困》的方法论部分和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整个论证以活力，而且后来亦为《资本论》提供了现实的结构。……这把钥匙就是对先验的、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化了的”、被扭曲了的结构及其最终结果——不仅仅是语词上的同义反复和逻辑的倒置——进行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这些同义反复和逻辑颠倒在开始考察基本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已作过探讨。②

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从一开始就与黑格尔的先验辩证法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区别所在：

> 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③

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就是对科学辩证法的最初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154、186页。

② ［意］德拉－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二十世纪经典哲学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陈学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3—7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9页。

述，他明确地指出了科学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科学辩证法就是“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的逻辑”。德拉一沃尔佩把“科学辩证法”说成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真正的哲学的批判”的反思辨的唯物主义方法。

马克思将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统一了起来，为科学辩证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马克思说：

>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

在德拉一沃尔佩看来，马克思的这个观点表明，科学辩证法体现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统一，体现了各门科学知识的统一，体现了伽利略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于一身的“道德伽利略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辩证法，就是因为他将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统一起来，在人的科学中容纳了自然科学的要素。

德拉一沃尔佩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发现了马克思从科学辩证法的角度所进行的唯物主义分析。他认为，马克思1857年所写的这篇《导言》是一篇独立成章的著作，具有其自身的权威性，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呈献给我们一个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的“天才大纲”。马克思在这篇《导言》中将“由特殊进到一般，由事实进到概念而不是(片面地)由一般到特殊或由概念到事实”的科学辩证法给予了“论证、解释和展开”：

> 这意味着在经济学中从“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神秘化的”或神秘的辩证法向“科学的”，亦即分析的辩证法的革命转变，也就是从实在到假设、从先验的主张到经验的预测的过渡。②

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事实到概念的方法，它的具体公式是具体—抽象—具体：

> 只有一种方法，这就是一种逻辑：现代的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构成物理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法则的技巧肯定是像各种经验和实在一样是不同的……但方法是一个，其符号是具体一抽象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② [意]德拉一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二十世纪经典哲学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陈学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4页。



具体的循环。①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证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德拉一沃尔佩对这个方法作了详细的说明：

> 必须遵循一种“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说，首先是从“具体”的东西出发，从“具体的主体”出发——在这个场合，它就是一个历史地“所与的社会”——朝抽象（没有它，任何思维和认识那是不可能的）运动。……如果为了说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我们从作为它的基础的人口出发，而不说明“阶级”，以及构成它们的具体的历史因素（诸如工资劳动、资本等等）……在这样做时，我们从一个“想象的”具体朝着越来越不复杂的抽象前进……而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但是，马克思继续说道，如我们一旦达到最简单的抽象……我们的“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来”，直到我们“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在这样做时，我们遵循着正确的方法，对于它来说，“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这样，能把正确的方法描写为一个从具体或现实到抽象或观念以及从后者回到前者的循环运动。这正好意味着经济抽象或范畴的一种连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证实。②

在这个科学辩证法的公式中，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但两种具体的含义是不同的。起点的具体是感性的具体，而终点的具体则是思维的具体。德拉一沃尔佩解释说，后一个具体（例如一个特定的社会）出现在从它开始的、作为一个综合过程和结果的那个思维中。“具体是对先验的东西进行抽象综合的规范，是实在的规范。”③正如马克思所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④具体是许多规定的总和，而这些规定，有的是各个时代所共有的，有的是现实特有的，因此，具体又是“复杂的统一”。但是不能把具体规定为（根据客观矛盾）对立面的统一，而是“复杂的、不同的统一”。

科学辩证法公式中间的抽象是“确定的抽象”，确定的抽象在本质上是历史的，是“历史的抽象”。德拉一沃尔佩说：“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方法

①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138.

②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p. 130—132.

③ ［意］德拉一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二十世纪经典哲学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陈学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3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8 页。

是使抽象不断历史化的方法，是揭示抽象的历史规定性的方法，而揭示抽象的历史规定性，也就是循环往复运动（具体一抽象一具体）的实际意义。"[①]而黑格尔的抽象则是"不确定的抽象"，因为黑格尔的先验辩证法是从思辨的观念出发，经过具体现实又折回到思辨的观念中，而思辨的观念又没有对现实的特殊性作出合理的概括，所以，黑格尔的抽象思维的起点和终点都消散在一片模糊的、不确定的观念中，真正的现实仍然在其视野之外。因此，德拉一沃尔佩说：

> 科学的辩证法是一种确定的或历史的抽象，它是经过批判从思辨的辩证法或一般的辩证法中分解出来的。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后一种辩证法是先验的、不确定的抽象，因而是错误的、神秘化的和无结果的，它实际上以同义反复为结果。[②]

应用先验辩证法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偏爱抽象的一般，抹杀具体，从关于生产的一般的、不变的观念出发，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当作抽象的或观念上的经济社会（社会一般）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塞了进来。

> 所以，形而上学的塞入或先验的代换，在规定具体的时候支持和偏爱一般或最抽象的东西，反对或轻视特殊的或最具体的东西，的确非常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论点（见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哲学的贫困》）错误的、被曲解的结构。这是一种神秘化的辩证法的结构和方法。[③]

从确定的抽象在科学辩证法中的重要作用来说，科学辩证法也就是一种科学的抽象辩证法。德拉一沃尔佩在回答人们对他的观点的质疑和批判时说道：

> 科学的辩证法是历史实践的时代性灵魂，它的结构是由产生一定的和历史的复杂东西的一致和理论化，亦即产生一个进步的统一的那些实践的和不能重复的标准模态，即一定的抽象构成的。这就是否定和保存（历史的继承性和革命）交替（不是表象中的或神秘）的辩证法，例如资本主义的"劳动一般"是在资本主义之前的一切类型的劳动中选择的结果，但它又在马克思的劳动的标准模态这个历史的理想的综合中转化为"社会劳动"和"价值尺度"等等。由此可见，

---

① [意]德拉一沃尔佩：《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转引自徐崇温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01 页。

②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p. 199—200.

③ [意] 德拉一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二十世纪经典哲学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陈学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37 页。

辩证法归根到底是在一定的抽象之中和由一定的抽象开始，也就是这样，它“再现”和推动客观矛盾。[①]

正因为科学辩证法是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所以它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德拉一沃尔佩说：

> 正确的方法可以表达为由具体或实在到观念的抽象，然后又回到前者去的一种圆周运动。换言之，具有逻辑严密性的正确的方法在于对抽象或（特别是）经济学的范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假若它们的真理与它们的内容的简单化或一般的抽象处在一种逆反的关系之中——进行不断的、永恒的历史解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之所以是正确的方法，是因为，“在这个限度内，从简单上升到复杂（或特殊、具体）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在对劳动这个基本范畴所做的正确的、科学的阐述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②]

劳动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范畴，这个简单的范畴却是一个抽象，不是先验的抽象，而是历史的抽象，符合现实的历史。“也就是说，它概括了伴随着‘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所产生的经济的、实践的和理论的‘进步’。”[③]

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割裂、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单纯地归结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辩证法，确实是德拉一沃尔佩在理论上的独创，但他实际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实关系，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内容，在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走上了歧途。

二、科莱蒂

（一）科莱蒂的生平和著述

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1924－2001）是德拉一沃尔佩的最有才华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德拉一沃尔佩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

科莱蒂出生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银行职员家庭。他早年受到意大利

---

① ［意］德拉一沃尔佩：《论辩证法——答同志们及其它》，转引自徐崇温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3页。

② ［意］德拉一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二十世纪经典哲学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陈学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0页。

③ ［意］德拉一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二十世纪经典哲学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陈学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0页。



著名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金蒂雷(Giovanni Gentile)的影响,克罗齐和金蒂雷的新唯心主义哲学成了他的思想的出发点。他在接受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佩里·安德森访谈时回忆说:"我的思想的起源与我那一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在法西斯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其出发点是克罗齐和金蒂雷的新唯心主义哲学。"①他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克罗齐研究专家卡洛·安东尼(Carlo Antoni)。在安东尼的指导下,科莱蒂撰写了关于克罗齐逻辑学的博士论文。


卢西奥·科莱蒂(1924—2001)

但科莱蒂很快就远离了他老师的唯心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大多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通过葛兰西的思想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阅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尽管科莱蒂在安东尼的指导下研究了克罗齐的哲学,但他更赞同康德批判哲学中的经验实在论因素,认为这种实在论与列宁的反映论的认识论是一致的。

朝鲜战争开始后,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世界日益分明。虽然科莱蒂将战争的起因归罪于北方,并且反感斯大林主义及其政党,但在选择自己的阵营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东方共产主义一边:他于1949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分子。斯大林的去世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使科莱蒂感到"一种真正的解放"。但是,他并不满意苏联此后的"去斯大林化"的哲学,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回到马克思的原著,寻求一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科莱蒂在墨西拿大学上学期间,跟随德拉一沃尔佩学习哲学。1950年,科莱蒂阅读了德拉一沃尔佩的《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深为所动,开始接受德拉一沃尔佩的观点。1957年,科莱蒂加入了《社会》编辑部,与德拉一沃尔佩共事。借助这个杂志,科莱蒂发展了德拉一沃尔佩的观点,甚至比德拉一沃尔佩本人更为鲜明地公开表明了德拉一沃尔佩学派的政治观点。他因此成为广为人知的意共党内左翼派别的著名代表。

① Lucio Colletti,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 in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ed. by *New Left Review*, p. 315.

从1958年起，科莱蒂先后担任罗马大学的讲师、高级讲师和教授，主要从事哲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科莱蒂一直是意共党内的异端人士。他批评意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而这种绝对历史主义是对克罗齐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继承。1962年，《社会》杂志编辑部被解散后，科莱蒂与意共领导人之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他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希望也随之幻灭，便退出了意大利共产党，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科莱蒂一生观点多变，后期逐渐向右转，并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传统自由主义的拥护者。①

科莱蒂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Il marxismo e Hegel*: *Materilismo dialettico e irrazionalismo*, 1969)、《意识形态和社会》(*Ideologia e società*, 1969)、《中止意识形态》(*Tramonto dell' ideologia*, 1980)等。

(二)科莱蒂对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作为德拉-沃尔佩的学生，科莱蒂沿着德拉-沃尔佩确定的方向，发展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1. 辩证唯物主义与物质辩证法

科莱蒂认为，以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解释成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来自于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

科莱蒂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出生地。科莱蒂说：“‘唯物辩证法’在其严格的意义上，就是黑格尔自己的物质辩证法。”②在科莱蒂看来，黑格尔是第一个物质辩证法家，在他之后的物质辩证法不过是他的物质辩证法的单纯的机械复制。

那么，什么是物质辩证法呢？科莱蒂说：

> 物质辩证法的要义如下：有限的是无限的，实在的是合乎理性的。换言之，规定者或实在的对象，这个唯一的“这一个”不再存在；存在的是理性、观念、对立面的逻辑的包涵物，是与那一个不可分离的这一个。另一方面，存在一旦被归结为思想，思想倒过来就成了存在物，即获得存在并在一个实在的对象中具体化的对立面的逻辑统

① Perry Anderson,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icago, 1984, pp. 28—29.

②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103.

一体。①

科莱蒂的这段话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个别的有限实体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从属于无限的观念实体。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万物都是有限的，有限物存在的真理就是它的终结；真正的存在物是无限，是观念，是逻各斯。有限物总是此时此地的存在，无限则是超越一切时空条件的存在，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本质。科莱蒂概括黑格尔的观点说：

> "真正的"有限并不是外在于无限的有限，而是内在于无限的有限，事实上，有限在观念之中。"实在"并不是那些外在于思想的物，而是被思想渗透的物，亦即这些物不再是物，而只是"逻辑的对象"或观念的环节。这种否定，这种对物质的"消除"，正是在从"外在"到"内在"的过渡中。②

第二，黑格尔通过将有限从属于无限，取消了物质的存在，也就是消除了整个物质世界，剩下的存在就只是观念和思想了。科莱蒂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为了把握存在，人们必须把握思想、观念；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理性。"③

第三，既然思想和观念成了真正存在的东西，那么这种思想和观念中所具有的矛盾就成了根本的矛盾，这种矛盾反过来规定了世界万物的矛盾，世界万物的矛盾是这种矛盾的体现和具体化。科莱蒂说："实在的对象被消解在它的逻辑矛盾中，这是第一个运动；在第二个运动中，逻辑矛盾又倒过来成了客观的和实在的。"④

在科莱蒂看来，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有两重作用。一是服务于他的绝对唯心主义。"正是通过物质辩证法这一工具，黑格尔使'哲学'变得连贯一致，从而完成了绝对唯心主义。"⑤二是服务于他对上帝存在的论证。"黑格尔思想中的'物质辩证法'的意义和功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它确实构成了所有宗教意识的一个本质的环节。'"⑥"哲学家现在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徒。"⑦

科莱蒂指出，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恰好接受了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将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变成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科莱蒂通过对比黑格尔与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论述，说明了恩格斯和列宁在辩证法

①④⑦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20.

②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16.

③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18.

⑤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14.

⑥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27.

方面抄袭了黑格尔。

首先，科莱蒂认为，恩格斯关于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的观点来自于黑格尔。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 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一旦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①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认为，某物之所以是有生命的，只是因为它本身包含着矛盾，只是因为它在同一瞬间既是它本身又是对它本身的否定。科莱蒂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认为，"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②。

因此，科莱蒂说：

> 两个应当彼此全然不同的概念，在人们的期待中，两个应被发现是彼此正相反对的作家——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却以相同的方式去定义实在和在他们看来是抽象的或缺乏实在的那个东西。③

其次，列宁把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看作黑格尔主义的实质，科莱蒂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继承了这一点。

科莱蒂说，当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中谈到关于"同一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僵死存在的规定，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在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能运动，才具有趋向和活动"的论述时，热情地指出："运动和'自己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动机'——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晦涩的……黑格尔主义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4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③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23.

实质呢？必须揭发、理解、拯救、解脱、清洗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①

在科莱蒂看来，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的这一页上看到了值得从黑格尔哲学中拯救出来的“核心”，看到了和黑格尔体系的“外壳”和“观念的神秘化”相矛盾的真正现实意义。列宁认为黑格尔学说是倒立的唯物主义，他在这里就是竭力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就是说，抛弃其中的神、绝对、纯粹观念等。

然而，科来蒂却说：

> 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这几页的“阅读”，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是建立在一个根本的误解上面的。他正是在黑格尔……否定物质的地方，企图去“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列宁被《反杜林论》的著名命题所纠缠，并被他为自己规定的方法所引入迷途——这意味着当黑格尔谈及上帝时，不予注意——列宁不了解（黑格尔《逻辑学》卷二C）第二章注三，它一开头就说，“每一样东西天生是矛盾的”，并以上述方式进行下去，走向一个课题：证明上帝的存在的问题。②

科莱蒂认为，通过将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与黑格尔的论述进行比照，可以证明两件事情：

> 第一，“物质辩证法”的一切基本命题，原来是由黑格尔系统表述的；第二，辩证唯物主义使自己限于从他（指黑格尔）的原文中抄写那些命题，既然辩证唯物主义的作家在重抄它们的过程中，明确指出他们把这些表述理解成包含一个在黑格尔的原文中已有的唯物主义立场，那么（我认为）必须得出结论说，他们简直犯了一个解释的错误。一个到现在已经存在于几乎一个世纪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错误。③

显然，科莱蒂将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等同起来了。科莱蒂说：“恩格斯和辩证唯物主义在重复黑格尔的论证的过程中，认为他们是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他们却以同唯物主义和科学作斗争来告终。”④

再次，科莱蒂还批评了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犯了与恩格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7页。

②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25.

③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27.

④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41.

斯和列宁一样的错误。

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不同，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都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直接联系，所以二者属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分支。科莱蒂说：

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就会显露出新的含义：它与其说是唯物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倒不如说是同一个黑格尔传统的两个对立的和掺和了大量异物的分支之间的差别。①

所以，卢卡奇和列宁是同道：

他们在黑格尔唯心主义中欢呼他们以前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学到的东西，惊奇地在黑格尔那里发现了正是他们已经从恩格斯那里学到的东西（而没有给下列事实以应有份量，即恩格斯只是首先从黑格尔那里抄写它）。一旦他们证实了观点的这种同一性，他们就得出结论说，黑格尔的哲学包含某些同其体系原则相矛盾的唯物主义萌芽。据此，他们就说，在黑格尔那里，产生了一种"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彻底的不一贯性。相反地，他们从未考虑的却是——虽然一般说来，这种可能性是像第一种可能性一样地合理的——相反的假设：黑格尔是绝对一贯的唯心主义者，而"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一种没有觉察到它自己的本质的唯心主义。②

2. 真正的唯物主义

在科莱蒂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或真正的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的或真正的唯物主义包括两条基本原理：一是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二是无矛盾原理。

第一，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

科莱蒂认为，在哲学史上存在着两条相互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大陆唯理论（特别是斯宾诺莎的学说）和黑格尔所坚持的路线，另一条是英国经验论（特别是休谟的学说）和康德所坚持的路线。两条思想路线对立的焦点是思维和存在究竟是同一的还是异质的。前者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后者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科莱蒂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基本的两难问题，或者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或者是思维和存在的异质

---

①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p. 194—196.

②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103.



性。这个选择把独断主义和批判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了。"①

根据科莱蒂的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基本含义是:一方面实在的过程被归结为单纯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观念和逻辑的东西倒过来又成了实在的主体和基质。而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的基本含义是:思维和存在是不同的,实在是一个独立发展的过程,它存在于观念、思维和逻辑之外。

黑格尔物质辩证法的真正哲学基础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沿着黑格尔物质辩证法的道路向前,就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唯物主义则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为基础的。

在科莱蒂看来,严格地说,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开始于康德。正是康德在批判大陆唯理论的过程中确立了批判的唯物主义的权威。但黑格尔在康德之后试图重新恢复唯理论的传统,这是明显的向旧形而上学和独断论的一种倒退。

如果说康德是对旧的形而上学和独断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的话,那么马克思则对黑格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旧形而上学的恢复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科莱蒂认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特征就是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一种头足倒置的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把它重新颠倒过来,以便发现其"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科莱蒂认为,马克思说的"合理内核"就是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理论本身,这种理论揭示了理性本身的内在冲突;"神秘外壳"则是指黑格尔把理性实体化了,从而把理性本身的矛盾带到了实在之中。

其次,马克思认为,实在有自己的发展变化法则,不能独断地把逻辑的法则强加于实在。比如,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全部批判都有赖于现实中的对立不能还原为逻辑上的对立这一点"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坚持实在的过程和逻辑的过程是并列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正是适应于实在的唯一方法。

再次,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中,从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出发,提出了异化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从反面确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因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性创造的合理的世界竟成了

①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97.

②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137.



压抑自己的异己的东西，这本身表明了实在在理性之外，是与思维完全不同质的另一种东西。

科莱蒂批评恩格斯、列宁在肯定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时接受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抛弃了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科莱蒂说：

>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有一个对唯物主义的清楚的论述，因此也有一个对思维和存在异质性的清楚的论述，缺少的是关于理性的理论，即关于概念和科学法则的理论（这本书中提出的反映论具有隐喻的、想象性的特征，可以说，它肯定的是一种"原始"水平的唯物主义）。反之，在列宁论述辩证矛盾的地方，比如在《哲学笔记》中，都以牺牲实在与逻辑的异质性为代价，就像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一样，"辩证法"确实是富有的，但"物质"却是可怜的，以致这些著作成了无意识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①]

所以，在科莱蒂看来，如果要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必须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科莱蒂将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割裂开来，只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第二，无矛盾原理。

科莱蒂认为，无矛盾原理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所以他十分重视无矛盾原理，强调无矛盾原理在真正的唯物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说：

> 实际上，唯物主义没有无矛盾原理是不可想象的；反之，"物质辩证法"则是对这一原理的一个否定。对于前者来说，特殊的对象是判断的根据：特殊的对象是外在的或不可还原为逻辑的普遍性的（人们只需要想到康德就行了）。可是，对于后者来说，只有当有限除了它自己外还有一个作为它的本质和基础的"他者"时，对立才是真实的，只有当有限本身不存在，而仅仅作为观念上的有限或思想之内的有限存在时，它才是"真实的"。[②]

那么，无矛盾是什么意思呢？科莱蒂说：

> 马克思主义也连续不断地谈到"矛盾"，即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矛盾。但是，对于科学来说，矛盾永远而且只能是应予排除的"主观错误"。科学包含了无矛盾原理，对于科学来说，是不存在客观

---

①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p. 104－105.

②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192.

矛盾，即现实中的矛盾的。科学只承认那些能称其为“理论”的矛盾。但是，当理论自相矛盾时，科学会立刻宣判理论的虚伪性。①

由此可见，科莱蒂所说的无矛盾是指思想、观念上的无矛盾。

科莱蒂认为无矛盾原理来源于康德。在康德看来，当人们在观念上描述实在时，在逻辑上应当保持一致，概念之间、思想之间应当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不应当相互对立、矛盾。然而，康德认为不能因为逻辑上的无对立就推论出实在本身也是无对立的。他举了数学中 A－B＝0 和力学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两个例子来说明实在中是存在对立的。所以，科莱蒂说：“对于康德来说，无矛盾原理纯粹是一个理性的原理；思想本身的一致性并不就是思想与实在的一致性。因此，从思维上不存在逻辑矛盾应该推论出实在中不存在对立的结论。”②这就是说，一方面矛盾是指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在思想中是应该排除的；另一方面，实在中存在着对立，但这种对立不是矛盾，而是“真正的对立”。科莱蒂说，“真正的对立”是一个“没有矛盾”的对立，它并不违反同一律和矛盾律，因而是和形式逻辑相容的。

如果将逻辑矛盾和真正的对立等同起来，那么就犯了逻辑与本体论混淆的错误。莱布尼茨虽然承认逻辑、思维上的无矛盾性，但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思维应该是无矛盾的，所以实在本身也应该是无对立的。科莱蒂说：“在批判莱布尼茨和所有的旧形而上学造成的逻辑一本体论的混淆时，康德的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是：实在中的对立是某种不同于逻辑上的对立的东西。”③

黑格尔也犯了将逻辑与本体论混淆起来的错误，但他与莱布尼茨不同。黑格尔首先批判了普通的形式逻辑，肯定了思维内在地包含着辩证矛盾，然后从思维中存在着矛盾推论出实在中也存在着矛盾。

科莱蒂认为，马克思正是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时继承了康德的思想，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无矛盾原理。他说：“如果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话，打破‘神秘外壳’从而‘倒转’辩证法（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再次使用这些被滥用的隐喻）就只能是恢复同一性和无矛盾原理，换言之，就是恢复唯物主义的观点。”④

---

① 见 1978 年 12 月 17 日意大利《信使报》。转引自徐崇温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28 页。

②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100.

③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98.

④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48.



然而，不幸的是，马克思的这个无矛盾原理并没有在他的继承人那里得到贯彻。科莱蒂指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绝大多数场合甚至没有想到有两种不同的对立。恩格斯对真正的对立和矛盾的对立之间的区别不置一词，他和黑格尔一样把科学的无矛盾当作一种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而列宁则把这两种对立混淆起来，他在《哲学笔记》中无批判地追随黑格尔接受了他破坏理智、破坏无矛盾原理的做法。

本来，科莱蒂提出无矛盾原理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他排除思维、观念中的矛盾，否定客观世界中的矛盾，则又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3. 社会生产关系理论

科莱蒂是德拉一沃尔佩最忠实的学生，他在许多方面的理论都是受到德拉一沃尔佩的启发之后，站在德拉一沃尔佩的立场上，沿着德拉一沃尔佩的思路发展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但科莱蒂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完全接受德拉一沃尔佩的所有观点，特别是他不满意德拉一沃尔佩仅仅致力于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认识论，而是试图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因为在科莱蒂看来，与逻辑和认识论相比，社会生产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基本的理论。科莱蒂说：

> 在任何根本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至少不是一种认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反映论几乎完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把认识论作为一个出发点，以便富有独创性地并撇开整个思辨传统去理解像“社会生产关系”这样的概念是如何从古典哲学的发展和转变中产生出来的。①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仅仅是一个出发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认识论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社会生产关系原理。

科莱蒂是从主体的角度来探讨社会生产关系原理的。讨论认识论必然涉及认识的主体——人，那么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在科莱蒂看来，本来，马克思认为“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②，但马克思的后继者们一般根据恩格斯的一段论述来理解人的本质。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说，“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

①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19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9 页。

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①科莱蒂指出，恩格斯的这段话用纯粹的思维取代了思维着的人，从而取消了关于人的社会性或历史性的论证。他说：

> 在恩格斯那里，认识并不是作为人在其同自然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的功能或表现而出现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论述的意义完全丧失了。存在着一个“纯思维领域”、事物的运动（如像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既然认识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思维和存在的“原始的统一”，那么，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即恩格斯“甚至没有提到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即主体和客体在历史过程中的辩证关系，更不用说给它以应得的突出性了”。②

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这些后继者不同。马克思吸收和发展了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有关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类的自然存在”概念，为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概念作了准备。

科莱蒂认为，马克思的“类的自然存在”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人是一个“自然存在”，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是他所依赖的并受其限制的其他客观自然存在中的一个客观的存在，人在其自身之外有其存在的根源。第二，人是一个“类的存在”，也就是说，把人同其他一切自然存在区别开来并构成其特殊本质的，并不是一个物，即自然本身的一个种，而是类，亦即一般概念，它是一切物中所共有的最普遍的东西。

科莱蒂认为，马克思直接把“类的自然存在”概念吸收进他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中去了。他说：

> 单方面强调人的物质性是哲学唯物主义的主要基础。当然，一旦人们承认自然界的存在，就不能不承认人也是一个自然实体，作为一个物质自然存在的人是一个动物。但这个特殊自然种属是通过其创造社会关系而区别于一切其他动物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人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生活在社会中并且有一部历史。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正是他们存在的这个方面才是主要的。人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的特殊性在于，他在涉及其他人的范围内涉及自然，在他涉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②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218.



自然的范围内涉及其他人。这种双重关系就是马克思在"社会生产关系"概念中把握的东西。马克思认为，离开社会关系，即同其他人的关系，即不能有生产——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而在人们之间，则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不是人在生产中同自然的关系的一个函数的。对于人的"本质"的特殊性是要在其在社会的表现中去寻找的，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历史主体。①

科莱蒂的这段话既说明了类的自然存在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关系，也解释了人作为一个社会历史主体的本质。

在科莱蒂看来，马克思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概念，以后，又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对此作了最明确和最根本的论述："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②

科莱蒂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说明，人同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同其伙伴的关系，这就是说，生产是人们主观之间的一种交往，因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在另一方面，人同其伙伴的关系，又是为生产的目的而建立的，就是说，是着眼于人对自然的活动和影响的，而且是它的一个功能。所以，他说，精确地说，马克思的这一论述：

意味着这么件事情，第一，对我来说，为了同一个客体发生关系，就必须也同其他人发生关系，因为客体本身在实际上是人的对象化（"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而这又意味着类"人"同其他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他自己类内的关系，也就是说，类（或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人所专有的一种关系。其次，为了同其他人发生关系，我必须同自然客体本身发生关系，准确地说，是关于他的类的其他性或异质性的问题——因为人的存在就是自然（人们只要记住马克思所说"一个没有在他自身之外的自然的存在，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就行了）。换言之，人并没有他自己的存在，而是只有把其他人的存在当做他自己的存在；这样，类的关系（人同其他人的关系）就包含

---

① 《访问科莱蒂》，载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 1974 年 7－8 月第 86 期。转引自徐崇温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8－53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86 页。

人同不同于他的其他自然存在的类的关系。[①]

在科莱蒂看来,从人的类的自然存在而来的生产关系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本身的逻辑都植根于此"[②]。

本章小结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因素而得名。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反叛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作为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理论观点,表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意共党员德拉—沃尔佩,他不仅探讨了社会主义和自由问题,而且阐述了科学辩证法问题。德拉—沃尔佩的最有才华的学生科莱蒂继承和发展了德拉—沃尔佩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他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物质辩证法的关系,提出了真正的唯物主义,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

思考题

1.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2.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样的基本特点?
3. 德拉—沃尔佩是如何论述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关系的?
4. 德拉—沃尔佩的科学辩证法包含什么内容?
5. 科莱蒂是如何分析物质辩证法的?
6. 科莱蒂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包括什么原理?
7. 科莱蒂是怎样阐释生产关系理论的?

阅读书目

1. [意]德拉—沃尔佩:《趣味批判》,王柯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

2. [意]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

①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218.

②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p. 228.



第五章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要点提示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
◎梅洛一庞蒂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和存在哲学
◎萨特的历史人学和人学辩证法

◎第一节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概述◎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兴起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它致力于用存在主义补充、解释马克思主义，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

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存在主义是一种从揭示人的本真存在的意义出发来揭示存在的意义和方式，进而揭示个人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的哲学思潮。存在主义者所分析的个人是生存于特定处境中的现实的个人，因此他们更为强调人的身体和情绪而非理性。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重点在于揭示个人的独特性而非一般性，所以，他们否认存在着决定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或性质。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不仅没有本质，而且还是荒谬的，所以毫无意义可言。世界既无意义、目的、决定性的本质，所以人是自由的，人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是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A.

Kierkegaard)和尼采(F. Nietzsche)。他们主张意志自由的本体论、非理性主观体验的认识论、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以及悲观主义的人生观。

作为一种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哲学流派，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国内秩序动荡不安，经济凋敝，失业者很多。德国各个阶层均充满了忧虑、失望、烦恼、恐惧等悲观情绪，同时不甘心失败和堕落，决心从失败中奋起，重振信心。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最大代表，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和分析了个人的存在及其主观体验，从个人的存在出发构造其哲学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的中心由德国转移到了法国，并盛行于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在许多方面都有一些共同之处：法国也在战争中经历了深重的磨难，社会秩序有待修复；社会上既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又试图摆脱这种情绪，消除社会危机，创造新的未来。"在严酷的冷战年代，任何一个其重要性可以与之匹配的思想运动都不曾出现过。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新颖和富有创造性的运动，是十分缺乏创见的战后年月能够出现的最好的运动。"[①]一大批法国思想家成了存在主义者，其中包括马塞尔(Gabrie Marcel)、加缪(Albert Gamüs)、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梅洛一庞蒂、萨特等人。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不仅是哲学家，还是作家、政论家，他们通过哲学、文学、政论阐发和宣传了他们的观点，使存在主义不仅在广大知识分子之间传播开来，而且在各个社会阶层中找到了同情者和支持者，从而成为一种时髦的思潮和社会风气。"法国的存在主义在巴黎，是一种狂放不羁的酵素；它把由它的年轻信徒们以汇聚夜总会，跳美国爵士舞，留奇特发型，穿奇装异服等形式造成的时尚作为哲学的装饰。……再者，存在主义还是一种文学运动，它的领袖人物——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西蒙·德·波伏瓦都是才华横溢、大受欢迎的作家。"[②]在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法国存在主义者描述和揭露了人的个性的丧失、人的自由的被剥夺、人之受物及一切异己力量的支配，论证了怎样使人获得

---

① [美]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 页。

② [美]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 页。

真正的自由，摆脱异化状态，恢复人的个性和尊严。

存在主义产生之后，一些人开始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建构一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早用存在主义的理论资源和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大作《存在与时间》出版后不久，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助手的马尔库塞就研读了该书，并尝试着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努力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当时写下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概要》和《论具体的哲学》等著作，开创了以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先河。1932年，马尔库塞写出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该书运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解释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后来称马尔库塞为第一位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存在主义传到法国之后，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斐伏尔于1938年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一书，该书是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著作，不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来源，而且还论述了人的概念。该书以及此后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都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倾向，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综合。

20世纪中期，梅洛－庞蒂成了综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梅洛－庞蒂致力于综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受到了法国哲学家科耶夫·伊波利特(Alexandre Kojève)的启发。科耶夫·伊波利特夫于1921年至1939年间在巴黎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讲座，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为存在主义辩证法。他还通过分析黑格尔关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来证明人是世界中的一种动态的存在，而不是静止的自然存在，并进而由人的动态的存在(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梅洛－庞蒂听了科耶夫·伊波利特的讲座之后，接受了他的观点，并把这种观点同马克思对宗教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分析进行综合，从而为他后来提出用存在主义“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作了准备。梅洛－庞蒂撰写了《人道主义与恐怖》和《辩证法的历险》等书，一方面指责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另一方面又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他主张对存在主义加以改造，使之与马克思主义一致，同时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作为真正的革命哲学，以与“僵死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在梅洛－庞蒂之后，萨特成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著名代表。作为法国影响最大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同时，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必须以存在主义来补充和完善它。萨特于1960年出版的巨著《辩证理性批判》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就。

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虽然和其他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学派，各个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学说也大为不同，甚至相互反对，但作为一个流派，它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基本特点。

首先，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流行于法国。

尽管马尔库塞开启了用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但只有在存在主义传播到法国之后，典型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才在法国开始形成，并流行开来，产生了一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过程看，它的主要活动区域是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都是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自德国产生以后，它的活动中心逐步由德国转移到法国。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点与德国不同。由于法国有许多社会主义传统，由于共产主义在打败法西斯主义中发挥杰出的作用而赢得了声望，以及由于许多流亡的外国知识分子发现巴黎是他们所适宜的居所，因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比在德国大得多的发展。但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发展，知识分子不愿意循规蹈矩地在法国传播和推进马克思主义。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重要而奇特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在存在主义的环境中发挥影响。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描绘了这一情况：

> 由于德国在1940年至1944年占领法国而毁灭了第三共和国的整个政治和文化体系，这也就第一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国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条件。法国共产党在人民阵线的最后几年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十万以上党员的大党，它从1941年以来就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支居主导地位的民众力量，并在战时大大增强。1945年以后，它在法国工人阶级内部在组织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已占压倒优势。



其结果是，该党在扩充和吸引知识分子方面都得到迅速的增长。波利策在抵抗运动中遭到杀害；尼赞死在敦刻尔克。列菲弗尔在后来的十年里仍然是党内最著名、最富有创见的哲学家。在这个时期，尽管法国共产党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但产生的新理论著作却相当少，这是因为自从冷战一开始，新的理论著作由于党内文化控制格外加强而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也因为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冷战高潮期间强制推行日丹诺夫主义的缘故。这样，在大战之后头十年内的重大而奇特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存在主义的环境中发挥影响。这最初是在占领时期出现的，而在此之后又通过萨特、梅洛·庞蒂和德博瓦尔的著作而得到了广泛的文化传播。①

其次，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战后法国的形成与法国哲学家对黑格尔哲学日益增长的兴趣密切相关。战争的经历毁灭了法国哲学家的理性主义信念，这种理性主义本来是深深地植根于法国哲学传统中的。“黑格尔及其历史哲学、异化和辩证概念、意识现象学，似乎促进了对近期经历的深刻理解。黑格尔哲学似乎也是最进步的思想的根源。”②正如梅洛一庞蒂所说：

> 上一世纪所有的伟大哲学观念都有其黑格尔的渊源：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现象学、德国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正是他开始尝试探索非理性，将之整合进一种扩展了的理性之中——这仍旧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任务。③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通过科耶夫和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著作传播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的。科耶夫的黑格尔哲学讲座吸引了一大批法国思想家，他把黑格尔解读为一个革命的社会理论家：劳动是根本的人类活动；获得承认的斗争内在于劳动过程之中，在获得承认的斗争中，劳动者最终会改变他们当前的奴隶地位，成为自由社会的主人。理性并不是某种抽象和永恒的范畴，而是人的不断深化的意识。这种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与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极为相似。安德森说，科耶夫是战前把黑格尔系统地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位学院哲学家，他关于《精神现象学》的存在主义解释，为萨特和梅洛一庞蒂转向

---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1 页。

② 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Third Edition, Macmillan, 1998, p. 308.

③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 1964, p. 63.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间接的渠道。①

伊波利特也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黑格尔指明了人与自身的分离是走向自我承认之路上的必要的步骤。人在走向自我承认之路上，不断地辩证克服"异化"。伊波利特还十分重视黑格尔早期的著作，认为其中揭示了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特别是异化劳动。

再次，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重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

科耶夫和伊波利特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有助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战后的岁月里快速地接受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们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视有别于法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法共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紧跟在苏联后面，把斯大林主义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特别是在哲学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斯大林钦定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法国的翻译出版，使人们看到了一种十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但给予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希望，而且还使他们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流行于法国的各种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结合起来。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之所以吸引法国哲学家的注意，主要是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关于人及其存在状况的学说。"日益增长的技术的力量和社会中存在的操纵人的诸种可能性致使许多评论者肯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观点，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存在主义的抗议。"②对这些思想家来说，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十分适合用来分析当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复杂现象。列斐伏尔的名著《辩证唯物主义》和《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围绕着马克思的早期代表性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展开自己的学说，而梅洛－庞蒂和萨特则是基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最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内部有两种不同的倾向。

根据其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存在主义，另一种是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前者以列斐伏尔为代表，后者以梅洛－庞蒂和萨特为代表。

列斐伏尔早年加入了法共，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又接受了存在主

---

① 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1－52 页。

② 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3rd ed., Macmillan, 1998, p. 309.



义，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梅洛－庞蒂和萨特本身是著名的存在主义者，他们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抱有一定的同情态度，但是他们从未在思想上真正认同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从未在组织上真正与共产党走到一起。他们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认为必须以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安德森在谈到萨特时说：

> 萨特的情况是特殊的，由于他本人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法国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所创立的），因此他把自己过去的学术观点以及出众的手段和创新，带进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结果是，《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的许多概念是相通的，其中："真实性"这个概念导致了"匮乏性"，"失真性"导致"系列性"，"自为与自在"的不稳定性导致"联合体"的不稳定性等概念。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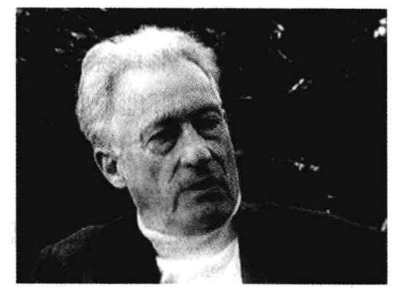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列斐伏尔

（一）列斐伏尔的生平和著述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学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列斐伏尔出生于法国斯科尼的一个官僚家庭，1920年毕业于巴黎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他与保罗·尼赞（Paul Nizan）等人结成了一个"哲学"团体，试图发起一场"哲学革命"。列斐伏尔还与文艺界的超现实主义和达达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投入了现实的政治活动。1928年，他创办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刊物《马克思主义杂志》。1929年，他参加了法



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75页。

国共产党。1930至1940年,列斐伏尔任哲学教授。1940年,他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1944至1949年,他担任设在图卢兹的法语广播电台的主管。

列斐伏尔自从1929年加入法共之后,就成了当时最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虽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公开地批判其他思想家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但由于他的理论和政治观点不同于法共的官方观点,所以他被法共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除出党。无论是在党内期间还是在党外期间,列斐伏尔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政策。他还参与主办了新左派的《论证》杂志,成为"论证派"的一员。1961年,列斐伏尔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1965年,又转任农泰尔学院的教授。农泰尔学院是1968年著名的"五月风暴"的发源地,他的学生邦迪是"五月风暴"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列斐伏尔与反抗学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学生运动提出了许多流行的口号。他不但为"五月风暴"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之作了理论的总结。

列斐伏尔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出版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著作。他的《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 1940)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他的《日常生活批判》(*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1947)系统地研究了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作为哲学思考的主要对象,建立了一整套论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凭借此书及此后的相关著作,列斐伏尔成为西方绝无仅有的研究日常生活的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相当一部分著作是论述城市、城市生活和空间的,如《城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 1970)、《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1974)等。这些著作不仅建立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和城市理论,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当前的城市理论、人文地理学及城市设计。

除了上述著作外,列斐伏尔的重要著作还有:《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问题》(*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 1958)、《元哲学》(*Métaphilosophie*, 1965)、《城市的权利》(*Le Droit à la ville*, 1968)、《马克思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Marx*, 1968)、《资本主义的幸存》(*La survie du capitalisme; 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1973)等。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

法国的存在主义都带有人道主义的特色,因而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在结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时,都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



义化。列斐伏尔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先河，这就是他为什么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出发解释马克思主义，并进而系统地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的原因所在。

1. 异化理论

异化理论是列斐伏尔最重要的学说之一。列斐伏尔认为，异化观念是哲学的中心观念，是马克思思想中的动力因素。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贫乏，之所以简单化为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就是因为抛弃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因此，要恢复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恢复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首先，列斐伏尔指出，从理论上来说，虽然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来源于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异化概念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

在黑格尔看来，存在的、历史的、辩证法的绝对基础就是“理念”的异化。在他的体系里，这种异化乃是发展的根本条件和绝对条件。这样，在黑格尔的学说中，矛盾不过是异化的内在因素。认识和自我认识、反省，就是解决一些矛盾，同时又激起一些新的发生异化的矛盾。理念是矛盾的动力，也是矛盾的终点，它既是与它自己对立的东西，同时又在矛盾中追求重新找到——并且反省地再认识——它与其他自身相统一的东西。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破除了黑格尔的体系，而继承了他的合理内涵。他说：

>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不再是矛盾的绝对基础；相反，异化把自己规定为人身上的矛盾和发展的一个方面。异化是辩证法的必然性在人身上的一种发展形式。所以黑格尔用异化来解释矛盾，而马克思则用辩证的矛盾来解释异化。所谓把黑格尔颠倒过来、更新使它“两脚站地”这个著名的说法的意义就在于此。这种改造不排斥异化理论，它包括了异化理论。①

其次，列斐伏尔论证了异化产生的必然性。

列斐伏尔指出，异化根源于人的本质之中，与生俱来。人之所以能够存在，全赖于他的生产活动。因此，人的本质产生于人的生产活动中。人的生产活动就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解决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同时又力图控制自然。

① 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Verso, 1991, pp. 69—70.

然而，人类生产的过程既是逐步脱离自然界的过程，不断统治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日益被自然制约的过程。人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存在物”一旦被创造出来之后，它就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就会对人的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反对人本身，即异化。他说：

> 人的活动逐渐地统治着自然界，但是，当这种活动转而反对人的自身时，就有了外部的性质，并把人类引入社会决定论之中，使人类蒙受了极大的不幸。人类本身并不是这种决定论，然而，没有这种决定论也就没有人类了。人类首先存在于非人类之中，并通过非人类加以体现。①

因为人的生产活动必然创造出独立于自身的外在对象，所以人必然要被这种对象所支配，必然出现异化。各种各样的异化现象，寻根追源，无不出于人所具有的创造性活动。

再次，列斐伏尔根据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揭示了异化的多样性。

列斐伏尔认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把异化局限在剥削上，局限在劳动个人或集体被占有生产手段的个人或阶级所剥夺这个事实上，而是分析了异化的多样性：劳动者作为物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作为人类成员的人的异化和作为总体的人的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异化的“多面性和无所不在性”，表现在“生产力上，生产关系上，也在意识形态上，而且还更深刻地，在于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他自己本性的关系上”。

然而，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只是提纲挈领式的，尚未详细分析遍布于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他说：“异化是这样地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②

列斐伏尔着重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的四个方面的异化：

第一，意识形态方面的异化。在列斐伏尔看来，意识形态的出现使人颠倒了事物、外部实体的秩序，这些精神的东西超越了物质的东西，直至使人认识不到自己的创造性的活动。人们按照为政治家们所利用的信仰组织起来，理论的异化就这样成了实践，并作用于习惯。荒唐无稽的事情

---

①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136.

②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147.

和偶像崇拜似乎具有一种实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人赋予并转而反对人的；即使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的今天，人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自己造成的偶像崇拜的牺牲者。偶像的存在既抽象，又真实，既是物质的，又裹着富有魅力的意识形态，人的生命消失在这种生存和意识形态之中。

第二，经济方面的异化。在列斐伏尔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货币——由商品为媒介而造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外在化——获得了一种绝对的权力，表现了经济的异化。列斐伏尔坚决反对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的目的，他认为追求金钱把人的需求异化了。他说，在现代人那里，金钱的需要成了唯一的真正的需要，以致金钱的数量日益成为人的唯一的品质，这种异化使得人变得更为贪婪，简直与禽兽无异；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有金钱，它的目标成了纯粹经济性的了；人的本质就是追逐物，追逐金钱，即恋物。列斐伏尔还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目标说成是使人生活好，他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其实，马克思的思想不是绝对经济主义，而是超越于经济主义之上。

第三，社会生活方面的异化。列斐伏尔强调，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来自社会过程的集体，个人只有在同集体的牢固和明确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它。但是，在当代社会，个人丧失和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脱离了社会的根基，把自己看成是理论上的抽象物（心灵）或生物性的存在（躯体），以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认识自己。人类的共同生活被破坏了，创造性活动成了一种使个人从集体中分离出来的手段。列斐伏尔指出，事实上，离开了集体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脱离了集体就不成其为人了，而是成为动物了。

第四，政治方面的异化。列斐伏尔认为，国家拥有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权力，这种非人性的权力就体现了政治方面的异化。“政治异化”的前提是“社会的人二重化为个人的方面和社会的方面，二重化为个人和公民”、“私人”和“公民”。在他看来，政治上的异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严重的异化。

最后，列斐伏尔既否认个人能够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又提出了非异化的“总体的人”。

根据列斐伏尔的看法，既然异化根源于人的本质之中，又广泛地弥漫于人的全部生活，那么个人就不可能从中得到解放；人在摆脱旧的异化的同时，又会产生新的异化。列斐伏尔说：

马克思辩证地思考人的本质：人是在超越的道路上的自然的存在物——是为了统治自然而对自然进行斗争的自然的存在物——他从自然中脱离出来，但他那种脱离的方式，他对自然的统治，却使他更深地陷进自然而生根在自然之中。①

正因为马克思从人的本质中寻找异化的根源，所以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关于人可以消除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然而，列斐伏尔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有关论述，提出了“总体的人”的概念，并认为“总体的人”最终摆脱了异化。他说：

人的异化的终结将是“人复归于其自身”，这就是说，是人的全部因素的统一。这种“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一致，它创造了合乎人性的人而保留其发展中的全部丰富性。“这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②

那么，究竟什么是“总体的人”呢？他说：

总体的人是变化的主体与客体，它是与客体对立并克服这种对立的有生命的主体，是被分成许多局部活动和分散的规定并克服这种分散性的主体，它既是行为的主体，又是行为的最后客体，甚至是行为在生产外界客体时的产物。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主体—客体，是起初被弄得支离破碎，后来又被禁锢在必然和抽象之中的主体—客体。总体的人经历了这种支离破碎走向自由，他是必然的，但又是自由的。他像自然界一样成了一个总体，但又驾驭着自然界，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③

如何造就这种“总体的人”呢？列斐伏尔认为，他既不是从经济命运得出的，也不是从神秘的历史目的性中得出的，更不是由社会的指令造就的。要造就“总体的人”，需要总体的行动。他说，总体的行动既是高度个体化的，同时又在基本能量上具有共同性；既是高度清晰的，又是高度自发的；虽然融合在自然界的节律之中，但又是唯一的存在。比如，艺术就包含一种走向总体行动的努力。人们能够在最神秘的诗篇中，找到被称为神圣的、超人的总体行动。艺术是摆脱异化特性的生产活动，是生产者

① 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Verso, 1991, p. 70.

②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150.

③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p. 149—150.

和产品、个人和社会、自然生物和人类的统一体。

2. 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正是从他的异化理论引申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他说：

> 异化理论和“总体的人”的理论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指针。这些理论能够使人揭示社会发展的总体，并确定发展方向。它们也使人能够通过对这种发展的深度的许多断面的分析，而深入细节，并把细节同总体联结起来。①

正因为异化无处不在，充斥于日常生活之中，所以人们应该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列斐伏尔认为，哲学家无权在异化概念本身上建立异化概念，无权在异化着的或被异化的现实情况以外来研究异化概念。哲学家无权把哲学领域孤立起来，已经确定异化概念和它的普遍意义之后，便应当过渡到其他一些确定的领域，特别要把异化概念和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是每个人的事，不是某个人、某个社会学家或哲学家研究的专题。我们应当努力把日常生活纳入哲学的研究范畴，使它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这种改造哲学、扩大哲学研究领域的观点同时也改变了从哲学角度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即用一种普通的看法来看普通。这种尝试的目的就是希望从普遍的、一般的事物中揭示特殊的、非一般的事物。他说：

> 我所接触到的东西越来越深刻，但它却是在最初的小事情中一开始就包含着的。于是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件就对我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偶然的小事；另一方面是比起这些小事所具有的许多“本质”来无限复杂而且更为丰富的社会事件。社会现象就是被这两方面的统一所规定的。②

列斐伏尔指出，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经济和意识形态只有在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候，才能提高到政治意识的水平，在那个时刻，社会实践中、自发意识中、群众生活和阶级生活中的一切因素都凝结而集中在政治生活上。而除了这些时刻以外，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便互相分离，甚至分道扬镳，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尤其如此。

> 这时候，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东西，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便把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等等一

---

① 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Verso, 1991, p. 76.

② 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Verso, 1991, p. 57.

方面包罗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它们掩盖和隐蔽起来。所以，一定要撕破面纱才能接触真相。这种面纱总是从日常生活上产生着，不断地再生产着；并且像作为日常生活的更深刻、更高级的涵义而把日常生活隐蔽起来。①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批判就是马克思主义。他自称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那么，列斐伏尔是如何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的呢？他说："日常生活批判按照'生活'的本质样子去分析它，不把它改变成一种暧昧的实体；日常生活批判要研究相互对峙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日常生活批判要研究新的冲突和矛盾。"②

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把生活问题简单化，而是要求并且规定一种比在偶然的机会中作简单选择的意识更高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迷宫中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丛林中找到方向；他们也才能做到辨别出什么是对生活有帮助的东西和什么是蒙蔽或阻止他的生活的东西。这样，每个人也许就会坚强地参加他的生活和热爱他的生活，而不逃避任何任务。

列斐伏尔以一个女人购买半斤砂糖为例来说明他的日常生活批判。他说，要了解这一简单事实，单单描写它是不够的。只有加以探讨才能发现理由和原因、本质和"表面现象"错综复杂的联系，发现这个女人的生活，她的生平历史，她的职业，她的家庭，她的阶级，她的预算，她的饮食习惯，她的钱财的用途，她的意向和观念，市场情况等，最后就整个地抓住了资本主义，抓住了国家及其历史。

列斐伏尔认为，无论如何，对日常生活批判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克服人性的内部分裂和矛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城市与乡村的分裂、私人与社会的分裂），并不是一朝一夕，在一个决定性的和"全面"的时刻，通过一个简单的行动就能实现的事情。因此，日常生活批判需要辩证的思维。他说："用一种普遍而具体的方式，辩证地来思考异化概念，这也就是说，在它的普遍性的广度上加以规定，并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来理解它。"③

辩证法的思想能够并且应该在生活中变成生活的辩证意识，即变成间接和直接的统一、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文化和天然的自发性的统一。所

---

① 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Verso, 1991, p. 56.

② 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Verso, 1991, p. 66.

③ 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Verso, 1991, p. 76.



以辩证思想将从意识形态和专门知识过渡到文化、语言当中，也许还会过渡到对世界的直接感觉当中——无论如何，都是过渡到日常生活当中。[①]列斐伏尔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并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批判分析，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拓展，但他的具体理论却往往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二、梅洛一庞蒂

莫里斯·梅洛一庞蒂(Maurice Merleau一Ponty, 1908一1961)是法国著名的现象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莫里斯·梅洛一庞蒂
(1908一1961)

梅洛一庞蒂生于法国滨海夏朗德省的罗什福尔。他5岁丧父后，随母亲移居巴黎。1926年中学毕业后，梅洛一庞蒂入巴黎高师学习，在此结识了比他高两级的萨特。梅洛一庞蒂于1930年大学毕业并获得教师资格。服完一年兵役之后，便在中学任哲学教师。1935年至1939年，在巴黎高师任助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炮兵部队服役。战后，他以《行为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 1942)和《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1945)两书获得博士学位。1941年，梅洛一庞蒂参加了由萨特等人组织的一个名叫"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组织。1945年，他与萨特等人创办了一个哲学、政治和文艺刊物《现代》，并任政治编辑。1945年至1948年，梅洛一庞蒂任教于里昂大学；1949年至1952年，他在索邦大学教授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1952年，他获得法兰西学院的哲学教授席位，成为历史上获得法兰西学院教授职位中最年轻的一位。

梅洛一庞蒂主要是一位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20世纪40年代，由于受到萨特的影响，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在这一时期，梅洛一庞蒂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对朝鲜战争和苏联社会主

① 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Verso, 1991, p. 76.

义实践的看法，他在政治和思想上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到了之前的立场。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书之外，梅洛一庞蒂的主要著作还有：《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e et terreur*, *essai sur le problème communiste*, 1947)、《意义与无意义》(*Sens et non－sens*, 1948)、《哲学赞词》(*Éloge de la Philosophie*, 1953)、《辩证法的历险》(*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1955)、《可见的和不可见的》(*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1964)等。

(二)模糊暧昧的马克思主义

模糊暧昧是梅洛一庞蒂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西方学术界常常把他的哲学称为“模糊暧昧的哲学”。这种模糊暧昧的特点体现在梅洛一庞蒂在综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时，既从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出发推出一种马克思主义人学，又从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出发推出一种马克思主义存在哲学，但同时否认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存在主义。

1.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学

在梅洛一庞蒂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主义像存在主义一样不把人的意识(例如革命阶级的意识)看作客观条件的产物，而是看作主体本身自由选择的产物。

第二，马克思主义像存在主义一样认为历史活动的要素的标志是偶然性和危机，个人在现实的历史情境中所遇到的，并不是命运和决定论，而是向他开放着的一种可能性、不确定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像存在主义一样强调历史的意义，来源于个人通过活动而注入其中的意义。历史活动充满着焦虑的性质，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历史活动具有自由的性质，它是由人来驾驭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像存在主义一样突出人的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人学，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就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他说：

>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应当从对经济作用所作的归纳分析中去寻找。同时也应当从个人和人类关系的某种直觉中去寻找。马克思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在学术上的新贡献，不是在于把哲学问题和人类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是在于从经济问题里找出哲学



问题和人类问题真实的相等物。[①]

梅洛—庞蒂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还是主观存在。他说：

> 如果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承受者和辩证法的动力既不是独立的“社会世界”，又不是“精神世界”，也不是观念的独特运动或集体意识，那又该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是以某种方式参与征服自然，并在此过程中以一定形式与他人发生交往的人，是具体的人在交往中保持的相互主观性，是正在根据一种典型方式实现着自己的各种存在的、具有连续性和共时性的共同体。[②]

社会主义的人之所以能够预见“自由王国”将会到来，并把现时代看成是资本主义异化的一个阶段，这是因为他通过周围的环境得出这样的信念：人是生产力，人同自己以外的物相对而存在，人不是惰性的物。必须确定人是工具和客体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不属于普通思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人置身于世界之中时所面对的外部世界既是“客观的”，同时又是“主观的”。为此，就应该认为人是“受动的”或“感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是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物，同时又是“开放的”、“能动的”、即使处于附属地位上也能保持其独立性的存在物。[③]

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主体的哲学，也不是客体的哲学，而是一种历史的哲学，一种人学。

梅洛—庞蒂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物质”和“意识”都从不是被单独去认识的，“物质”被纳入到人类共存的体系中去，在该体系中建立起当时的和历代的所有个人的共同环境，它保证个人的各种计划的普遍性，并使历史能够有一条发展的路线和有自己的意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要旨不是从动物出发去解释人，更不是从物质出发去解释人。

梅洛—庞蒂还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把他的唯物主义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想说明物质作为实践的支撑点和形体在人的生命中起作用，也就是说，突出了主体的能动作用。

在梅洛—庞蒂看来，这种马克思主义人学既不等同于斯大林主义的

---

①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Beacon Press, 1969, p. 101.

②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9.

③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9—130.

历史决定论，也不等同于存在主义。梅洛－庞蒂否认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否认它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将历史决定论强加给马克思不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危及了马克思主义。

梅洛－庞蒂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历史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对立起来，忽视了前者的作用而过高地估计了后者的作用。斯大林主义者只看到外部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把社会历史的进步当作是由一个物化的引擎所推动，把革命事件看作是可以预先注定的。因此，斯大林主义者陷入了宿命论。按照这种宿命论，人无非是朝着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不可逆转地开动着的巨大的时间机器的一个齿轮。他说：

> 且不论在理论上，至少在革命实践上，（苏联）目前的阶段打破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的平衡。与经典的提法相比较，就可看出，现阶段过高估计了经济基础这一客观因素，而低估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观因素。时至今日，革命看重的是中央的英明、计划的有效和劳动者的纪律性，而不是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中央已不再去发掘世界的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潜力，不再随着历史的发展阐述历史的方向，不再去引导历史的自发进程。①

梅洛－庞蒂指出，苏联在对外方面遏制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力量，接受阶级合作，在对内方面强制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只注重革命的客观条件，而忽视革命的主观因素，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最好例证。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片面地强调经济基础，已经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虽然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具有相同之处，但他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也不等同于存在主义，特别是不等同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走向了与斯大林的历史决定论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即只强调个人自由决定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客观的、物质的条件对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制约作用。在梅洛－庞蒂看来，人是自由的，但人的自由不是无限的、绝对的，自由要受社会和历史的制约，自由不能只是个人的决定，它同时也是集体的、社会的决定。

2.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存在哲学

梅洛－庞蒂认为，许多人，特别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

---

①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Beacon Press, 1969, pp. 135－136.

与存在主义对立起来，极力批判存在主义，或者对存在主义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这既误解了存在主义，也误解了马克思主义。

在梅洛－庞蒂看来，弄清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是否真的对立，必须把握存在主义的实质。把握存在主义实质的角度是“人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是自然影响、生理影响和社会影响下的产物，这些影响从外部确定人的本质，并使人成为世界万物之一；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具有脱离外物的自由，因为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他能用表象再现出被认为作用于人的外在原因。这两种观点都把意识和行动割裂了开来。萨特的存在主义一反传统的观点，把意识和行动统一了起来。存在主义统一两者的途径就是把人理解成一种十分特殊的存在物，即“力图主宰万物而又不停留在万物之中的有动机的生物”。按照萨特的观点，人是存在的，而存在是人赖以在世界中生活的运动，它使人置身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而这种环境又最终确定了人的世界观。这样，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再是历来的唯心主义所说的认识关系，而是一种存在关系。

梅洛－庞蒂认为，把握了存在主义的精神实质就可知道，确实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是与存在主义相对立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就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客体的一种反映、存在的一种副产品。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恩格斯和列宁。例如，恩格斯说，观念是客体的精神反映，人脑归根到底不过是真实世界的产物；列宁则说，世界的图像是一幅表现物质如何运动的图像，人脑是思维的器官。这种马克思主义确实与存在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它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说：

>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提法是不全面的，他们有权认为这些提法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体现（因为它们把所有的现象归结为一个物质实体），而不是辩证哲学的体现（辩证哲学必定承认，在物质现象的基础上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类现象，必须研究这些类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原始关系，以及各种原始结构的诞生）。①

然而，非形而上学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却是与存在主义存在着共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都是

①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8.

黑格尔的继承人，他们殊途同归。梅洛一庞蒂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三个方面体现了它与存在主义的一致性：

首先，梅洛一庞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存在哲学的"存在"而非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的角度来批判主观性问题和主观性概念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用以反对主体哲学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存在'。这就是说，以反思出现的任何哲学同它所要抓住的东西——人的存在——不相适应，因为它已经是世界和历史之外的某种存在方式。"[①]正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用"存在"来反对唯心主义的主观性，所以，它在反对这种主观性时，并不否认历史的主观条件。

其次，梅洛一庞蒂认为，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人不仅是集体的人或阶级的人，而且也是保留着为本阶级服务或背叛本阶级这种权利的单个的人。马克思告诉我们，阶级的客观定义是单个的人在生产流程中的实际地位。马克思主义不仅容忍个体和自由的存在，而且它作为唯物主义，还赋予人以极大的责任。

再次，梅洛一庞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要我们在没有纯精神作保证的条件下，把历史的逻辑置于历史的偶然之上。马克思主义不能在"总体的人"成为事实以前断言"总体的人"的存在，它也不能事先确定历史的终结，如果我们所有的矛盾总有一天会消除的话，我们也只有等到这一天到来时才能知道。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事件依旧是偶然的，革命爆发的日期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具体地或抽象地被确定。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重视历史的主观条件，强调历史发展偶然性方面，还是在容忍个体的存在和自由方面，都与存在主义相吻合。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辩证的哲学，而且还是一种存在哲学。

梅洛一庞蒂认为，马克思本人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但"存在哲学"则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名称。为什么"存在哲学"更适合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是因为，这个名称最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他说：

> 正如其名称所指出，"存在哲学"所要研究的题目不仅是认识和意识（即独立地确认对象的内在性和可塑性的活动），而且是存在，即在一种自然的和历史的环境中出现，既不能摆脱环境又不能屈从于

①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9.



环境的活动。认识从此回到了人类实践的总体中去，并且不断被实践所补充。“主体”不再是认识的主体，而是人的主体，他在持续的辩证运动的作用下，根据自己的环境进行思维，通过自己的经验制定出范畴，并用他在环境和经验中所找到的意义去改造环境和经验。①

梅洛－庞蒂一再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存在哲学，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等同，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存在”的特征，但马克思主义与萨特的存在主义还是有原则上的区别的。

三、萨特

(一)萨特的生平和著述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是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者。


让－保罗·萨特(1905－1980)

萨特出生于法国巴黎，其父是一名海军军官，但在萨特年幼时去世。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萨特很小的时候就阅读了许多法国文学大家的作品。萨特在中学时期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并立志成为一名哲学家。1924 年，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主攻哲学。在那里，他广泛地阅读了笛卡尔、斯宾诺莎、卢梭、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的著作，同时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1933 年，萨特慕名到德国学习胡塞尔的现象学，投入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门下，跟随海德格尔学习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积极地投入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抵抗运动，不久被俘。被释放后，他便在巴黎从事教学、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1943 年，萨特发表《存在与虚无》(*L'étre et le néant*)一书，使他成为存在主义在法国的最著名代表。1945 年，他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著名演讲，堪称存在主义哲学的宣言。除了哲学著作之外，萨特还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戏剧、政论、评论等，使他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萨特在教书和写作之余，还积极地投身

①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3－134.

于政治活动，成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虽然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但自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经常与法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曾先后访问苏联和中国，以表达对社会主义的支持。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萨特越来越远离共产党，并且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但同时他在政治上越来越激进，在思想上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初，萨特与罗素一起组织了“国际战犯审判法庭”，以反对美国侵略越南。1964 年，他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声称不接受来自官方的一切荣誉。20 世纪 60 年代末，他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亲自上街卖支持学生运动的报纸。1960 年，萨特发表了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巨著《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第一卷，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萨特的重要哲学著作还有：《想象力》(*L'imagination*, 1936)、《自我的超越》(*La transcendence de l'égo*, 1937)、《情绪理论纲要》(*Esquisse d'un théorie des émotions*, 1939)等。萨特的一些政论、文论和文学作品也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境遇》(*Situations*, *I*－*X*, 1947－1976)、《家庭傻瓜》(*L'idiot de la famille*, 1971－2)、《恶心》(*La nausée*, 1938)、《苍蝇》(*Les mouches*, 1943)、《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 1948)等。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

存在主义的主旨之一是抗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将人当作物，扭曲了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人的存在和自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内容，同时也决定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走向。在萨特的眼中，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任何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无非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调重弹。然而，马克思主义虽然正确，却被当前的教条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唯心主义化了，所以它停滞和僵化了。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给它洗了一次硫酸澡，把人消溶掉了，把它变成了一种非人的学说。鉴于这种情况，萨特主张应当用“真正的人学”即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探究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

1. *历史人学*

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就是：“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

不是。"①

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也就是人的"主观性"。正是根据这个原则,他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命题:人生之初,空无所有;人只能进行"自由选择",使自己获得各种现实的本性。人不外是自己造成的东西。他说:"因为如果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②

那么,"主观性"是什么意思呢?萨特说,我们用"主观性"这个词除了说人比一块石头或者一张桌子更具有尊严外,还包括这样的意思:

> 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一棵花椰菜。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连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③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这种"主观性",所以必须用它补充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我们不仅要承认经济条件等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本性,即所谓人的"意义"(即人之成为怎样的人)是被社会环境赋予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人是自己赋予自己以意义的。因为社会环境是人所创造的,即社会环境的意义是人所赋予的,而且人只有自己成为意义的赋予者,即自己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时,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意义。总之,社会环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领域,人可以选择这一种意义,也可以选择那一种意义,关键在于人的"主观性"。

萨特在用存在主义的"主观性"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历史人学",对人类发展史作了重新解释。

萨特认为,历史人学的基础是"实践"。但他所说的实践并非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而是一种"主观性"的"自由"行动。萨特用实践来规定人与外界的联系,他说实践就是有目的地克服物质条件的有组织的计划。

在萨特看来,全部社会历史开始于个人的实践。个人的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基础,社会历史活动必须从个人活动中才能得到说明。按照这种逻辑,萨特描述了人类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历史是从个人实践到群集再

①③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 页。
②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 页。

到集团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个人的实践逐渐被异化，由构成的实践转变为惰性的实践，于是个人就起而反抗这种状况，破坏集团，重新开始构成的实践活动。

萨特认为，个人的实践具有能动性，它既能克服自然物质的必然性，又构成了全部社会关系，所以它又被称为“构成的实践”。按照萨特的看法，个人实践是这样展开的：作为物质有机体的个人，为了维持和继续自己的生存，就得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需要，人就利用自己的物质性，把自己的身体工具化，使之作用于外部物质界，这样就产生了个人的实践。一方面，个人的实践赋予物质存在以意义，使之适应于人的需要，从而实现外在性的内在化；另一方面，物质存在又要求人完全适应它所指示和需要的处理办法，从而又实现内在性的外在化。

但是，在外部物质界中作为偶然事实而存在的匮乏，却不能保证有机体的满足，并且使它的发展中断。萨特认为，匮乏——首先是生活资料的不足——说明了历史的基本结构，是阶级产生的根源，也是人转化为“反人”这种异化的原始的基础。萨特说，在生活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当个人消费一个对象时，也包含有因为消费那个对象而同每一个其他人相对立的意思。因为个人需要的满足，同时又是对每一个其他人的威胁。因此，当着个人的满足自己需要的实践转而反对他，并通过社会环境而作为它者而达到他时，第一个异化就产生了。

萨特把“群集”和“集团”称为超个人的“实践集合体”，它们都是惰性的、反辩证法的。在群集中，人们的结合是由于某种外在的未能意识到的原因，就像一群人等公共汽车，大家互不相识，除了都要乘车外，没有任何共同点，而争夺座位又使他们成为潜在的敌人。在这个阶段上，由许多个人集合而成的群集，虽已初步形成集体，但还是散漫的乌合之众，群集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利益的对象，也没有共同的实践，只是具有被动的活动性的物质在支配着人，原来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实践——辩证法——被否定了。

萨特认为，阶级也是一个群集性的群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异己的，即使是同一个阶级中的成员，也免不了他们之间的异己性。所以，阶级本身也和其他群集一样，成为一种被动的惰性的集体。

集团是对群体的否定，构成集团有两个要件：人们按照规定的共同对象而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把这个对象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投入自己的实践。



集团的最初形态为“融合集团”，它是由外部的压力形成的。例如，1789年巴黎群众在攻打巴士底狱时就形成了一个融合集团。当时，群众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威胁面前，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形成了一股共同的力量。这种集团的实践，是每个人自由决定的行动，因而具有个人实践所特有的那些因素，属于惰性最小的实践。

但融合集团只能在短时期存在，一旦完成了它的目标，它就解散了。为了维持集团的存在，集团必须发展为“誓愿集团”。为了保证这种集团的存在，集团成员宣誓牺牲自己的自由来保证公共的自由。为了保证誓言的效力，在宣誓的同时，还必须包含恐怖。因此，誓愿集团既要求内在的自我约束，又要求外在的强制。

为了使集团实现集团成员共同目的的机能趋于完善，誓愿集团又发展成为“组织集团”。这种集团的特点是：为了实现所确定的共同目的，把工作分配给它的各个成员。这样，集团成员就由原来具有流动的同质性的融合集团的成员，发展为执行着由集团所规定的具有异质性的机能单位。在这里，集团用综合的权力把各种不同的机能联结起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共同实践虽包含有好多主体，但行动只是一种。

更进一步，为了防止集团成员的“群集化”，又产生了把集团的关系明确地加以规定的、在非有机的制度中把成员固定化起来的“制度集团”。这样就产生了人人必须服从的主权者，集团的共同目的也由主权者来决定了。本来，维持“制度集团”的那种制度，是为更好地支持个人的自由的，却不能保证集团的共同意志就是各个成员真正的意志；主权者在事实上的力量，也由于制度化而成为一种由不可超越的权力而来的力量；主权者所决定的集团目的，也不是各个成员的共同目的。而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点就是“官僚国家”。

从个人实践发展到制度集团，惰性的实践完全取代了自由的实践。物极必反，由于实践的力量，制度集团势必分解开来，社会历史重又经历从个人实践向制度集团的发展。

2.人学辩证法

萨特强调，他所说的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指设定一种历史的内在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指那种自以为发现了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妄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萨特的眼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被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曲解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一种内在辩证法，而辩证唯物主

义主张一种自然辩证法。

在萨特看来，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由于恩格斯提出的自然辩证法。他说，正是由于恩格斯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才使辩证法成为“教条主义的公式”，因为自然辩证法导致了“自然的历史化”和“历史的自然化”。所谓“自然的历史化”，是指把自然界看成同人类历史一样，是有规律地发展的；所谓“历史的自然化”，是指把人类历史看成是离开人的创造而自然发生的，人在自然界和历史面前完全成了无所作为的、消极被动的存在物。

萨特之所以把他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巨著命名为《辩证理性批判》，是为了确定辩证理性（即辩证法）的有效性和限度。那么，辩证法的有效性和限度是什么呢？萨特说，辩证法只适用于社会历史，而不适用于自然界，马克思是根据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来解释和界定它。萨特说：

> 如果存在着辩证理性，那么它是在人类实践中，并通过人类实践，向处在某个特定社会内的人，在它发展的某一时刻表现出来，并且建立起来。在这种发现的基础上，必须确定辩证事实的界限和范围：只要辩证法像可理解性的规律和存在的合理结构一样是必要的，那么它就会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唯物辩证法只有在人类历史内部确立起物质条件的优先地位，由特定的人们在实践中发现了它们并承受了它们时，它才有意义。简言之，如果存在某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东西，那它一定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即一种内部的唯物主义，同时造就了它并使它强加于某一事物，去体验它和认识它。因此，如果这种唯物主义存在的话，也只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有限范围内才是真理。①

按照萨特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是内在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即人学辩证法。

什么是辩证法？萨特说，辩证法是由人内部的非理性的意识活动所支配的个人的活动，即“个人的实践”。辩证法只能来源于个人的实践，这就是说，辩证法不是人以外的对象所固有的，而只是人所创造的，以个人的实践为源泉，离开了个人就不可能有辩证法。他说：“倘若我们不希望辩证法再次变成一种超凡的法则、一种形而上学的宿命，辩证法就应该是

①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6 页。



来源于个体，而绝非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体的整体。"①

在萨特看来，恩格斯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能够通过非辩证的过程，从自然界中获得他的辩证法则：比较、类比、抽象、归纳。脱离了人的辩证法只能是抽象的教条和形而上学的公式，最终会陷入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宿命论。既然辩证法的存在以及对它的理解都取决于个人，那么，这种辩证法就只能是人学辩证法。

萨特认为，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就是整体化。整体化指的是整体东西的形成，或者说是实现整体的运动。辩证法既是一种个人的整体化，又是一种社会的整体化。个人的整体化是社会整体化的基础，社会整体化通过个人整体化来达到。他说：

> 辩证法就是整体化法则，这个法则造成了一些集合体，一些社会、一部历史，即一些强加在个人之上的实在性；而同时，它又必须由无数个体行为交织而成。②
>
> 如果存在辩证法，它只能是由整体化的个体的一种多元复合性操纵的各种具体整体化之总体整体化。③

萨特指出，整体化仅仅存在于社会历史之中，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就是指社会历史的一种整体化运动。整体化不存在于自然界，所以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这是因为，其一，人总是外在于自然界，把自然界当作外在性来理解，人与社会构成一个整体，而不与自然界构成一个整体，在自然界中不能由人的实践来实现整体化；其二，自然界是无限的，而无限的东西不能构成一个现实的整体，自然界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尽管萨特意在将"人学辩证法"确定为普遍适用的方法和普遍适用的规律，但因为他只将这种辩证法限定于社会历史之中，限定于人的内在性之中，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普遍的方法和规律。

本章小结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兴起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在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它注重马克思的早期著

①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9—170 页。

②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0 页。

③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1 页。

作，致力于用存在主义补充、解释马克思主义，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最早用存在主义的理论资源和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存在主义传到法国之后，法国的哲学家列斐伏尔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先河，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出发解释马克思主义，并进而系统地进行了日常生活批判。20世纪中期，梅洛—庞蒂成了综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一种人学和存在哲学。在梅洛—庞蒂的启发之下，萨特成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著名代表，他主张从历史人学和人学辩证法的角度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以发展马克思主义。

思考题

1.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2.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哪些主要特点？
3. 列斐伏尔是怎样改造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的？
4. 试评述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学说。
5. 如何理解梅洛—庞蒂的马克思主义人学？
6. 萨特的历史人学是怎样看待人类发展史的？
7. 如何看待萨特的人学辩证法？

阅读书目

1. [法]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2.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3.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六章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要点提示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
◎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
◎普兰查斯的国家学说
◎普兰查斯的阶级学说

第一节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概述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为代表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与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样，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以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称。

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是“结构主义”，而结构主义方法源自于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创立的。索绪尔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学，提出了系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语言学上实现了重大的变革。索绪尔把语言与言语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决定着言语。语言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也就是一种先验结构。语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网络，成为一个语言的

体系(符号体系),这就是语言的结构。一切语言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者与所指者。索绪尔把共时性的语言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与历时性语言研究(作为个人现象的语言)区别开来,强调共时性研究的重要性。共时性语言研究就是从一个时期的语言的横断面来研究这种语言,而历时性语言研究则是从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这种语言。

源于语言学研究的结构主义哲学思潮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当作学术研究的普遍方法,以具有客观结构的语言取代个体主体存在的人来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力图超越传统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和心理主义的理论框架,他们或致力于寻求固定的结构,或强调结构的流动变化,或把结构主义理论用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具有不同倾向的学者因在不同意义上将原来主要在语言学中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用于从事其他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庞杂的思潮。结构主义方法的中心课题就是从混杂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或者结构来。

各派结构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从既定的语言结构(系统、模式、型式)及与之相应的思维结构出发来解释其所研究的领域的现象。他们对结构概念的解释在如下几个方面有一致之处。第一,认为结构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规则、秩序)由许多成分(要素、单元)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而作为系统、整体的结构正体现了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通过揭示和阐释这些关系,就可理解所涉及的领域的各种现象。第二,把结构划分为深层与表层等不同层次。第三,认为结构作为一种理智和观念的存在具有超越作为主体的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是无人格的。第四,大都否定结构的历史性,认为结构超越时间性。

正是在结构主义的氛围中,法国哲学家开始思考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结合的人是当时年轻的人类学家吕西安·塞巴格(Lucian Sebag)。塞巴格曾加入过法国共产党,拥护马克思主义。但后来他同法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试图从结构主义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1963年,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一书,第一次正式论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塞巴格在该书中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最好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在历史、本体论、精神分析

和马克思主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总体性的理论，结构主义则在于了解人类的现实。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愈来愈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是科学的东西。而结构主义则是科学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应该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现象的总体性理论，才能明确理解人类现实。塞巴格在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方面开了先河，但因他过早辞世，没有留下其他作品，所以他的观点在理论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

除塞巴格之外，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和皮亚杰等结构主义大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他们一般认为，马克思是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他们自己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来源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以他们赞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立者和最大代表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阿尔都塞的带动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的思想舞台上曾盛极一时，并风靡西方及拉美一些国家。一些左翼学生对阿尔都塞十分崇拜，他们把阿尔都塞的著作当作圣经，经常跑步冲进教室听阿尔都塞讲课。阿尔都塞的许多学生，如普兰查斯、格罗克斯曼和巴里巴尔等人，对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行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走下坡路。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阿尔都塞的一些学生开始抛弃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转而鼓吹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新哲学”。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阿尔都塞本人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基本上解体了。

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作为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股思潮，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同为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许多人都高度评价了这股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有人把阿尔都塞的著作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把大家从官方解释者的乏味的重复中解放了出来，“它的重要性甚至连诋毁他的人也承认”。他们把阿尔都塞的名字同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毛泽东、格瓦拉等受到他们极力推崇的人并列在一起。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曾经把

阿尔都塞列为继萨特之后的“第二个最好的”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者。西方有些学者还认为,阿尔都塞试图创造一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危害它的各种形式的还原主义(经济主义、自发主义)分割开来的概念,因为这些还原主义不能理解革命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各种现实。

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前,许多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特别重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主要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们不是公开地、明确地和严格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术语、政治术语、意识形态术语去提出问题,却根据人的哲学的概念去提出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早年关于异化的意识形态概念来思考和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批判了苏共“二十大”之后日益泛滥的人道主义。阿尔都塞指出,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使得一些共产党人和理论家将人道主义加之于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说:

> 共产党人用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现实反对一般帝国主义“非人道”,这无疑是正确的;这一对立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争论和斗争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把人道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概念不分场合和毫无保留地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去使用,这可能也是危险的,因为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无论如何总是使人想到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并且很容易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命题混淆起来。①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把早期马克思的学说作为非科学的东西加以否定,而肯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摆脱了非科学的人道主义,走上了科学的道路。阿尔都塞说:“从 1845 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②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强调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科学结论正是在批判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获得的。马克思在历史理论中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概念代替了个体

---

①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239.

②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227.



和人的本质等旧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即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阿尔都塞坚决主张必须把人的哲学神话打得粉碎，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绝对条件下，才能对人类世界有所认识。

> 所以，关于理论，严格地说来，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公开谈到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关于在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中看到关于人类世界本身以及对它进行实际改变的绝对（否定）的前提条件，除非根据那种把有关人的哲学（理论）神话归为灰烬的绝对前提，否则就不能认识人的任何东西。所以，到马克思那里去要求任何种类的恢复理论上的人类学或人道主义的任何思想，在理论上说来无非是灰烬罢了。①

在他看来，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同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的决裂不是一个次要的细节，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又是与马克思的科学浑然一体的。

第二，反对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反对人道主义，也反对历史主义。阿尔都塞说：

> 我乐意指出，从理论观点来看。正如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样，它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而且，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一个独特的运动中和靠了确立它的独特的认识论上的决裂，严格地说，是一种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②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强调共时性的结构方法优于历时性的历史方法。从结构分析方法出发，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着重阐发马克思的思想中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连续性和中断性，即结构性转换。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否定历史的研究。阿尔都塞指出，全部历史对象的科学是建立在已知的、现存的历史对象基础上的，对象成了以往历史的结果。我们现在对对象的认识，只不过是这一对象在过去基础上的现在的投影。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只是一连串的结构。所以，他们都强调“共时性”，主张从横断面去对待历史。阿尔都

---

①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p. 229—230.

②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119.



塞正是由此出发，认为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开始，就把“反思的次序”倒转过来，特别注意考察事物的“总体的特别结构”，以便理解它的各环节的“构成关系”以及“历史的特殊结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事物内部各方面的“同时存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阿尔都塞说：

> 在这里的一切就是：同时存在，社会体系各个环节的连接，不能在“运动、顺序、时间的逻辑公式”中思考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如果我们记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逻辑”只是“运动”和“时间”的抽象——它们在这里被当作蒲鲁东神秘化的根子来直接引证——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主要的是要把反思的次序倒转过来，首先思考总体的特别结构，以便理解它的各个环节和构成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的形式以及历史的特殊结构。①

阿尔都塞还提出了“两个客体”的理论，以论证他的反历史主义。阿尔都塞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存在着“实在客体”和“认识客体”。实在客体是变化的，所以是有历史的；认识的客体是不变的，所以是没有历史的。阿尔都塞用上述理由去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的命题，用意是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建立在认识客体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现实客体基础上。换言之，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是以已知的、现存的历史对象为基础的，是从已知的历史材料抽象出来的，而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得来的，也不是以现实材料为基础去作出革命性的结论。

第三，反对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从区分意识形态与科学出发，认为经验主义在性质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只有理论思维才真正是通向科学认识的道路。

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反经验主义的。他们认为，经验主义单纯地把直接的“感觉”和独特的“个体”作为本质的存在物而作为加工对象，混淆了思维与实在。而科学则总是以现有的概念，即“一般 A”作为加工对象，它既不加工纯粹的客观“材料”，也不加工绝对的“事实”。由“一般 A”（概念原料）加工成“一般 B”（概念或认识），即由“抽象”转化为“具体”这个过程，只涉及理论实践的过程，即完全“在认识过程中”进行。“一般 A”和“一般 B”之间，从不存在本质的同一性，只有真实的转化性。费尔巴哈恰恰把二者混淆起来，处于费尔巴哈阶段的马克思也是如此。后来当马克思有意识地放弃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

①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98.

他就抛弃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混淆。阿尔都塞说：

> 当他（指马克思）自觉地抛弃了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使他认为，科学概念正是通过在具体的果实上进行抽象，作为“应当被”产生的一般果实概念而产生的——时，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任何科学认识的过程都始于抽象，始于一般性，而不是始于实在的具体时，他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他真的同意识形态决裂了，真的同仅仅谴责思辨抽象决裂了。就是说，真的同它的前提决裂了。①

根据这种观点，阿尔都塞反对马克思本人把自己的辩证法说成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因为黑格尔用观念运动去解释科学工作的现实，把从抽象到具体的整个过程当作是概念的自生。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不承认真实的质的不同和质的转变，不承认理论实践过程本身在本质上由中断所构成。这实际上是把思维与存在、思维过程与存在过程、“思维具体”与“实在具体”等同起来。因此，马克思用“颠倒”的概念向我们指出的“清算”，不可能是一种与经验主义决裂的另一种相反的理论。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把理论与经验对立起来，必然结果是轻视感性的实践活动。因此，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没有感性的实践活动的真正地位。他们所谓的“实践”，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理论而已，即“理论实践”。同时，在他们的理论中，也没有革命主体——无产阶级——的真正地位。所以，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活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过程，均不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之内。

——◎第二节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阿尔都塞

（一）阿尔都塞的生平和著述

阿尔都塞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最大代表。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出生在阿尔

①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190.

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近郊比曼得利小镇的一个银行经理的家庭里。他1924年至1930年在阿尔及尔读小学;1930年至1936年在法国马赛读中学。中学毕业后,阿尔都塞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天主教青年运动和青年学生中的基督教徒组织。1939年,阿尔都塞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院。此时正值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阿尔都塞随即弃学应征入伍。但在次年六月他被俘虏,被关在一个德国战俘集中营里,直到战争结束。战后,阿尔都塞重获自由,重新回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著名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echelard)的指导下,他于1948年完成题为《黑格尔哲学中内容的观念》的博士论文,此后就一直在那里执教。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

在政治上,阿尔都塞早在抵抗德国侵略时就开始接触法国共产党,认为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是法国工人阶级的政党。1948年,他正式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但并不认同法共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苏联开始了去斯大林化的进程。法共领导人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这意味着恢复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之根。然而,阿尔都塞反对这一趋势,提倡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并赞同中国共产党对苏共的批评。

从20世纪60年代起,阿尔都塞在列维-施特劳斯、拉康等人的影响下,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使他成为公认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还在法共内部组织学习小组,研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传播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阿尔都塞起初站在学生一边,支持学生的行动。但后来他和法共一起指责学生犯了"左派幼稚病"。结果,许多他的以前的支持者转而批评他。

阿尔都塞长期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1980年某天因掐死自己的妻子被送入精神病院。1983年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基本上过着隐居的生活。虽然还继续研究和写作,但很少公开发表。1990年,阿尔都塞死于心脏病。



阿尔都塞的主要著作有：《政治和历史》(*Politics and History*, 1959)、《保卫马克思》(*For Marx*, 1965)、《阅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 1965)、《列宁与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1969)、《自我批评文集》(*Essays in Self-Criticism*, 1974)等。

(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的理论工作就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解读马克思的著作，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科学的基础是当代历史中最重大的理论事件"①。那么，阿尔都塞是怎样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的呢？他又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出了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呢？

1. 症候阅读法

阿尔都塞认为，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不能用通常的方式，而要用一种依据症候的阅读方法(symptomatic reading)。

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提出来的。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学家在治疗精神病患者时，通常让病人自由地谈话，通过对其谈话中出现的各种症候，如失言、遗忘、沉默、语言的中断、思想的空隙等的分析，揭示其深层心理中的秘密。

阿尔都塞把弗洛伊德的这种治疗精神病人的方法移植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上，目的是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通过其表面的文字，发掘出潜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框架。他说：

> 我建议，我们不应该用直接阅读的方法来对待马克思的文本，而必须采取依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来对待它们，以便在话语的表面的连续性中辨认出缺失、空白和严格性上的疏忽。在马克思的话语中，这些东西并没有说出来，它们是沉默的，但它们在他的话语本身中浮升出来。②

阿尔都塞这里所说的"缺失"、"空白"和"疏忽"都是马克思著作中的症候，阅读者正是通过这些症候读出马克思的问题框架或真实思想。

阿尔都塞之所以提出症候阅读法，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出问题框架来，是因为在他看来，一种理论的同一性，不存在于理论所包含的任何特定命题中，也不存在于一种理论的作者的意向中，而存在于它的结构中，存在于它所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就是说，存在于它的理论框架中。

---

① Althusser, *Politics and History*, NLB, 1972, p. 166.

②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143.

阿尔都塞认为，作为阅读对象的文本，初看起来是单一的，但用症候阅读法阅读时，则呈现出两个不同层面的文本：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第一文本指概念之间、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章节之间的表面上的联系和结构，第二文本则是表达中的缺失、空白和疏忽。第二文本是一种不可见的话语，这些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结构便是隐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框架。阿尔都塞说："任何问题或对象只有位于某个范围或视界内，即位于一个给定理论学科的理论问题框架的确定的结构领域中才是可见的。"①由于一个学说的问题框架，不仅很少以明显的形式存在于它所支配的理论中，而是一种埋藏在这种学说中的无意识的结构，因此，在阅读包括马克思的理论著作时，就不能仅仅通过对其写在白纸上的黑字的明白论述，去作文字上的简单、直接的阅读，而必须把它同构成作为原文的必要补充的"缺失"、"空白"、"疏忽"，即埋藏在原文中的无意识的问题框架的许多症候联系起来阅读，才能把一种学说的问题框架从深处拖出来。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本人就是运用症候阅读法的鼻祖。马克思在阅读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时进行了双重阅读，这双重阅读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阅读原则。在读亚当·斯密的著作时，马克思首先通过自己的话语来阅读斯密的话语。"这种阅读的结果不是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记录，而是对斯密的发现和空白、功绩和缺陷、他的出现和不出现的总结。事实上，这是一种回顾式的理论的阅读。在这一阅读中，斯密没有看到或理解的东西仅仅表现为完全的空缺。"②马克思从这种阅读中看到了斯密看不到的东西，即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区分。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看到的东西不是它没有看到的东西，而是它看到的东西；不是没有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而恰恰是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不是它疏忽的东西，而恰恰是它没有疏忽的东西。"③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第一重阅读，第一重阅读仍然停留在对存在与空缺、洞察与失察的二元观察上，还没有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的第二重阅读是要揭示出可见的东西本身蕴涵着不可见的东西，洞察本身蕴涵着失察。马克思的第二重阅读方法就是症候阅读法。

> 所谓症候阅读法，就是他在他所阅读的文本中揭示了没有揭示的东西，并且在同一运动中把它与另一不同的文本联系起来，而后一

---

①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25.

②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18.

③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21.



> 文本是第一个文本中必然空缺的东西。马克思的第二重阅读预设了两个文本的存在，而且以第二个文本作为第一个文本的尺度。但这种新阅读之所以与旧阅读区别开来，是因为在新的阅读中，第二个文本表现为第一个文本的空缺。①

马克思正是在第二重阅读的基础上，填补了斯密的文本留下的空白，提出了新问题，从而转向了新的问题框架。阿尔都塞说："马克思能够看到斯密注视所回避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拥有一个新的视界，这一新的视界是从新的回答中产生出来的，是无意识地从旧的问题框架那里产生出来的。"②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运用症候阅读法来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而他自己则将这种阅读方法应用于阅读《资本论》。

首先，阿尔都塞肯定了阅读《资本论》所使用的症候阅读法。

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的目的是确定马克思本人没有明确地提出的问题。他说：

> 这里我向他直接提出一个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象本身的基本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尽可能准确地确定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所达到的明确的哲学意识的程度。确定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在马克思通过他的科学论证本身所开辟的新的哲学领域中把他已经阐明的东西同尚未阐明的东西加以比较。在确定马克思已经完成的东西时，我想尽可能说明他本人也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就是确定这一领域，规定这一领域的范围，并使之同哲学的发现联系起来。总之，就是要尽可能准确地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前的开放的理论领域。③

阿尔都塞强调，要准确地明确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阅读，哪怕是仔细地阅读。只有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症候"进行真正的批判性阅读，才能揭示其秘密。他说：

> 我们在阅读《资本论》的时候也使用了一系列的双重阅读即"症候阅读"：我们阅读《资本论》，看到了《资本论》中可能仍然以看不到的东西的形式存在的东西；而这种"阅读"的后退通过同时完成的第二重阅读占领了我们所能赋予它的全部领域。这里所说的第二重阅读是对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特别是对《1844 年手稿》从而对作为

①②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28.

③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73.



马克思著作底蕴的总问题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总问题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总问题的阅读。①

其次，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所以，我们不仅要科学地阅读《资本论》，而且要哲学地阅读《资本论》。他说：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中，到处都提出同样的要求：只有更严格、更充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刻理解《资本论》的理论结果。换句话说，或者用经典的术语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景在今天还有待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化，而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化本身又取决于对《资本论》的严格的批判性研究。历史向我们提出这个巨大的任务。我们愿意以我们微薄的力量参加这项工作。②

阿尔都塞认为，我们需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资本论》，同时我们又在阅读《资本论》时能够读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双重的阅读。

因此，这就是我们这一研究的双重对象，而这种研究只能通过不断的、双重的互为前提才有可能：在《资本论》中鉴别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象要以鉴别和认识《资本论》本身的对象的特性为前提，而后一种鉴别和认识又要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要求它不断发展。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而我们同时也应该在《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这种双重的阅读，也就是不断从科学的阅读回复到哲学的阅读，再从哲学的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是必要的和有成效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这种阅读中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所包含的这一哲学革命的本质：一次开创了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③

再次，阿尔都塞认为，逻辑的顺序与现实的顺序是有区别的，两者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他说：

概念在分析中出现的顺序就是马克思科学论证的顺序：这个顺序与某一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顺序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对应的关系。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可能会出现巧合，某些前后联系似乎遵循着同一顺序。但是这种情况远远不能证明这种一致的存在，远远不

①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33.

②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77.

③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p. 75—76.



是对关于一致问题的回答，它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①

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证所遵循的就是逻辑的顺序或思维结构的顺序："思维结构的顺序是一种特殊的顺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理论分析的顺序本身，是作为《资本论》理论的被思维的整体和被思维的具体的生产必不可少的各个概念联系、'综合'的顺序。"② 只有在认识中生产出这种思维结构或整体，我们才能认识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结构，现实的具有各个相互连接部分的总体。

2. 认识论的断裂

阿尔都塞运用症候阅读法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出来的一个结论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即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发展。

要理解阿尔都塞所说的这个认识论的断裂，首先必须了解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和"科学"是什么意思。

关于意识形态的含义，阿尔都塞说："一个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给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③

阿尔都塞从多个方面阐释了意识形态的特点：

第一，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

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不存在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说："在任何社会中，尽管表现形式可以变化万端，但始终有一种基本的经济活动、一种政治组织和一些意识形态形式（宗教、伦理、哲学等等）。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④

阶级社会中存在着意识形态，无阶级社会中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照样存在着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⑤ 既然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意识形态，所以每一个人出生之后，都不可避免地要落入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

第二，意识形态是一种强加于人的无意识结构。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无意识基本结构，它强加于人们的身上，人们无法自由地选择它。阿尔都塞说：

---

①②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48.

③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231.

④⑤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232.

即使意识形态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形式出现(如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它也是十分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但这些表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意识”毫无关系;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意象,有时是概念。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而作用于人。①

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是人类世界本身。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的这种无意识中,才能变更他们同世界的体验关系,并取得被人们称之为“意识”的这种特殊的无意识的新形式。

第三,意识形态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意识形态之所以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因为意识形态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需要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种种事实表明,假如没有意识形态这些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实践方面。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一社会的功能比理论的功能(即认识的功能)要重要得多。”②阿尔都塞具体说明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一社会功能:

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符合他们的生存条件的要求,任何社会都必须具有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是对人类的生存条件的不断改造,即使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人类因而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以适应这些条件。这种“适应”不能放任自流,而应该始终有人来负责、指导和监督,这个要求的表现形式就是意识形态。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中衡量距离、体验矛盾并“能动地”解决矛盾。……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关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在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所有人根据自己的利益体验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赖关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③

关于科学的含义,阿尔都塞说:

马克思的立场和他对意识形态的全部批判都意味着,科学(科学是对现实的认识)就其含义而言是同意识形态的决裂,科学建立在另

①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232.

②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231.

③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p. 235—236.



> 一个基地之上,科学是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形成起来的,科学就现实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对象。①

从阿尔都塞对科学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的最基本特征是它与意识形态是相对立的:

第一,科学建立在不同于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科学是在抛弃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前提下形成起来的。阿尔都塞说:

> 谁如果要达到科学,就要有一个条件,即要抛弃意识形态以为能接触到实在的那个领域,即要抛弃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框架(它的基本概念的有机前提及它的大部分基本概念),从而"改弦易辙",在一个全新的科学的问题的框架中确立新的理论活动。②

第二,科学是对现实的认识。阿尔都塞强调,科学执行的是理论、认识的功能,而意识形态执行的是实践、社会的功能,所以前者是对现实的认识,而后者则不注重认识现实。

第三,科学始终处于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阿尔都塞认为,科学形成后仍然处在意识形态的包裹、缠绕之中,只有坚持与意识形态的斗争,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他说:"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的自由的科学。"③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与科学相互对立,从意识形态到科学是一种质的中断。他把这个质的中断叫做"认识论断裂"。

"认识论断裂"一词是阿尔都塞从他的老师巴什拉那里借用来的。阿尔都塞说:"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用巴什拉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断裂'。"④

认识论断裂标志着由前科学的问题框架转变为科学的问题框架。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认识论断裂,即从意识形态转变为科学。他说:

>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一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

---

①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78.

②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p. 192－193.

③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170.

④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p. 167－168.

> 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在这里,新的理论信仰以必定是不平衡的和暧昧的概念与公式的形式,开始从旧信仰和旧术语中显露出来。①

这一断裂产生了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阿尔都塞认为,这一认识论断裂将马克思的思想分裂为两个大的阶段:1845 年前的阶段和 1845 年后的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是科学的阶段。在前一阶段,马克思的思想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是不成熟的、前科学的;在后一阶段,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新的基础上成就了科学。

当然,马克思的思想从意识形态到科学、从不成熟到完全成熟本身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四个时期:

(1)早期著作时期。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即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之间所写的一切著作。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开始是康德、费希特派,后来是费尔巴哈派。作为康德、费希特派,马克思谈论最多的是理性和自由;作为费尔巴哈派,马克思谈论最多的是异化和人道。

(2)断裂时期。这一时期的著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与此前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相决裂,确立了新的问题框架,提出了新的理论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但这一时期的著作不仅因为处于新理论的创建初期,而且因为主要是以论战的方式写作的,所以有很多理论并没有展开,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

(3)成长时期。这一时期的著作是指 1845 年至 1857 年间的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进行了多年的实证研究和精心推敲,以便能够创造、形成和建立一种适合于他的革命理论设计的概念术语和问题框架。

(4)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著作是指 1857 年之后的著作,以《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为代表(但在《列宁与哲学》一书中,阿尔都塞把《哥达纲领批判》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这一时期最

①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33.



成熟的著作)。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了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

"认识论断裂"是阿尔都塞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这一观点。比如,当有人批评他的断裂说是"凭空捏造"时,他回答说:"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寸步不让的。……我们应该明确指出,在马克思理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一个'断裂',这个断裂不但不等于零,而且对整个工人运动史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3. 结构辩证法

阿尔都塞认为,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结构辩证法。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结构辩证法决不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简单"倒置"。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谈到,"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这是因为决不能设想辩证法可能藏在黑格尔的体系里面,如同一个内核藏在它的外壳里面的那样;决不可能设想,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曾被黑格尔的思想体系"玷污";决不可能设想只凭一种"脱壳"的奇迹就可以使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

其实,"倒过来"一词只有象征的意义,甚至只是一种比喻。我们只要仔细研究《资本论》德文版就可以发现:

> 所谓神秘的外壳,完全不是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如恩格斯之后的若干注释者所相信的那样)指的是思辨哲学,或"世界观",或"体系",换句话说,当时完全不是指一种被看作方法之外的因素,它所指的乃是辩证法本身。马克思说到"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手中神秘化了"的时候,他说的是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和它的"神秘形式",而他正是用他自己的辩证法的合理的形式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这种"神秘形式"相对立的。②

马克思所做的不仅是剥去其神秘外壳,而且还对唯心辩证法进行了结构的改造。

> 这种神秘形式不是相对地存在于辩证法之外的一种因素(例如"体系"),而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一种内在的、同质的因素。所以,要解放辩证法,只剥除它的第一层外壳(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也剥除

---

①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19 页。

②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p. 92—93.

附在它身上的第二层外壳。毫无疑问，这第二层外壳就是辩证法本身的、不可分离的皮，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直到它的基础——本身。①

因此我认为，这种把辩证法"颠倒过来"的比喻的说法在其近似的意义上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同一种方法应用于其上的对象的本性(在黑格尔是观念世界——在马克思是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完全是从辩证法本身来看的辩证法的性质的问题，也就是辩证法的特殊结构的问题；并不是把辩证祛的"方向"颠倒过来的问题，而是辩证法的结构的改造的问题。②

经过结构改造之后，就产生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结构辩证法。阿尔都塞说：

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合乎理性的而不是神秘的，这种根本的不同应当在辩证法的实质中，即在它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得到反映。明白地说，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假定马克思接受了这些结构，事实上他并没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这也意味着，结构的这些不同是能够被揭示、描述、规定和思考的。既然是能够的，那也就是必需的；我甚至认为，这对马克思主义是生死攸关的。我们不能满足于无休止地重复体系和方法的不同、哲学的颠倒或辩证法的颠倒、"合理内核"的发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含糊术语，否则岂不是要让它们代替我们去思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动脑筋，却一味相信那些早已用滥了的词句能够魔术般地完成马克思的事业。③

应用这种结构辩证法看待社会时，社会就表现为一个具有结构的"总体"。

在哲学上，"总体"是一个十分流行的术语："'总体'这一概念今天应用得十分宽泛，人们用这个词几乎可以毫无障碍地从黑格尔谈到马克思，从格式塔心理学谈到萨特。词还是同一个，但概念却因不同的作者而起了变化，有时甚至彻底地变了。"④虽然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使用总体概念，

①②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93.

③ Althusser, *For Marx*, pp. The Penguin Press, 1969, 93—94.

④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203.



但马克思的总体和黑格尔的总体有着根本的区别。黑格尔的总体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内虽然也有多样性的因素，如市民社会、国家、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但它们都可以还原为总体中的简单本原，即精神，所有这些因素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对象化。而马克思的总体则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讲的统一性是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复杂整体的组织方式和构成方式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统一体。这是断言，复杂整体只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①马克思虽然强调具有归根结底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济，但他并不是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经济因素，把经济看作一切现象的本原。

> 假如人们匆忙地把复杂整体的有结构的统一性和总体的简单统一性等同起来，假如人们把复杂整体仅仅当作唯一的、原始的和简单的本质或实体的简单发展，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会从马克思倒退到黑格尔，在最糟的情况下，则从马克思倒退到海克尔。②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所主张的总体是一种“表现的总体”，“在这种总体中，每一部分都通过总体而存在，都是对它属于其中的整体的直接的表现”③，它把一切部分和现象都还原为单一的精神本原。而马克思所主张的总体则是一种“结构的总体”，在这种总体中各部分相互发生作用，但不能还原为一种本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是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结构型的总体。

这两种不同的总体与两种不同的因果观相对应。黑格尔主张表现的因果观，这种因果观在考察整体对于它的各个局部的影响时，预先假定整体可以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质，而整体的各个局部则无非是它的现象上的表现。卢卡奇、柯尔施等人是这种因果观的信徒。马克思主张结构的因果观，这种因果观把总体理解为一个结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因果是总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要素互为因果，所以不存在单一“因”，各个要素都可能成为“因”。从这种因果观出发，必然得出“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多元决定是指许多原因同时起作用而引起的一种精神疾病。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对复杂的社会进行分析时，把社会要素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具有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则具

---

①②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202.

③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2009, p. 17.

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的作用力。这就是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决定和被决定的，每一方都有助于决定它是其组成部分的那个全局的构造的本质，又转而被这个构造所决定。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并没有排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因素都可以起决定作用。总之，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它的每一种因素都可能在某一个时刻起决定作用。所以，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所主张的不是一元决定论，而是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就论述了矛盾的多元决定。《矛盾论》考察了矛盾的复杂性，分析了多种矛盾的并存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指出，在并存的多种矛盾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而主要矛盾的性质又取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即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为次要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毛泽东所说的多种矛盾的并存及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就说明了矛盾的多元决定。阿尔都塞说：

> 矛盾在不再具有单一含义之后，它的定义、作用和本质就得到了严格的规定；根据有结构的复杂整体赋予矛盾的职能，矛盾从此就有了复杂的、有结构的和不平衡的规定性。请读者原谅我使用了这一长串修饰词，不过我承认，我更喜欢用一个较短的词：多元决定。①

阿尔都塞从这种观点出发，批评马克思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黑格尔改造马克思，把多元决定偷换成一元决定，否定了结构辩证法。

二、普兰查斯

(一)普兰查斯的生平和著述

尼库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1936－1979)是希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和欧洲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

普兰查斯生于希腊的雅典。普兰查斯成长的年代正是社会急剧变动

① Althusser, *For Marx*,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 209.



的时期。他很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当时并非通过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而是通过法国哲学，特别是萨特的著作。在学生时期，普兰查斯就积极参加了希腊的学生运动，加入了希腊民主联盟。因为当时共产党被当局禁止，这个联盟实际上是披着合法外衣的希腊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他成为希腊共产党的一员。1968 年希腊共产党分裂后，他成为希腊共产党国内派的成员。


尼库斯・普兰查斯(1936—1979)

普兰查斯在大学期间主攻法学。1957 年，普兰查斯从雅典大学毕业，随后服了几年兵役。他本来打算去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德国法哲学的博士学位，但后来改变计划，到了法国巴黎。在法国巴黎，普兰查斯任索邦大学的助教，并且继续从事法学研究。1964 年，普兰查斯完成了关于法哲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依据戈德曼和卢卡奇的学说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理论。

在法国期间，普兰查斯先是受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仔细阅读了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著作，后来逐步接受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核心成员。自 1968 年起，普兰查斯在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社会学。1979 年，普兰查斯因对社会主义事业悲观失望而自杀身亡，年仅 43 岁。

普兰查斯的主要著作有：《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1968)、《法西斯主义与专政》(*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the Problem of Fascism*, 1970)、《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1973)、《专政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Dictatorships: Portugal, Greece, Spain*, 1976)、《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State, Power, Socialism*, 1978)等。

(二)普兰查斯的国家和阶级学说

普兰查斯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撰写出了许多重要的论著，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论题，特别是往往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忽略的国家和阶级问题。普兰查斯旗帜鲜明地声称："无论是否公开，所有 20 世纪的政治理论都在根本上提出了同一问题：国家、权力和

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①

1. 国家学说

普兰查斯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国家问题。在他看来,经济和政治是相对分离的,所以我们可以单独研究政治问题,提出国家理论。

在国家问题上,普兰查斯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在他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一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观。根据工具主义的国家观,国家只不过是特定阶级手中的工具。普兰查斯不同意这一点,因为他认为工具主义的国家观对国家作了简单化的理解,不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

普兰查斯同意列宁关于国家重要性的说法:每一个革命的基本问题都在于国家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等都要求对国家进行彻底改变,即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普兰查斯认为,国家既是调和一个社会形态的统一因素,又是这个形态各个方面矛盾集中在一起的结构。他说:

> 国家的特殊职能就是要成为一种社会形态各个方面调和的因素。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概念的原意,即国家是一种社会形态的"秩序"或"组织原则":但这并不是指现代意义的政治秩序,而是就它能够起着一个复杂的统一体所有各个方面调和的意义而言,并且是作为调节这个体系综合平衡的因素而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出,为什么以国家为目的的政治实践能带来统一体的转变,因此也就是"历史的动力":正是要这样来分析国家的这种作用,我们才能证实这个主题的反历史循环论的意义。这里无非有两个可能。第一,政治实践的结果是维持一种社会形态在一个时期或阶段的统一(即使其维持不变)。这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适应和不适应的方面,由于所处时代先后不同的失调而呈现不稳定的平衡,这种平衡从来不是由经济因素带来的,而是由国家来维持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实践的目的就是把国家作为维持这种统一的调和因素。第二,政治实践产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其目的就是把国家作为这种统一受到破坏的关键性结构,既然国家是这种统一的调和因素。这一段论述可能旨在说明,国家是产生一种新的统一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一

①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Verso, 2000, p. 11.



个因素。[①]

国家的这种秩序或组织职能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经济方面表现为技术经济职能，在政治的阶级斗争方面表现为政治职能，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职能。

> 虽然如此，但国家的技术经济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受到国家的严格政治职能（即涉及政治的阶级斗争方面）的多元决定的影响，因为前两种职能使得国家的综合作用具有不同形式，而国家在一个社会形态的统一中是起调和作用的因素。国家的这种综合作用是一种政治作用。[②]

普兰查斯对国家问题的分析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典型的。普兰查斯认为，从表面上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最基本的明显特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包括生产承担者这样的主体（国家中所固有的“个人”、“公民”和“政治的人”）的决定作用。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性质：在国家体制里没有建立起政治上的阶级统治。

> 它本身就代表一种大众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体制是以“个人”或“政治的人”的自由、平等原则为中心的。其合法性并不表现于以王权原则为代表的神的意旨，而整个说来表现于个体公民形式上的自由平等，表现于大众的主权和国家对人民的世俗责任。“人民”本身被认为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本原，它并不是由社会阶级中充任生产承担者所组成，而是个体公民的集合，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团体的表现在于普选，通过普选表现“普遍意愿”。现代法律体系与以“特权”为基础的封建法规体系有所不同，它具有一种“标准”性质，它表现于一整套基于自由平等原则的系统化的法律：这就是所谓“法”治。个体公民的自由平等在于他们对抽象的和形式的法律关系，法律被认为是“法治国家”内部的普遍意愿的体现。可见，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整个社会普遍利益的体现，即表达整个“国家”的意愿。[③]

然而，在普兰查斯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要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他着重从资本主

---

①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 页。

②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 页。

③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9—130 页。

义国家的职能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实质。

普兰查斯认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结构是由国家的制度化权力组成的。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凝聚一种社会形态和调节整个社会的平衡。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以阶级统治为特点，所以国家维持社会的凝聚力符合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稳运行，维护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

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之一是通过掩盖阶级的存在将个人孤立起来。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是抽象的个人，资本主义国家将个人设定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为此，资本主义国家便掩盖个人的阶级区分，将个人孤立起来。孤立的结果造成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和资本主义财产私人拥有者之间的竞争。竞争遍及所有社会关系之中，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怕现实”。因而，竞争不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而是指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国家将人设定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也证明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因为这种设定允许雇佣合同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

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之二是代表全部被孤立的个人，将个人结合为一个统一整体。国家将自己界定为“由政治性的人/私人个体组成的人民/民族的统一体”①。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任何行为都似乎与阶级斗争无关。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存在着阶级，但国家以特定的方式否认了阶级斗争的现实。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现普选权、允许自由组织党派等方法，掩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把所有非统治阶级都变成统治阶级的附属物，将非统治阶级统一到统治阶级的体系中去，使国家的利益成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本质上，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的不是全体人民，而是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其说国家‘称’它自己为所有人民的国家（尽管它事实上是一个阶级国家），倒不如说国家通过国家机器所体现的是一个‘阶级国家’（即统治阶级的国家）。”②如果将事实上的阶级社会看成是大众社会，就犯了意识形态的错误。

普兰查斯认为，国家机器不同于经济机器。关于国家机器，他说：

> 这些机器一方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和它的部

---

①②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New Left Books and Sheed and Word, Ltd., 1973, p. 189.

> 门——军队、警察、监狱、法院系统、内务部；另一方面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教育机器、宗教机器（各种教会）、信息机器（无线电、电视和新闻系统）、文化机器（电影院、剧院和出版系统）、阶级合作的工会机器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等，在某种意义上，至少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也包括着家庭。①

关于经济机器，他说：

> 正如存在着国家机器一样，就下面这一术语的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也存在着经济机器，“商业”或“工厂”作为人们占有自然的一种中心的事业，物质化和具体化了它们在与政治一意识形态的关系相结合中的经济关系。②

普兰查斯关于国家机器进一步区分为压迫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来自于阿尔都塞。阿尔都塞曾经明确地区分了这两种国家机器：一种是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另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③ 普兰查斯不仅将阿尔都塞所说的两种国家机器进行了细分，而且进一步强调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普兰查斯认为，国家不仅仅要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还要获取被统治阶级的认同。其方法是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渗透以期得到被统治阶级的认同。

普兰查斯借用了葛兰西的“领导权”（霸权）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国家。他说：

> 这个概念的范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阶级斗争，特别是包括这些形态里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因此在**阐明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方面的统治阶级的关系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一个霸主阶级领域的国家**。④

普兰查斯将领导权概念应用于资本主义形态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方面，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它表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正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而出现的，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人民国家”；第二，它意味着在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里，几个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组成“权力集团”，其中一个统治阶级或派别对其他统治阶级或派别起着特殊的统治作用，即领导（霸主）作用。

---

①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25.

②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25.

③ [法]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8 页。

④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5 页。

> 领导权概念使我们能辨明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里这两种类型的政治阶级统治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导阶级把政治方面的双重职能集于一身,那就是一方面代表人民国家的共同利益,同时又要维护在统治阶级或派别中的特殊统治地位。它通过自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关系来做到这一点。①

普兰查斯基于列宁的观点,按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资本主义划分为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四个不同的阶段。"一种资本主义形态各个阶段的国家形式(在这种形态中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形式中的某一种占统治地位),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形式相应的各种国家形式相关的。"②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对革命战略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民族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的重要性是决定性的,因为十分清楚,当代国家作为任何革命战略的绕不过去的主题,只能在它与现代阶段的帝国主义和在大都市区域中的作用的关系中被研究"③。

普兰查斯指出,从帝国主义阶段开始的时候,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就开始集中并逐步形成了经济帝国。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生活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就是资本向国外的输出。这些特点通过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及劳动分工和剥削的国际化而表现出来。

在帝国主义阶段,美国成为经济的超级大国。普兰查斯说:"资本的国际化是在美国资本占有决定性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④有数据显示,在1968年的生产性工业资本中,55%的资金为美国的跨国公司所拥有;在世界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美国拥有40家;在1962年至1968年的经济合作中,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外来资金的主体是美国公司。

普兰查斯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国际化,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霸权的形成,对欧洲民族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继续存在,延续着原有的任务。"国家的任务是维持被划分为阶级的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它以认可并合法

①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②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③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38.

④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60.

化统治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反对这一社会形态中的其他阶级利益的方式，集中地体现了在世界阶级矛盾背景中的整个社会形态中的阶级矛盾。"①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为了在资本国际化形势下继续生存下去，自身做出了许多改变，特别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跨民族化"。"就教育机器、再训练这个方面来看，欧洲民族国家的作用就是再生产建筑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之上的劳动分工的新形式。"②普兰查斯指出，民族国家的跨民族化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功能会在更大范围内体现。他说：

> 无疑地，从一方面看，"强国家"(权威的警察国家)的特殊形式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被建立起来；从另一方面看，一个法西斯化的可能进程的条件的积累，既体现出这些社会形式中的阶级斗争，也体现出它们在新的依赖结构中的地位。③

在普兰查斯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是以垄断为基本特征的，但并不能把当代国家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与垄断资本的关系中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种相对的自主性无论是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一主要矛盾中，还是在垄断资本自身内部的斗争和矛盾中(在这里这一矛盾对我们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都得到了显示。"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强烈干预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相对的自主性。

2. 阶级学说

普兰查斯的阶级学说和国家学说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所说的国家是阶级国家，他所说的阶级是国家中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在国家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有的是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有的是被统治阶级，只能受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普兰查斯自称，他研究阶级的目的不是系统地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而是为从事具体分析做准备；他的研究方法是把理论分析与具体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后者的需要来论述前者。

什么是阶级？普兰查斯给出了这样一个阶级的定义：

>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社会阶级是根据它在社会实践总体中的地位，即根据它在社会总体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来加以定义的。这一总体包含着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阶级是

---

①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78.

②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83.

③④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84.

这样一个概念，它指示出社会劳动分工（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内部的结果。因此，这一地位是与我称之为阶级的结构决定一致的，也就是说，是与结构所决定的阶级实践内部的存在一致的。这里说的结构指的是生产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或从属关系。阶级仅仅存在于阶级斗争中。①

普兰查斯的这个关于阶级的定义包含着这样几点内容：

第一，强调经济地位在决定阶级中的作用。普兰查斯认为，阶级是社会行动者构成的群体，它们主要是按照它们在社会总体劳动中的分工，即经济领域中的实际地位来确定的。他说：

只有当一个阶级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即当它的经济存在通过一种特殊表现在其他方面反映出来的时候，这个阶级才能被认为是社会形态内部的一个不同的和独立的阶级，才能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力量。②

第二，承认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决定阶级中的作用。普兰查斯指出，社会行为者的经济地位在决定社会阶级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决不能由此下结论说，这是决定社会阶级的唯一因素。他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经济的地位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不论什么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在分析社会阶级时，都摆脱了单纯的经济标准的界限，他们都十分明确地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准。③

其实可以说，马克思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从来都不单单指经济结构（生产关系），而总是指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结构的整体，指由不同方面所维持的各种关系。我们不妨说，一切问题的发生首先在于经济方面，其次在政治方面，再次在意识形态方面，似乎社会阶级就是各种结构的整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产物。分辨一个社会阶级既可以从经济方面，从政治方面，也可以从意识形态方面，因此，那就可以根据一种特殊环节确定阶级的地位。④

第三，明确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普兰查斯认为，阶级与阶级斗争

---

①③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14.

②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5 页。

④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0 页。



密不可分，离开阶级斗争的阶级不能单独存在。仅仅由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不能构成阶级概念，阶级的概念包括阶级实践（阶级斗争）的整体，包括社会关系结构各方面的整体所产生的影响的整体。他说："社会阶级同阶级实践，即阶级斗争是一致的，它们唯有通过相互之间的对立才能被定义。"①阶级之间的对立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经济地位之中，而且也表现在它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种方面的组合，以社会关系的形式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践中，在各种阶级实践之间的'斗争'中反映出来。"②

第四，表现了结构主义的立场。普兰查斯认为，社会阶级是被结构地决定的，而阶级的决定结构是一个给定社会存在的生产方式的组合。根据普兰查斯的定义，生产方式是由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构成的。一般来说，阶级就是在结构上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所决定的，而经济关系中的生产关系则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社会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概念，它表示社会关系、社会整体。

> 更具体地说，社会阶级是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示结构的整体，表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一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对承担者——他们构成社会阶级的支持者——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概念指示出社会关系领域内全部结构所产生的影响。③

由此观之，阶级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阶级成员的意志和"意识"。所以，在许多场合下，一个社会阶级有可能采取与自己的利益不一致的阶级立场。比如，工人贵族在某些事件中往往采取资产阶级的立场。

在普兰查斯看来，社会阶级不是静止不动的，它自身还进行扩大再生产。他说：

> 社会阶级（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涉及两个相互之间不能孤立地存在的方面：一方面，存在着一个被行动者们占有的地位的扩大再生产的问题。这些地位标志着阶级的结构决定，即标志着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结构（生产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决定在阶级实践中发生了作用。另一方面，存在着行动者们自身

---

①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14.

②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5 页。

③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4 页。

对这些地位的再生产和分配的问题。[①]

普兰查斯阶级学说的研究重点在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直接探讨工人阶级。在他看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研究相对地遭到了忽视。“而我认为，与以往比较起来，今天的革命战略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在于很好地了解敌人，以便能够建立正确的联盟。”[②]

普兰查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说：

> 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不仅居于关于当前帝国主义大都市中的阶级结构的讨论的中心，而且也居于关于受统治的、依附性“边缘”形态讨论的中心，这一形态通过各种对边缘问题的分析而显现出来。这个问题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的一个关键性的方面。[③]

小资产阶级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了解小资产阶级的情况对于确立合理的革命战略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普兰查斯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称做“新的小资产阶级”。新的小资产阶级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不同。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由具有小规模的生产和所有权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而是属于简单的商品形式，从历史上看，那是从封建的模式向资本主义的模式转化中出现的一种形式。”[④]新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那些不像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白领构成，这些人包括管理者、技术人员、办公室和服务性机构的雇员、商业和银行的雇员。新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大部分属于脑力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属于资本家阵营。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新的小资产阶级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反对资本主义，但又不主张革命，而是对改良抱有强烈的幻想；其二，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但倾向于通过参与政权来改变这种关系，而不是通过革命改变这种关系；其三，试图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但不愿诉诸革命行动；其四，信奉“权力拜物教”，崇拜国家权力；其五，观念比较激

---

①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28.

②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9.

③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 193.

④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LB, 1975, pp. 285—286.



进，行动易趋极端，但仍然超不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普兰查斯指出，新的小资产阶级虽然受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影响，却存在着向无产阶级分化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在新的小资产阶级阵营中，有三部分人最容易向无产阶级分化。第一部分人包括商业部门中地位低下的劳动者、国家机器中的下层雇员和服务部门中的普通服务人员等。第二部分人包括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地位较低的助手、办事员和办公室人员等。第三部分人包括直接参与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技术人员和低级工程师等。普兰查斯认为，新的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分化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力量上的对比。只有深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阶级关系，为新的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分化提供条件，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本章小结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为代表，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从总体上来说，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解释。阿尔都塞把弗洛伊德治疗精神病人的方法移植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上，提出了症候阅读法，目的是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通过其表面的文字，发掘出潜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框架。阿尔都塞运用症候阅读法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出来一系列结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即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结构辩证法，社会表现为一个具有结构的“总体”，总体的每一个因素都可以起决定作用。阿尔都塞的后继者普兰查斯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国家和阶级问题。普兰查斯认为，国家既是调和一种社会形态的统一因素，又是这种形态各个方面矛盾集中在一起的结构。普兰查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典型，力图从国家的职能方面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普兰查斯认为，不同的阶级在国家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有的是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有的是被统治阶级，只能受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小资产阶级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了解小资产阶级的情况对于确立合理的革命战略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思考题

1.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2.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3. 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的含义是什么?
4. 评述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
5. 如何理解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
6. 如何理解普兰查斯的国家学说?
7. 普兰查斯的阶级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阅读书目

1.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2. [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法] 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等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0 年版。

4. [法] 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林泣明等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版。

5.《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6.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二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潮



第七章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要点提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
◎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罗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出路
◎罗默的剥削学说
◎埃尔斯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第一节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概述◎——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语国家兴起的一种思潮，它试图以分析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重构马克思主义。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语国家中的一些学者之所以提出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

其一，分析哲学的素养。

20世纪分析哲学所倡导的精确严密的分析方法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析哲学诞生以来，分析哲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了20世纪英美的主流哲学。美国哲学家怀特将当今的哲学时代称之为“分析的时代”①，得到了英美国家许多哲学

① 参见[美]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家的赞同。而美国哲学家穆尼茨则进一步指出,“有时候人们把我们的哲学时代描述为‘一个分析的时代’。尽管这种描述过于简单,但它促使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的出现。”①

正是在分析哲学的氛围中,一些人既得到了分析哲学的训练,具有深厚的分析哲学素养,又对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强烈的兴趣。于是,这些人将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创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柯亨在他的代表性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说,“我在这部著作中的论述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一方面是马克思所写下的东西;另一方面是20世纪的分析哲学据以为特征的清晰性和严格性的标准。”②

其二,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愿望。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在英语国家并不流行。尽管英语国家里不乏激烈的工人运动,而且工人运动在这些国家里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却没有相应地在学术界得到重视。英语国家的学术传统似乎使英美知识分子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著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廉姆·H.肖(William H. Shaw)说:

> 在我们的这些工作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大陆一些理论家的工作,而在英语世界里,即使是在别的学科,比如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有人对马克思的思想有研究、有成就,但是在哲学领域中,认真对待马克思思想的人为数不多。所以,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使英语世界中真正呈现出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把哲学问题凸现在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并引进分析哲学的方法,是这个学派所作出的两项主要贡献。③

有人就说:“在我们美国的学术界里寻找一位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④所以,当时,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世界甚至某些西方国家里蓬勃发展,在英语国家里却遭遇到了前所未

---

① [美]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吴牟人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iv.

③ [美]威廉姆·H.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6页。

④ U. Sinclair, *The goose-step: A study of American Education*, Pasadena, 1924.



有的危机。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情况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英语国家里产生了。一些哲学家将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试图在英语国家里复兴马克思主义。

其三，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欧洲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大多采用思辨方法、运用抽象晦涩的语言来解读马克思的著作，空洞地虚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针对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一些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力图运用精确的语言和严谨的论证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威廉姆·H.肖说：

> 针对当时欧洲大陆国家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许多人的研究不是认真严谨地对待文本，不重视一些最重要理论原则的研究，对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的解说陷于混乱和繁琐。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所做的工作正是为了达成此目标。而且我们所说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只是运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与思辨的哲学方法相反，后者往往是独断虚构地得出一系列结论，而我们则主要运用批判和辩驳的原则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我们中许多人所得出的结论对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有“澄清”的价值，而且有“重建”的意义。①

根据著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罗默的说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在1978年诞生的，其标志是G.A.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和乔恩·埃尔斯特的《逻辑与社会》这两本书的出版。② 正如埃尔斯特所说，几乎一夜之间，柯亨的著作将严格性和清晰性的标准赋予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柯亨和埃尔斯特的书出版之后，柯亨、埃尔斯特和罗默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年会。这个年会自1979年开始，每年在9月份举行一次，直到2000年。2001年的年会因美国“9·11”事件没有举行。自2002年起，举办人决定隔年举行一次。

---

① ［美］威廉姆·H.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5—6页。

② C. John&E. Roemer (ed.), *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4, p. ix.

因为年会在9月份举行，参加年会的人基本上是同一些人，所以这些参加年会的人就形成了一个小组，被称为“九月小组”。同时，小组成员极为厌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也自称为“非胡说的”(non—bullshit)马克思主义小组。柯亨曾说：

> 像我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半马克思主义者都厌恶那种侵扰马克思主义的模糊性，当我们这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一个群体——一个马克思主义讨论群体，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我很荣幸属于其中的一员——时，我很赞同我的同道们称它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①

后来柯亨又专门详细地解释了这种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他说：

> 在别人告诉我我们正在搞的东西被称作“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前，我在自己的实践中把我们正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称做“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引起颇多争议和确实多少有些狂妄的说法。因为人们可以想象，称一些人所搞的东西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就认为其他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正统性，而当你把你所搞的东西称作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时，你是在暗示其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只有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既不是分析的，也不是胡说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我们可以称它是)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旦遇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它必然要么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要么成为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化学发展为物理化学之前，你可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整体主义的化学家，然而，一旦这一进步已经完成，再坚持整体主义的态度就是一个蒙昧主义者。
>
> 无论如何，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同与之不同的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加以对照，是有助于说明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胡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不诚实的形式，更确切地讲，其不诚实就在于它对别人的批判不以诚实的方式予以回答。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可以确信，教条主义者面对所有的批判仍然坚持他的主张，但诚实的教条主义者是可能的，他会对批判做出他力所能及的回答，他甚至会承认他对某一批判尚不能做出很好的回答，尽管他仍然固守他的教条主义的观点。相比之下，胡说的

① G. A. Cohen, "Deeper into bullshit." In *Contours of agency: Essays on themes from Harry Frankfurt*, ed. S. Buss and L. Overton, MIT Press, 2002, p. 323.



马克思主义者却会随时改变他的主张，在批判性的攻击下他常常是这样做的。但他不对那种攻击的实质性的问题予以适当的考虑以便以一种可以把握的并且已被科学地指明的方式去改变他的立场。他只是简单地转换到另一种未加思考的或模糊不清的立场，为的是在不同的立场上仍旧装出未被击败的样子。真正的教条主义者坚持他的立场。胡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会随着他所断言的东西而不断地转换其立场。不过，反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胡说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一点上态度是一贯的。他认为，无论从广义上讲还是从狭义上讲，分析的方法都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避开，因为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它是非辩证的，从其特殊的形式来看它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①

围绕着九月小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逐步成长起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阵营相当强大。除了柯亨、埃尔斯特和罗默之外，参加九月小组的人还有：普拉纳·巴德汉(Pranab Bardhan)、山姆·鲍尔斯(Sam Bowles)、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艾伦·卡林(Alan Carling)、约书亚·柯亨(Joshua Cohen)、安德鲁·莱文(Andrew Levine)、亚当·普沃斯(Adam Przeworski)、希勒尔·施蒂纳(Hillel Steiner)、罗伯特·范德温(Robert Van der Veen)、菲利普·范帕里基斯(Philippe Van Parijs)和埃里克·赖特(Erik O. Wright)。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九月小组的年会，却与九月小组的人一样对同样的论题感兴趣，积极地参与讨论这些论题。比如，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罗宾·汉内尔(Robin Hahnel)、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大卫·米勒(David Miller)、里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克罗克斯(G. E. M. de Ste. Croix)、迈克尔·华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和艾伦·伍德(Allen Wood)。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人也属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早在1981年，埃尔斯特就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名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首次公开使用了这个词。到了1985年，主要由九月小组成员撰写的一本论文集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名出版。于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逐步流行开来。

自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它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

① [英]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6页。

第一个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到20世纪90年代初。

在这个阶段，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出版了一系列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定期举办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专题的学术会议。“80年代是这个理论运动的鼎盛时期，这时期的成就越来越广泛传播开来，使得这个学派成为英美理论家在理论方法和视角上有别于欧洲大陆理论家的一个品牌和标志。”①

从研究的主题来说，这一阶段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辩护，他们依据20世纪分析哲学倡导的清晰性和严格性探究马克思的本意。

第二个阶段，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

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鼎盛的发展时期已经过去。威廉姆·H.肖说：

>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虽不能说这个理论运动已经结束，但是它的鼎盛时期肯定已经过去。在那以后，很难说这个理论运动还有什么大的进展。当初那些有影响的代表性学者的研究兴趣大都转向了其他领域：柯亨90年代后主要研究和写作规范理论和伦理学；罗默在90年代之后还有一些关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问题的作品，但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哲学方面的作品不多；埃尔斯特在90年代后主要是研究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的问题。我在近十几年主要从事商业伦理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写作。伍德、赖特等人后来在马克思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也不再有什么进展。近二十几年中我几乎没有看到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再有什么重要的作者和作品出现。②

另一方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广泛：

> 当前虽然看不到新的杰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和理论家，但是这个学派作为英美哲学家研究马克思理论的最重要品牌和标志，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和讨论，甚至可以说是英美国家研究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主流。大多数英美学者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不能脱离、不能超越分析学派的背景和框架，我们当初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还激励着人们，还在被许多学者深入思考和讨论，成为当今世界马

①② ［美］威廉姆·H.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6页。



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和理论资源。①

从研究的主题来说，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拓展了研究领域，将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家面临的中心问题的挑战纳入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来研究。比如，平等、正义、民主和解放等问题。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人物众多，而且研究的问题也十分广泛，如阶级结构、历史理论、意识形态问题、政治理论、经济问题、社会民主、国家问题等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同学者的理论之间大相径庭。就某一问题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持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思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将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将分析的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是分析的方法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统一为一个学派。威廉姆·H.肖说：

>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特别是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语义逻辑混乱，从而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来更加准确真实地阐明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方法是柯亨、埃尔斯特、包括我在内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共同认可的。②

那么，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呢？

简单说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是概念清晰、表达明确、论证严谨的方法。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柯亨专门说明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分析的”的含义。柯亨说：

> 至于“分析的”，它在当前我们所涉及的问题中可做两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理解，即广义的理解和狭义的理解。就广义的理解而言，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分析的；就狭义的理解而言，大部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分析的。无论从广义上讲还是从狭义上讲，只要是“分析的”，就意味着它是同一种传统上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分析的思维，就广义的“分析的”而

---

① ［美］威廉姆·H.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页。

② ［美］威廉姆·H.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7页。

言，是同所谓“辩证的”思维相对立的，就狭义的“分析的”而言，是同所谓的“整体主义”的思维相对立的。①

具体来说，广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分析的，在于它运用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的一些分析的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之所以是分析的，是因为它们要求并推进了表达的精确和论证的严谨。

第一种分析的思维方法是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起源于德国，流行于英语国家，是由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分析的思维方法是经济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来自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瓦尔拉和马歇尔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则赋予了它严格的数学形式。

第三种分析的思维方法是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培育、发展起来的，它的理论形式表现为“决策论”、“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

柯亨、罗默和埃尔斯特三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熟练运用这些分析方法的大师。不过，他们三人各有侧重：柯亨侧重于运用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罗默侧重运用经济分析方法，而埃尔斯特则侧重运用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否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其独特的有价值的方法，所以他们反对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一种被称作“辩证的”方法。柯亨说：

> 我们认为，虽然“辩证的”这个词在被使用时并不总是含义不清，但它却从未被明确用来指称一种同分析的方法相匹敌的方法。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能向分析的推理形式挑战的辩证的推理形式。对辩证法的信仰只存活于思想不清醒的状态下。②

狭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就是指从微观上来分析宏观。柯亨说：“狭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指的是它以分别构成整体的微观成分和构成总体转变过程基础的微观机制，去说明宏观现象的那种倾向。”③“因为获取一种微观上的分析总是需要的，而且从原则

① ［英］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3页。

②③ ［英］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4页。

上讲也总是可能的，即使在实践中在某一学科的某一发展阶段上并不总是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①

狭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整体主义，因为整体主义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坚持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具有它们自身行动规律的整体，认为这种行为不是构成整体的个人的行动的功能。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描述了宏观现象，但并没有进一步分析构成宏观现象的微观成分。“知道钠和氯构成盐是一回事，知道它们是怎样构成盐的和为什么会构成盐是另一回事。声称资本主义必定要崩溃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并没有表明个人的行为是如何导致这一结果的。”②

在柯亨看来，坚持分析方法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说：

>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方法的信奉是绝对的。无论是就广义的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狭义的分析方法而言，我们对分析的方法的力量的相信是不可改变的。就这三个创立者的情况而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赞同在程度上并不像对分析的方法的赞同那样绝对。我们可以说，对这些方法的赞同反映的不过是对理性本身的赞同。削弱对清晰的陈述和严谨的论证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抵制分析的推理，无论是一般地以辩证法为名对分析方法的抵制，还是特别地以反个体主义的整体主义为名对分析的抵制，都是无理性的蒙昧主义的表现。当然，拒绝以某些方法为名提出的个别结论不能说是无理性的，因为普通的错误，以及特别的意识形态上的歪曲都会损害这样的结论。但我们认为，那种要表明分析的方法本身有一种毫无希望的非辩证的或个体主义的东西的做法，代表了一种不愿接受理性的严谨性的意向。③

总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分析为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将分析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但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更重视方法而非对象本身的观点。所以，他们为了坚持方法，不惜牺牲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柯亨为此辩解说：

> 在我们所有的著作中，作为探究对象的总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

---

① [英]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54 页。

② [英]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54—5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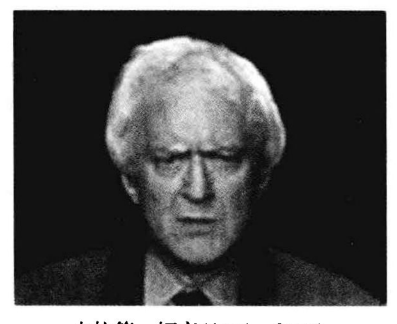
③ [英]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55 页。

分析的方法，而分析的方法则被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究。这已经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点已被抛弃，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的运动虽然保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热点问题，保存了它的志向和价值观，但拒绝了它的很多经典的观点。不过，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由于通过了分析方法的严格检验，所保留下来的观点，既包括原初的观点，也包括由原初的观点发展而来的观点，比以前更有力了。而被抛弃的观点在理智的良心中不能再保留了，除非以削弱理性的严谨性为代价，但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代价。[①]

第二节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柯亨

(一)柯亨的生平和著述



杰拉德·柯亨(1941—2009)

杰拉德·柯亨(Gerald Cohen，1941—2009)是英国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柯亨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母是服装行业的工人，信奉共产主义，热爱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和中国，并积极地参加左翼政治活动，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从4岁到11岁，柯亨在一个犹太共产主义组织创办的学校中学习，同时也在公立学校上学，并成为全国劳工青年联合会少年部的领导人。柯亨先是在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学习哲学和政治学，获得文学学士；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哲学，获得哲学学士。在英国学习期间，受教于著名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特别是在莱尔的指导下，他得到了系统的分析哲学训练。

起初，他和其他人一样，将分析哲学看成远离现实的、十分专业的哲

① [英]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5页。



学学说，并没有意识到分析哲学对他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何价值。他后来回忆说："我来到牛津时已经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和我的大多数政治上同道不一样，我并不指望大学哲学给我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①但是，由于他同时对分析哲学的热爱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他并没有因为一方而放弃另一方。

柯亨曾长期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任教。1963年至1964年任助理讲师，1964年至1979年任讲师，1979年至1984年任高级讲师。正是在伦敦大学学院期间，柯亨逐步地将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把在分析哲学中学到的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撰写了一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文章，运用严格的分析方法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该书在左翼激进派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获得了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纪念奖。

柯亨后来回顾这本书时说，该书"对我的出身环境表达了敬意，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学到该书所捍卫的那种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的"，它"得益于我的父母、教育我的学校、培育我的政治群体"②。柯亨的这本书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运用分析哲学方法的新学派奠定了基础，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加拿大皇后大学哲学教授克莉丝汀·斯诺维奇（Christine Sypnowich）在纪念柯亨担任齐契利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20周年的文集中写道："我认为，公正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柯亨的这本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存在。"③

从1985年起，柯亨被聘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著名的齐契利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的教授（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同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柯亨退休，成为牛津大学的荣誉教授。2009年8月5日，柯亨因中风去世。

柯亨的主要著作除了他的开创性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1978）之外，还有：《历史、劳动和自由》（*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1988）、《私有权、

---

①② G. A. Cohen,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Themes from Mar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xi.

③ Christine Sypnowich (ed.), *The Egalitarian Conscience: Essays in Honour of G. A. Coh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

自由和平等》(*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1995)、《如果你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你怎么会这么富有?》(*If You're an Eq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2000)、《拯救正义和平等》(*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2008)、《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Why Not Socialism?* 2009)等。

(二)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

柯亨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开启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具体来说，就是运用严格的分析方法辩护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时代复兴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柯亨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永不满足、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能够把它们全部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需要后人以明晰的概念和严密的推理来重新建构。柯亨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就是运用分析哲学的严格方法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柯亨说：

> (我的)目的是建构一种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这种历史理论与马克思在该问题上所说的大体一致。尽管他肯定会发现接下来的一些论述不是很熟悉，但我希望他能够认识到这是对他的思想的合理清楚的表述。①

柯亨自信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比马克思的原文清楚得多。

1.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在柯亨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理论”这两个名词是一个意思。柯亨在他的著作的行文中经常不加区别地换用这两个名词，当成一个概念来使用。

那么，什么是柯亨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呢?

柯亨的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 我要为之而辩护的是一种旧时尚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传统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生产力的增长，而社会形态的兴盛和衰落则取决于它们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这种增长。我将把探讨的焦点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更基础性的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像一些论述马克思和社会的著作一样，较少地涉及阶级冲突、意识形态和国家问题。②

①②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ix.



柯亨的这段话表明：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的原著中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改造或曲解的历史唯物主义。

柯亨明确地指出，他为之辩护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

>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

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为了表示他对这段话的重视，柯亨专门将其置于《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的首页，意在表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就是辩护其中所蕴含的思想。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在柯亨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的关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则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他说："历史是人类产业的历史，人类产业在生产力中经历了自己的生产过程，其动力和载体是经济结构，当经济结构造成了它自己所无法容纳的生产力的更剧烈的生长时，它就会衰亡。"[②]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概念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力概念展开的，他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命题都是关于生产力的。

第四，阶级冲突、意识形态和国家问题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柯亨并不否认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相比，这些问题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的范围。比如，柯亨认为，马克思解释社会变革时经常诉诸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并不是根本解释，阶级斗争的根源仍然是生产力。柯亨说："马克思在生产力的特征中找到了答案，'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③]也就是说，如果某种类型的阶级统治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获得了统治的历史合理性；如果某种类型的阶级统治不适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阶级斗争就会发生，进而发生社会变革。

2. 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命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②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7.

③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9.



柯亨在辩护历史唯物主义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命题，二是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

生产力的发展命题是：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贯穿历史。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释的。

为了论证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柯亨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将这个命题分解为以下一些基本命题：

①生产关系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合；

②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③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④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它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

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⑥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柯亨认为，命题①是对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的严格表述。马克思在这一句话中所说的"适合"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说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时，他的意思是前者要适合于后者，即生产关系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它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

从文本上来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开始，单向地考察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到社会革命到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没有进行逆向的考察。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总体语境是说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且，从"生产关系同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这个论断的前后文来看，紧接其后的一句话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很明显，马克思的这后一句讲的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适合是单向的。既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适合是单向的，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合也必定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因为在两个相邻的句子中，适合肯定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

柯亨认为，只有对"适合"一词作单向的理解，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首要性命题。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的性质必须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说明。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发生不一致时，要依

靠变革生产关系来解释,而不能依靠变革生产力来解释。因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适合”是单向的。虽然马克思也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影响,即生产关系的发展也会引起生产力的变化,但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只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之中的一个内在的逻辑的必然结果。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始终是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倒过来——要求生产力去适合生产关系。

柯亨认为,命题②至⑥是对命题①的具体阐述,它们构成了一个严格的形式。同时,柯亨通过对命题⑤和⑥的分析,认为它们分别等同于以下表述:

如果一个经济结构灭亡,那么它实现了最大的生产潜力;

如果一个新的更高的经济结构出现,那么使它产生的生产力在其所处的经济结构中充分发挥了出来。

针对一些人指责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是“技术决定论”,柯亨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能力的发展之间,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马克思的理解中,都是一致的。一旦我们注意到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人类劳动能力的增长,那么强调技术便不会贬低人性。“奴役人的能力首先是属于社会关系,而不是属于物质力量,阻碍物质发展时成为桎梏的正是生产关系。”[①]

在柯亨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命题为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的论证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根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肖的解释,生产力的发展命题与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的逻辑关系如下:

①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自然趋势(发展命题);

②任一社会结构不可能同一切生产力发展水平都相适应(适应性前提);

③因此,只要时间足够,生产力将达到一个不再同它从前在其中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发展水平(由于①和②);

④为了保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生产关系将发生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由于①和②);

⑤因而,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说明的(首要性命题;由于④)。[②]

---

①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7.

② [美]威廉·肖:《历史唯物主义与发展命题》,《社会科学的哲学》1986年第16期,第198页。参见余文烈著《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生产力又为什么趋于不断发展（发展命题）呢？柯亨的解释是：其一，人是有理性的；其二，人在历史上的处境是匮乏；其三，人具有一种使他能改善自己处境的智能。因此，有理性的人类知道如何满足不断增强的欲望，并倾向于抓住和运用满足其需要的手段，扩大生产能力。

所以，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贯穿整个历史发展的命题，生产力具有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会使原来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为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情况不会长久维持下去，最终会导致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新的选择，因而总是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而不会相反。这样一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首要性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于是，生产力的发展贯穿整个历史（发展命题），而生产力的水平说明一个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性质（首要性命题），发展的观点和首要性关系同时并存。同样，生产关系对于上层建筑也是首要性的，即前者说明后者。与此同时，还存在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重要影响。两个命题一起说明了人类发展史。

3. 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

在柯亨看来，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中包含着两个命题：一是生产关系的性质要由生产力的性质来说明，二是生产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这两个命题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前者讲的只是生产关系要由生产力来说明，而不包括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后者只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从中得不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来说明，由此会使人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样，坚持马克思的第一个命题就要否定他的第二个命题，反过来也一样。但是，柯亨认为，如果采取功能解释的方法就会发现，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命题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一脉相承的。

柯亨本人十分重视功能解释。在他看来，功能解释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都是功能解释，功能解释是他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的一个代表性成果，是他辩护历史唯物主义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

那么，什么是功能解释呢？柯亨说：

> 马克思的核心解释是功能解释，它的大体意思是：被解释的东西的特征是由它对解释它的东西的作用所决定的。这样解释马克思主

义的一个理由是：如果解释关系的方向像已经确定的那样，那么对这种关系的本性的最好的说明就是，它是一种功能解释。①

柯亨举了以下两个例子来说明功能解释：

①鸟长有空心骨是因为空心骨有利于飞行；

②制鞋厂以大规模生产是因为大规模生产会带来经济效益。

柯亨指出，在这两个例子中，鸟长有空心骨要由空心骨有利于飞行来解释，制鞋厂以大规模生产要由大规模生产会带来经济效益来解释。这样的解释就是他所说的功能解释。

为了使人们能准确把握功能解释，他还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对其做了严格的说明。他说，假设 E 是原因，F 是它的结果，我们以 E 具有这种作用来对它做功能解释。以 E 的发生是由于 F 的发生来解释是错误的，因为这是用后出现的结果来解释先出现的原因，这样一来，功能解释就与通常的因果解释相矛盾了。以 E 的发生是由于它引起了 F 的发生来解释也是错误的，因为当 E 引起 F 时，E 已经发生了，因而它引起 F 这一事实也不能用来解释它的发生。唯一可选用的解释是：E 的发生是由于它会引起 F，换句话说就是，E 的发生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事件 E 会引起事件 F。柯亨强调，这种功能解释与通常的因果解释并不矛盾，它不过是后者的一种特殊形式。柯亨说，如果他对功能解释的上述说明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就都是功能解释，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并清楚地指明这一点。

在柯亨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运用了大量的解释性表述。比如：

①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了它的经济结构的性质。

②生产的经济结构解释了上层建筑的性质。

此外还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其社会意识等等。

柯亨指出，在这里的每一句表述中，马克思都区分出两个关系项，断定其中前者以某种方式解释后者。马克思不曾说明他设定的是哪一种解释，但如果仅仅对“适应”、“制约”、“决定”这些词汇作语义分析，不是揭示

---

①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p. 278.

马克思的思想的方式。

柯亨断定，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解释就是功能解释。因为只有这样说，才能使上述①、②论断与马克思的如下命题协调起来：

③社会的经济结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④社会的上层建筑稳定了社会的经济结构。

③和④包含着如下思想：这种经济结构对于该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功能的，起了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结构的巩固是有功能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功能解释在这里简单地说就是，被解释者的性质是由它对解释者的功能所决定的。柯亨说，按照马克思所阐述的解释关系的方向，把他的解释看做功能解释，就能使被解释现象的影响力量（例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力量）与它在解释次序中的第二等的地位（较之生产力来说，生产关系是被决定者，是第二位的）两者之间统一起来。

应该注意的是，按照柯亨的思想，不是命题③和④本身表明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是由所陈述的功能来解释，而是把③和④与①和②作为前提，才使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方式看做是功能解释。

这样，说一种经济结构适合于生产力的一定水平，其意思就是，这种经济结构为该生产力的有效利用与发展提供了最大的范围。而且，之所以有如此的发展是因为它提供了这样的范围。说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至少主要方面是如此），社会的主导思想的性质，是由其支持符合生产力所要求的经济结构的作用的倾向（即根据这种性质）来解释。

换句话说，为什么有这样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生产关系？为什么有这样的上层建筑而不是别的上层建筑？就是因为这样的生产关系、这样的上层建筑对现在的生产力和现在的经济基础有促进或巩固的功能。这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由它们的这些功能而得到解释。

柯亨还强调指出，虽然功能解释没有详尽地解释所有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特殊的价值，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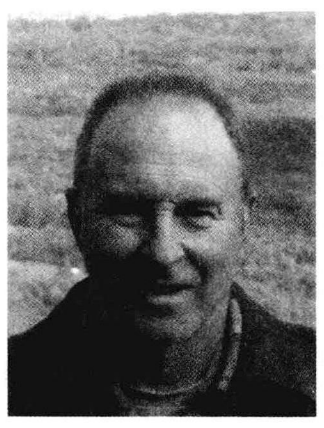
二、罗默

（一）罗默的生平和著述

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1945－）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罗默于196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数学系，获得学士学

位;然后进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读研究生。越战期间,罗默因政治上激进曾被学校开除。直到1974年,罗默才在柏克莱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进入学术领域之前,罗默最初任职于工会部门。此后,罗默被聘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系教师。罗默现任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教授。罗默是经济计量学会的研究员,也是古根海默基金会和罗素哲人基金会的研究员。


约翰·罗默(1945—)

罗默具有强烈的学派意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1984年,他主编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一书。10年之后,1994年,他又主编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二卷本)一书。这两部书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罗默主张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以他为主,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又形成了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潮。

罗默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哲学、分配正义和机会均等。他的思想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8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思想成分占主导地位;1980年至1985年间,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成分达到顶点;1985年以后,新古典主义思想成分到达顶点,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成分有所减弱。

罗默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1989)、《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1982)、《自由地损失:马克思经济哲学导论》(*Free to Lose: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 1988)、《社会主义的未来》(*A Future for Socialism*, 1994)、《分配正义理论》(*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1998)、《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 2000)、《政治竞争》(*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2006)等。

(二)罗默的剥削理论

罗默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说,特别是剥削理论。他不仅表明了我们可以运用新古典与福利经济学的博弈论和数学模型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原理,而且也建构了独立于劳动价值



论的剥削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罗默阐述剥削理论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被公认为是继柯亨之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和出路

罗默提出剥削理论的出发点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他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危机，这一危机由于其缺乏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和发展的成功说明而得到证实。”①在罗默看来，解答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危机中走出来，归根到底应该使用经济术语，“也就是说，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始源性的术语应该是经济术语”②。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政治现象是经济现象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经济现象解释政治现象的理论。

罗默指出，只有把新古典经济学、数学中的博弈理论和分析哲学方法结合成一个新的、独特的视角，尤其是偏重于从基础性的经济理论，即剥削理论上来重新解释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现象，才能真正克服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危机，使历史唯物主义站得住脚。

罗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核心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乃是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19 世纪经济现象的结果，而在新的时代再用马克思用过的经济概念是不必要的。他说：“我们的任务不可能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 20 世纪晚期的境况中，而是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应用到这些境况中。我们这里运用的方法的产物是一个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剥削理论。”③

罗默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在并不采取强制性方式的劳动交换的制度中，工人所生产出来的、超出自己的生存需要的那部分剩余产品是如何系统地被剥夺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交换是竞争性的，所有商品的交换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展开的。马克思将剥削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他认为剥削就是剥削者剥夺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剥削之所以可

①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

②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5－6.

③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4.

能，正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为前提的。如果生产资料公有化了，那么剥削也就不可能了。

然而，罗默指出，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来思考问题，那么剥削不会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是，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政治上的不平等归根到底是由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的，所以，应该提出一个一般的剥削理论，使之适应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

罗默认为，一个一般的剥削理论比马克思的经典剥削理论有以下优点：

第一，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看成是剥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一般剥削理论只以财产关系的存在为前提。

第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的，而一般剥削理论则独立于劳动价值论，它运用博弈论给予剥削现象以更一般、更抽象的说明。罗默说：

> 博弈理论的构成独立于劳动价值论。确实，它并不涉及劳动价值，而只是依据对财产关系的选择性说明（也就是说，对所有的生产者来说，在生产资料的可让渡性方面都应该是平等的）来考察剥削问题。①

第三，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主要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而一般剥削理论则说明了贯穿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剥削现象。

总之，罗默试图以一种一般剥削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经典剥削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马克思主义，克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为马克思主义找到新的出路。

2. 剥削的一般定义

什么是一般剥削呢？罗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定义一般剥削现象，从而确立了他的一般剥削理论。他说："它是一个博弈论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财产关系，而不是劳动价值理论，是核心的概念。"②

---

①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0.

②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9－20.



罗默关于剥削的博弈论定义是：

当人们说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在某种境况下被剥削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剥削这个概念必须具备如下这些条件，即当且仅当下面这些条件存在时，一个群体S在一个较大的团体N中才是受剥削的：

(1)假定存在着这样一种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S总是比现在的状态更好。

(2)在这样的选择中，群体S'作为N减去S后的剩余物，即作为S的补充物，总是比现在的状况更坏。

(3)S'在与S的关系中占据优势。①

罗默的这个关于剥削的博弈论定义规定剥削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一个群体能够做出一种更好的选择，那么它现在就处于一种受剥削的状态之下；如果一个群体的选择有可能使另外一个群体处于比目前更坏的状态之下，那么另一个群体现在就处于一种剥削的状态之下。两个群体还必须处于不平等的关系之中。罗默认为，虽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剥削，但是剥削总是一种不平等。

罗默虽然对剥削持批评态度，但他并不是对剥削进行全盘否定。在罗默看来，剥削并不全是消极的，某些剥削还有积极的作用，它们为社会所需要。所以，罗默在讨论一般剥削时，还提出了“社会必要剥削”的概念。

什么是社会必要剥削呢？罗默说：“如果一种剥削形式的取消总是会改变物质刺激和制度，以致使被剥削的群体处于更坏的情况下，这种剥削形式就是社会必要的。”②

这就是说，尽管某些剥削不合理，它们却可以改善被剥削者的状况，促进社会发展，所以社会必须保留和容忍这些剥削。

罗默还进一步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必要剥削：一种是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即一个群体做出选择后，它的处境立即变得更坏；另一种是动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即一个群体做出选择后，虽然它的处境没有马上变坏，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变坏了。

---

①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94—195.

②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0.

3. 三种具体的剥削形式

为了显示其一般剥削理论的特点，罗默运用他的这个理论对具体的剥削形式进行了分析。

其一，封建剥削。

罗默解释说："如果一个群体按照这样的规则——它能带走自己的资金来利用份地——从更大的团体中撤出来，从而对份地进行改良的话，那么它就是以封建的方式受到了剥削。"①

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中，如果农奴从经济博弈中撤离出来，其处境比目前更好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受到了封建的剥削。与此相应，如果领主们因农奴的撤出而受到损害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剥削者。

罗默将封建剥削等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剥削概念。他说：

> 结果是，封建剥削等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剥削概念：如果一个生产者的边际产量没有得到支付，那么这个生产者就是受剥削的。新古典主义的陈述是：一个行动者只要接受了他的边际产量的支付，他就没有受到剥削。②

在封建社会里，边际产量是农奴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表现为实物形式，往往被领主所占有。新古典主义的剥削概念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封建的剥削概念。

其二，资本主义剥削。

罗默认为，与封建剥削相比，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关于封建剥削的问题是：如果废除了封建束缚，当事人有什么好处？而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是：如果废除了可转让财产的关系，当事人将生活得怎样？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博弈中，一个群体能够在一种假定的选择中带走自己的私人财产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博弈中，一个群体在假定的选择中就能带走社会人均可转让的财产（生产资料）。罗默说："资本主义剥削的严格的定义需要在假定的选择中具备资本的人均分配方式。"③

罗默认为，在确定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征时，根据财产关系的博弈方法

①②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9.

③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11.

优越于根据剩余价值。因为在人们谈论剥削时，财产关系的概念能更清楚地揭示其道德要求，博弈的方法又允许人们设想一种替代的选择，用以跟资本主义下的无产者作比较。

其三，社会主义剥削。

罗默认为，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财产的生产资料是不可转让的，但并不意味着剥削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可转让的生产资料，但仍然存在着不可转让的财产（如生产者的技能）。这些不可转让的财产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使剥削得以产生。所以罗默说："当不可转让的财产以差异的方式被赋予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剥削也就随之而产生了。"①

罗默这样定义社会主义剥削：

> 在可转让财产被平均分配之后，如果一个联合体带其人均社会不可转让财产退出而能改善自己的命运，那么它就受到社会主义剥削。尽管执行这种技术的再分配也许是不可能的，或至少会碰到棘手的难题，但稍有一点经验，这种计算便可确立起来。②

罗默所说的社会主义剥削来源于人们之间技能上的重大差异。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这种社会主义剥削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剥削，如资本主义剥削、身份剥削等。身份剥削产生于人们在社会上的不同身份，不同的身份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从而获得社会财富的不同份额。

罗默的一般剥削理论为人们研究剥削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但他对剥削现象的界定过于宽泛，从而歪曲了剥削的阶级实质。

三、埃尔斯特

(一)埃尔斯特的生平和著述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1940—)是挪威社会政治理论家，专业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哲学、理性选择理论和分配正义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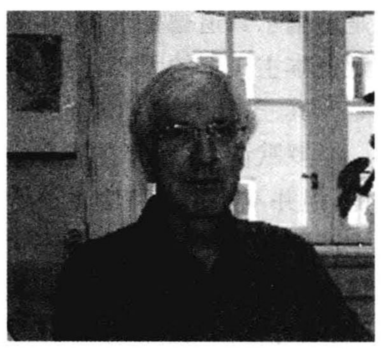
埃尔斯特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他的父亲曾任挪威广播公司总裁，是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母亲是一位诗人。埃尔斯特早年在奥斯陆接受教育，

---

① J.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1.

② J. E. Roemer, "New directions in the Marxian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in J. E. Roemer(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9.

1968年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到法国巴黎求师于著名法国哲学家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研究黑格尔哲学，但正值后者去世。后来，埃尔斯特转而师从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阿隆的指导下，埃尔斯特以关于马克思的论文获得法国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


乔恩·埃尔斯特(1940－)

埃尔斯特曾是"九月小组"的成员，20世纪90年代初脱离这个小组。埃尔斯特曾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历史系任教，还担任过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与政治科学系的荣誉教授。埃尔斯特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政治科学教授、法兰西学院教授，还是挪威科学与文学院的成员。埃尔斯特于1997年获得让·尼柯德奖(Jean Nicod Prize)，该奖每年在巴黎颁发给在心灵哲学领域有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被人们誉为心灵哲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埃尔斯特在学术研究上十分勤奋，撰写了大量学术论著。他在1978年出版的《逻辑与社会》(*Logic and Society*)一书被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著作之一。此后，他兴趣有所转移。但20世纪80年代初在柯亨和罗默的影响下，埃尔斯特又回到了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他后来回忆说：

> 我之所以回到马克思是因为，我开始意识到知识氛围正在发生变化。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出版首先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它突然改变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严谨和清晰的标准。我还发现，不同国家的同仁们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我们在1979年成立了一个小组并进行了会晤，以后每年会晤一次。……尤其是约翰·罗默的贡献——这种贡献现在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中得到了深刻的阐述——更是至关重要。①

埃尔斯特回到马克思后研究的新成果就是于1985年出版的《理解马克思》(*Making Sense of Marx*)。这部书是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角度全面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的思想。罗默评论说："希望探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读者最好能进一步地参考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一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出版于1985年，它运

① 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xiv.



用分析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理论、历史理论（阶级、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①

除以上两本书外，埃尔斯特的著作还有：《卡尔·马克思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1986）、《社会的粘合剂》（*The Cement of Society：A study of social order*，1989）、《所罗门的判断》（*Solomonic Judgments：Studies in the limitation of rationality*，1989）、《地方正义》（*Local Justice：How institutions allocate scarce goods and necessary burdens*，1992）、《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1993）、《精神的炼金术》（*Alchemies of the Mind：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1999）、《被解放了的尤利西斯》（*Ulysses Unbound：Studies in Rationality，Precommitment and Constraints*，2000）、《解释社会行为》（*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2007）、《理性与合理性》（*Reason and Rationality*，2009）、《托克维尔：第一位社会科学家》（*Alexis de Tocqueville：The First Social Scientist*，2009）等。

（二）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1. 什么是方法论个人主义？

“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并非是埃尔斯特的首创，早在埃尔斯特使用这个术语之前就在学术界流行开来了：

> 根据马克卢普的观点，“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术语是1908年由熊彼特介绍而来的，但他意欲把它专用于“对特定经济过程的描述”。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方法论个人主义同政治的个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该术语重新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德国阶级合作政体被打败期间，斯大林主义在俄国作为世界权力出现之时。首先是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然后是卡尔·波普提出了一种学说，哈耶克称为“个人主义”，波普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正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在当前的用法中，“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仅仅指一种经济观点，也不避开政治的主张。②

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热烈讨论之后，“方法论个人主义”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一个术语。

---

① J. E. Roemer (ed.), *vol. 1*, *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4, p. x.

② ［美］理查德·施密特：《方法论个人主义、心理学个人主义和对理性的辩护》，载［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那么，什么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呢？埃尔斯特解释说："我借此表明的是这样一种学说，即全部社会现象——其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是可以以各种只涉及个人（他们的性质、目标、信念和活动）的方式来解释的。"①

在埃尔斯特看来，方法论个人主义是还原论的一种形式。

> 还原论的基本原理可以简要地做如下表述：如果科学的目标是借助规律进行解释，那么就有必要在解释和被解释者之间——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尽可能地还原时间跨度（time—span），以避免各种虚假解释。②

这种还原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就是将社会现象还原到个人，从个人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

埃尔斯特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在个体行为的层面上预设自私自利或合理性的前提，也不对人性做出任何实质性的界定，它仅仅是探索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第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被坚持和使用，不能把人们对那些"超个体的实体"的信念还原为对个体的信念。比如，"资本家害怕工人阶级"就不能还原为资本家害怕个体工人；而"资本家的利润被工人阶级所威胁"就不能被还原为"由于个体工人采取行动而带来的后果"。

第三，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仅限于单一的个人，它还涉及其他的个人，因为个人的许多性质是内在相关的。

第四，方法论个人主义是还原论的，但不是"不成熟的还原论"。不成熟的还原论是机械的生物还原论，即试图根据个人的动机和信念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从而导致贫乏的和武断的解释。

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提出来之后遭到许多人的质疑和反对，但埃尔斯特认为，只要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以上四个特征，那么所有的质疑和反对就会烟消云散。

在埃尔斯特看来，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或方法论整体主义是相对立的。方法论集体主义或方法论整体主义是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否定，埃尔斯特说：

> 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作为一种目的本身——假定，在解释的

①② ［美］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 页。

次序中，存在着各种先于个人的超个体的实体。解释始于自我调节的规律或这些较大实体的发展规律，而个人的活动则源于聚合的模式。这种解释经常采取功能性解释的形式，如果人们论证到客观利益为产生它们的集体活动提供了一种充分解释的话。①

2.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埃尔斯特研究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坚持用方法论个人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一个微观基础。因此，埃尔斯特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在《理解马克思》一书的开头就说：

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今天，马克思身上仍然有效的东西是他的方法，而非任何实质性的理论命题。正如我将在以后各章中表明的那样，我不赞成这种观点。马克思关于技术变革、剥削、阶级斗争和信仰形成的观点，仍有着超越了这种价值——它们可能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方法（如果有的话）的例证——的意义。但我相信，有一种特殊的、研究社会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一种可以被广泛运用甚至能为那些不赞成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的人所运用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在今天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运用，以致很少有人想起提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然而，历史地看，马克思是运用这种方法论的一个先驱。甚至在今天，他的全部洞见仍未枯竭。②

然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了马克思的整体主义方法，而忽视了马克思的个人主义方法。埃尔斯特说：“在很长的时间里，传统的智慧就认定，马克思主义生来就是反对政治自由主义的，从而也是反对认识论的或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③

埃尔斯特坚持反对把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为方法论整体主义、功能解释和辩证演绎的统一体。他说：

我想着重拒斥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以下三种要素的混合体。第一种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它认为整体或集体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关于这种整体或集体的陈述不能还原为关于个体成员的陈述。第二种是功能解释，它试图依据社会现象对某人或某物的有利结果来解释社会现象，即使证明不了产生这些结果的意图。第三种是辩证演绎，

① [美]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6 页。

② [美]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③ J. E. Roemer (ed.), *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 vol. 2,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4, p. 289.

它是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很难对其做出简洁的概括。①

埃尔斯特并不否认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深深地植根于黑格尔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但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也散布着方法论个人主义。他说："另一方面，人们不应忘记，马克思也曾（至少是间断地）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做过承诺。《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依赖于对历史的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反目的论的研究方法。"②

马克思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应当避免把"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手稿》中的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个体的人的发展，而不是集体的人的发展。所以，"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关于如何解释社会现象的学说，而不是关于如何评价它们的学说。马克思从未在共产主义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使个人之全面自由的实现成为可能这一观点上动摇过。"③基于以上考虑，埃尔斯特主张我们可以在今天重建马克思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他说：

> 在我们已经讨论的情况下，马克思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追随确实使他严重地、无可挽回地迷失了方向。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微观基础的匮乏却是可以弥补的，尤其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的理论能够按照重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方式重构。④

在埃尔斯特看来，马克思在探讨"商品拜物教"现象、犹太人问题及各种历史事件时，都十分重视个人行为及其信念、偏爱、欲望、激情的细致分析。比如，埃尔斯特引证了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对当时英国工人的情绪的分析：

> 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

---

① Jon Elster, *An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1.

② [美]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③ [美]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④ J. E. Roemer (ed.), *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 vol. 2,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4, p. 300.

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

>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①

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方面解释了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他说："从更一般化的角度来看，我确信，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个研究项目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无法分离的。"②

本章小结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语国家兴起的一种思潮，它试图以分析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重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诞生于1978年，主要标志是G. A. 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出版。围绕着"九月小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逐步成长起来。自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它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其分析方法，而分析方法则是概念清晰、表达明确、论证严谨的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是柯亨、罗默和埃尔斯特。柯亨的目标就是运用分析哲学的严格方法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命题，提出了独特的功能解释方法。罗默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说，特别是剥削理论。他不仅表明了我们可以运用新古典与福利经济学的博弈论和数学模型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原理，而且也建构了独立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埃尔斯特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特别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他阐释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涵、特征和应用。

思考题

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② J. E. Roemer (ed.), *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 vol. 2,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4, p. 300.

2.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哪些根本特征?
3. 柯亨是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
4. 柯亨是如何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命题的?
5. 柯亨是如何阐述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的?
6. 罗默是如何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出路的?
7. 罗默是怎样定义剥削的?
8. 罗默是怎样分析三种剥削形式的?
9. 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含义是什么?
10. 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有哪些特征?

阅读书目

1. 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2. [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3. [英]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 年第 1 期。

4. 陈伟:《在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之间——访 J. A. 柯亨教授》,《哲学动态》2007 年第 11 期。

5. [美]威廉姆·H. 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6. [英]克里斯多夫·贝塔姆:《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2003 年第 4 期。

7. [英]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8. [美]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八章　后马克思主义

要点提示

◎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激进民主学说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后马克思主义概述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思潮，是在后现代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和重构。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股思潮，但因为严格说来，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所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不同的人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的追溯也大不相同。

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康研究专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将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追溯到了黑格尔那里，断言黑格尔是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中找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所以，有人就问，"马克思是最早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吗?"著名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把被称为恩格斯去世后"正统马克

思主义的代表"的爱德华·伯恩施坦称为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家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约翰·巴尔达克海诺(John Baldacchino)和约翰·莱希特(John Lechte)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许多人都归入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如西姆认为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就已显示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巴尔达克海诺干脆直接把卢卡奇和阿多诺归入后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之中,而莱希特则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归入后马克思主义。[①]

最早提出"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人是匈牙利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一书中将后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斯大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终结之后的思想解放。波兰尼最早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一词,也最早为这个词的使用规定了基本含义,那就是"后马克思主义"之"后"一般含有"终结"、"断裂"、"取代"、"解构"、"重构"、"解放"等意义。著名政治学家麦克弗森(C. B. Mcpherson)在1964年就说:

> 目前,对被称作"后一资本主义"的东西的不精确的论述之作纷纷涌现。同样,使用这一术语的时事评论员和理论家们也很容易谈到后马克思主义。两种情形包含的观念是相同的,都暗示着如今(在前面)被加上连字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并且它已被某些确实相当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在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中,尽管人们不能否认表面上与旧的东西相似的事物仍然随处可见,但是,人们或许能通过把它叫作"后一某某"(即在它前面加上词缀"后")而驱除它的核心精神。如此一来,由于从任何可接受的社会伦理来看,旧式的资本主义难以得到正当的辩护,所以达至它已让位于其他东西的结论就变得十分有益。由于旧式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地陷入困境,所以人们或许能通过宣告它的逊位或被取代而更容易地对它加以处置。[②]

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经历和一些历史性的事件(如"布拉格之春"、"五月风暴"),无论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内还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都有一些人开始重新解读甚至批判质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产生了广泛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

① 参见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36页。

② C. B. M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71.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苏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修正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批判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发展阶段。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仍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肯定,但逐步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纲领,甚至激烈地批判马克思主义。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前后,后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里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广泛的思潮和运动。

东欧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库龙(Jacek Kuron)、莫泽列夫斯基(Modzelewski)、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基思(Kis)、瓦伊达(Vajda)、本斯(Bence)、巴赫罗(Rudolf Bahro)、吉拉斯(Djilas)、赫勒(Anges Heller)等。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一些学者也纷纷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美国,丹尼尔·贝尔曾经表示,他虽然反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且对马克思本人也多有背离,但他还是乐意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道格拉斯·拉米斯说:“在美国,像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丹尼尔·贝尔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早在冷战时期的 20 世纪 50 年代就发展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了。”①

另一位美国政治学教授珍·柯亨(Jean L. Cohen)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宣称要“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层理论奠定基础,以使这一理论能够在不忽视马克思主义成就的情况下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与创新。”②她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进行反思并从中解脱出来,同时又仍然继续从事于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彻底批判工程”③。而到了 90 年代初,她则将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民主联系起来,进一步说明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一直关注发达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致力于在社会理论中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图雷纳说:

> 我希望建立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最终归之于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的,因而也是归之于那种为了对文化领

---

①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

②③ Jean L.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2, p. 2.

域进行社会控制而发生的冲突性行动的，是这些关系和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那里所无以获得的中心价值，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在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那些除了国家再也看不到任何敌人的人所拒绝承认的。①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产生了，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成为学术界的一股影响广泛的思潮。这一功绩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学者拉克劳和墨菲。拉克劳和墨菲于1985年发表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倡导用"后马克思主义"来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出版之后，他们的观点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热烈的讨论，"后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确立了拉克劳和墨菲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发展史中的地位。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说，《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是"最深刻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②；艾伦·伍德(Ellen Wood)认为该书总结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和最终结论，是一个美丽的范型③；保罗·雷诺兹(Paul Reynolds)称拉克劳和墨菲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④；斯图亚特·西姆称他们两人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代表⑤。

随着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掀起的热潮，西方理论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成为西方理论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后马克思主义派别有：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各式各样的后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派别比较起来，后马克思主义更非一个统一的学派，各个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疏远。各个后马克思主

① Alain Touraine, *The Voice and the Eye: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14.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③ A. M.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47.

④ Mark Cowling & Paul Reynolds, *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Palgrave, 2000, p. 263.

⑤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12.



义者往往分属于不同的哲学流派，他们立场各异，观点独特，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尽管如此，作为一股思潮，各种派别的后马克思主义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的。

第一，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

后马克思主义与当前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密切相关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一股强大的思潮。美国著名后现代研究专家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写道：

> 过去20年来，后现代争论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文化和知识活动领域。在美学和文化理论方面，围绕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是否已经终结以及何种后现代艺术将取而代之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哲学方面，在关于现代哲学传统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上爆发了争论。同时，许多人已开始向一种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利奥塔等人相联系的新的后现代哲学欢呼了。①

后现代主义影响了各个学科，使之产生了各种冠之以“后”的概念和理论：后工业社会、后文化、后人类学、后殖民主义、后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后女性主义等等。

> 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分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诘难。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它摈弃认识论的假说，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②

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就属于纷繁多样的“后某某”之一。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年的书《后现代状况》逐渐成为后现代信徒的圣经，但重点是它正好在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③。国内有些学者甚至把后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如果我们把后现代主义喻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这

---

①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 ［英］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张英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根蔓上的一个瓜。”①

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与后现代主义具有共同的理论取向，大量吸收和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术语和概念，“马克思主义需要利用后现代主义的洞见”②，而且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是公认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如德里达。

第二，解构与建构并举。

从术语上来看，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后”，而这个“后”也正好表现了后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那就是解构与建构并举。

“后某某”之“后”，远不是单纯的年代意义，它不仅表示了批判和超越，也表示了继承和更新。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曾详细地分析了后现代话语中“后”字的含义：

> 事实上，各种后现代话语所操弄的“后”这个词本身就有着一种内在的模棱两可性。一方面，“后”描述一种“不是”现代的东西，它可以解读为一种试图超越现代时期及其理论与文化实践的积极的否定。……在这种规范的意义上，前缀词“后”表示同此前东西的一种积极的决裂。……另一方面，后现代一词中的“后”也表明了对此前之物的一种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和连续关系使得某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只是一种进一步强化了的现代性，是一种超现代性，“现代性的一种新面貌”，或是一种现代性之内的“后现代”发展。③

由此而言，后马克思主义之为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更新。如果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超越，那么就只是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如果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更新，那么就只是别一种马克思主义或新一种马克思主义，远表现不了“后”这个词的丰富或模糊的含义。拉克劳解释说：

> 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

---

①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5页。

② A. Callari & D. Ruccio(eds), *Postmodern Mater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t Theory: Essays in the Althusserian Traditi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

③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①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既在解构马克思主义，也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同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两方面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偏重于解构，有的人偏重于建构。

第三，激进的社会政治倾向。

无论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社会政治立场上却都表现出一种激进的倾向。“对新事物有一种内在的同情，正是后现代话语的特点所在，而它的颂扬者们总愿意把自己标榜为理论和政治上的前卫分子”②。后马克思主义鼓励政治多元主义、解放和激进民主。拉克劳说：“现在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有限性和它所开启的政治可能性。这是我们的后现代时代开始着手的潜在解放性话语的起点。”③

1968年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如法国的“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阿根廷的“哥多华索事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激进运动，而这些激进的政治运动促成了新左派的产生，新左派在理论上大多属于后马克思主义。正如英国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罗纳尔多·蒙克(Ronaldo Munch)所说：

> 因为正是“1968年”(1967年至1969年)，象征着旧左派的死亡和新左派的开端。新左派将成为众所周知的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因其强调“后”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程度而形态各异。1968年前后的事件导致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全部前提的质疑：“它的话语的普遍性，它对单一阶级和政党的认同，它的单纯代表(经济)利益的前提，它看不到多种统治的形式，它在一个生态限制的世界中不受约束的共产主义”。④

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算得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向度。后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不认同现存社会，他们对现存社会十分不满，从不同的角度揭露和批

---

① 参见[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译者前言第4—5页。

②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③ E. Laclau, *Emancipation(s)*, Verso, 1996, p. 18.

④ [英]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张英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判了现存社会的弊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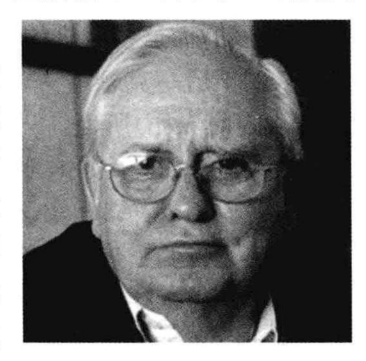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拉克劳和墨菲

(一)拉克劳和墨菲的生平和著述

拉克劳和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最有影响、最著名的两位，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界的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潮。

拉克劳(Ernesto Laclao，1935－)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阿根廷接受了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里，拉克劳担任哲学与人文学院学生会主席，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委会的左派学生代表。1958年，拉克劳加入阿根廷保卫社会主义党。20世纪60年代初阿根廷保卫社会主义党分裂成几个小党派，拉克劳于1963年加入由拉莫斯(Jorge Abelardo Ramos)领导的国家左翼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the National Left)。1963年至1968年，拉克劳是阿根廷国家左翼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成员之一，并担任党的周刊《工人斗争》的编辑。在这期间，还担任过党的理论刊物《国家左翼》的编辑。



拉克劳(1935－)

1966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拉克劳参加了反军人政府的学潮，受到当局的追捕，被迫于1969年流亡英国，在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举荐下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73年牛津大学毕业后，拉克劳受聘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政治系任教，教授政治理论，同时指导关于意识形态和话语分析的博士课题。此后，拉克劳还兼任了北美、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拉克劳就结合阿根廷的经验系统地阅读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拉克劳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他与墨菲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



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1985)。除此之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1971)、《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m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1977)、《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1990)、《政治认同的形成》(*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ies*, 1994)、《解放》(*Emancipation(s)*, 1996)、《偶然性、领导权、普遍性》(*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2000)、《论大众理性》(*On Populist Reason*, 2005)和《隐晦的普遍性》(*Elusive Universality*, 2010)等。

墨菲(Chantal Mouffe, 1943—)生于比利时的沙罗勒瓦,先后在比利时鲁汶、法国巴黎和英国埃塞克斯的大学求学。20世纪60年代,墨菲在巴黎求学期间,深受当时学生运动和第三世界革命形势的影响。那时发生了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古巴革命及其他拉美国家的革命。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墨菲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亲赴拉美,1967年至1973年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学生运动和第三世界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墨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又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墨菲(1943—)

在哥伦比亚期间,墨菲开始认识到阿尔都塞的学说不适应哥伦比亚的现实情况,所以她开始放弃阿尔都塞的学说。就在这时,墨菲在葛兰西那里发现了她感兴趣的东西。葛兰西的学说,特别是他的领导权概念,使墨菲深受启发。墨菲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探索葛兰西的非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认为正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解20世纪70年代的形势提供了理论工具。

墨菲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求学期间,结识了在该校政治系任教的拉克劳,从此开始了两人长期的理论探索合作。墨菲曾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等多所大学任教,兼任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89年至1995年,墨菲担任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的导师。墨菲现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

政治理论教授。

除了与拉克劳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之外，墨菲还主编了《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1979)、《激进民主的维度》(*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1992)、《解构与实用主义》(*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 1996)、《卡尔·斯密特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1999)和《维特根斯坦的遗产》(*The Legacy of Wittgenstein: Pragmatism or Deconstruction*, 2001)等，撰写了《政治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1993)、《民主的悖论》(*The Democratic Paradox*, 2000)、《政治与激情：民主的风险》(*Politics and Passions: the stakes of democracy*, 2002)和《论政治》(*On the Political*, 2005)等。

(二)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激进民主学说

拉克劳和墨菲沿着激进的多元民主路线，将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政治理论的建构和对政治实践的反思。

> 二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把后阿尔都塞(Post－Althusserian)观点和新葛兰西(Neo－Gramscian)观点结合起来，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激进民主理论与政治。从根本上看，这一计划引导他们"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无怨无悔地拥抱一种后马克思主义"。①

1. 领导权

领导权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他们正是通过领导权这一概念建构起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激进民主政治理论。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植根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一种历史哲学，它认为社会历史的演变具有客观规律，具有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社会历史观。这种社会历史观突破了社会客观性的逻辑，打破了历史必然性的教条，显示了主体性而非客观性的作用，体现了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逻辑。这种非主流的思想，就是领导权理论。拉克劳和墨菲说："面对那种把社会历史当成理智上可以把握的，围绕概念化规律可

①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以解释的总体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的偶然作用的角色。”①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考察了领导权概念的谱系，他们认为，列宁、葛兰西对领导权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列宁主张的是政治领导权，葛兰西主张的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而他们则主张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自诩他们提出的领导权理论是一次哥白尼式革命，领导权范畴成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起点。

(1)政治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经济还原论和历史决定论，认为存在着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生产力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生。正是列宁提出了政治领导权理论，打破了经济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

> 列宁主义代表着经济主义模式瓦解并朝向以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念前进的一个关键点。列宁不再把革命性的断裂构想为单一矛盾之展开的必然的预定的点，而是构想为特殊的关键性转折点，它由各阶级间力量的关系中的移位所支配。这种观念的背景是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解为一个帝国主义链条，这一链条的最薄弱环节(在此环节中革命性的断裂是可能的)并不必然地与那种在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它的最高点的环节正相重合。这种情况下，为经济主义的观念所预见的该阶段的普遍必然性大受质疑。②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列宁通过领导权理论，赋予政治领导权以优先性。列宁指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在革命时期具有领导权的作用，通过领导权将各种大众力量结合起来，形成反对旧政权的阶级联盟。阶级联盟正是列宁所构想的领导权形式，各种力量团结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首先，它打破了历史必然性的僵化观念，展示了一种偶然性的逻辑。其次，它打破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经济主义观念，赋予政治以优先性，领导权就是一种政治斗争，无产阶级

---

①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3页。

②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政党通过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再次,它也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并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必然结果,社会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在"阶级利益"的概念之下,因此可以有无产阶级领导权下的各阶级联盟。

(2)意识形态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既继承了列宁的领导权理论,又发展了列宁的领导权理论。

> 葛兰西既代表了列宁主义的连续性,同时又代表与列宁主义的脱节。连续性,是因为他扩展了列宁的如下直观:历史并不按一个简单逻辑进行,每一接合和断裂取决于革命主体的政治干预;但也有脱节,因为他并没有把政治的优先性限于革命的紧急关头,而使之成为包括稳定期在内的每一社会形势之下的接合性原则。①

这就是说,领导权的政治优先性并不局限于革命时期,而是社会的一般原则。葛兰西对列宁的领导权理论的重大突破在于超越了政治领导权概念,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拉克劳说:

> 正是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向超越了"阶级联盟"的领导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因为,鉴于政治领导权可以建立在联结起来的一致利益上,在其中参与者保持他们自己的身份,道德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就需要被大多数参与者分享的全体"观念"和"价值"或者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说,某些主体立场横贯了大量的阶层。根据葛兰西的观点,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构成了较高的综合,"集体意志",通过意识形态,它们变成了统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所有这些形成的概念对列宁主义的观点有一个置换作用。②

因此,

> 对葛兰西而言,霸权(领导权)不再被构想为对预先构成的主体所施加的纯粹的政治领导,而是构想为"政治的、智识的和道德的领导",正是通过这一领导形式,新的政治主体被创造出来。这些主体将表达民族一大众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产生了工人阶级对一系列相应于那些严格讲来并非是阶级矛盾的各种矛盾而生出的民主

---

①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8—59 页。

②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宅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2 页。



的大众的要求进行的接合之中。①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引发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置换。首先，意识形态是一个物质性概念。“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代表的‘观念体系’或‘错误意识’，它是有机的、关系的整体，具体化于制度和机构之中，它围绕着许多基本的连接原则把历史集团焊接在一起。这排除了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式的阅读。”②其次，结束了意识形态的还原论。“对葛兰西来说，政治主体严格说不是阶级，而是合成的‘集体意志’，同样，领导权阶级所连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③

总之，根据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扩大了领导权的概念，特别是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使意识形态领导权摆脱了阶级属性，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构成原则。

(3)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在考察了领导权概念的谱系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话语领导权理论。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他们的领导权理论的出发点是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他们明确指出：

> 只有葛兰西——其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的著述——这个孤立的例子，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他的著述中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④

但是，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阶级论和经济主义这两个本质主义因素：

> (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机构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自己。正如先前我们所指出的，这两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⑤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他们的话语领导权理论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

> 现在我们已达到前此提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核心之处了。这在

①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②③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宅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④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宅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⑤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宅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于艰难地得出与经济主义决裂的结论——它由列宁开创、经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得以发展；在于坚决地与本质主义的“历史保证”的形而上学决裂；也在于同一种宣称自己为历史过程的“绝对真理”、宣称自己能够预测历史的必然进程的形而上的科学形式决裂。如果我们还想有朝一日进入到一种真正解放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社会构想为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政治斗争复杂的场域，在其中，大量的不同主体必须被承认和接受。①

这就是说，话语领导权的革命意义在于彻底与客观主义、本质主义的传统观念决裂，彻底与历史必然性、经济主义和阶级观念决裂。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他们之所以提出完全新型的领导权理论，是基于社会运动的新特点。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运动，包括妇女、学生、年轻人、种族的、性的和地区性少数派以及各种反体制和生态斗争，不能仅仅定位于生产关系之层次，不能说成是仅仅起源于经济原因，不能仅仅理解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这些新的主体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来界定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敌人不是由剥削的功能来界定，而是由某些权力的行使来界定。而且这一权力也不是从生产关系的一个地位获得，而是具有该社会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这一社会诚然是资本主义的，但这并不是它的唯一之特征；它也是性别歧视主义的和父权制的，更不必说种族主义者了。②

所以，原有的领导权理论已经不能解释新的社会运动。

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领导权需要一种非总体化的话语逻辑，因此他们将领导权概念建立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之上。他们的话语理论承袭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即认为话语是社会的生活形式。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话语与社会密不可分。一方面，话语是由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没有社会就没有话语。另一方面，社会又是话语的连接实践所构成的，社会概念被理解为话语空间。从这个角度说，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他们认为，由话语建构起来的社会是异质性的、开放性的、偶然性的、非决定性的，既不存在所谓的客观规律，也没有历史必

---

①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②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然性。正因为社会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所以拉克劳和墨菲极力主张话语领导权，将其视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新策略，认定社会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结果，而是社会主义的话语获得认同。话语领导权的实现是偶然性的、不确定性的、非本质性的、开放性的话语连接过程，这就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

同时，话语领导权理论也彻底摆脱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拉克劳和墨菲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否认了由客观的经济地位、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他们所讲的主体身份是在话语连接的领导权实践中建构起来的；主体身份并非由社会客观决定的，而是在话语连接的领导权实践中形成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随着话语认同的变化，身份也会变化。由话语所决定的身份是多元的、暂时的、相对的，不同身份之间的边界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话语连接的变化而不断地革新、不断地流动。这种话语的领导权完全摆脱了阶级的观念，消除掉了本质主义因素，从而完全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领导权理论。

总之，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一旦领导权摆脱了本质主义逻辑，人们就能够理解社会现实的多元的、复杂的、多方决定的性质，就能把握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社会运动，就能对这些运动所具有的历史可能性——激进民主——创造条件。一旦领导权摆脱了本质主义逻辑，并在后结构主义的背景中得到重新阐释，它就可以成为左派进行政治分析的基础性工具。①

2. 多元激进民主政治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建立新的领导权需要创造新的政治，新的领导权理论也为多元的激进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性。

> 拉克劳和墨菲用“多元”一词来指涉政治认同的多样性。这种多元主义之所以是“激进的”，是因为这些认同被确证为具有自主的性质，但又处于联盟之中。而激进的多元主义之所以是“民主的”，乃是因为没有哪个单一的团体或斗争形式拥有高于其他的团体或斗争形式的特权，并且每一个都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扩展到生活的所有方面。②

---

① 参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②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拉克劳和墨菲自命为左派分子，但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左派思想已经遭到了严峻的挑战，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他们说："左翼思想今天处在十字路口之上，过去的'鲜明的真理'——经典的政治分析和推理形式、斗争力量的本质、左翼斗争和目标的真正意义——受到了瓦解这些真理基础的巨大历史转变的挑战。"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方面，"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和波兰政变；从喀布尔到越南和柬埔寨共产主义胜利的余波，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实现它的道路越来越产生疑问"②。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③。本来，人们还希望苏联模式的崩溃会重新推动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消除过去的社会主义给人们造成的消极印象。"然而，随着各种各样共产主义的失败，正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变得令人不能再相信了。新生活并没有形成，社会民主陷入混乱之中。"④鉴于这种情况，拉克劳和墨菲试图通过多元激进民主政治来更新左派的思想，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方案。

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方案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首先，他们拒斥"狭隘的"工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们反对将社会主义理解成为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具有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其次，他们拒斥社会主义革命概念，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过去的革命性决裂。再次，他们拒斥"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它导致了官僚化和对个体的压制。

拉克劳和墨菲主张社会主义的民主，但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民主。建立在剥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基础上的经济组织形式的社会主义将会像东欧国家那样产生官僚的压制和不平等。他们驳斥了社会主义民主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的观点，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事实说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缺乏民主的。

正因为如此，拉克劳和墨菲要以新的社会主义方案取代旧的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主义意味着铲除等级制和不平等现象，意味着自由，意味

---

①②③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④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第9－10页。



着多元的激进民主。只有多元的激进民主革命，才能实现新的社会主义，原因在于“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都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它必然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①。这种多元的激进民主设计是民主革命的一个内在发展阶段，它把由资产阶级开创的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斗争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领域之中。

为了实现具有多元激进民主政治内涵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激进的民主革命。这种激进民主革命的内容是：(1)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执行者，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中的被剥削和被压迫者成了激进民主革命的主体。(2)用激进的民主代替无产阶级的原有斗争目标——实现共产主义。(3)用一种新的话语来阐发多元的激进民主政治。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激进民主社会的首要条件是接受其所有价值的偶然性和激进开放的特征(在此意义上，就是抛弃对单一基础的渴望)”②。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社会关系具有偶然性，“如果社会关系是偶然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通过斗争来彻底变革社会关系，而不是把这种变革视为客观性本质的自我转换”③。社会的偶然性既排除了社会的必然性，也决定了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新的激进民主政治学说正是建立在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的基础之上。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新左派领导权策略存在的可能性，不是在放弃民主的意义，而是在同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整体进行民主斗争的范围内。左派应当完全把自身定位在民主革命领域，发展反对压迫的斗争，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这就是左派走出危机和困境的唯一出路所在。

二、德里达

(一)德里达的生平和著述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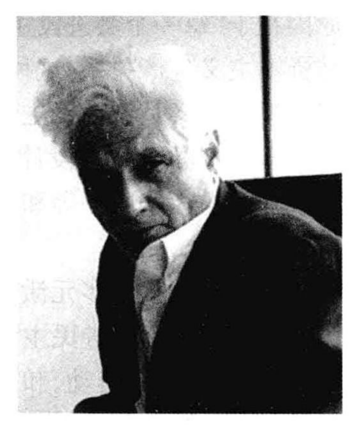
①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0 页。

②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4 页。

③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5 页。

解构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

德里达生于当时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南面埃尔比哈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家中五个子女中排行第三。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埃尔比哈度过的。德里达年少时酷爱足球，梦想长大后当一名职业球员。同时，他也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尼采、纪德、加缪和萨特的著作，从中汲取精神营养。19 岁时，德里达走出家门，远赴巴黎求学。1952 年被享有世界声誉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


雅克·德里达(1930－2004)

在巴黎高师期间，德里达结识了一些人，与他们成为师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文学批评家杰拉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等。德里达和这些人一起日后成为法兰西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在此后的 20 年间极大地改变了法国乃至世界哲学的理论面貌。

1954 年，德里达写出了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两年之后获得教师任职资格。此后，德里达得到赴美奖学金，在哈佛大学研读了一年的乔伊斯的意识流文学名著《尤里西斯》。回国之后曾试图撰写博士论文，但没有完成，直到 1980 年才凭已出版的著作获得博士学位。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德里达进入军队服役，但任务是给法国士兵的孩子教法语和英语。战后几年，德里达在索邦大学任助教。1964 年，在阿尔都塞和让·伊波利特的推荐下，德里达获得巴黎高师的永久教职，直到 1984 年去职。自 1965 年开始后的七年里，德里达参加了著名文学和哲学团体太凯尔(Tel Quel)小组的活动。1983 年，德里达与他人一起创建了国际哲学学院，推动了法国哲学的发展。

德里达在世界上许多学术机构拥有客座或永久职位。从巴黎高师离职后，他受聘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1986 年，他就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人文科学教授。同时，他担任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欧洲高等研究院等校的客座教授。由于德里达的哲学成就，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埃塞克斯大学、鲁汶大学等均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除此之外，他还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且获得了 2001 年法兰克福大学的阿多诺奖。

德里达是一位多产的哲学家，一生的著作和文章多达几百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1967)、《写作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1967)、《书写语言学》(*De la grammatologie*, 1967)、《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1972)、《撒播》(*La dissémination*, 1972)、《绘画中的真理》(*La Vérité en peinture*, 1978)、《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 1993)、《友谊政治学》(*Politiques de l'amitié*, 1994)等。

(二)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以解构主义者著称，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就是消除和分解结构。这里的"结构"实质上是指西方文化之"根"，即"逻各斯中心主义"。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这些隐喻或转喻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确定为"在场"。它将证明，所有这些与根本法则、原则或中心相联系的名称都提示着某种不变的存在。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在场的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论的结合体，它意味着语言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和存在。传统哲学总是将存在规定为在场，寻求确定的基础和第一因。而语音中心论则是指一种把语音或言语作为语言之本质的语言观，它认为鲜活的言语比不在场的文字能更好地表达思想。

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马克思及其部分文本进行了解构性的阅读，提出了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的幽灵

"幽灵"是德里达建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说。德里达在谈到《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时说：

> 这本书首先是对我长期以来关注的幽灵性这个范畴的反思。人们在我的早期研究中也可能接触到这样的思考。幽灵不仅仅是灵魂、鬼魂，回过来不合时宜地召唤我们继承遗产的东西，而且还是非死非生、非真非假、把鬼魂的维度重新引入政治的东西，它还帮助我们理解现时公众空间、媒介、交流等等的结构。这是我的论著的一个主要动机之一。这个幽灵性的范畴在书中多处可见，因此是这部论著的一条主线。①

幽灵的根本特征就是它的不在场的在场，因此可以说，幽灵既在又不

① [法]德里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转引自张一兵《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载《理论探讨》2005年第5期，第38页。

在，非生非死、非真非假，既可见又不可见。德里达说：

> 正如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而我们下面也将谈到的，那幽灵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正在形成的肉体，是精神的某种现象和肉身的形式。它宁愿成为某个难以命名的“东西”：既不是灵魂，也不是肉体，同时又亦此亦彼。因为正是肉身和现象性方能使精神以幽灵的形式显形，但它却又在显形中，在那亡魂出现或那幽灵回来的时候消失无踪。在其本身作为死人重现的显形中，有某个东西消失了，死去了。那精神，那幽灵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强调这个差异；但是就它们又有共同之处而言，人们并不知道那共同之处是什么，它在眼下是什么。它恰好就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某个东西，它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相应的名字和一个对应的本质。人们并不知道：这并非由于无知，而是因为这个非物体，这个非存在的存在，这个存在于彼处的缺席者或亡灵已不属于知识的范围，至少是不再属于人们认为他可以以知识和名称去认识它的范围。人们不知道它是活着还是死去。①

虽然幽灵不是一个血肉之躯，我们看不见它，它却时刻在注视着我们。

> 人们根本看不见这个东西的血肉之躯，它不是一个物。在它两次显形的期间，这个东西是人所瞧不见的；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也同样瞧不见。然而，这个东西却在注视着我们，即便是它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它能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它。在此，一种幽灵的不对称性干扰了所有的镜像。它消解共时化，它令我们想起时间的错位。我们将此称之为面甲效果：我们看不见是谁在注视我们。②

这种不在场的幽灵不是单纯地注视着我们，这种“看”是一种本体论的看：借由这种本体论之看，他者永远在“为我们制定法律、向我们发出指令”。幽灵并不远在天边，它就在我们的身前身后徘徊，它即将到来。德里达说：“在历史终结之后，那灵魂是通过归来（亡魂的归来）到来的，它既能赋予一个归来的死人以外形，又能赋予一个被期待着在一次又一次的返回中重复自身的鬼魂以外形。”③德里达一再强调幽灵在本质上就是将来，它总归会到来；人们虽然无法控制它的到来和归去，但它总是通过归来开始的。

作为一种将要到来的东西，幽灵表现为一种正在来临的威胁，“它在

---

①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 页。

②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 页。

③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 页。



将来必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去祛除不幸”①。德里达认为，我们不可能排除马克思的幽灵的干扰：

在提出“马克思的幽灵们”这个题目时，我最初考虑过某种徘徊不去的思想情感的所有各种形式，这种思想情感，在我看来，似乎对今天的话语发挥了主导的影响。值此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②

因此，我们不可能中立地研究马克思：

既然马克思已经过世，尤其是既然马克思主义似乎正在迅速解体——有些人似乎想说——我们将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干扰，而且因此也不受马克思本人，亦即一个还在不停地言说的鬼魂的干扰，去关注马克思。我们将平和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对待他：依照学术规则，在大学，在图书馆，在学术讨论会上！我们将系统地研究他，遵守阐释学、语文学、哲学的注释规范。③

不仅如此，幽灵的功能还在于它对现实存在的质疑。德里达说：“如果说真有所谓的幽灵性的东西存在，也就有种种理由至少质疑这一确定的诸种现在的秩序，尤其是在现在、实际的或现有的现实性的现在。”④这种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有助于我们运用幽灵说来分析当代社会，比如分析当代的技术：

“幽灵性”的概念，今天似乎成为理解比方说技术、交流变革方法（电视、网络、电话、手机等）的东西，它接受物理空间和向地空间。“幽灵性”的概念对于分析我们时代的这些技术、这些新技术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幽灵”意味着不是真实的，又不是想像物，他既不是生者，也不是死者。他制造传播、印迹、技术的形象。⑤

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的幽灵是复数形式，即不是一个马克思的幽灵，而是多个马克思的幽灵。他说：

马克思的幽灵们。这里为什么是复数？它们有很多个吗？Plusd’un（很多个/不止一个）：这意味着可能有一撮，尽管不是一伙、一帮或一个社会，要不然就是一群与人或不与人共处的鬼魂，或某个

①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5 页。
②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3 页。
③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6 页。
④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3 页。
⑤ [法]德里达：《德里达中国演讲集》，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8 页。

> 有或没有头领的社团——而且是完完全全散居各处的一小撮。绝对不可能聚集在一起。进而，如果那帮幽灵一直是从一种精神获得生命的话，人们就会思忖有谁敢谈论一种马克思的精神，或者更严肃地说，谈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今天，我们不仅是为了给他们预言一个未来，而且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多样性，或者更严肃地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异质性。①

这就是说，在德里达看来，不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而是有多种马克思主义，而且这些马克思主义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马克思的幽灵们一直是从一种精神中获得生命，这种精神就是马克思的精神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2. 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德里达的幽灵学旨在辩护马克思主义，解决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德里达说："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②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后，随着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似乎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胜利，社会主义已至穷途末路。资产阶级的右派提出了"马克思之死"的命题，声称马克思主义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社会主义已经终结。特别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 1992 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认为，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德里达说：

> 当今世界上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抑或毋宁说是正在走向统治地位的过程之中的话语，它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的话语，关于马克思主义(这多半与前者不是一回事)的话语，关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话语，关于由马克思主义所启发的革命模式或多或少的缓慢瓦解的话语，关于社会——它们企图使我们目前将要呼唤的东西付诸实现，再一次引用《共产党宣言》，"古老的欧洲"——的迅速、仓惶、不断地解体的话语，如此等等。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经常带有狂热、兴奋和蛊惑人心的形式，弗洛伊德将其归因于所谓哀悼活动中的欢庆场面。咒语不断地自我重复并且变成了仪式，它喋喋不休而成了套话，就像万物有灵论者的魔术一样。配合着流畅的进

①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 页。
②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 页。



行曲节奏,它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 ①

在德里达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现在重新提出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说:

"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其实是一个重复已久的话题的回声。但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的确已是一个摆在和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面前的问题了。同样的问题已经被提出过了。固然是同一个问题,但提问的方式完全不同。②

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这个时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就是全球科技化的世纪,是地缘政治有效的离心化的世纪,是人类在其本体论暨神学的同一性或其遗传特性中真正离心化的世纪,也是"我思故我在"——以及作为其两难的自恋概念本身离心化的世纪。③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里达撰写了《马克思的幽灵》一书:

对我来讲,正是马克思的终结、马克思之死以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终结的问题上,应该重新解释那时发生的、特别是在西方世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所引出的结果。④

我试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得出某些结论来。⑤

德里达给予马克思以高度的评价,他说,马克思在我们的心目中几乎就是一个慈父般的形象,我们今天不能没有马克思:

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当教条的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国家、政党、党支部、工会和作为理论产物的其他方面)全都处在消失的过程中

①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5—76 页。
②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23 页。
③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0 页。
④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6 页。
⑤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1 页。

时，我们便不再有任何理由，其实只是借口，可以为逃脱这种责任辩解。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①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不管我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我们全部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我们所共享的文化在一种不可估量的深度上仍然保留着这一遗产的标记，不论是以直接可见的方式还是以不可见的方式。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既不需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需要征得马克思本人的同意。

在他看来，我们今天继承这一遗产义不容辞：

人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接受它的最有"活力"的部分，这也就是说，自相矛盾地，继续将生命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或是鬼魂的问题、超越于生死对立的生—死问题等等，还原到画板上。这一遗产必须通过尽其所需地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而被重申。这样一种重申既应当忠实于那些与马克思的要求——让我们再一次在其指令的精神的意义上说——相符合的东西，又要与一般意义上的遗产概念符合一致。遗产从来不是一种给予，它向来是一项使命。正如我们无可置疑地是马克思的继承人那样，甚至在我们愿意或是拒绝做他的继承人之前，这项使命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而且与所有的继承人一样，我们都在为之哀悼。尤其是我们哀悼的对象就是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②

在德里达看来，不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始终是客观存在的。那些公开反对马克思的人，事实上他们也离不开马克思的精神，受到马克思精神的纠缠。德里达指出，当前西方社会之所以如此过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因为他们害怕马克思主义，他们想借某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时"来"驱魔"。因为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已搅得西方社会不得安宁，使许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恨不得想借此能把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棒子打死，立刻开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证书，好让它永远消失于历史舞台。"驱魔法以各种各样非理性的、运用魔术的、神秘的方

①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 页。
②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8—79 页。



式，甚至神秘化的实践来驱除那恶魔。……驱魔法在于以一种念咒的模式反复说那死者的确已死去”，“灵验的驱魔法故作姿态地宣告那死亡仅仅是为了造成死亡”①。

既然马克思的精神是时代需要的精神，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的精神呢？德里达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的精神与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区别开来，必须从马克思文本的内部去寻找其精神实质。他说：

> 我们总是想一下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看起来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同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的，以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或作为方法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而且同作为被纳入政党、国家或是工人国际的机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②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精神实质呢？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批判精神。他说：

> 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这样一种自觉自愿的批判必然是根深蒂固的，它内在于一种还不是批判性的土壤中，即使不是，或者说还不是前批判的。③

三、詹姆逊

(一)詹姆逊的生平和著述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是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理论家，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詹姆逊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学习法语和德语。1954年毕业后到欧洲求学，在法国和德国多所著名学校学习，受到了大陆哲学和文化的熏陶。回国后进入耶鲁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1934－)

①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②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③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位。20 世纪 60 年代，詹姆逊相继在哈佛大学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任讲师和助理教授。1969 年，他与加州大学的一些学生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小组”。1971 年，他升任加州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1976 年，他转任耶鲁大学法语系教授。自 1983 年之后，他一直为杜克大学威廉·莱恩讲座教授，并担任文学系主任、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兼任学术刊物《南大西洋季刊》主编。

虽然詹姆逊一直担任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的教职，他的研究领域却并不仅限于此。他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从西方文化和文学研究到哲学，论题涉及建筑、科幻小说、电影、先锋派艺术、政治、经济、马克思主义、现代和后现代等。2008 年，詹姆逊荣获第五届挪威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该奖旨在表彰他在文学研究、文化理论、诠释学、后现代理论、美学、影视研究和历史学等方面的贡献。该奖每年授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法学和神学等领域的杰出学者，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克莉斯多娃(Julia Kristeva)、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政治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Myles Dworkin)和科学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都是该奖得主。

詹姆逊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的思想的，萨特的思想对他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塑造了他思想中的一些要素：哲学、文学、马克思主义。同时，卢卡奇、布洛赫、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人也在詹姆逊的思想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和萨特一样都把文化批评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成分。他们的立场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后者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

詹姆逊的主要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 1971)、《语言的牢笼》(*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1972)、《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1981)、《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文，1987)、《理论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2*vol.*, 1988)、《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 1990)、《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91)、《地理政治美学》(*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1992)、《时间的种子》(*The Seeds of Time*, 1994)、《布莱希特和方法》(*Brecht and Method*, 1998)、《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 1998)、《单一的现代性》(*A Singular Modernity*, 2002)、《未来的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2005)、《现代主义文集》(*The Modernist Papers*, 2007)、《辩证法的暴力》(*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2009)、《黑格尔的变奏》(*The Hegel Variations*, 2010)、《表现〈资本论〉》(*Representing 'Capital'*, 2011)等。

(二)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

虽然许多人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詹姆逊却将两者结合了起来:

>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往往感到这是一种罕见的或悖论的结合,是缺乏稳固基础的,以致有些人认为,当我现在"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时,必须不再做任何含义(即用其他一些传统字眼)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就是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不仅始终致力于批判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且还吸收了它们的贡献,以此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②。研究詹姆逊的专家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就说,"如果我们想要弄明白詹姆逊的重要性、他对文学—文化研究的影响,那么我们需要同时记住两个基本层面: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③

1. 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观

詹姆逊曾多次撰文详细阐释了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观。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詹姆逊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哲学,但它根本不是一种哲学,它的自我定位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最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论证,即不是把它等同于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作是对特定的复杂问题的表述,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问题的能力。

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经写成就可以束之高阁的东西,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现实的优先地位,把理论看成是一种对现实生活反映与揭示的过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必须坚持总体性原则与辩证研究方法,从事物发展整体过程与内在矛盾中去把握事物,把事物发展看成是一个既连续又间断的过程,从而最终形成一种既连贯又不连贯的理论叙事。

---

① [美]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载《詹姆逊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②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③ Adam Roberts, *Fredric Jameson*, Routledge, 2000, p. 1.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科学。

詹姆逊指出：

>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一方面，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某种无形状的内在消解，而是相对说来合法的和常规的消解，至少易于在事后进行理论概括。例如，对于任何既定的资本主义时期来说，它所控制的空间都将逐渐商品化。因此，这种危机是体系性的。①

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的最有弹性、最具适应性的一种生产方式，它曾借此多次克服循环性的危机。资本主义借以克服危机的策略有两种：一是制度的扩张，二是全新商品的生产。就制度的扩张来说，资本主义制度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性质决定了它要不断开辟新的市场，而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又决定了它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开辟世界市场的方式有所不同，资本主义总能根据不同历史的具体条件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形式与方式。自由资本主义依靠民族市场得以发展，帝国主义依靠世界殖民体系得以发展，而晚期资本主义则依靠"全球化"得以发展。詹姆逊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日益明显，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那些原已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重新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体系，资本渗透幅度增大，市场范围空前扩展。正是这些原因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就全新商品的生产来说，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克服制度危机的内在要求，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不仅可以生产出新的商品，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增强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还可以成为拓展市场空间最有效的工具。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技术革新才得以形成与巩固的。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生结构性转变时期的产物。

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所以每当这个研究对象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会发生危机，旧的范式被新的范式取代。詹姆逊说：

> 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经历结构性变态的时期。第

① [美]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3 页。

一代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化或现代主义时期。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从第一阶段(国内资本主义)转向第二阶段(现代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的一种反应。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出现于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让位于后现代阶段之际。①

在詹姆逊那里,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实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后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两代: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一代和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

不同时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因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不同而不同。

正像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反映了源于古典资本主义组织化或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一样,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变迁中找到根据:源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民主化"和体现在将大众空间扩张成为世界性的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从属性地位,这种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已经麻木了国内的劳工运动。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②

而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重点也因它们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命运而不同。

例如,它们可能会辩称,阶级性质的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它已让位于"后资本主义"。马克思所列举的各种特征在这种"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再存在。其次,有人还试图捍卫这样一种观点:类似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虽还存在,但由于某些原因已经变得更加美好,更加适合于人民的意愿和集体的需要,所以毋需对其作彻底的体制性变革,更不必说革命。这也正是残存的各种社会民主运动的立场。最后,有人可能主张,资本主义的确还存在,但其创造财富和矫正错误的能力被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低估了;从目前看,资本主义是通向现代化和普遍改良的唯一看得见的道路。这是市场论者的观点,它似乎还压倒了前两种主张。③

---

①② [美]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2 页。

③ [美]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0—71 页。

詹姆逊自己则属于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反对与自身对立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①

2.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旨在将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背景之中，通过研究后现代文化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提出和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那么，什么是詹姆逊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呢？

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实际上来自于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一书。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开拓。詹姆逊说：

第一个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接着的第二个阶段是帝国主义下的垄断式资本主义，最后才到我们所身处的第三个阶段，有人称之为后工业阶段，我觉得那并不准确，我以为我们或可更客观地称现阶段的社会为"跨国资本主义"。我曾经指出过，曼德尔对后工业社会的介入以及跨国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论述，其实并未偏离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分析。曼德尔以为今天的消费社会才算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彻底的形式。在此，资本的扩充已达惊人的地步，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许多多前此未曾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简言之，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才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纯粹的形式。②

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是个很庞杂的概念，它是对后工业化、充分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积累和消费方式的总概括。晚期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力量扩展到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领域，渗透到了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领域，也渗透到了无意识本身之中。

詹姆逊正是根据曼德尔的资本主义分期，提出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

① [美]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②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页。



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分期。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每一发展阶段都对应着一种文化风格。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风格。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不仅包括无孔不入的市场机制，而且也包括日新月异的大众媒体，以及日益普遍的后乌托邦式日常生活和反英雄主义情结。

詹姆逊认为，正是这一划分使得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成为可能，由此，后现代主义可被理解为是对第三阶段文化生产的特殊逻辑理论化的尝试，而不是另一种脱离现实的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批评或精神诊断。

詹姆逊在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受着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是，詹姆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并没有独立自主性。詹姆逊将后现代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视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产物。

在詹姆逊看来，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现代主义转向了后现代主义。他指出，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现代主义已存在了近百年的时间，其巅峰时期的成就表现在诸多方面，如绘画上的抽象派和表现主义、哲学上的存在主义、小说史上把握再现形式的最后经典、电影史上标榜作者风格论的大师系列、诗歌史上奉史蒂芬斯为权威典范的现代诗派等。现代主义到达巅峰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而后现代主义正是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现代主义消退和破产的结果。简言之，无论是从美学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①。

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

> 我们必须视"后现代主义"为文化的主导形式，我们的历史分期观才能有出路。我认为，只有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质。有了"文化主导"这个论述观念，我们才可以把一连串非主导的、从属的、有异于主流的文化面貌聚合起来，从而在一个更能兼容并收的架构里讨论问题。②

虽然后现代主义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唯一文化，但它好比一个偌大的张力磁场，吸引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构成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

①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421 页。

②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427 页。

中枢。

按照詹姆逊的看法，后现代主义代表了大量的文化变迁：高雅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的坚固界限已告瓦解；现代主义的作品已经完全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几乎完全被商品化，丧失了批判和颠覆功能；由于主体已彻底破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复存在；颓废的现在主义抹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使人们不再能感觉到一个具有不同意义的未来。詹姆逊试图抵制现在主义，恢复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他分析了主体的精神分裂式的崩溃以及资产阶级对无意识的殖民化；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形象和类象文化，投射出广大无边的超现实；他强调后现代文化的片断性；他指出了后现代空间的无法图绘性。①

鉴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确定的后现代空间最终成功地削弱了个人躯体的定位能力，使他无法借助感知来组织周围环境，无法在一个原本可以图绘的外在世界中理智地标定自身的位置，所以詹姆逊提倡一种能够使个体图绘出他在社会和世界中的位置的空间政治。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图绘"，在批判距离已经被完全摧毁的后现代文化中，认知图绘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有可能实现的激进文化政治形式。詹姆逊认为，认知图绘并不是在古典意义上再现世界，而是根据历史框架来转译世界。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完美地掌握世界，但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可以图绘的外在世界中，通过认知图绘来获得关于社会现实的有意义的知识。一旦我们在美学和理论上完成了对世界的图绘，我们就能够发明激进的文化政治策略。

本章小结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思潮，是在后现代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和重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解构与建构并举，激进的社会政治倾向。在拉克劳和墨菲的推动之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界的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潮。拉克劳和墨菲沿着激进的多元民主路线，将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政治理论的建构和对政治实践的反思。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马克思及其部分文本进行了解构性

① 参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



的阅读，提出了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辩护。詹姆逊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旨在将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背景之中，通过研究后现代文化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思考题

1. 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2. 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3. 如何理解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概念？
4. 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什么样的政治学说？
5. 如何理解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
6. 德里达是怎样辩护马克思主义的？
7. 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观是什么？
8. 为什么说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阅读书目

1. 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

2.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3.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詹姆逊文集》(第 1—4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5.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6.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九章　市场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要点提示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市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

第一节　市场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述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它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由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首次系统地加以表述。在 50 年代到 80 年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被苏联东欧的经济学家进一步阐发并发展为这些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80 年代初，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在探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问题时，开始关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提出了一些力求适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解体后，左翼学者反思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进而主张市场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方案。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了一股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90 年代后，



这一思潮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英左翼学者中仍很有影响。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产生

人们通常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例如，加尔布雷恩(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波兰和南斯拉夫旅行》(*Journey to Poland and Yugoslavia*，1958)、沃德(B. Ward)的《伊利里亚的企业：市场辛迪加主义》("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1958)以及美国学者A.伯格森(Abram Bergson)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67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题为《市场社会主义再考察》("Market socialism revisited"，1967)的文章。上述文献都直接或间接地使用了"市场社会主义"概念。① 自市场社会主义概念出现以后，国外学者虽然经常使用这一概念，但在使用中往往赋予其不同的含义。

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格雷戈里和斯图雷特给出的界定是："生产要素的公共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②

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③。美国的林德布洛姆(Charles Edward Lindblom)把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消费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以及以公有企业为基础的计划者主权的经济制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1987)对市场社会主义则做了这样的解释："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④

由此可见，国外学者一般都把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一种既不同于以

① 参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赵海月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② [美]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林志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页。

③ [英]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④ 转引自余文烈：《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第68页。

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和把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

(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50年代的理论确立阶段。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诞生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问题引起了世人关注。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了一场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大论战。论战的主题是:中央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存在是否可能?论战的一方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为代表;另一方以当时旅美的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断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合理经济计算。针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观点,兰格在其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经济计算、合理分配资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兰格认为,根据"试错法",利用价格机制的计划手段,在只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前提下,解决生产资料价格问题,通过模拟市场求解线性方程组确定物价等一系列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兰格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中要自觉地应用"试错法",这比资本主义完全竞争的市场更富有效率:"因为中央计划局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能够有的知识宽广得多,并且因此比竞争市场可以用一个短得多的、系列的、相继的试验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①

此次论战的结果产生了"兰格模式"(Lange Model)的市场社会主义。根据"兰格模式"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论证,就其运行方式而言,"兰格模式"是一种主要运用价格调节手段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兰格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中,经济发展的计划和社会主义部门的日常管理必然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秩序和资源分配是由行政命令决定的,引导工人工作的动力是道德、政治引导、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意识等。他批判地指出,这种体制的长期存在会造成资源浪费、阻碍技术进步、官僚主义、生产和群众消费脱节等弊病。因而,应实行"积极计划"来规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向,除了行政方法以外,还要用经济手段来引导人民做计划

① [波]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规定的事。计划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价格体系之上，即根据由供求决定、达到均衡的市场价格与在生产成本之上加上供社会积累和集体消费的利润而形成的正常价格之间的差额，不断调整计划，通过计划使两者趋于一致，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益的最优状态。兰格还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不能来自任何行政命令，应当基于本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在自己的经济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

这一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以哈耶克为首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兰格模式”有着以下弊端：第一，缺少动力机制，企业的管理者是被动的；第二，缺少生产资料市场，只有消费品市场，这种市场机制很难发挥其功能；第三，没有跳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框架，即公有制和计划模拟市场的二元机制；第四，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是反映中央计划者的意志，并不能反映消费者的意愿；第五，中央计划者根据全部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情况决定均衡价格，因此必须掌握全面的市场商品流通过程的相关信息。然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全面地掌握实际市场上的信息，并以此调整价格。

尽管如此，“兰格模式”却在理论上表明了市场与社会主义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市场机制不仅能够和私有制分离，而且还具有相对独立性。“兰格模式”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的最早理论尝试，它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微观经济学巧妙地结合起来，确认了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重大意义，对市场与社会主义能否结合和怎样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论证，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兰格的市场与公有制兼容、计划与市场并存以及效率与平等相一致的思想，不但被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所继承，而且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和改革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①] 正因为如此，“兰格模式”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理论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研究是伴随着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进行的。二战后，社会主义实践从苏联一国扩展到多国，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

① 王金凤、赵海月：《市场社会主义的结构演进及理论述评》，载《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10期，第393页。



济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摆脱困境，谋求社会主义发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这一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是随着这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国家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既不愿意抛弃计划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又力图利用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而出现了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Decentralized Model)"的市场社会主义。当时著名的模式有波兰的布鲁斯(W. Brus)"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c)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模式，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Alec Nove)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这些理论模式通过揭露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强调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此来论证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的必要性。这就为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而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氛围。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演进的交互作用中，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的东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是，与"兰格模式"一样，"分权模式"也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利用市场，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没有摆脱计划一市场的二元模式，在计划与市场如何运用上，往往顾此失彼，如南斯拉夫、匈牙利两国都承认"尚处于计划与市场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两不像'状态"。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如何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分权模式"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即在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结合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它并没有找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方案。

第三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理论超越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显示出超越以往市场社会主义的特征。无论是"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都是以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为前提的，市场机制仅仅是计划经济的附属品。因而，在这些模式中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可言。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充分肯定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市场经济能够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它承认市场经济是资



本主义的必备特征，但肯定资本主义绝非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特性。"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开理解，即尽管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是极为可能的。"①

在这一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长期以来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下对市场与计划二元机制如何结合问题上的理论困境，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明确区别开来，并通过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把效率和平等、民主、自由结合起来，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思路。②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把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结合、资本主义市场通过改造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等观念作为其理论前提，把论证的重点转入从更加微观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市场与社会主义如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如何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进步的问题，力图把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实践。③

总的来说，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运行和进行改革的背景下确立的，其所主张和论证的是：计划能够模拟市场，计划与真实市场的结合能够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内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则是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确立的，它所探讨、论证的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可以作为中性机制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它从微观经济运行层面探索改造资本主义市场的具体方案，以此建构出理想社会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

二、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把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具体说来，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把资源配置形式与社会制度分离开来，即把计划机制或市场机

① ［英］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 页。

② 王金凤、赵海月：《市场社会主义的结构演进及理论述评》，载《商场现代化》2008 年第 10 期，第 394 页。

③ 何小勇：《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逻辑进程》，《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7 年第 3 期，第 36 页。

制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分离开来。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源配置形式，无论是计划机制还是市场机制，都是与社会制度的性质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制度的本质表现之一。因此，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表现，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在古典的西方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运行，因此，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同时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一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古典的西方经济学，它认为市场与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无关，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可以搞计划经济。

第二，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牛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柯亨（G. A. Cohen）论述道："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与不拥有资本的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阶级。"①

当然，不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公有制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公有制说成是社会所有制，有的把公有制说成是为各个企业的劳动者共同所有的集体所有制，还有的把公有制说成是全民的股份制。

第三，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被人们称为市场社会主义。不过，对在多大范围、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以及采取哪种形式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这些问题上，不同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或同一时期不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又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节　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罗默在市场社会主义方面的代表作是 1994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A Future for*

① ［英］科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第 25 页。



Socialism)。

在罗默看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当今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根源，就是私有财产制度。因此，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应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苏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否定。或者说，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形式，因为公有制可以保证社会公正，而市场经济可以维持经济效率。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他提出了“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Bank—centric Market Socialism)”模式。

(一)罗默对“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证

1. 社会主义是一种平等主义，国家所有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必要的。

首先，社会主义是一种平等主义。罗默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财产关系的实施。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社会主义者评价财产关系必须根据这些财产关系提供平等主义的能力。”①

在罗默看来，社会主义者需要的是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政治影响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的机会平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应是在这三个方面实现了机会平等的社会。所谓机会平等，就是要求对那些由于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引起不利条件的人给予补偿，因为这些不利条件不是由这些人自身造成的，而是由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只有那些生产财富的人才有正当权利得到财富。而罗默认为，社会主义者要求的是每一个人都应得到财富。因此，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论据是一种平等主义。

其次，国家所有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必要的。既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平等，那么对所有制形式的选择就完全是一个手段问题。因此，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 在对待财产关系的态度上，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折中主义者：可能有许多所有制形式比传统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形式更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目标。②
>
> 种类繁多的财产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变得随处可见：非盈利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企业、独资企业、公有企业、社会一民主财产、劳动管理企业，以及社会共合

---

① [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3－114 页。

② [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 页。

体财产的其他形式。最能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财产形式，可能只是淡淡地涉及生产资料的直接民众控制或国家控制。[①]

可见，罗默所讲的国家所有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必要的，只是就苏联模式的国家所有制而言，而不是说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必要的。

2. 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可以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目的。

首先，市场体制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无关。市场体制只与效率相关，而社会主义只与平等相关。这也就是说，市场体制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无关，它既可以同资本主义结合，也可以同社会主义结合。罗默从新的角度做了论证。他指出，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由于产生竞争的市场机制。

我们确实有几个例子——现代企业以及或许有中国的乡镇企业——使我们开始理解，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以前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归因于私有财产无限积聚的权利，事实上可能归因于竞争和市场。[②]

这也就是说，市场的作用与资本主义的作用是两回事。另一方面，苏联的失败不应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应归因于取消了市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经济福利的增长过多地依赖经济革新的能力，即采取新技术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苏联型经济令人沮丧地失灵了。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市场提供的竞争——国内的和国际的——企业就没有进行革新的压力，而没有竞争的动力，革新就不会发生，至少达不到市场经济引发的那种速度”[③]。所以，苏联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没有实行市场经济。

其次，只有市场体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为其公民提供差不多同资本主义一样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社会将是不稳定的。而除了市场体制以外，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体制能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能否设计出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技术革新将会产生，而资本主义特有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将不会发展，这样的体制只能是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市场体制解决效率问题，社会主义解决平等问题，市场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加平等。

---

① [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

② [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4 页。

③ [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 页。



当然，罗默并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他所说的那种平等。但他认为，尽管市场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作为社会主义长远目标的平等，但它是唯一能够逐步接近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经济体制。

（二）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罗默对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做了如下界定：

>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我指的是大多数物品包括劳动通过价格系统来分配，企业（不管是否由工人管理）利润在居民中非常公平地进行分配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安排。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机制才能实现利润的这种分配，同时又不至于在效率方面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①

为了论证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罗默设计了一种被人们称为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每一成年公民均拥有一份国有公司的股票、有价证券。国家的所有公司的全部股票都被重新分配，以便从一开始就给每一成年公民一份按人头计算的股份、一份股票的有价证券，使他们有权获得一份其持有股票的公司的红利。当公民死后，这些股票要退还给国家。这些股票可以进行交易，但不可出售以换取现金。这样富人就不可能通过购买穷人的股票而取得对经济利益的控制。国家应设立两种货币，即现金货币和证券货币。现金货币只能用于日常商品买卖，证券货币则只能用于购买企业股票。第二，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化的。这些银行从私人储蓄者那里集聚资金，并向企业发放贷款，其运营的原则与资本主义银行没有什么区别。第三，公司董事会是企业工人和股票持有者的代表。公司的经理不是由国家而是由董事会决定的，后者由公司借以获得资金的主要银行的代表构成，他们是企业工人的代表，也是股票持有者的代表。第四，政府保证和调节投资。政府保证有重大意义的投资计划，运用不同的利率去鼓励或阻止某些特殊的投资。第五，允许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即使是由个人创办的企业，但这种企业一旦达到一定规模，或一旦企业的创办者去世，就得实行国有化（予以赔偿的），它的那些股份要被重新分配给一般大众。

（三）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和局限

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

① 转引自《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9 页。

它使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基本矛盾得到了解决。在这样的经济中，企业是在市场的环境中相互竞争(包括与外国企业)，这样一来，信息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模式不存在集权主义倾向，因为不存在所有企业都依赖的中央计划机构；企业革新问题从两个方面得以解决：一方面，竞争迫使公有的企业注意开发和填补新产品和新技术；另一方面，经济中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一席之地。

第二，解决了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大幅度缩减了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获得的收入，经济上不平等明显地减少。全体公民大体上平等地享有社会的集体财产，因而也大体上平等享有来自生产剩余的所有利益。由公民交易其股票而出现的对财产的所有的不平等，不允许超出一个人的有生之年而遗传到下一代，它们不能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地积累和集中。这就有利于解决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市场在做出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投资决定方面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投资有很多无法用市场很好管理的外部影响(它的一个消极的例子是污染)。这一模式强调政府对投资计划的干预，有利于解决投资上的不合理问题。

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该模式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而忽视了其他要素，缺少理论指导，没有群众基础，不能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仅仅把公有制作为实现公平的手段，没有当成基本经济制度，所以该模式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相对公平，不可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而且，该模式规定公民死后全部证券交归公有，这将会对不同年龄层的公民的投资行为和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复杂的影响，造成一定程度的市场扭曲。最为重要的是，该模式“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劳资供求关系，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结构，并且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决策结构、劳资雇佣关系以及运行目标”①，这决定了“证券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无论逻辑上多么完善，理论和实践中却难逃市场资本主义的“覆辙”。究其实质，该模式无非是一种资本主义改良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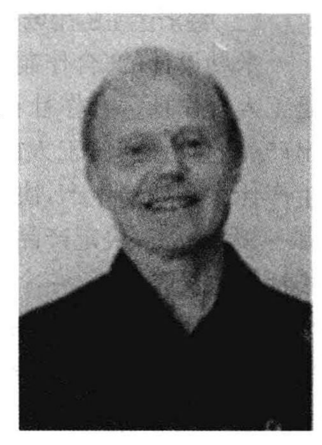
二、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是英国牛津大学纽菲尔德学院社会学和政

① 吴宇晖:《市场社会主义——世纪之交的回眸》，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8 页。



治学教授，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戴维・米勒(1946—)

米勒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论述包括：他与埃斯特林(S. Estrin)合写的《市场社会主义：一种社会主义政策》(“Market Socialism: A Policy for Socialists”, 1986)、《市场中的剥削》(“Exploitation in the Market”, 1987)、《市场、国家和社会：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1989)、《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构想》(“A Vision of Marked Socialism”, 1991)、《平等和市场社会主义》(“Equality and Market Socialism”,1993)等。在这些论著中，米勒提出了一种被人称为“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

(一)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并非是专属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机制，对此，米勒做了清楚的表达：

> 资本主义依赖的是市场，但资本主义的特点主要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而其余大多数人只能作为领薪者被他们雇佣。人们完全可能既造成市场又反对资本主义，左派若跳不出人云亦云的框框，看不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该受责备的就只能是他们自己。①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虽然依赖市场，资本主义的特征却不是市场。市场只是一种经济手段，人们完全可能创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市场。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需要市场呢？米勒认为，市场可以促进更大的民主、可以使生产更有效率、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他指出，在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中，市场必定会起很大的作用，市场社会主义既不简单地肯定市场，也不简单地否定市场。他提出市场社会主义至少要实现这样四个目标：在生产中运用市场机制以获得经济效益；限制国家的作用使民主切实可行；实现初次分配的更大的平等；保护工人的自治。米勒称自己设计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要证明市场社会主义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同时又把“市场的效率长处与社会主义的人

① [英]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 页。



道的和平等的目标结合起来”①。

(二)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米勒设计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企业是工人合作社。合作社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出售它的产品,并以它们卖出产品的收入支付工人的工资。合作社实行工人民主管理,它自行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决定收入如何在其工人中分配,决定用多少资金在哪一领域投资,决定产品的价格,以及有关其本身的其他一切事务。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工人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他的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合作社的生产资金最初来自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投资部门。这些公共投资部门掌握着社会拥有的资金,各企业可以从这些投资部门借贷资金进行经营。这些公共投资部门有权决定对哪些项目予以支持以及收取多少利息。

“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

第一,资本所有权社会化。消除资本所有权的私人收入是创造社会成员人人拥有起点平等的机会。企业以固定利率从投资机构有条件地借贷资金,对借贷资金有使用权,但没有完全的所有权。企业必须认真维护固定资产,资本不能被当做收入分掉,也不能重新贷给别的企业。②

第二,国家实施经济调节功能。在“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家将起重要作用。国家不直接计划经济产出,但它通过确定生产参数间接地调控经济,从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以保证经济服从广泛平等的目的。国家的作用包括调节资金、制定税收政策以调节收入分配、确定工人收入的最低标准、提供社会福利以满足公共需要等。

第三,“每个企业都由其内部工人进行民主控制”③。企业的每个工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企业要扩大规模和吸收新成员,必须征得企业全体工人的同意。企业可以自己确定内部的民主管理机构,如小型企业可以由全体工人参加的企业大会决策,大型企业可以设立复杂的决策机构,如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

第四,追求社会平等。米勒认为,社会平等等同于地位平等,即人们

① David Miller, “A Vision of Market Socialism: How It Might Work—And Its Problems”, in Frank Roosevelt and David Belkin (eds.), *Why Market Socialism: Voices From Dissent*. M. E. Sharpe Inc., 1994, p. 247.

② 蒲国良:《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9 页。

③ Davi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



在社会中拥有一个平等的起点和机会，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在“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收入不平等。但这反映了人们对经济活动所作贡献的大小，这种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当然，这种不平等不能发展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差异程度，不能危及社会平等。

（三）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及其局限

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该模式中，不是资本所有者对劳方的雇佣，而是劳方雇佣资方，生产资料成了劳方的一种工具而非主人。其次，权力分散在整个企业中，每个成员在形式上都具有平等的选举权，而且也具有参与管理职能的机会，工作时间和其他工作条件也可以按照工人的愿望加以调整。所有这些都能使人们对工作产生一种高度积极的态度，并对企业活动日益热衷。第三，该模式下的平等可以比资本家的企业更为平等，利润在劳动力中的分配要比在股东中分配更为分散。而且，尽管劳动者中仍存在着一些薪水差异，但这些差异通常要比一般资本家公司中的薪水差异小得多。[①]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这一模式改变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没有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企业能否保持旺盛的技术优势还不清楚。另外，让企业进入资金市场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与工人控制企业相互协调，这点也尚不清楚。

米勒提出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力求巩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他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一些价值目标的追求有时是盲目的和幻想的。他们追求对社会活动的自觉控制、民主、平等、自由和共同体的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关系。例如，对社会活动的自觉控制需要一个单一的控制中心，这就与社会主义者要求的广泛的民主发生冲突；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自由信念也与共同体的价值不相容，因为共同体的目标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普遍遵守的道德价值。其二，没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能够完全体现上述五种价值目标，并把它们摆到相同的位置。因此，倡导和认同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他们赋予民主、自由和效率等目标以优先地位时，他们同时必须放弃另一些价值目标的优先地位。而他之所以要提出“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要力图解决上述价值目标之间的冲

① ［英］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19 页。

突,寻求切实可行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途径。

三、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t,1942—)是芝加哥罗耀拉大学哲学教授,著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戴维·施韦卡特(1942—)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施韦卡特一直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1993年,他出版了一本标题为《反对资本主义》(*Against Capitalism*)的论著,在该书中,他阐明了存在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之后》(*After Capitalism*)一书中,他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施韦卡特认为,其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是缺乏民主(如罗默的模式和扬克的模式),或是缺乏效率(如米勒的模式),而“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①,它体现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出现的。施韦卡特理解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三个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一,绝大多数生产工具归私人所有,可以直接归个人,也可以通过公司这个媒介间接归个人所有;第二,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第三,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即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将他们的劳动能力卖给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原材料和工作场所的人。“要成为资本主义,一个社会必须具有三方面体制特征: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雇佣劳动。”②

因为对资本主义的特征有了充分认识,所以施韦卡特在设计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时就能规避资本主义的弊端。

施韦卡特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①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② [美]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陈志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他总结道：

> 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都同意这样四个观点：(1)市场不应被等同于资本主义。(2)中央计划作为一种经济机制有极大的缺陷。(3)不存在任何可以替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的、合乎要求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就是说，在短缺的情况下，市场是组织一种可行的经济的必不可少的(尽管不是完美的"机制")，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形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并且远比资本主义更可取。①

(二)"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在《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一文中，施韦卡特明确表达了"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和基本特征：

> 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这一制度的核心，以反对平均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工人的自我管理是经济民主模式的第一个明确的特征。使其与资本主义(以及与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第二个特征，是产生和分配新的投资资金的机制。②

具体地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内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工人的民主管理。工人对围绕设备操作的一切活动负责：工厂的组织和纪律、生产工艺、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净收益如何分配等。有关这些事务的决策是通过民主程序做出的，实行一人一票。对于大规模公司的决策则由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或总经理被授权做出某些决策。尽管是由工人管理工厂，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这些资料是社会的集体财产。工人可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但不能通过处置生产资料作为工人收入的补偿。如果一个企业身处困境，工人可以自由地进行重组，但他们不能自由地廉价出售他们的资本股份，资产的最终处理权属于社区。③

第二，日常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企业从其他公司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又把它们的产品卖给其他企业或消费者。一般情况下不实行价格调控，除在某些情况下诸如对垄断部门进行价格监督外，一切通过供求

① [美]伯特尔·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② [美]伯特尔·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③ [美]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关系裁决。“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市场失灵时允许政府干预，它没有将市场绝对化，而是倾向于把市场看作是达到某些社会目的的有用工具。企业的分配方式则由工人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在施韦卡特看来，重要的不是分配原则和具体分配标准，重要的是决策是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确立。所以，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分配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他们也许选择平均，或者他们可能决定给予更困难的任务以更高的酬劳。他们还可能发现，给予稀缺的技能以特殊的奖赏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以此来吸引和稳定他们所需要的人才。①

第三，新的投资是由社会所调控的。关于投资基金的产生，投资基金是通过民主协商的程序产生的，筹集资金不是通过提供利息吸引储户，而是通过征收资本税的方式。关于投资调控的范围，施韦卡特分析了三种情况：一是自发地从事有利可图的投资；二是虽以赚钱为目的，但其生产和消费都存在外在性，因而比它们的收益性所指示的更有益于社会的投资；三是同免费商品和服务相关的资本投资，如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后两类投资是需要计划调节的。关于投资基金调控的准则和功能：一是国家调控投资基金的准则是提升公共利益。施韦卡特指出，投资基金应该由国家融资制度按照可以提升公共利益的准则进行调配。在调配程序中要考虑市场因素，但市场因素不能超越其他一切因素。二是社会调控资金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促使各地区均衡发展。假如仅仅由市场标准来调控，那么资本必将不可避免地偏向资本相对丰富的地区流动，而其他地区则要付出代价。如果地区保持相对稳定，避免了大规模移民，那么，哪里有人就必须在哪里注入资本，而不能相反。地区间不能争抢资本，资本应该通过看得见的（国家负责的）手进行调配。②

> 总之，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可被视为有着三个基本结构的经济制度，这三个基本结构是：企业的工人自我管理、投资的社会控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确定的组成部分：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③

在《资本主义之后》一书中，施韦卡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又有了新

---

① ［美］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 页。

② ［美］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77 页。

③ ［美］伯特尔·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 页。



的发展。在他看来，经济民主有三个核心特征：其一，工人自己管理企业。关键性的企业业务决策，要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挑选工作的代表民主地做出。在工作决策上，每个工作场所必须坚持管理自治和民主影响之间的平衡。尽管企业及其资本的投入由社会集体拥有，但劳动力可以自由地追求分配给他们的利润。其二，经济民主保持市场机制对消费者和资本物品的开放，但市场机制并不延伸到劳动和投资市场。其三，投资的社会控制。和资本主义不同，所有投资基金并非由个人和他们的银行拥有和控制，而是由集体拥有和控制。个人允许从储蓄中获得收益，但不能拥有资本，不能因拥有财产而产生财富。投资基金产生于民主企业支付的资本税收，而企业则以此换取公共机构的资本投入。这些税收资金属于社会集体，并且由给企业分配投资基金的上市银行控制。公众投资决策的制定不仅基于投资回报，而且取决于各个项目创造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的能力。

在该书中，施韦卡特以简明的形式表明，经济民主能够更好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六个问题：(1)关于不平等，经济民主不会尝试、也不能消除不平等。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和工人将自由地形成不同的利润和收入；因其责任水平、经验、技能和对企业的忠诚等差异，企业中的工人存在着工资上的差异。而在民主企业中，工人的工资差距比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显著缩小。在经济民主中，消除储蓄收入或许是削减不平等的另一个推动力。(2)关于失业率，失业率的升级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国界的资本自由流动使旨在拉动内需和就业的国家凯恩斯主义扩张战略显得相形见绌。进口制度导致了政府开支缩减，失业破坏了经济和社会凝聚力。相比之下，经济民主可以通过对投资的社会控制，使投资决策能够建立在产生经济效益和扩大就业机会的项目的基础之上，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经济民主取代旨在刺激贸易的“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确保了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保持一种稳定、双赢的贸易关系。(3)关于工作过度，经济民主的政策将会合理地分散劳动力之间的工作时间，既为就业者减少工作的时间，也为寻找工作的人创造工作机会。民主的工作场所将为其成员提供更多的闲暇时间，从而减少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并减轻过度消费及其环境适应性上的后果、压力。(4)关于贫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而言，贫困是必不可少的。而经济民主以充分就业为目标，通过创造就业机会，让所有想工作的人能够摆脱贫穷。(5)关于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和政

治权力受超级富有的精英分子的摆布。他们以消除投资为威胁，操纵政府的意志；他们可以决定媒体的话语，以满足其需要。相比之下，经济民主要求民主建立在企业的经济基础之上，企业普遍地赋予工人以真正的表达其经济生活的权利。选举产生的政治机构、政治代表，将进一步分散到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深化到个别的功能性政治团体之中。(6)关于环境退化，资本主义对经济增长的永久渴望，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危机。资本主义依赖于经济增长，但它对更大的消费不断增长的需求，只会导致对环境的彻底破坏。经济民主有着类似资本主义的增长势头，但它是通过对社会投资的控制机制来控制消费，其投资集中于那些远离对环境造成损害并能实现绿色经济的商品生产。

(三)"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和局限

施韦卡特认为，他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从企业方面来看，由于实行集体所有制和工人的民主管理，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合作的组织，这种合作的性质保证了企业的效率。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投资机制考虑到了那种与市场要求相一致的计划，这种计划是优于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的。企业创新的问题也解决了，因为竞争的压力将迫使现存的企业与其领域内的技术发展同步前进。此外，工人在一个企业内将得到更多货币收入、缩短劳动时间或获得更好的劳动条件的可能性也为创新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激励机制。施韦卡特还详细论证了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方方面面都优于资本主义。首先，它更为平等，因为它消除了依靠财产获得的收入，消除了资本家。其次，它更为民主，因为它把民主向下延伸到工厂，向上延伸到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最后，它还充分克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具毁灭性的特征：资本的过度的流动性。

尽管施韦卡特全面分析了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该模式所具有的众多特点和优势，阐述了"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形式，但是，他所构想的模式中还存在着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工人管理的企业缺乏普遍的适应性，工厂民主与大工业生产管理权威的矛盾以及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等等。此外，施韦卡特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是和平的，向完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将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需要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作为诱因。这种试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前提下，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途径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四、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詹姆斯·A.扬克(James A. Yunker)是美国西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教授,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扬克就开始酝酿“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构架。多年来,他一直潜心地多方探究和系统建构其倡导的理论,并于1992年出版了《修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Market 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 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一书,在该书中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观点。在《资本主义和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一般性均衡评估》(*Capitalism versus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a General Equilibrium Evaluation*, 1993)、《经济正义:市场社会主义的视角》(*Economic Justice: the market socialist vision*, 1997)、《论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随笔与分析》(*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ket Socialism: essays and analyses*, 2001)等书中,对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扬克学术兴趣广泛,目前主要集中于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及世界政府的治理等问题的研究。

从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配不平等的弊端出发,扬克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比市场资本主义优越的经济制度。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主要是试图通过对生息资本进行社会化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其核心目标是在保持资本主义效率的同时,消除其分配方面的极端不平等。

(一)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

1.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优越性

扬克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大资本所有者获得大量生息资本收益权收入导致收入分配悬殊的不合理性,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这主要包括:

第一,资本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扬克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它一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分配,即生息资本收益权收入的非劳动所得,远远超过了资本家在经济过程中的贡献,而劳动者阶级和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没有获得与他们的贡献相当的收入。收入状况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世界上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可以享受着较高的生活水平。

第二,在政治民主问题上,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也优于资本主义。扬克认为,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如苏联)相比,民主的市场资本主义(如

美国)有着明显的优越性;而与现存的民主市场资本主义相比,民主市场社会主义则具有显著的优越性。民主市场资本主义优越于寡头计划社会主义,其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由于市场配置优于中央计划、民主政治优于寡头政治。而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优于民主市场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在有着民主、市场取向的共同前提下,社会主义对于市场的配置有利于更大社会范围内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改善,尽可能避免社会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

当然,扬克对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解显然不同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扬克指出,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容置疑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货真价实的类型,但是,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是非常严密和非常有限的,它与大多数流行的社会主义概念之间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本质上,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他解释道:

> 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在每一重要方面都完全模仿现存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它与市场资本主义的比较相似,来自于这样的重要考虑,即保留现存的令人满意的经济效率水平。它只实行最低程度的制度变革,以利于实现非挣得的所有权收入分配的平等化。①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兼顾经济正义和经济效率。在这一问题上,扬克实质上讨论了"经济需要"与"道德公正"的关系问题。扬克认为,"经济需要"与"道德公正"是不可分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种道德假设之上的。在《经济正义:市场社会主义的视角》一书中,针对我们能否得到经济正义和经济平等这一问题,他认为,根据当前大多数人的观点,"经济正义"并非指比美国和其他处于领先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平等、更公正的资产收益权收入(如股息、利息等),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永久存在的非劳动收入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性也是难以被全面接受的。显然,扬克密切关注非劳动收入之间以及非劳动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针对这种不平等,扬克积极倡导市场社会主义,因为它既要效率,也要平等。② 也就是说,它有利于改变资本主义的弊病,同时实现经济正义和经济效率。

---

① 引自余文烈、姜辉等:《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3 页。

② James A. Yunker, *Capitalism versus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 a General Equilibrium Evaluat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pp. 3—4.



2.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内容

扬克指出，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它与中央计划社会主义和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之处。扬克认为，无论是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它们既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目标，又追求很高程度的平等目标，因而它们追求较为激进程度和方式的社会改造。然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破坏了创造性和灵活性，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缺乏可以遵循的成功标准，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缺乏企业内部权力的必要集中，反而损害了经济效率。因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实用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与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更为相似，二是制度变革范围和程度尽量保持在最低。"与其他社会主义主张相反，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更强调平等而不是效率，这使其制度建议仅在微小程度上与现行社会状况相区别。"①

由此出发，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倡议从两个方面进行社会改造：第一，大规模的企业实行国家政府所有制（通过中介机构，主要是公共所有局）；第二，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所有权收益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分配给全体公民，这要按照劳动收入多少的比例，而不是按照拥有货币资本的多少。

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实行生产资本公有制，消除私人资本所有权收入。扬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谴责是：绝大部分资本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正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其理论倡导的核心是将资本的个人所有转化为公共所有，消除当代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企业中的个人所有财产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使将来的财产收入流动反映企业生产的非人力因素（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反映各式各样的社会成员对经济生产所作的独自贡献。② 具体讲，这个社会化改造的对象是个人所有的、能够给人们带来非劳动收入的投资资本，诸如股票、证券等。将这些资金转为公有，也就消灭了个人对资本所得收入的获取。社会化改造的范围包括联合股票、证券和政府债券，因为它们会带来非劳动挣得的收入。"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特别强调，应转为公有的是个人资本财富，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社会允许富人存在，人们可以储存大量财

① James A. Yunker, *Capitalism versus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a General Equilibrium Evaluat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p. 1.

② James A. Yunker, *Market 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 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 29.

富,“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消除的不是富有的生活方式,而是能够带来富有生活方式的非劳动挣得的资本财产收入。

在资本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的问题上,扬克对一些例外的情形也做了说明。其一,利息的取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例外:(1)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付给储蓄者的特别利息,这种利息率要与当时消费品的通货膨胀率持平,以使储蓄者的存款保值;(2)诸如在私人储蓄中融资的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它们为了提供退休收入而向投资者付给的利息,这种利息付给要保留。其二,为了让私人企业家在经济中继续发挥作用,两种企业可以仍然保留在私人手中:小型企业和企业家经营的企业。这些企业都要交纳资本使用税。如果所有者自愿放弃企业的经营权,而将它卖给一个公有企业,所有者将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补偿。这种补偿不是必须全部偿付所有者的财富增值或继承遗产的增值。在原则上,补偿的比率应随着财富水平的增大而减小。在转变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剥夺所有者依靠自己的直接劳动获得的财富积累。

扬克强调指出,社会化的公有制转变绝不等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是把企业的获利动机强制转变为服从广泛的社会目标,而不是考虑资本所有权收入的不平等分配问题。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转变是仍然使企业保持利润最大化目标机制,同时充分考虑资本所有权收入分配的平等化。

第二,公有企业的利润以社会红利形式分配给社会成员。“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必须采取一种适宜的方式,将公有企业的部分利润公平地分配给社会劳动成员。扬克设想成立一个名称为公共所有局的机构。公共所有局的功能主要是严格和准确地评估公有企业经理的工作绩效,但它绝不是中央计划权威机构,也不是微观经济管理机构。因而它被严格限定不能就企业微观经济决策事宜向经理提供任何指示、建议或方案。它根据一定的标准衡量企业经理工作的好坏,并具有对企业总经理的任免权。按照扬克的设想,公共所有局接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所得的生息资本投资收入,包括购买私人企业的股票、债券以及政府债券所得的收入。至于公有企业的利润,则将一部分留作企业的自用资金,另一部分交给公共所有局掌管。同时,公共所有局也接受非公有的小型企业上缴的资本利用税。公共所有局要将收入的绝大部分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成员。这部分份额至少要占全部收入的95%,余下不足5%的份额留给公共所有局作为运作经费。

分配社会红利的依据是社会成员个人的劳动收入(工资和薪金),也就是说,个人所得的社会红利的份额与他挣得的劳动收入成正比。退休的人则根据他们的退休金额或其他形式的补偿性金额获得社会红利。从量上看,社会红利的最大估计额是扣去工资和薪金后的国民收入量。按照较为恰当的计算,社会红利额应占企业利润的25%左右,其余部分是税金和企业自用投资金。

第三,公有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扬克指出,公共所有的大型商业企业的经理们享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同样的决策权。[①] 在征得公共所有局的允诺后,公司经理甚至可以设计自己的"补偿计划"。公共所有局无权发布任何涉及商业企业运行的微观经济变量,诸如价格、原料的采购、生产水平、市场和广告费用、税后利润的分配、投资计划等。

总之,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是要在保存当代资本主义效率的同时消除其在"非劳动的财产收益"分配方面的极端不平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最小伤害经济动态效率为代价,通过使资本财产收益分配极大地平等化而获得一种实质性的利益。"[②]

(二)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扬克的理论以特有的方式论证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会实现较大程度的社会分配公平。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将当代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的企业转为公有,借以消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资本为私人资本家控制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这种主张在所有制关系层面对如何获得社会公平的途径问题展示了新颖的探究。

在效率方面,扬克认为,如果资本公有制实行得恰到好处,公共所有局运作合理,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甚至会取得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扬克在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原则,反驳了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诋毁,这些使其理论模式具有了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然而,该理论模式没有跳出西方诸多改良主义的理论窠臼。扬克自认为其理论设计超越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并不包含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它不意指一个庞大的、家长制作风的福利国家;它不意图实行激进的重新分配和平均主义;它本

---

① James A. Yunker, *Market 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 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 76.

② 吴宇晖:《市场社会主义——世纪之交的回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身不存在共产主义的狂热激情;它不标志着官僚政治的同质化对个人唯利主义的胜利。[1] 实际上,扬克理论的“超越”只是其实用性的反映:在20世纪末,西方人大多对社会主义抱有反感情绪,而扬克的理论则力图避开西方社会舆论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扬克的理论虽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了否定,同时也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但由于其改良性质,它不可能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症结,因而也不可能设计出科学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另外,由于这种理论设计声称替代资本主义,却又在许多方面接近资本主义,这也适合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渐近改良心理。[2] 所以,“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左翼社会改良理论。

五、市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

自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来,一直不乏对这一理论的反对者。伯特尔·奥尔曼编著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赞同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和各自的观点。参与争论的共四位学者,即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戴维·施韦卡特和詹姆斯·劳勒(James Lawler),反对这一理论的希勒尔·蒂克庭(Hillel Ticktin)和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他们四位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均反对市场资本主义,提倡建立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市场经济是否应当成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一个组成部分。

蒂克庭和奥尔曼从市场自身的弊端、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等方面,论证了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不可行性。蒂克庭从分析社会主义发展史入手,通过对市场和社会主义定义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分歧的分析,得出了“就市场社会主义把劳动者降低到竞争的机器的水平而言,它是反平等和反人道的”,“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已经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市场是乌托邦的,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等结论。通过直接考察市场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弊端,以及对市场导致了生产的神秘性、市场掩盖

---

① James A. Yunker, *Market 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 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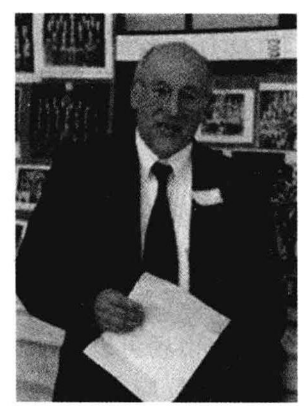
② 姜辉:《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谨慎方案——詹姆斯·扬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评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1期,第90页。



了剥削和异化等的分析，奥尔曼指出："市场已成为铸造人性中大部分最不完美的东西的主要模具。"此外，奥尔曼还论证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消除市场的神秘化及其导致的弊端，并由此得出了他对市场社会主义十个方面的批判。

（一）希勒尔·蒂克庭

希勒尔·蒂克庭（1937—）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所教授，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希勒尔·蒂克庭（1937—）

蒂克庭是《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杂志》（*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的主编。他是《苏联危机的起源：分裂的政治经济》（*Origins of the Crisis in the USSR: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disintegrating system*，1992）、《南非种族歧视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Race: discrimination in South Africa*，1991）和《马克思主义与全球金融危机》（*Marxism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2011）等书的作者，是《列·托洛茨基的思想》（*the Ideas of Leon Trotsky*，1995）一书的合著者。他还发表了80多篇与上述题目相关的论文。

蒂克庭坚决反对市场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理论，它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并得到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支持。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市场社会主义再度兴起，但它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根本上就不是社会主义。其论点主要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他说，市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对什么是市场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持有不同的看法。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以大规模的国有化和企业间的市场关系为特征的经济，这种经济的运营以赢利和亏损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消灭了劳动力的买卖，因而劳动者既控制经济也控制企业，即市场不再控制劳动，资本市场、价值和货币也不复存在。所以，市场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截然对立的社会。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必然包含消灭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消灭个别工人降



为机器或生产过程的附属物的情况”[1]。更为根本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是根据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原则运行的”[2]。蒂克庭强调，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论证社会主义有它自己的本质的特征，其中计划是最根本的。市场是计划的对立面，它不容许劳动者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它依赖于自发的和无政府的行为，在这样的行为下，能发挥最大作用的是那些控制资本的人，而不是劳动者。

第三，只要市场继续存在，就不会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首先，市场的继续存在必然会增大资本，而资本是国际性的，就资本是世界的统治者而言，它也将统治那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其次，市场的继续存在会使公有经济成分腐败，从而阻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后，市场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官僚主义。总之，只要市场继续存在，就不会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并不能带来效率。发达国家走向市场社会主义必然带来资本家和工人、雇佣者和受雇者之间的冲突。市场社会主义者争论说，市场可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蒂克庭反驳说，市场只能提供对货币做出反应的信号。同时，市场要有效率，就必须有在任何领域都起作用的失业机制等。因此，他得出结论，计划和市场是不相容的，将它们混合在一起不会有任何前途。

（二）伯特尔·奥尔曼

伯特尔·奥尔曼是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于 1963 年获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67 年获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长期执教于美国纽约大学，并先后被聘为马里兰大学、牛津大学、牙买加西印度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兼职教授。


伯特尔·奥尔曼（1935—）

伯特尔·奥尔曼著述颇丰，其著作有：《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① ［美］伯特尔·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7 页。

② ［美］伯特尔·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8 页。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1971)、《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Social and Sexual Revolution: Essays on Marx and Reich*, 1978)、《辩证研究》(*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1993)、《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的方法的步骤》(*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2003)。另外,他还与人合编了《社会主义教育学研究》(*Studies in Socialist Pedagogy*, 1978)、三卷本的《左派学院:美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The Left Academy: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 1982—1986)、《美国宪法》(*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200 years of anti-federalist, abolitionist, feminist, muckraking, progressive and especially socialist criticism*, 1990)、《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Market Socialism: 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1998)以及《新世纪的辩证法》(*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2008)等。

伯特尔·奥尔曼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的研究。他长期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环境中,切身感受到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严重问题,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深恶痛绝,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声疾呼资本主义行将灭亡,代替它的必然是社会主义。

奥尔曼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市场关系,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市场关系。他批判地指出,市场社会主义保留市场及其必然产生的蒙蔽作用,确保了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弊端继续存在,不但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阻碍目前的社会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因此,他坚决反对市场社会主义,并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其论点主要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首先,市场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形式,但不管哪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变化都是最小的,它们都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其次,在市场社会主义下,虽然企业是由工人集体所有和共同控制,但这种企业与资本主义下的企业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再次,市场社会主义中作为集体资本家的工人间的竞争现象是不能避免的。最后,由市场产生的思想模式与实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思想方法、感情和评价是不相容的。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错误源自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充足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奥尔曼指出:"资本主义更重要的特征是市场而不是私有制。"[①]在他看来,市场社会主义者恰恰

① [美]伯特尔·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很多东西，包括它的运行、思想方法和情感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就存在于它的市场关系中，因此，也就没有认识到继续保留任何一种市场会很大程度上妨碍社会主义的建立。关于共产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要为共产主义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就必须与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很少论及共产主义，未能意识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关于社会主义，奥尔曼指出，马克思设想的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作为社会主义成功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的社会主义计划，必须以先进的工业和管理、受过教育掌握着高超技术的工人阶级、相对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普遍的民主决策的存在为前提。市场社会主义者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无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奥尔曼强调，向市场及其弊病发起正面的、毫无保留的进攻，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社会主义意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有形成了对所有市场关系的拒绝，人们才会转向社会主义。”①

第三，马克思从不认为市场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存在。奥尔曼不认为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这种将马克思当作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一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合作社的赞成态度，但这种赞扬是有限的；二是马克思认为受到限制的市场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一个不长时期内还会继续起作用，但马克思绝不认为某种形式的市场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存在。

总之，市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对赞同者的批驳，主要是从后者对计划的批判以及对市场社会主义过于乐观等方面展开的。他们着重对市场社会主义能否把社会主义及其合作范畴同市场的竞争、利润最大化有机结合起来，以及市场社会主义能否如其倡导者所说的可发展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责难，并最终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结论。

本章小结

市场社会主义探讨的主要是社会主义与市场能否结合、怎样有机结合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体现在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之

① ［美］伯特尔·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中，其理论上的发展表现为不同时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特征。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产生并在此后获得补充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以改良或替代当代资本主义为己任，提倡以某种形式的公有制或限制资本权力为基础，运用市场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经济民主、分配平等、选择自由、消除剥削等，培育社会主义因素。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理论探索，尽管其论证立场有着一定的差别，但都较为深入地探讨、论证了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重大问题。这些探讨在预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般趋势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的思想材料。

思考题

1. 评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
2. 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3. 如何理解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
4. 评述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5. 简述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
6. 如何理解市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的观点？

阅读书目

1.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 [波]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4. [英]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5.[美]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陈志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6.[美]伯特尔·奥尔曼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争论》,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7.[美]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林志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第十章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要点提示

◎女性主义
◎新女权运动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并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在内的不同分支。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压迫女性的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对妇女解放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讨，展现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与开放性，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有重要影响的一种思潮。

◎第一节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述◎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新女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或思潮。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她们把女性主义议题和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压迫、妇女解放等理论连接起来，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阐发现代社会的女性问题，而且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赋予了女性主义的独特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在女性主义领域应用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形式。这一思潮在不同背景下有不同的名称，如“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materialist feminism)。尽管这些名称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它们都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①

一、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女性主义,按《布莱克韦尔政治思想百科词典》的说法:

"女性主义"是关于一种复杂现象的一般性的一个词……它关心妇女的地位……现代女性主义的语言和目标出现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后,它追求妇女的权利、性别平等,并对"妇女"一词重新定义。②

据女性主义研究专家南希·F.科特的研究,"女性主义"一词大约是在1910年进入英语词汇的,"女性主义"的含义是妇女角色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早期女性主义有两个主导思想,即妇女作为人的解放和作为女人的解放,它的目标是消除妨碍妇女作为个人获得完全发展的一切障碍。"③

沃特金斯对女性主义的定义是:

女性主义运动是向传统劳动分工方式的挑战。原有的劳动分工让男性得以控制所有的公共领域——工作、运动、战争、政府,同时使女性成为家庭中没有报酬的奴工,承担整个家庭生活的重担。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权利,向男性(所有男人为一个族群)和女性(所有女人为另一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挑战,向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挑战。④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而是女性主义流派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在严格意义上,这一派别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女权运动,是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上看,女性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呈现为三个比较明显的阶

①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俞吾金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1997, p. 4.

② David Mill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 151.

③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1.

④ [美]沃特金斯:《女性主义》,朱侃如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段。第一阶段大约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的妇女发出“女权也是人权”的呼声，发起了以求政治平等为主要目的的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这次妇女运动，为欧美妇女赢得了选举权、继承财产权、受高等教育权和经商权。这一时期的运动被称作“旧”女权运动。1848年7月19日，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韦斯利安卫理公会教堂，召开了美国第一届女性权利大会，会上通过了一份《权利和意见宣言》。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被后人称为“女权运动之母”的莫特(Lucretia Coffin Motl)、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don)和安东尼(Susan B. Anthony)。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美国女权运动的正式开始。另外还有哈莉特·穆勒(Harriet Taylor Mill, 1807—1858)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夫妇，其代表作分别是《女性的选举权》(*The Enfrachisement of Women*, 1851)、《女性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①] 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早期的运动着重强调在人权和政治领域的形式平等，而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者则开始拓展平等的范畴。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被称为“新”女权运动。新女权运动始发于美国，随后波及欧洲的西部和北部，继而扩张到世界各地。

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浪潮的领军人物是弗里丹(Betty Friedan, 1921—2006)，其代表作是《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一书。

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于1963年出版，被普遍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另外她也是《第二阶段》(*The Second Stage*, 1981)等书的作者。在《第二阶段》一书中，她提出了女权运动的“两阶段论”：第一阶段，走出家庭；第二阶段，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制度。



弗里丹(1921—2006)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女性的奥秘》这部书点燃了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波浪潮的导火索。在这本书中，弗里丹描绘了女性在工业社会中的生活状态和所扮演的角色，尤其

①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是全职家庭主妇这一沉闷而备受禁锢的角色，提出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妇女的“无法命名的问题”，即受过教育的妇女被迫回归家庭，无法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问题。美国妇女运动在 20 世纪初风起云涌，妇女由此争得了选举权、工作权。二战期间，大部分美国妇女参加工作和生产，为美国的战争胜利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但是，二战后的 50 年代，在士兵回家后，妇女被迫回归家庭。社会舆论一直压抑着女性的需求与自信，特别是知识妇女，受过大学教育后的唯一选择是作家庭主妇。很多妇女感到烦闷，从而导致了这一著名的“无法命名的问题”。

弗里丹认为，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男女都有机会选择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社会。因而她号召家庭妇女不能满足于相夫教子的生活，坚持女性与男性一样有能力在任何职业领域谋求进步和成就，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更多教育，谋求事业成就，在经济、情感和智力上摆脱对男性的依赖。

弗里丹于 1966 年与人合作创立了旨在促进妇女权益的全国妇女组织，并担任该组织首任主席，直至 1969 年卸任。1970 年 8 月 26 日，借着纪念首度赋予女性选举权的《美国宪法第 19 修正案》通过 50 周年，弗里丹在纽约市发起了妇女争取平等的罢工游行，旨在帮助女性谋求职业待遇方面的平等权益，吸引了约 5 万名妇女参加。罢工游行活动进而席卷美国，成功地扩大了女权运动的影响。

弗里丹积极支持堕胎合法化，并积极参与推动美国其他许多促进两性平等的立法进程。她终生不懈地通过写作与社会活动为扩大妇女权益、争取两性平等而呼吁奔走，被称为美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著名女作家爱瑞克·荣对弗里丹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弗里丹“单枪匹马地激活了美国的女性主义”。

在弗里丹的引领下，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民权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等一系列以消除社会不公正为目标的社会运动的开展，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女权运动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黑人民权运动以自由、民主与平等为理想，向歧视、剥削、压迫黑人的种族歧视、种族压迫提出挑战。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女权积极分子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黑人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被白人男性统治者统治，都因先天禀赋上（如肤色或性别）的差别而在社会和经济权利上受到歧视，因而他们都有共同的斗争需要。这些认识激发了她们为实现自由、民主与平等的理想、为消灭性别歧视而斗争的愿望。总的说来，为了争得事实上的男女



平等，这次运动从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经济、家庭等一切领域批判地探讨了所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

"新左派"可以说是新女权运动的直接的促进因素。在新社会运动过程中，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积极声援黑人，踊跃参与民权运动；他们反对侵越战争，反对学校当局刁难、迫害左翼激进学生，猛烈抨击美国的社会制度；主张通过学生运动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无信仰歧视、无性别歧视的所谓"三无"的完全平等的社会制度。然而，在"新左派"内部存在着歧视女性、将女性问题边缘化的现象。在作为"新左派"的主要领导机构的"学生非暴力委员会"中，妇女被贬低到"卑躬屈膝"的地位；在 1967 年 8 月"新左派"的"全国新政治大会"上，女性成员要求宣读一篇阐述妇女问题的讲稿，这一要求遭到负责人的拒绝。"新左派"妇女不满于这种状况，认为"解放妇女是比解放黑人更为迫切、更为紧要的任务"。于是在芝加哥单独举行大会，发表了"告左派妇女书"，号召姐妹们团结并开展一场新的"妇女解放运动"。随后，新女权运动在加拿大、英国、法国以及北欧的丹麦、挪威等国家得到蓬勃发展，在世界各地，各种妇女解放组织迅速涌现出来。①

对"新左派"的不满，激发并推进了新女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新左派"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包括改善人际关系，强调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方案忽视了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一方面它抨击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却忽视妇女和妇女的利益，维护父权制和男权主义；另一方面它宣称要反对旧的文化传统，主张人人享有民主，却奉行传统的妇女观和大男子主义。②

新女权运动不同于早期的女权主义，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自由女权主义，它最初采取了小团体的形式，致力于提高觉悟，组织地方工会。在这一运动中，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个人的即政治的"，她们关注女性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把她们的理论付诸实践。这一运动成功地触及并调动了由女性生活所有方面的诸多矛盾而引发的不满，当妇女解放运动迅速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时，女性解放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公共意识，获得了"姐妹情谊"坚定有力的支持，这就为大规模的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

① 奚广庆、王谨:《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20 页。

②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7、88 页。

在新女权运动中,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一开始便对社会变革进程中女性问题的地位有不同的看法,并产生出不同的策略倾向。一些人将反对女性受压迫的斗争视为更大范围的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人则坚持,女性被男性统治的问题是所有社会变革进程的基础,有明显的独立存在的特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行不同性质的斗争。随着这两种争论与实践的深入,妇女解放运动内部开始分裂。激进女性主义者日益强调性别对立在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地位、性行为和性偏好的关键作用以及社会主义作品在女性问题上无法改变的缺陷。相反,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主张激进女性主义的力量事实上可以与社会主义体系融合成一种新的策略。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后者逐渐强化成为妇女运动以及左派运动中的重要力量。①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女权运动实践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如何看待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如何确立妇女解放的目标和如何进行妇女解放斗争等等。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女性主义内部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与策略,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80 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失败(1972 年被国会通过,因 1983 年未获得所要求的全部各州的 2/3 的州的批准而未能生效),有组织的女权运动似告终结,但草根性的或单一目的、分散的女权运动至今依然在继续。② 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女权运动。

二、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一)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妇女解放理论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也和其他女性主义派别有着明显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从人类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了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与妇女解放的条件。其内容主要包括:

其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反对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从而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反对妇女在经济上屈从于男性的

① 参见[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 页。

② 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述评》,载《美国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114 页。

社会地位；主张妇女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地位中解放出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拥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对待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其二，它从私有制和阶级关系上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认为私有制而非男女两性生理上的差别才是造成女性受压迫以及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其三，争取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在经济上同时解放男女劳动者，从而也使男子的特权失去其存在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这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

其四，在妇女解放的社会条件、目标和实践策略上，主张妇女解放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妇女解放首要的社会条件。而只有全人类的解放，妇女才能彻底解放。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是相一致的，妇女解放必须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只有在争取全人类的解放中，才能逐步实现妇女独立、平等、自由的要求。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因而它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而单独地存在与发展，妇女运动的发展也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革命与历史条件。妇女必须积极参与（无产阶级的）社会变革和革命活动，使妇女争取平等解放的斗争同人类的解放融为一体。

>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①
>
>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②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③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充分肯定了女性解放的重大社会历史意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女性主义一方面怀着极大的兴趣，因而总是自觉地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妇女受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结构分析，另一方面又从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角度接受某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6 页。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家务劳动的讨论中，女性主义者利用马克思的阶级、生产、价值等概念，讨论妇女的家务劳动到底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它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还是具有剩余价值的，妇女的家务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这些讨论涉及女性劳动的解放策略，因而开启了一个看待妇女压迫与妇女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一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结合为分析框架，通过性/性别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探讨来解释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如何对妇女施加压迫，以及如何改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受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她们重新思考了生产、再生产、价值、阶级、意识、劳动等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包括哈特曼、乔多萝、哈丁、巴雷特等在内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围绕性别劳动分工、妇女劳动的价值、性别文化生产与母职、育儿模式、家庭组织等问题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展开了富有深度的理论探讨。

20世纪7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开始从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把"把教育、文化行动、甚至文化革命看作社会变革的动力，这一信念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关于妇女解放，它以以下的假设为基础：妇女所受的压迫与基本的物质生产关系没有一点关系，……妇女所受的压迫根源于父权制组织的文化中，对他们来说，女性主义大体是文化运动、新的意识形态或新的意识"①。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就是要颠覆男性享有对女性特权的父权制价值体系；聚焦于父权制压迫的文化特征以及文化领域的改革；拒绝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强调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不同，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把文化看作社会的整体，而是把它视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领域，文化斗争只是女性主义斗争的一个领域，而不是全部。不过，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对文化的关注，对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深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关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女性主义流派的关系，沃特金斯在其《女性主义》一书的"1970年—1979年女性运动的主要趋势"中做了生动的描述：

> 女性运动很快地茁壮成长，成为一股主要的政治势力，快速地在欧洲和北美洲蔓延开来。随着女性运动的成长，也发展出不同的趋势——激进派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及自由派或称之

①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1997, p. 7.



为“平等机会”的女性主义者。

激进派女性主义：我们激进派女性主义者，是以父权社会的出发点来看问题——也就是男性势力压倒女性的社会系统。男性统治者，男性军事、工业、政治和宗教等编制，男人的同业工会以及男人主导的左派，全都是父权社会的一部分……并且经由个别家庭中男人力量压倒女人及小孩的方式，不断强化这种情况。女人是一个阶级，男人是另一个阶级。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亨利·福特四世的太太怎么可能和危地马拉的农妇属于同一社会阶级？我们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综合了男性控制与社会剥削的问题——我们要反击这两者！只要这个世界的力量和财富是由一小撮人垄断，只要他们寻求利润的欲望仍控制这个社会，真正的解放便不可能实现。

自由派女性主义：你们都太极端了！这纯粹是偏见的问题——制度需要被修正而不是被推翻掉。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注重公平权利的立法机构，更多好的人格典范以增加女性的信心。

这三股个别趋势也强调不同的战斗策略。

激进派女性主义：受压迫女性只需要宣传和示威，建立女性的空间和女性的文化。她们集中力量于男女关系的极端——特别反对男人对女人施加暴力、强暴和色情图片。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较强调与反帝国主义侵略运动、工人的组织、左派政治团体以及其他受压迫团体和阶级的结盟——她们在与这些组织中进步男性进行持久对话的过程中，时而疲惫，时而兴奋。沟通的内容有女性主义反抗性别压迫的意识和重要性，以及反思如何加强它在个人与家庭关系，甚至在解放运动和团体内部结构中的对策。

自由派女性主义：较小的团体——集中力量向政府游说以女性为主导的改革，并且试图要影响决策者！但她们经常被不具实质意义的广告或解决方案鱼目混珠掉了。在女性解放运动刚开始时，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占主导位置，主要因为女性运动是随着社会示威游行，以及60年代末期的反越战运动而兴起的。到了70年代结束时，激进派的女性主义变得较有影响力。

到了比较保守的90年代，逐渐出现综合这三种不同主张的新趋势。这是体认到三者各有其优缺点，并且能够看出女性主义是所有

反抗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及独裁主义之人权运动的同盟。[①]

(二)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问题、内容和目标上有其鲜明的特点。

伴随着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在不断吸收文化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与内容也在不断地深化,其研究对象与问题也在不断扩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第一,从研究对象看,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女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这一对象是承受着以父权制(或男权制)压迫和阶级压迫为代表的各种压迫的女性,是诉求自由、平等和解放的女性,其范围包括了发展层次不同的各个阶级、民族和种族的女性。在有的学者那里,这一对象有时被表达成一个"性阶级"。把妇女作为一个社会阶级,这种从两性的自然差别做出的规定有利于揭示妇女所受到的特殊压迫,也有利于把妇女团结在同一旗帜下。而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看法有着非社会历史的局限性,难以在理论上提高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②] 实际上,除了性别规定性之外,妇女还有阶级、民族、种族等属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其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可能发生冲突。关于如何在正视这种冲突、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女性的共性、团结,有的学者也建议从女性立场出发来考虑妇女之间如何结成政治联盟的问题。[③] 总的说来,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女性,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关注并确认这一对象的问题上,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一定的差别。

第二,从研究问题看,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是女性问题,是妇女受歧视、剥削和压迫以及妇女的解放问题。由于女性与男性的自然的、社会历史的关系有着复杂多样的性质,妇女问题也与其他问题处于复杂的关联之中。妇女受压迫问题不仅仅是性别不平等问题,而且是与阶级问题、种族问题、生态问题等密切相关的。以黑人女性主义的视角为例,它不仅关注不同于白种女人的反种族歧视政策,也关注不同于黑人男

---

① [英]沃特金斯:《女性主义》,朱侃如译,广州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9—120 页。译文有改动。

②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Routledge, 1993, p. 34.

③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1983, p. 378.

性和白人男性的反性别歧视政策。[①] 在女性受压迫的复杂情形中，现存社会的权力关系是女性问题的核心问题。这种权力关系是所有制度化不平等的根源，它具有强制性与等级制的特点。尽管妇女之间存在着阶级、种族、性别、年龄、性倾向等差异，但权力关系及其固有的强制与等级制特征是把握性别不平等的关键，妇女解放也必须以结束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为前提。在有的学者那里，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被运用于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分析之中。

第三，从研究内容看，早期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侧重于从物质、经济层面探寻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与妇女解放的途径。以米切尔为代表，她一方面分析了妇女在生产、生育、性与儿童的社会化中妇女受压迫的综合状况，同时也强调精神分析的重要性，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起来，关注妇女在受压迫根源问题上父权制的根本性作用。[②] 随着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解社会中的精神方面"愈加受到关注，在理论上转向意识形态研究。有的学者探讨了性别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对妇女地位的影响。[③] 有的学者则直接把妇女问题的讨论置于意识形态、文化实践、知识生产中，探讨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关系，从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等差异中理解妇女的话语构成，及其与剥削性的社会安排与再生产之间的共谋关系。总的来说，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容包括了从物质层面到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十分丰富的内容。

第四，从追求目标看，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再限于对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的追求，而是深入到制度层面进行批判。早期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马克思的生产与再生产、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概念框架，从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角度揭示了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物质或经济根源。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将女性问题与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批判相结合，从性别等级分工角度揭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伴关系。其理论策略在于，要改变妇女受资本主义与父

---

① Zillah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p. 263.

②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③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Routledge, 1993, p. 21 .

权制双重压迫的状况，必须同时向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开战。[1] 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对妇女解放的根本重要性。有的学者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互为前提，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也是难以实现的。以沃格尔为例，她主张，要解放妇女，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扩大民主，把妇女吸收进公共生产，逐步变革家务劳动，从而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家庭和两性之间的更高形式。[2] 而有的学者也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妇女解放的充分条件，甚至质疑妇女解放与实现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处理家务劳动与妇女屈从地位的问题，社会主义不能必然性地使妇女解放。

第二节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观点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用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所提供的深刻见解加以扩展，甚至完全改变。就此，不同的学者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景观。这些学者主要有朱丽叶·米切尔、玛格特·本斯顿、佩吉·莫顿、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和凯特·米利特、海迪·哈特曼、艾里斯·扬等。

（一）朱丽叶·米切尔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出生于新西兰，于1944年移居英国。她是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精神分析学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是位于剑桥大学的英国精神分析和性别研究中心的教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积极参与左派政治，是《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者。她尝试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在养



朱丽叶·米切尔（1940—）

---

[1] 转引自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2] Cf.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72.



育儿女时可能产生的非父权制结构模式。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最初主要致力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家务劳动和儿童培育等问题。米切尔的思想也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她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她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和《女性地位》（*Women's Estate*）之中。《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最初发表于 1966 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左派评论》上，两年后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评论，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趋势时，它迅速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力量。1971 年，米切尔出版了以其早期论文为基础的《女性地位》一书，强化了其思想的影响。

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首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有关女性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评论。她简要评论了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和列宁关于女性解放的基本观点，并指出了其理论策略对于社会背景的不恰当性。她指出，在这些文献里，“女性解放仍然只是一个标准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附属物，而并未在结构上与之融为一体”。总的说来，他们“关于女性问题的经典文献绝大多数都强调经济”①。

米切尔将女性的状况分为四个不同的结构：生产、生育、儿童的社会化及性关系，认为每一结构都独立发展，它们综合组成了女性地位的“复杂整体”。米切尔的“生产”指的是我们直觉上可能称之为家务或家庭领域之外的各种活动，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参与雇佣劳动。其他三个范畴在家庭中共同对女性实施压迫，从而导致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而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的现状。米切尔认为，社会主义者的策略必须面对有关女性地位的所有四个结构。在她看来，生产、生育和儿童的社会化这三个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相反，性关系结构是一个最容易招致压迫女性的薄弱环节。在策略上，她既反对改良主义，认为温和的改良性需求总是与关于女性地位的主要评论不一致；也反对唯意志论，认为激进的废除家庭、全面性自由、集体抚育儿童以及其他类似的主张仅仅是理论分析或实践信念的替代物，这种主张客观上使自己处于传统政治讨论体系之外。她认为，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用一套注重实效的主张来取代这些抽象纲领，对女性受压迫的所有四个结构做出解释。比如，米切尔注意到，在雇佣劳动领域，最基本的需求并不是工作的权利或得到平等工资的权利，而是平等工作的权利本身。关于废除家庭，她认为政策关注的应该是女性的解放和

①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 页。

性别平等(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现在的家庭与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是矛盾的。平等不是来源于对家庭形式上的废除,而是来源于历史性的家庭功能的改变。革命的主张应该解放出这些功能。

米切尔对女性状况的分析是有问题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20 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生产、生育和儿童的社会化之间以及它们和性关系之间明显的不稳定和相互矛盾、冲突,因而,把前三者看作是相对稳定的,这种分析忽视了具体的、历史的客观状况。其二,她没有看到女性参与生产在许多阶级社会中是主要因素,片面强调女性活动限于家务劳动,似乎现实的女性被囚禁在家庭之内,并且她贬低家务劳动而非客观评价这一活动的积极意义,这同样是有问题的。其三,她脱离现实的阶级关系,而更多的是抽象地谈论女性状况的"四个结构",这势必不能有效地改变女性受压迫的现状。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米切尔一方面坚持认为社会现象不能被简单地描绘为经济现象,另一方面又承认经济现象的重要意义,这对指导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玛格特·本斯顿和佩吉·莫顿

玛格特·本斯顿(Margot Benston)和佩吉·莫顿(Peggy Morton)都是加拿大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当 1969 年北美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到了顶峰时,她们都发表了重要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在家庭内的无薪工作,讨论了现存的社会矛盾和改变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①

本斯顿首先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第二性地位的基础。她认为,这一基础是"经济的"或"物质的",而且就在女性无薪的家务劳动中。女性承担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如烹饪、缝补、洗衣和照料孩子等,但是这些工作产生的产品和服务却被直接消费而从未进入市场,这些产品和服务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交换价值。由于女性"群体"中的人在与家庭相联系的那些活动中生产具有简单使用价值的产品,因此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它的主要功能不是消费,而是生产。而且本斯顿认为,正是女性对家务劳动所承担的责任构成了她们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并使资本主义将她们看作是劳动力的后备大军。如果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的并且在技术上是落后的,那么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就是平等地从事家庭外的工作。因此本斯顿建议,需要将目前在家庭中进行的工作转化为公共生产,社会必

① 参见[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 页。

须走向家务劳动和照管儿童的社会化。当这样的工作变成公共部分时，歧视女性的物质基础才会消失。

佩吉·莫顿的文章进一步拓展了对家庭的分析。莫顿将家庭看作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的一个单位。通过将对家庭的分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联系起来，她着重考察了工人阶级妇女在家庭中、在劳动力中以及在这两种作用中体验到的矛盾。她指出，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大军，女性是经济的中心而非边缘，正是由于她们，那些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国有部门才可能运转起来。

两篇文章共同确认了家庭中存在女性无薪劳动的客观性质，把这种无薪劳动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经验中诸种矛盾的物质基础，并且都分析了这种无薪劳动作为这一基础发挥作用的方式。莫顿还用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系统阐述了这一问题，并强调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特殊性质。

上述两位学者在理论上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就本斯顿而言，她将家务劳动描绘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这既没有合理认清一般性家务劳动存在的历史普遍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家务劳动中女性受压迫现象的社会必然性。就莫顿而言，尽管她的理论分析显得较为严谨，但作为女性主义者，她只是从家务劳动的视角探讨特定的妇女群体承受压迫的问题，而没有客观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女性遭受特殊性压迫的普遍性，从而导致把女性受压迫问题仅仅当作是工人阶级的事务。尽管如此，两位学者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推进仍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

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她 1972 年在美国和意大利同时发表的《女性和共同体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一文中。达拉·科斯塔坚持认为，在世界层面上，所有女性都是家庭主妇，女性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她们受压迫的基础在于无薪家务劳动的物质性。同时，达拉·科斯塔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阶级家庭女性身上，她认为，她们不仅为家庭直接消费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生产非常重要的商品劳动力——工人工作的能力，并通过工人而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主义通过向工人阶级丈夫支付工资的形式来支付这种剩余价值，工人阶级丈夫因而也成了剥削妇女的工具。而工人阶级的生存依赖于工人阶级家庭，“妇女是工资奴隶的奴隶，她的受奴役状态保证了她的男人受奴役的状态……因此，工人

阶级妇女反对家庭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①]。

因为工人阶级家庭主妇是被特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生产性劳动力，所以揭露家务劳动作为"生产性劳动的伪装形式"就成了中心任务。对此达拉·科斯塔提出了两个策略性解决方案：

第一，利用无薪家务劳动、性别歧视、家庭与外界的分离以及类似的公共议题来调动工人阶级家庭主妇斗争的积极性，使孤立的家务劳动者的斗争社会化。

> 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斗争的形式，以便能立即打破家务劳动的整个体系，完全拒绝它，拒绝我们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拒绝将家庭作为我们存在的聚居区，因为问题不仅仅是停止做这样的工作，而是要摧毁家庭主妇这个角色。[②]

第二，完全拒绝工作，特别是拒绝在日益将女性纳入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作。她认为，通过"在社会化结构中从事社会劳动"来获得经济独立仅仅是虚假的改革；女性已经工作得够多了，她们必须"拒绝通过工作获得自由的神话"。

达拉·科斯塔的文章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由于她主张"家务劳动作为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它生产剩余价值"，这引发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围绕着女性无薪的家务劳动及其产品而展开了一场前后持续达 10 年的"家务劳动争论"(the domestic labor debate)。家务劳动争论中的议题是劳动力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大家在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确切含义和应用上产生了分歧。特别是，讨论集中于家务劳动的产品的性质，它作为生产性劳动或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地位，以及它与工资和雇佣工作的关系。

实际上，家务劳动争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国际性现象。参与者不仅有英国、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的学者，如丹尼·李·雷格尔(Dani Le Leger)、克瑞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希格丽德·珀尔(Sigrid Pohl)、加布里埃尔·黛德丽(Gabrielle Dietrich)、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艾丽斯·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麦克茜恩·莫莉纽克斯(Maxine Molyneux)、米利厄姆·格鲁克斯曼(Miriam Glucks－mann)、本·芬尼

---

①② 参见[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 页。



(Ben Fine)和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等人。[①]

总的来说,这场争论围绕着三大问题而展开:家务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家务劳动的性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家务劳动能否工资化?经过争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达成的共识是: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压迫的根源;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等。总之,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等理论,对妇女工作给予了新的探讨,将被忽视的家务劳动揭示出来,指明它是妇女经济落后的关键,强调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和妇女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特殊意义。不过,对于这场家务劳动争论,有些女性主义者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米歇尔·巴雷特声称,这场争论没有回答妇女受压迫的真正原因,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妇女在家中做家务,而不是男子或一些其他类型的人们充当处于依赖、从属和受剥削地位的家务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后备军。事实上,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产生。安吉拉·迈尔斯则指责家务劳动的争论滑向了经济主义。[②]

(四)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和凯特·米利特

20世纪60年代晚期,女性主义者转向激进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者通常认为,男性统治和两性间的性别斗争是普遍的,它事实上一直都是所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她们从把女性的地位低下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的局限性,到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寻求解释所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深度和普遍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smith Firestone)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

费尔斯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1970)一书中。其中,她提出了一套激进的女性主义政治理论,综合了威廉·赖希、弗洛伊德、马克思、恩格斯和西蒙·波伏瓦等人的思想。费尔斯通声称,要揭示关于性压迫的更根本的问题,就要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停留于经济层面的解释。对费尔斯通来说,阶级分析是美丽的,却是有局限的。“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全

---

① Lise Vogel, “Domestic-Labour Debate”, in “Historical-Crit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6 (2008), pp. 237-243.

② 戴雪江:《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变革还是继续?》,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第4期,第45页。

面地分析阶级对抗那样，对于性别斗争的动态分析，我们正在处理的是更全面地追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动物王国本身存在的更大的压迫问题。”①

《性的辩证法》一书的内容主要包括：(1)阐发了“性阶级(sex class)”概念，认为女性的身体、生育(再生产)及哺乳使妇女成为不同于男人的一个阶级，女性的身体是造成其从属性地位的物质基础；(2)认为女性承担的人口再生产将其困于家庭，从而使其地位低下，经济不独立；(3)认为技术的发展可帮助妇女控制自己的身体，摆脱生育的束缚，是妇女解放的关键。

通常，女性主义者总是否定女性的依从地位有其生物学的基础，而费尔斯通认为，女性附属地位的根源在于人类生物学的某些永存的事实，即：较长的婴儿成熟期决定了婴儿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依赖于成人，特别是依赖于母亲；而生育使女性的体质变弱，使她们只有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此，费尔斯通断言，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这一革命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母奶，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对男人的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女性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

她在《性的辩证法》中还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消除经济上的阶级特权，而且消灭经济上的阶级差别本身，因此，不像第一代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不只是消除男性的特权，而是消除性别差别本身。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异在文化上不再起重要作用。

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一书中，凯特·米利特首次提出了“性政治”这一概念，并且是最早将男权制(父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人。借助于对这些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米利特对妇女受压迫问题给予了新颖的解释。



凯特·米利特(1934—)

在《性政治》一书的第二章，米利特首先引入了“父权制”这一概念，这成为后来女性主义理论大量使用这一概念的起点。在米利特这里，父权制包含了双重含义：第一，它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它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总之，米利特使用这一术语来表示广泛的政治、经济、

① Margaret Walters, *Femi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6.



意识形态，尤其是心理结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男性控制了女性。

米利特反对男权统治者宣称的“男女社会角色的不同源于不可改变的生物性差别”的误导性说法，她分别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暴力、神话和宗教以及心理学八个层面解构分析了男权系统，揭示了数千年来男性残酷压迫女性以及取得统治成功的奥秘。在她看来，人类女性与男性在生物学上的差别其实极其微小，但男权社会发明了性别气质和角色这两个概念——男人应该是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的，女人是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的；男人的角色是事业成就、兴趣和抱负，女人的角色则是生产、养育后代、料理家事等没有价值的动物性本能。这种意识形态明明是为了维护男性利益、实现其对女性群体统治的文化观念，却被文饰为“自然的”。通过家庭这个父权制（而非血缘）的权力基本单位，女性被剥夺了经济权力，成为一个靠“剩余物”生活的阶层。人类社会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现象常常使人们转移目光，忽略了性别不平等这个基本事实。排挤女人从事付酬劳动、同工不同酬等歧视手段阻止女人获得经济自由，在教育制度上设置的种种障碍使女人保持愚昧无知，易于统治。对不驯顺的女人，男权社会将采取备用的暴力手段：刑罚、禁止堕胎或强制堕胎、强奸等。在文化、神话和宗教中，男权意识形态宣传“厌女症”，女人的性征、月经、生育都是不洁的、被诅咒的，男人的性器则幻化为被崇拜的偶像。通过这一系列无孔不入的教育、训诫、暗示、潜移默化、惩罚，大部分人都会在心理上认同这一套意识体系。将男权思想内在化后，女人们痛苦地认同自己是“低等生物”，开始无意识地自我厌弃并互相鄙视、敌对，甚至沦为男权制度的帮凶。

总之，女性受压迫是既存在于公共领域也存在于私人领域的一种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也是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而政治、经济、文化和种族等诸多因素都成了压迫女性的工具。父权制（男权制）作为揭示这一压迫的关键概念，表达了女性受压迫的实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某一性别的阶级对另一性别的阶级的压迫。

针对女性受压迫现象，米利特提出了“性革命”的观念，并设想了彻底的性革命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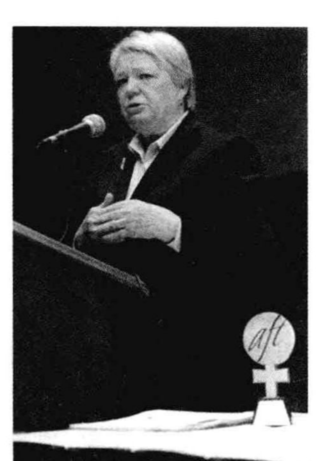
> 性政治要实现性革命也许首先必须结束传统的性抑制和性禁忌，尤其是那些对男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威胁最大的禁忌：同性恋、非婚生子、少年性行为、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环绕性行为的消极氛围应和双重标准以及卖淫制度一道铲除。性革命的目标是

> 建立一种宽容的、允许性自由的单一标准，一种未被传统的性联姻带来的粗俗而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腐坏的标准。
>
> 然而，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结束男权制，废除大男子主义思想和带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地位、角色和气质的传统的社会化方式。这将使两性各自的亚文化实现一体化，原先相互隔离的两性的体验将融为一体。①

结合性革命观念，米利特还做了这样的设想，如：重新审视被称作"男性"和"女性"的特征（比如，被当作男子气概而受到鼓励的暴力、被视为"女子气的"并且在男女两性身上都不足取的过分被动），将男女两性的可取之处（如效率和理智这些"男性的"气质以及温柔与体贴等"女性的"气质）作为适合于男女两性的品质推荐给他们；废除性角色以及妇女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对下一代的抚养工作将实现职业化和集体化（并取得改进）；婚姻有可能被自愿伙伴关系所取代。②

（五）海迪·哈特曼和艾里斯·扬

海蒂·哈特曼（Haidi Hartman）生于1945年，是一个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妇女政策研究学会的创始人，也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教授。哈特曼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政治和社会保险董事会成员，是美国未来运动的顾问，以及老年妇女经济安全专责小组、妇女组织全国理事会的联席主席。其专长领域包括妇女与经济、劳动力参与、就业、薪酬公平和社会保障等。她曾多次在美国国会作证，她的研究被各种媒体引用。她的讲授内容广泛涉及妇女、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在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哈特曼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男权制和性别分工》（"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1976）和《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联姻》（"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1979）等文章中。近年来还与人合著了《依旧是男性劳动力市场：长期的收入差别》（*Still A Man's Labor Market: The Long－Term Earnings Gap*, 2004）和《生存在底层：有子女的低收入家庭的总收入》



海蒂·哈特曼（1945－）

①② ［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Survival at the Bottom*: *The Income Packages of Low－Incom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2003)等著作。

在《资本主义、男权制和性别分工》中，哈特曼指出：

> 按性别分工看来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里，按性别分工是等级制的，男人在上面，妇女在底层。然而，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表明，这种分工并不总是等级制的。性别分工的发展和重要性是我在这里探讨的题目。我坚持认为，妇女目前的社会地位的根源在于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我相信，如果妇女获得与男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如果男女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不仅男女分工的等级性质应当消除，而且男女分工本身也应当消除。①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男女分工的等级制归根结底在于劳动分工。同时哈特曼还注意到，性别分工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的父权制对于妇女受压迫的消极意义，男劳工们在维护性别分工与男权制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男劳工们组织起来，垄断技术、机会、行会和工会，排斥、控制妇女。资本家则从男劳工坚决维护的男权制中获益。② 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联姻》中，她对这一主题继续进行了剖析。③

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联姻》中，哈特曼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常忽视性差异，因而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很难运用马克思主义。尽管女性主义深刻地认识到了男女关系上的制度特征，但它忽视了历史轨迹或经济权力结构，因而又可以学习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哈特曼考察了三个范畴：早期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认为，妇女在无产阶级之内不是受压迫的，妇女参与劳动是她们获得解放的关键因素；一旦她们变成资本的生产者而与家务劳动者相对立，她们就会得到解放。在哈特曼看来，这样的看法是天真幼稚的。按照女性主义理论，在西方，男性对于征服女性有着既定的兴趣。日常生活学派则研究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对日常生活发生影响的。扎莱斯基(Zaretsky)认为，妇女是为资本主义工作的，而不是为男性工作的，因而女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奴隶，而不是支配社会的男性的奴隶。家庭从工作场所的分离出来以及家务劳动的私人化，显得女性似乎

---

① [美]海底·哈特曼：《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7页。

② [美]海底·哈特曼：《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6－73页。

③ Haidi Hartma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in Linda Nicholson (ed.), *The Second Wave*: *A Reader in Feminist Theory*, Routledge, 1997, pp. 97－122.

是为男性工作的，而事实上，她们都是为资本主义工作的。她们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完全忽视了在生产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而且拒绝承认妇女是遭受了不平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

哈特曼指出，女性主义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要想把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贯穿起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和女性主义关于父权制的社会历史结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新的分析方法。

自 2000 年以来，艾里斯·扬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以研究正义理论、民主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著称，被誉为 20 世纪最后 15 年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她曾担任过德国歌德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且是一系列机构（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南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普林斯顿人文价值中心以及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等）的客座研究员。

哈特曼的上述两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针对哈特曼的这两篇文章，艾里斯·扬（Iris Marion Young）在 1981 年发表了《超越不幸的婚姻》（"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Dual Systems Theory"）。


艾里斯·扬（1949—2006）

扬早期就在全球正义、民主与差异、大陆政治理论以及性别、种族和公共政策等领域中的教学和写作树立了声誉，她在 1990 年著述出版的《正义和差异政治》使她登上了国际舞台。扬的著述十分丰富，著有《全球性挑战：战争、自决和正义的责任》（*Global Challenges: War, Self-Determ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2007）、《论女性的身体经验》（*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2004）、《交叉的声音：性别困境、政治哲学和政策》（*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997）、《正义和差异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1990），并参与编著了《女性主义哲学指南》（*A Compan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1998）、《女性主义伦理和社会政策》（*Feminist Ethics and Social Policy*, 1997）和《女性主义和法国哲学》（*The Thinking Muse: Feminism and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1989）等著作。另外还有大量影响深广的文章。她的研究广泛运用了批判理论、现象学和解构理论等 20 世纪大陆哲



学的思想，其作品被译成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瑞典语等。

在《超越不幸的婚姻》一文中，扬从批评女性主义理论试图把家长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出发，深入探讨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她认为，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简单结合在一起是一种不成功的尝试。

扬认为，哈特曼的《不幸的联姻》是一种表面的二元论。在她看来，其一，既然哈特曼认为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不让女性接近某些生产资料，那么父权制实质上就是某种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都是由控制生产力的一方决定的。因而，哈特曼的二元论只能是表面的二元论。[①] 其次，由于哈特曼是从社会生产、物质生产的角度来分析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因此扬认为这实质上仍是马克思的生产经济决定论，所以女性主义只能是嫁给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不可能平等，前者只是后者的修修补补。[②] 再次，哈特曼似乎认为资本主义是天生的平等派，资本家本意是想让除自己妻子以外的所有男人女人都平等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只是由于男权制的作祟，资本主义才不得不满足男劳工们对控制妻子的渴望。所以要想解释男劳工和资本家对自己妻子的控制欲，只有从男权制入手。在扬看来，哈特曼人为区分出了两个独立的系统。[③]

扬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分析性别关系和压迫妇女的理论余地，因而是一种不适当的生产关系理论。我们需要一种生产关系理论和产生于生产关系并且加强这种关系的社会关系理论，这种理论把性关系和妇女状况看成一种核心因素。女性主义应当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改造成这样一种理论，而不是嫁给马克思主义。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分析，扬要求将具有性别视角的性别分工作为核心范畴。这是因为，分工作为在分析水平上比阶级范畴更具体、范围更大的范畴，是分析参与劳动活动并从这种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将分工提升到像阶级那样重要、那样确切的核心地位，分析除性别差异以外的现象才会有意义。对性别分工的分析同二元制理论比较可以有许多优势：它使性关系和妇女的地位处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中心；它也可以说明妇女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从属地位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它允许我们特别对性

① [美]海底·哈特曼：《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78—82 页。

② [美]海底·哈特曼：《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83 页。

③ [美]海底·哈特曼：《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82 页。

别方面的社会劳动关系进行有形的分析，关注妇女特殊的性别状况和她们所受的压迫。这样一来，对于分工的分析和强调，所产生的政治斗争策略与二元制相比也是不同的：按照二元制理论，社会主义运动中妇女问题仍然被分割为通常仅仅是由妇女处理的问题，而强调性别分工进而在理论上表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家长制的，那么，反对压迫妇女和把妇女推向社会边缘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

总体来说，扬反对哈特曼的《不幸的联姻》，是因为其中的二元论是不彻底的，它不能适当地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受压迫的事实。而扬实质上是坚持一种彻底的二元论，把对于性别分工的分析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同等地看待，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策略上，这有利于把反对妇女受压迫和阶级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女性主义者在对父权制予以探讨的同时，还关注了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即再生产。再生产概念是作为从理论上联结女性受压迫和关于生产、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两者的方式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再生产过程作为一个与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征——可相比拟但相对独立的过程来分析。她们通常用再生产方式（mode of reproduction）这一与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类似的词语来谈论问题。同父权制概念一样，在关于再生产术语的本质含义上也很少有相同意见。一些人简单地将再生产等同于家庭的明显功能，并在根本上坚持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再生产方式的改变。

父权制和再生产这两个概念近来受到了某种质疑。一些学者认为，现有的理论探讨没能形成满意的将二者理论化的方式。首先，弗利西蒂·埃德霍尔姆、奥利维娅·哈里斯和凯特·杨认为，对父权制和再生产的定义缺乏一致性。父权制概念作为一个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的体系，仍然深深扎根于它的激进女性主义根源中，而当它在更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时，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的解释充分融合。定义再生产概念的问题则来源于其本身意义的宽广范围。她们建议区分分析的三个层次：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或生产条件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production）、劳动力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the labor force）以及人类或生物再生产（human or biological reproduction）。尽管这一建议很有用，但这些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问题依然存在。其次，在二元性问题讨论中，理论家们反复使用父权



制和再生产概念，用两个不同的体系来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比如，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阶级体系（the class system）和性别体系（the gender system）。但正如艾里斯·扬所说的，这些“二元体系理论”暗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两个迥然不同又相对独立的体系”，但这一理论未能足够成功地面对和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没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而仅仅是将一种性别关系理论加入其中。另外还有其他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将目光集中于性别与阶级压迫的关系的同时，极大地排除了种族压迫或民族压迫的问题；在策略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呼吁妇女团体或妇女运动将社会各部分的女性联合起来，但她们的有色人种姐妹却通常不信任当代妇女运动，并通常仍然参加自己团体的行动。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自产生以来，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理论进展，但它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一）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盛行于美国的女性主义思潮）之后形成的一个女性主义流派，是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研究女性问题的方法或思潮，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女性主义的重要转向。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克瑞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于 1975 年使用的。她在《主要的敌人：对妇女压迫的唯物主义分析》（*The Main Enemy: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1977）一书中指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把压迫看作最基本的现实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妇女和所有被压迫团体需要用唯物主义去考察他（她）们的状况的原因。① 而其流行的观念则根植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读本》的作者将它描述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以及关于意义和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学等几种话语共生的产物”②。在这几种话语之中，“后现代”是界定这一流派的基本特征和源泉，由此与

①② Rosemary Hennessa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1997, p. 7.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区分开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那些自我标榜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著述之中，这主要有：库恩(Kuhn)与沃尔佩(Wolpe)编著的《唯物主义与女性主义》(*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1978)、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著的《妇女问题：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评论》(*Women's Question: Essays for a Materialist Feminism*, 1995)、克丽丝·英格拉汉姆(Chrys Ingraham)与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读本》(*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1997)以及兰德里(Landry)和麦克林(Maclean)合著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Materialist Feminisms*, 1993)等。

在基本立场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自称是和马克思主义保持一致的。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导言中，兰德里和麦克林自认为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她们的著作是一本"关于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

早期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她们的出发点。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持批判态度，但她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都同意把妇女压迫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语境中加以研究，审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生产与再生产的联结、意识形态、国家和法律制度等如何在家庭内外施加影响并再生产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尽管这一流派内部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但她们都使用了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唯物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编者库恩与沃尔佩明确采用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定义："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①

不过，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库恩与沃尔佩看来，马克思主义缺少对于劳动中的性别分工的分析以及对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男/女两性关系的生产方式的所有其他方面的分析，它不可能对妇女压迫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因而必须予以改造。

---

① Annette Kuhn and Ann Marie Wolpe (eds.),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 7.



兰德里和麦克林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主义的、阶级还原论的和忽略了文化与意识形态作用的。兰德里和麦克林指出：

>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坚持以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中心，并围绕这一中心矛盾试图以不同方式分析性别压迫。除了阶级矛盾和性别意识形态内的矛盾之外……我们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也应将其他矛盾当作物质方面的矛盾来认可。这些矛盾也有其历史且作用于意识形态，它们植根于物质的基础……它们应在自称为唯物主义的社会分析和文学分析中被赋予物质的重要性……这些范畴将包括……种族、性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伴的激进批判。[①]

如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植根于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持拒斥态度。

(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

按其观点的实质内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或者更明显地倾向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主要有德尔菲、莉丝·沃格尔和珍·威克(Jennifer Wicke)等；或者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这主要有英格拉汉姆、罗斯玛丽·亨尼西和兰德里等。

在1980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可能的》("A Materialist Feminism is Possible")一文中，德尔菲指出，女性主义理论"从压迫出发规定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压迫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概念"[②]。对于德尔菲来说，家庭或家庭生产方式是家庭剥削的场所和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她认为，婚姻是给予男人剥削妇女的权利的劳动契约，在家庭的背景下占用她们的劳动或控制她们的工资或其他市场收入；它是一种奴隶的关系。德尔菲在生殖方式的组织中寻找性别分工的结构基础，而不是探讨性别分工的社会结构。她试图确认把男人和女人置于不平等关系的物质条件。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家庭背景而忽视社会变化因素的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珍·威克的观点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主张考察社会等级(包括性别等级)在其中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它避免把性别等级看作仅是父权制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看作社会和心理作用相互交织的结果，这些社会

①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Routledge, 1993, p. 229.

② Christine Delphy, "A Materialist Feminism is Possible", *Feminist Review*, No. 4, 1980, p. 15.

和心理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物质的、历史的因素。她指出，所谓“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认为各种物质条件在性的社会生产中都发挥关键的作用，并要求分析妇女参与这种生产的不同方式。[①]

莉丝·沃格尔虽然自称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不过，她1995年出版的文集明确地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为标题。[②] 根据她的理解，“唯物主义”一词是用来强调生产(包括家庭生产)在决定导致妇女被压迫的条件中的关键作用。她严肃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且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在于再生产。这种分析也是牢牢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③]

与上述三位学者不同，还有些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深受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张根据偶然性、当下的权力关系或话语来分析、理解社会生活，几乎全部聚焦于意识形态、国家与文化实践、身体的意义及快乐等问题，主张对社会生活的当下的、偶然性的解释。这些学者拒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观点以及社会变革的主张，不再考虑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起过关键作用的社会结构、生产、父权制、阶级等概念。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也被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美国学者亨尼西在其《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读本》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话语政治学》(*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1993)等书中阐发了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看法。

亨尼西追踪了英国和法国女性主义者著作中“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起源。她认为，英国和法国女性主义者更喜欢“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一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她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改变以便能够解释劳动的性别分工。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其阶级偏见和关注于生产而难以完成这一任务；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质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妇女”概念，女性主义也是成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会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概念的原因。亨尼西指出，后现代的批判结合了那些没有把自身包括在“一般妇女”主体中的知识女性发出的批评声音，在20世纪90年代促成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出现，即把“妇女”看作是同类的经验整体以便探讨“妇女”作为一个话语范畴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不过，亨尼西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否定总体以及社

---

① Jennifer Wiche, “Celebrity Material: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Culture of Celebrity”,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93, no. 4 1994.

② Liss Vogel, *Women's Question: Essays for a Materialist Feminism*, Routledge, 1995.

③ 俞吾金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页。

会体系的理论分析，而由于妇女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受世界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影响，“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必须坚持对影响妇女生活的总体即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

亨尼西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综合了文化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 当许多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的分析是唯物主义的，甚至在她们自称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实质上是文化唯物主义，反对系统的、反资本主义的分析，把文化的历史和意义的产生与资本的阶级体制相联系，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对概念的选择中把知识的生产、身份的形成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球体制相联系，在这层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正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①

在对拉克劳与墨菲、福柯、克里斯蒂娃以及其他一些后现代理论家的批判中，亨尼西形成了关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特征的观点。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阅读的方式”。这种方式拒绝占统治地位的多元范式与偶然性逻辑，并试图在那些被话语建构起来并且相互区别的主体性（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化中它们业已代替了“妇女”这个类概念）与那些剥削、压迫妇女的不平等制度之间建立起联系。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似乎要赋予一切事物以物质性（也许指的就是客观性、现实性以及同等的因果效力）。亨尼西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混合了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主体理论，是一种解释、重写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它把解构的阅读实践作为政治批判的工具，但它并不准备解释或改变那些将妇女压迫与阶级联系起来的物质现实。

克丽丝·英格拉汉姆则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拒绝历史唯物主义，把分析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同其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孤立起来）做了如下区分：“同文化女性主义不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不把文化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整体，而只是看作社会生产的一个领域，因而只是女性主义斗争的一个领域。”②在她看来，

---

①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p. 5.

②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p. 7.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若干种话语（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意义和主体性的后现代和心理分析理论）的最终产物，在这当中，后现代的介入是其明确特征的来源。①

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一书中，兰德里和麦克林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阅读实践……这种对文化以及社会历史中的人工制品，包括文学与艺术文本、档案文件以及理论著作的批判性研究，从而为……政治论争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场所”。这种对文化的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解答，实质上着重关注与女性、有色人种以及其他边缘人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显然，兰德里和麦克林基于后结构主义而拒绝马克思主义，她们把“妇女”解构为一个分析范畴，关注“话语的”性别、团体以及妇女中的多样化区别，从而切断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形成大多数妇女生活的现实条件之间的联系。

在理论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反复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时，实际上表现了它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主义的和非辩证的理解，因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质，并且使这一流派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这一问题显得含糊不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生产方式决定了各种劳动过程和实践的其他形式，而实践辩证地改造了自然和人性、存在和意识、身体和关于身体的话语等。无论是关于身体的还是其他事物的物质，只有被历史地、具体地提出，才能有理论和政治意义。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脱离现实社会历史关系，过分强调解构性的阅读实践，这就割裂了实践和话语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内在的辩证联系。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也有着明显的主观性、相对性的局限。它把“妇女”作为一种分析、解构的范畴，关注“话语地”建构起来的性别、性行为、身体和妇女间的多元差异，已经中断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塑造了大多数妇女生活的那些现实条件之间的联系。这就把一切都看作是相对的、偶然的并且是话语地建构的。然而，妇女压迫不是一个故事、一个文本，或解释、阅读世界的一种方式，政治被还原为对世界的重写或重述，还原为一个从话语的物质性推导出的结论，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现实，从而暴露出明显的抽象思辨色彩。

在解读实践中，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明显表现出立场上的不确定

---

①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1997, p. 7.



性与概念上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读本》的导言中，作者一方面自称赞成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声称："一个女性主义者并不一定就是反资本主义者，同时，一个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并不等于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甚至也不等于是不满于现状的……她并不准备解释或改变那些将妇女压迫与阶级联系起来的物质现实。"①正如《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实质是什么?》一文的作者玛莎·E. 吉梅内兹(Martha E. Gimenez)所指出的：

> 亨尼西和英格拉汉姆认为有必要保持被概念化为意识形态的话语与压迫妇女相关的"全球性分析"、父权制以及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尽管如此，她们的努力不仅不足以把当代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从其明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中拯救出来，并且还增加了这一概念的歧义性。②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实践上不能有效地变革现实。它假定了语言和话语的物质性，这只会导致一种话语决定论，这种决定论破坏了话语的物质性本应起的作用。由于妇女生存境遇日益恶化的客观现实，那种认为一切都是社会地或话语地建构的观念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站得住脚。实际上，在处理对于影响现实的妇女生活的物质条件时，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明显是无能为力的。

总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割裂了存在和意识、话语和其可能性的物质条件之间的本质联系，当它反对作为"经济主义的"劳动和生产方式的物质性(如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现实和因果效力)时，假设了话语的物质性和任何可能"外在于"话语的事物。正如艾伯特正确地指出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今天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唯物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③

本章小结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女权运动第二波产生出来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传统女权运动的延续，又是探究妇女受压迫和妇女解放问

① 俞吾金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09》，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75—376 页。
② 俞吾金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09》，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0 页。
③ 俞吾金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09》，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2 页。

题的新的理论尝试。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社会女性问题相联系，形成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等基本流派，在研究的对象、内容、问题和目标上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它们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分析、解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和妇女解放的条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父权制的同时，展望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女性解放的根本重要性。随着这一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联姻，这一理论愈加注重精神分析、意识形态批判和话语的分析与对话等方面，这对于克服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人们的禁锢有着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

思考题

1. 什么是新女权运动？它是如何演变的？
2. 如何理解“新左派”对新女权运动的影响？
3. 简述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基本内容。
4. 如何理解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5. 如何理解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6. 试述女性主义运动中“家务劳动争论”的基本内容。
7. 如何理解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

阅读书目

1. [美]海底·哈特曼：《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2. [美] 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3. [英]沃特金斯：《女性主义》，朱侃如译，广州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
5. 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
6.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原苏联、东欧地区

要点提示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南斯拉夫实践学派
◎布达佩斯激进学派
◎波兰意识形态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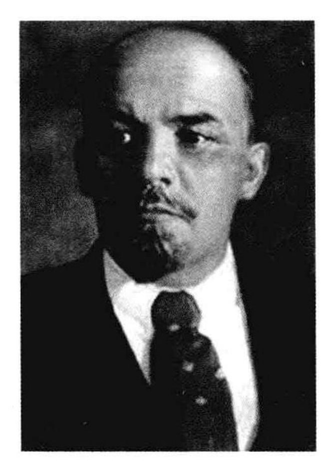
伴随着俄国革命的发展，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列宁主义，这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中，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僵化理论与实践模式，逐渐导致了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原苏东国家的理论家们尝试探索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形成了以南斯拉夫实践学派、布达佩斯激进学派和波兰意识形态学派等为代表的多个"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建立了各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虽然难免有其局限性，但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理论贡献。

第一节　原苏联地区的马克思主义

一、列宁主义的诞生及其完整思想体系的形成

列宁（1870—1924），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

他的笔名。列宁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布尔什维克党创建者、苏联缔造者。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理论。被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广泛认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


列宁(1870－1924)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它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革命形势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逐渐为革命的高涨所取代。列宁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特征，积极准备无产阶级革命，创立了有别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并投身于俄国 1905 年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适时提出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及时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道路，推动了俄国革命的迅速发展，为无产阶级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同时，列宁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及时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创立了列宁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贡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从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到 1905 年之前

列宁从少年时期开始就倾向于革命，并在求学的过程中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青年时期他来到彼得堡，积极参加了工人革命运动，成为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之后又成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主要代表。这期间，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先后在理论上批判了自由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以及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1902 年 3 月，列宁完成了《怎么办?》一书，全面地批判了经济派，从思想上粉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理论，阐述了建立新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建党的思想基础。1904 年 2 月至 5 月，他又写下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深刻地批判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全面阐明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丰富了马克思主



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至此，在俄国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问题已基本解决。

(二)从 1905 年俄国民主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1905 年 1 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出自己的路线和策略方针，以便正确解决无产阶级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905 年 7 月，列宁写下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动力、道路和前途，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于指导俄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都有重要意义。1905 年革命的失败，引发了革命队伍中的思想混乱。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大肆宣扬“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为此，1909 年列宁出版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全书对经验批判主义作了系统、详尽的批判，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阐明了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本书虽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但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人们的种种幻想，证明了帝国主义是一切灾难的根源。针对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并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列宁撰写了《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战争和俄国民主党》(1914)、《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等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和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战争与和平、民族殖民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关于国家与革命、关于民族殖民地等重要理论思想，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谬论，也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另外，在这一时期列宁还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以及黑格尔的《逻辑学》，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即《哲学笔记》)。此书虽不是系统的专著，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带有极大启发性的哲学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全面的阐述和发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可见，在这个阶段列宁主义经历

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开始初步形成科学体系。

(四)从1917年10月革命胜利到列宁去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诞生，实践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理论。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却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列宁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列宁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理论上论证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指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革命意义在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善于把握历史的机遇，不能因为死守所谓的历史规律而失去良机，要善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作相应的改变。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即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其次，列宁对苏联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经历了巩固红色政权的战争时期，然后才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战争时期，苏联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后和平建设时期，则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使苏联迅速摆脱了困境，工农业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极大的发展，同时它也为革命胜利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探索出了一条道路。通过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实践，列宁发展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这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此外，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在探索上述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还同时阐发了许多富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宝库。例如，列宁提出了生活的公式高于书本的公式，理论的生命力存在于实践之中，应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作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论述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提出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阐明了前进与后退、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辩证法，并于1922年3月写下了他在逝世前的一篇重要的战斗哲学檄文《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论文是列宁对十月革命后哲学领域斗争及特点的深刻总结，是列宁关于哲学党性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体现了无产阶级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对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纲领性价值。

列宁作为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登上政治舞台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了帝国主义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斗争以及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过渡与和平建设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理论思想和观点，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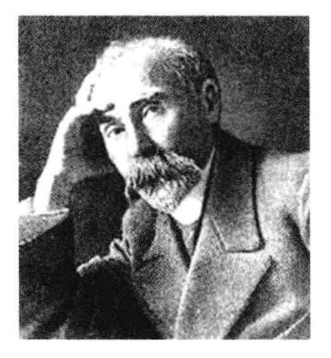
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使列宁主义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一)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贡献

瓦·彼·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袖、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

瓦·彼·普列汉诺夫早期参加民粹主义运动，19 世纪 80 年代转入马克思主义阵营，早在 1883 年他就同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共同创立了劳动社，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始同民粹主义决裂。他写作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诸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唯物主义史论丛》(1893)、《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898)等，宣传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抨击了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民粹主义的错误理论，即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民主革命，借助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企图进行批判。他的著作滋养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影响也很大。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他多次和恩格斯见面，并保持通信上的联系。1905 年革命失败后，他坚定地捍卫党，反对取消主义和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和列宁一道建立护党联盟。



瓦·彼·普列汉诺夫(1856—1918)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结束了几十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进入了其生涯中最有争议的阶段。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俄国国情的认识，他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反对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应当继续深入和完成民主革命。他认为，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在一国的生产方式还能促进该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的时候，它决不会退出该国的历史舞台；并且认为，没有根据断言俄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俄国不仅承受着资本主义带来的困难，而且也承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所带来的灾难，因而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普列汉诺夫重申恩格斯的观点：工人阶级最大的

历史灾难莫过于还没有准备好就夺取政权。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显得保守，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也证明了普列汉诺夫主张的失败，不过，苏联后来的历史，特别是斯大林主政期间的社会政治现实表明，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的审慎无疑是值得认真关注的。总之，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布哈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苏联（苏俄）建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涌现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比较著名的有布哈林（1888－1938）、德波林（1881－1963）等人。其中布哈林的影响比较大，争论也较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他曾经被誉为“党内头号思想家”。列宁逝世后，他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在战胜“新反对派”和托季联盟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由于和斯大林的分歧于1929 年被解职。大清洗时于 1938 年被处决。

布哈林的理论和观点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在学生时期，布哈林就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1912年秋他与列宁会面后，接受列宁的建议，开始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从此就开始从事大量的著述工作并积极参加国外的工人运动。在 1915 年至 1916 年间，他完成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把世界经济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当时的世界经济无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在同时撰写的


布哈林（1888－1938）

《论帝国主义的国家理论》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等文章中，他提出必须敌视和炸毁资产阶级国家，而国家也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列宁曾质疑这一提法，但 1917 年列宁自己也使用了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提法。布哈林认为，在帝国主义时期，俄国面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问题已不能独立存在，民族自决权已无必要，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民族问题。相比而言，列宁则坚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认为俄国当时的任务是进行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在民族问题上应坚持民



族自决权的原则。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布哈林回国进入了《真理报》编委会。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抓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工作，编辑党报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在国内战争时期，布哈林写了《共产主义 ABC》和《过渡时期经济学》两本重要著作。列宁认为，《共产主义 ABC》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它对俄共党纲“作了极好的解释”；而《过渡时期经济学》试图揭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和规律，这是对过渡时期经济规律最早的系统、认真的探讨，布哈林也因此成为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积极支持苏联（苏俄）1918 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对 1921 年苏联（苏俄）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同样积极拥护。在这期间，他提出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从保护社会生产力出发处理好经济建设中的多种比例平衡关系等富有见地的思想。他冷静地分析俄国的国情，承认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俄国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

布哈林在 1924 年至 1927 年同托洛茨基派、1928 年至 1929 年同斯大林的争论中竭尽全力捍卫并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列宁在逝世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写作了《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5）、《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1926）、《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列宁的政治遗嘱》（1929）等文章。布哈林认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真正政策，是能利用一切经济力量并且真正提高国家生产力的经济政策，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它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发展。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政策的标准，是布哈林的一个重要思想。正因为如此，他主张扩大商品流通，通过市场关系加强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同时也通过市场关系、通过竞争逐步排挤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存在小生产，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必须搞商品生产，利用市场关系。而既然存在市场关系，就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利用价值规律为我们服务。制订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把价值规律的作用考虑在内。布哈林还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尚未完全建立的时候，应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允许私人贸易，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手段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排挤和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形

式。这些主张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可见，布哈林在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脉络与列宁的思想发展基本上是一致的。

1928年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的思想开始同斯大林的主张发生尖锐的冲突。布哈林反对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反对中断新经济政策的企图；既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农民当作殖民掠夺对象，也反对斯大林的“贡款”论。而由于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逐渐形成了多数，布哈林被戴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1929年4月，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同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解除了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之后布哈林再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并于1938年3月15日被处决。

(三)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1953)，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苏联领导人，曾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1879—1953)

斯大林中学读书期间开始研读马克思的作品并参加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1903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派，1912年2月被选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主编党的机关报《真理报》，1917年协助列宁组织和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曾多次被流放和监禁。

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从1917年5月至1952年10月连续当选为苏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年至1952年10月连续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首先，斯大林捍卫和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思想。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次，斯大林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的学说作了发挥，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斯大林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有重要意义。此外，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8)和《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等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斯大林的思想通常被归结为"斯大林主义",在这一一开始就有着反思、批判意蕴的提法中,其内容主要包括:其一,"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这是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论战时提出的,也是斯大林思想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断言。这一断言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含义,而且美化了列宁曾经谴责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之类的东西。其二,在国家"消亡"以前,必须大大强化国家。其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会加剧。①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是对列宁晚年继"一国胜利论"之后所思考的"一国建成论"的继承与公开论证。在列宁那里,"一国建成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是对经济技术落后的俄国通过迂回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一国建成论"不但在一段时期内,而且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可以不把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发生和胜利作为自己的必要前提。②

在1925年5月俄共(布)第14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首次正式提出"一国建成论"。在之后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文章中,斯大林最终论证并完成了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这一理论是马列主义的组成部分,它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就是,经济上的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政治上的坚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坚持共产党对这个政权的领导;意识形态上的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

不过,在实行在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基础上的高速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他也实行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政策,例如,违反工农联盟的原则,用挤挖农民的办法来积累工业化资金;扩大分配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搞等级制,为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权开了绿灯;不切合实际地宣布阶级斗争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而结束,结果无法正确分析

---

① [英]汤姆·博托莫尔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0页。

② 卢之超、王正泉编著:《斯大林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8页。

日益激烈的党内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党内斗争同一般刑事犯罪的区别，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①

尽管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表现出了很多的局限，这主要在于人们所关注的僵化的斯大林模式问题上。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病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在经济上，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方法，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政治上，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在文化上，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权集中于党，领袖言论成为真理与错误的唯一判断标准，舆论高度一律。

马克思主义作为苏维埃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最终转变成简单、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这在根本上是斯大林主义者在 1931 年后对苏维埃思想生活干预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斯大林 1924 年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将列宁思想慢慢地变成了具有权威地位的圣典，列宁主义被确立为党的“官方”路线，它不允许批评与反对，否则一概被斥为异端。列宁去世后，在 1924 年 12 月到 1926 年 1 月斯大林和布哈林在论战期间所阐发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中，斯大林强调，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趋近，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国家就应该越强硬，这在确立党的共同威信的同时也凸出了斯大林在所有理论问题上神圣的个人权威。1938 年编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 年出版)将马克思主义法典化，本书虽简明扼要，但也明显存在着理论上的简单、偏狭，比如其主要疏漏是列宁和恩格斯都曾提出的概念，即“否定之否定”。总而言之，被神圣化了的斯大林理论支配了理论界，缺失了批评、讨论氛围的理论界丧失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情况灵活、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的契机，难免陷入专断、僵化的教条主义误区。

(四)二战之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

从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历史逐渐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苏联面对战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背景，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讨并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复杂的实践道路。其一，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初期。这个时期，苏联整个思想界、理论文化界开始出现日趋活跃的局面，并开始探索从战争转向和平的一系列社

① 戴开尧、胡石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26 页。



会新问题，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错过了体制转轨与观念转变的最佳时期。其二，从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和平与发展已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时期三个不同阶段的改革，却始终未能从理论思维的高度真正解决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从而再一次贻误了改革时机。其三，从 8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末期。这是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掀起了改革新浪潮。而这时在苏联处于执政地位的戈尔巴乔夫却提出了他的所谓改革纲领，即对社会主义进行人道主义和道德解读的“新思维”理论：专注于人道主义价值观而非阶级价值观，强调个人的需求和利益的重要性，把道德和生存问题看成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由物质状况和社会关系所限定的纯粹的个人生活准则和信仰则不再重要。由此，他提出，苏联的改革要实行“经济市场化＋产权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三位一体，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使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当代出现了空前的大曲折。

（五）苏东剧变后原苏联地区马克思主义的状况

1991 年“8・19”事件之后，随着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宣布为非法，苏共和俄共全部财产被没收，苏联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共潮流，他们肆无忌惮地谩骂共产党，咒骂列宁和斯大林，全国上下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受到排斥和打击，一些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者受到了迫害，有的被迫改行。苏联时代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经两次易名，最后改为“俄罗斯独立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所”。教科书中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全部被剔除，代之以欧洲哲学等内容，后来在俄罗斯新出版的哲学著作中虽然也提及了马克思哲学，却只把它作为人类哲学中一位普通哲学家的哲学，并把它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简要地进行了阐述。而列宁哲学和列宁阶段的问题却只字未提，对于 1917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哲学更是未加理会，致使这段哲学史出现巨大空白。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相互关系等理论，虽然提及较多，却极力回避“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主要的哲学概念。在这一时期，公开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以尤里・阿洁西耶夫为代表的“声讨派”。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声讨派”就主张改革苏联的政治体制，要求彻底清除“斯大林主义”及其影响。苏联解体后，他们先后出版了《谁为历史负责》等政治文集，否定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认为



共产党的领导是造成一切弊端与失误的总根源。与此同时，一些原著名学者也纷纷写文章宣传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这些都对俄国思想界起到了极大的蛊惑性作用。

然而，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在俄罗斯也出现了反思斯大林的错误、尝试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派别，这主要是以奥鲁杰夫、布兹加林、斯米拉诺夫、科齐科夫等一批尚具有理智的学者为代表的“反思派”和以莫罗佐娃为代表的“复兴派”。面对“声讨派”的种种言论，“反思派”给予了严厉驳斥。奥鲁杰夫认为，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全面评价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心问题，即对所谓“斯大林模式”的评价问题，要具体分析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客观地评价其进步作用和弊端局限。经济学教授布兹加林则认为，苏联过去产生的失误和弊端，其根源在于经济、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具体运作环节出现了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苏联社会主义是比较正常的，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能因此而放弃目标。斯米拉诺夫也驳斥了那些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他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现在就断言社会主义已完全失去历史发展前途还为时过早，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也并非是拯救俄罗斯的万能药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将是永久的。而对于学术界连续多年盲目攻击共产主义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背叛历史”的观点，科齐科夫则给予了公开驳斥，并肯定马克思主义仍体现着“真理的内核”。与此同时，“复兴派”代表人物莫罗佐娃于1993年底曾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隧道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一文，她认为，虽然目前现实社会主义面临危机，但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复兴。为此，她认为目前要集中力量做好理论工作，克服当前各种极端错误倾向，保护好社会主义的萌芽，诸如集体主义、平等、无私、互助等。经济学家柯索拉波夫则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复兴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要真正复兴，只有强化全民所有制的主导作用，确立非官僚主义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才有可能，而引进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等资本主义的方法只能给社会主义带来新的困难和混乱。同时他还在《“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文中谈道：“关于社会主义是否灭亡或有无前途的争论，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能否摆脱俄罗斯困境的争论，可以从中国那里得到问题的一种答案。”

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俄罗斯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和由安德列耶娃领导的全联盟共产党（布）为首



的正统派，他们表示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也忠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反对俄罗斯社会流行的市场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及民主社会主义。这派观点目前在俄很难得到大众的支持，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二是俄共的“新社会主义”观点。1995 年 1 月，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定义，即没有人剥削人的，按劳动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生活资料的无阶级社会。同时还基于当前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俄共已不处于领导地位的事实，提出了分三个阶段使俄罗斯走向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是民主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自身发展阶段。俄共提出的“新社会主义”观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三是左翼学者的社会主义观点。他们研究的问题比较广泛，人数也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布兹加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他试图抛弃旧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并公开宣称自己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其标准是保证获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效益，保证人更自由、和谐发展。布兹加林的理论具有片面性和不完整性的局限。

在当今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奥伊则尔曼。他的学术倾向与以上学者都有不同，主要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进行批判反思，可以被称作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唯一一位始终从事马克思主义批判工作的原苏联哲学家，近年来出版了专著《作为哲学史的哲学》(1999)、《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2003)、《为修正主义辩护》(2005)。2006 年他出版了名为《问题》的社会、政治、哲学论文集，其中部分内容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奥伊则尔曼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

如今，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走下神坛，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教条转变为在哲学和科学思想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之一。就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而言，呈现出了自由开放的研究氛围，当代学者展开了深入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回归。

◎第二节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诸流派◎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欧非斯大林化过程中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至少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出发的)理论家，

从社会主义内部反叛斯大林主义，并对教条主义进行激进的批判，致力于从总体上重建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以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坎格尔加和斯托扬诺维奇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学派；以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等人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以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波兰意识形态学派。

一、南斯拉夫实践学派

实践派主要分布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两个哲学中心。实践派人物众多，主要代表人物达20余位。贝尔格莱德实践派的代表人物有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考拉奇（Veljko Korać）、日沃基奇（Miladin Životić）和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ć）等，萨格勒布实践派的代表人物有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弗兰尼茨基（Pedrag Vranicki）、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波什尼亚克（Branko Bošnjak）等。实践派成员中没有突出的权威，人人各有独特的见解；实践派也没有严格的组织规章制度，它是一个凭借共同的人道主义信念的维系而成功地合作20余年的自发的知识分子团体。

（一）南斯拉夫实践学派的由来与发展

实践派的历史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批判斯大林主义，形成人本主义立场的时期。1948年突发的苏南冲突，促成了南斯拉夫哲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思批判斯大林主义模式的错误，这一工作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全社会和所有民族的首要任务。1951年至1953年间，对斯大林主义的哲学批判达到了第一次高潮。批判者们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著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得出了较为简单、较为温和的批判性结论：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要表现为割裂理论与方法，即割裂唯物论与辩证法以及割裂逻辑学与辩证法；同时表现为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进而否定辩证法本身等等。从1953年起，弗兰尼茨基编译的包括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1953）出版，它一下子激起一批渴求新哲学立场的青年哲学家的极大兴趣。一些年轻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开始由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批判斯大林主义，政治界和理论界都积极弘扬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消灭旧式分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等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精神。1958年，苏联针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1958）而同东



欧其他国家一起加紧对南斯拉夫的理论讨伐，由此激起了南斯拉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第二次高潮。从青年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以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和弗兰尼茨基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否定形式或异化形式，其要害是根本否认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地位，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这种新的批判理解导致南斯拉夫哲学界中人道主义派与辩证唯物主义派的分裂。

第二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初人道主义派同辩证唯物主义派进行直接的理论交锋的时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从批判斯大林主义转而对辩证唯物主义本身进行批判，针对反映论和自然辩证法问题并试图超越这一哲学立场。在"布莱德会议"上，以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坎格尔加等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哲学家，从本体论、认识论、人本学、伦理学、美学和哲学史等不同方面对反映论立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反映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范畴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范畴，因为它不能揭示认识的本质，同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相悖；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不是给定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自然不是自在地呈现在人的面前，而是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而与人相联的，属人的自然（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因而，应当从实践出发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认识和思维确定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或内在环节。尽管以斯托伊科维奇、涅戴里科维奇和舍希奇等为首的辩证唯物主义派哲学家继续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反映形式的多样性以及较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出发捍卫反映论立场，但人道主义派在反映论问题上的观点取得了主导地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半期，两派哲学家又围绕着自然本身是否存在辩证法，即自然辩证法是否成立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辩证唯物主义派认为，如果不假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就无法解释人及其历史辩证法的起源，也无法说明自然界的许多带有辩证特征的现象。人道主义派则认为，自在自然本身对人无直接意义，不能一般地谈论自然辩证法。"运动本身并非辩证法的特征"，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在于对给定性的否定，在于自我否定，因此，"只有在存在人的历史的地方才存在辩证法，在人的历史活动之外没有辩证法"[①]。在与

① 引自衣俊卿：《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4 页。



辩证唯物主义派的论战中和在自己的理论创作中，人道主义派哲学家比较系统地重新阐述了人、实践、自由、决定论、历史、社会、个性、辩证法、真理、异化、扬弃异化等哲学范畴，奠定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实践哲学的一般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下列著作之中：普·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History of Marxism*, 1961)、米·马尔科维奇的《辩证的意义论》(*Dialectical Theory of Meaning*, 1961)、维里科·科拉奇的《马克思和现代社会学》(*Marx and Modern Sociology*, 1962)、米兰·坎格尔加的《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The Ethical Problem in Karl Marx's Works*, 1963)、加约·彼特洛维奇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Philosophy and Marxism*, 1965)、卢迪·苏佩克(*Rudi Supek*)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Sociology and Socialism*, 1966)、弗兰尼茨基的《人和历史》(*People and History*, 1966)等。这些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人道主义派的观点。

第三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实践派理论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1964 年，实践派创办了《实践》杂志，并因此得名而更多地被称作"实践派"。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实践派的关注中心从一般的理论问题转到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从对人的存在结构（实践）的一般哲学沉思转到对当代世界和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批判分析。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作为实践哲学的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不能停留为一般的哲学争论或纯学术的理论探讨，而应当以 60 年代初建立起的实践哲学的一般理论原则为基点，对现存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批判分析。在《实践》杂志创刊后的 10 年间，实践派哲学家以《实践》(1964—1974)、科尔丘拉夏令学园(1963—1973)以及从 1966 年开始采取实践立场的《哲学》杂志为论坛，组织了一系列的国内和国际哲学会议，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0 年间，实践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实践哲学，成为南斯拉夫哲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哲学派别。实践派的影响并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领域，而是涉及社会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哲学史等领域。人道主义精神或人本主义倾向在整个哲学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期间，实践派哲学家同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戈德曼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广泛交往与对话，使南斯拉夫哲学第一次在国际哲学论坛上取得一席地位，获得了国际承认，受到了布洛赫、弗洛姆、戈德曼等



人的高度评价。

20世纪60年代后期，实践派的批判立场同政界发生了分歧和冲突。1974年《实践》与《哲学》杂志双双被迫停刊，科尔丘拉夏令园停办。1975年1月，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解除马尔科维奇、达迪奇(Ljubomir Tadić)、日沃基奇、哥鲁波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米丘诺维奇(Dragoljub Mić unović)、印基奇(Trivo Indić)和波波夫(Nebojša Popov)8名实践派哲学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教学职务，实践派历时10年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进入80年代后，实践派解体了，其成员主要是作为单独的哲学家参与国内外哲学界的学术活动。

(二)南斯拉夫实践学派的主要观点

实践派哲学所体现的根本精神或基本立场是哲学人本主义，实践派哲学家批判反映论，否定自然辩证法，力图超越片面地强调客观性原则及其对世界"是什么"的客观描述，其宗旨就是要把人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把人的活动视作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以人的实践为基础建构起人本主义的世界观模式。在实践派看来，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从本质上、从整体上是人道主义，其具体表现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哲学。

1.关于人的实践本质的思考

实践派哲学家认为，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理解并不能真正解决认识的本质问题，因为这种见解把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当成给定的存在，把实践作为外在的联系嵌入主体与客体之间。这实际上是把实践限定为认识论范畴，其结果是极大地限制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应有的地位。因此，实践派哲学家努力突破实践范畴的认识论局限，首先将之视作人本主义和本体论范畴。第一，实践派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实践作为普遍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和自我创造的活动，不只是人的某一特殊方面或某种特殊活动，因此，实践不是从某一方面，而是从存在方式和结构方面把人与其他动物根本地区别开来。人由此摆脱了动物式的片面地依赖于自然界给定环境的状态，按照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活动固有的内在尺度和所有种类的普遍尺度而不断再生产自身与对象世界。第二，实践作为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包括了人的存在的所有方面，是人的各种活动和各个方面的总体或统一体。一方面，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总体，包含感性的、物质的、意识的、精神的、情感的等各种活动形式于自身，只有理性逻辑才能将它们抽象为不同的东西；它同时也是人的各种属性和潜能(理性、意识、情感、直觉、感觉、意志、本能等)的统一体，因而，自由、创造性、社会性、目的性等构成实践的(即人的本质)

的内在规律性。另一方面，实践活动的本性决定了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保持不变，都不会被动地面对给定性，而是不断地扬弃自然性和给定性，不断地指向未来。这样，人作为实践存在物，就具有永恒的不完善特征，换言之，历史性、超越性、不完善性、开放性也是实践（人的本质）的必然规定性。坎格尔加认为，实践活动"是属人的，即历史的世界或精神与肉体、精神性与物质性、本质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人与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句话，它是属人的，即历史的世界或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统一体。"①第三，实践是人的世界的基础，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其物质性而在于实践。实践派认为，不应把实践作为认识的环节引入认识论，相反，应当把认识确定为实践总体的内在环节或形式。认识的主体与客体都不是给定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人的认识对象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确立的，人不仅在认识中设定对象，也现实地再生产出活动的主体与客体。因此，人通过自由的、创造性的、普遍的和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不断再生产自身与自己的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都在这种现象的活动中统一起来。坎格尔加有代表性地表达了他们的实践观点：

> 人的本质既非精神也非物质……而是为其创造所有人之可能性的人的历史性活动。同样，世界的统一性（由于对人而言只存在人的、历史性的世界），一方面，不在于上帝、精神或精神性，另一方面，也不在于其物质性，而在于人的创造性活动，在于实践。②

2. 异化理论与社会批判理论

实践派的异化观主要包含下列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从人的本质活动的角度来理解异化的本质，把异化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坎格尔加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既存和现存，而在于人能够和应当成为的东西，因而，人既不是从上帝那里异化，也不是从人的理念或理想那里异化，而是从"未来"异化。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人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不断通过自己的活动重新生产出自身和自己的世界，这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但是这一活动本身就包含着否定的可能性——人在扬弃自然性和给定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否定因素。第二，实践派强调，不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异化结构和异化现象，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依然存在。以此，他们对充斥当代世界的普遍的异化力量进行了批判，尤其对政治异化、意识形态和技术理性进行了批判，从而发展出了

①② 引自衣俊卿：《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30 页。

社会批判理论。实践派哲学家认为，政治本质上是一个异化的领域，只要社会中还存在着“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分工，只要人们还分为那些进行决策的人和那些只能服从并依据这些决策从事活动的人，社会的政治生活就必然是异化的，其直接后果是官僚制的强化。因而，实践派哲学家指出，尽管我们无法一下子使国家等政治力量消亡，但必须增强每个人的自主自律和参与意识，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以避免政治成为一种失控的自律发展的异化力量。实践派哲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实质上是颠倒的歪曲的社会意识，是异化世界的异化了的意识，其要害是使人们与现存体制和现存社会结构认同，从而使异化的世界永恒化与合理化，它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阻碍。因而，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是确立和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文化中人的解放的潜能。实践派哲学家认为，技术发展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迄今为止的自动化和劳动的科学组织并未真正使人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是使传统社会分工加深为“技术分工”，人更加片面，成为自律运转的机器系统的附属品或组成部分；技术时代出现了人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和本质归结为物质存在的异化现象，技术的影响渗透到人的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们把技术当作衡量一切乃至人类进步的最高标准。由此，人类对技术的发展不能放任自由，而应当持人道主义的批判的态度。第三，人类不可能在终极意义上一劳永逸地扬弃一切异化形式。自我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其根源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之中，在人的结构中不只是趋善的东西，也有作恶的东西。

3. *对革命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解*

实践派认为，革命是一个深刻的哲学范畴。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马克思设想的革命实质上不是一般的政治革命，也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它包含着对社会的改变和新人的造就两个方面。这种社会变革是对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和结构在总体上进行彻底的变革。对社会存在方式和结构的彻底变革离不开人的存在方式的改变。人具有超越性本质和异化的永恒性，革命本身不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是人之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存在方式的最高形式。基于对革命的这种认识，实践派哲学家认为，不应把社会主义设想为未来某种给定的状态，它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永不完结的过程，其核心就是逐步扬弃人的自我异化，逐步使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使人以自由的创造性的方式存在。社会主义的实质与核心是人道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生成”。“共产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人道主义，

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共产主义"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实践派哲学家一般都把自治当作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形式。

总之,实践、自由、异化、革命、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是实践哲学的主要范畴。它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而逐步实现将使"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终结的人类解放,即实现人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存在方式。

二、布达佩斯激进学派

布达佩斯学派是以哲学家卢卡奇为首的匈牙利新马克思主义派别。因其活动中心在布达佩斯而得名。该学派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主要代表人物除卢卡奇外,还有A.赫勒(Ágnes Heller)、M.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M.瓦伊达(Mihály Vajda)、F.费赫尔(Ferenc Fehér)、A.黑格杜斯(András Hegedüs)等。这些人同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派别有广泛联系,在国内外影响较大。

(一)布达佩斯激进学派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政治分歧,国家领导人纳吉力图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卢卡奇在哲学上发表与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见解,表示对纳吉的支持。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卢卡奇及其学生赫勒等积极参加非斯大林化运动,在"裴多菲俱乐部"批判"斯大林时代的歪曲",要求维护个人自由和主权,反对国家对新闻出版的控制;反对农业合作化,支持工人成立"工人委员会";排除共产党领导,要求实行多党政治;批判"教条主义"和"唯意志论",主张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改革"和"复兴"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文章和演说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在1956年10月酿成了全国性动乱。匈牙利十月事件被镇压后,卢卡奇和赫勒受到党纪处分,其思想观点也受到了批判。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自由化思潮重新抬头。卢卡奇重返哲学论坛,提出了"社会存在本体论"概念,进一步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化。他的学生和追随者纷纷以"社会存在本体论者"自称,著书立说,在官方政治路线之外正式形成了一个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学派。

1967年,卢卡奇重版了他40多年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再版前言中批判地重申了自己过去的基本观点。与之相配合,赫勒发表了《文

---

① 引自衣俊卿:《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页。

艺复兴时代的人》(*Renaissance Man*, 1967),黑格杜斯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ist Sociaty*, 1966)等,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欧美正在兴起的"新左派"运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所谓"布拉格之春","布达佩斯学派"策动学生上街游行,表示声援,并对苏联和本国政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抗议。匈牙利共产党对他们采取了严厉措施,在全国开展了反对"敌对"意识形态运动,使该学派在国内的势力大为削弱。而在进入80年代后,"布达佩斯学派"围绕纪念卢卡奇诞辰90周年(1975)和逝世10周年(1981)再次活跃起来。特别是1983年8月匈党中央文化政策部发表了《纪念乔治·卢卡奇100周年提纲》以来,该学派成员在政治上为卢卡奇恢复名誉的同时,在研究和"接受卢卡奇宝贵遗产"的口号下,从理论上继承和发挥了他的某些非正统观点。他们以人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实践概念,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多方面考察,着重批判了现存社会主义制度。

(二)布达佩斯激进学派的理论主题

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研究涉及十分宽泛的领域: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其中最能反映他们理论建树的是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涉及对人本身的认识、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核心是"激进哲学"与"激进民主制"。

1. 激进需要与激进哲学

布达佩斯学派把人本身作为哲学的主题,他们从社会性、劳动(对象化)、自由、意识、普遍性等方面探讨人的本质;从个体存在与类本质之间的分裂与矛盾来理解异化现象。赫勒主张在人的历史生成的"第二本性",即"心理一社会本性"中把握人的潜能和本质,注重人的需要的生成与满足,即人类的需要结构。因为按照赫勒的说法,一切文化都是需要、矛盾和日常生活问题的产物,需要的丰富程度及其满足的程度反映了人性丰富的程度,反映了人和社会发展的程度。赫勒认为,除了把他人当作纯粹手段这一需要之外,所有人的所有需要均应得到承认与满足。在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对需要的选择也必然是多元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形成一种对需要进行选择的民主化程序或系统。

> 最适合于规定需要满足先后顺序的系统是通过公众民主的争论来使决定本身制度化那样的系统:在这样的争论中,代表了相同的现实的需要的社会力量决定(总是通过意见一致的方式得到重复)何种需要满足应该优先于何种其他需要的满足(同样得到承认)。因而顺

序的建立并不以任何方式同意见一致的民主原理相冲突。①

"通过独裁的决定来禁止意在满足现存需要的对象化的出现",这种类型的需要管理称之为"对需要的专政",它不但阻碍多元需要的满足,而且为将他人用作工具的需要的满足提供了条件。因而,赫勒提出了"基本需要革命"的构想,即对现存需要结构的改造,从而在未来的联合生产者的共同体中产生一种新的需要结构。赫勒认为,这一基本需要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激进需要"和具有激进需要的个体的出现。所谓激进需要,是指那些产生于现存的以依附和统治为基础的社会之中,又无法在这种社会之中得以满足的需要。激进需要是多元的:每一个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通过合理的讨论而决定社会的发展及其内涵、方向和价值,自由选择的共同体的普遍化,人际关系的平等和社会统治的消除等等。激进需要的满足以超越现存社会为前提,旨在超越现存以统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消除那种把他人用作纯粹手段的需要。具有激进需要的人也就是具有革命特征的人。

激进需要的实现需要一种激进哲学。所谓激进哲学或激进主义(radicalism),从根本上说是对现存以依附和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的"总体批判"。激进哲学的基本任务是:发展"体现合理乌托邦的理想",指出目前人所应前进方向上的相对目标以及人在目前所应为之行动的目标;为自己的合理乌托邦建立一种社会理论,以探究这一乌托邦的"可能性";提出"一种生活方式",以激励"人的自由行动",使人性得到充分发展;为广义的政治行动制定计划。在赫勒的乌托邦理想中,要建立"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藉此消除所有统治,人人具有平等的权力,平等的人际交往和自主的活动将取代生产劳动和物质资料而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在道德上充分承认与尽可能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将人的自我保护作为义务,以达到类和个体的统一与丰富。

总之,布达佩斯学派的基本观点就是:立足于人的需要及其满足,通过人类需要结构的改造而达到人的个性的丰富以及个体与类的统一。

2.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国家与民主

以波兰尼(Karl Polanyi)的《伟大的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为代表,布达佩斯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国家和形式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理论上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① 引自[德]凯特琳·勒德雷尔主编:《人的需要》,邵晓光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2 页。



首先，布达佩斯学派承认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上阶级统治关系的存在，但是他们认为，阶级分析方法论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阶级只是作为趋势而存在，不存在两大对立的阶级，只存在多元的利益团体和社会层次。两大阶级的两极对立只是一个"消极的乌托邦"。其次，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重大转变的直接后果是国家职能的强化与转变，政治领域不再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附带现象，国家不再是单纯的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社会整体自我调节的机构"。瓦伊达指出："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为了剥削，而是为了社会生产而存在……国家作为政治压迫的机构，并非为了政治压迫，而是为了管理社会总体而存在。"①最后，在以混合经济和多元利益团体为特征的层次化社会和同经济领域（市民社会）相对分离的国家基础之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民主制，即"形式民主"。"形式民主"是布达佩斯学派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核心。

资本主义形式民主包含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形式民主的基础是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即国家同市民社会的相对分离。由此，国家不再是单纯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它作为社会总体自我调节的工具，具有一定的民主特征。第二，形式民主承认政治多元化。国家不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社会总体的"受托管人"，不同的利益集团均可以把自己的需要施加于国家，而国家做出相应的反响。第三，形式民主承认自由的公民权，由此而形成了个体全面和自由发展的观念。第四，形式民主促进政治平等，尽管政治平等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资产阶级社会是个人自由和物质不平等的混合物，一定程度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可超越的"。

3. *现存社会主义：对需要的专政*

以费赫尔、赫勒和马尔库什三人于20世纪80年代初合著的《对需要的专政》一书为代表，布达佩斯学派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为例对现存社会主义集中进行了分析批判。他们认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专制主义体制。布达佩斯学派指出，在东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实际上是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政党代替无产阶级而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一政党在革命成功后又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形成了专制主义的精英统治，革命所产生的新

① 引自衣俊卿、丁立群：《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页。

的社会体制本质上是精英对需要的专政。[①]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为了扫除对劳动的剥削而采取了“对私有财产的消极废除”，致使经济被国家所吞并，成为完全政治化的领域。国家吞噬了市民社会，同时也废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形式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现存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以“对需要的专政”为特征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社会”。

所谓“对需要的专政”，是指在现存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中，对经济剩余分配，对人的需要以及需要得以满足的形式，都直接通过政治权力予以社会控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家长式统治，通过命令性计划来提供、控制工人赖以生产生活的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不允许有西方社会那种失业和由此而产生的职业竞争，使社会成员的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方式同质化和齐一化，从而把全体人们降低到共同的“生活样式”，通过个人对国家的依附而获得了国家对社会的稳固统治。

4. 第三条道路：激进民主制

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宗旨是通过人类需要结构的革命而达到人的个性的丰富发展以及个体与类的统一。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他们提出了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激进民主制。

激进民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民主的完成，其核心是个体自由和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权利，即平等自我决定；其基础和前提是以非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为核心的混合经济和民主国家。

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民主主要是一种政治民主，它并未渗透到经济领域，因而是不完善的。在这一民主形式中，具有政治自由的全体公民，有权参与政治决策进程，但没有参与经济决策过程的相应权利。布达佩斯学派的激进民主制主张经济领域的民主化，即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使财产的占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将财产的使用逐步从所有权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实行对财产的民主控制，以经济领域决策进程中民主、平等的参与权利取代财产占有的统治权。布达佩斯学派认为，激进民主需要混合经济，这主要是指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混合、国家（政治机构）同市民社会（经济领域）的混合以及公共计划和私人市场机制的混合。在混合经济中，私有财产不会再作为经济上不平等的基础，国家作为“再分配的行政机构”，其职能在于保证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从而成为“民主国家”。

布达佩斯学派认为，实现激进民主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一个“自治

① F. Feher, A. Heller and G. Marcus.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St., Martins Press, 1983, p. 224.



社会”。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均实现民主化的社会，在政治上必然是多元化的社会，使社会决策过程民主化就意味着建立自治社会。以民主决策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为人类新的需要结构的生成奠定了基础。自治社会虽然不能承诺满足人的一切需要，但它允许各种需要得以平等地、广泛地表达，借助于“新的公共领域”，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来确定满足需要的方式和次序。实行激进民主的自治社会把人从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之中解放出来，但“它不可能意味着从所有种类的权威、规范和义务中解放出来，而只能从特殊种类的外在权威、规范和义务中解放出来”①。因此，在激进民主制条件下，为了防止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妨碍他人的平等权利，仍然需要道德规范。布达佩斯学派认为，人们应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对他人的影响而负责，这是人的一种“地球责任”。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认为，激进民主的伦理规范的核心是自由、公正和终止磨难。

5. 日常生活的人道化

要实现现存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需要两个层面的变革：在宏观层面上，需要推进激进民主制；而在微观层面上，则需要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赫勒继承了卢卡奇的思想，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赫勒从研究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方面来探讨日常生活的内涵。个人只有通过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才能再生产社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赫勒把日常生活定义为“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②。另一方面，个体的再生产依赖于一定的人类条件，即语言、言谈、交往、交互作用、工作、想象、意识、理解、解释等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它们是为人们获得生存手段、合作和抗争、意义的建构提供规则系统的“人类条件”。它主要包含三个组成部分：“(1)日常语言和语言用法的规则与规范；(2)使用、管理和操作客体(尤其是人造客体)的规则和规范；(3)被称为习俗的人们交互作用的规则与规范。”③简言之，即“语言”、“对象世界”和“习惯世界”。

赫勒采用了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类本质”和“对象化”两个基本范畴，将日常生活定义为由语言、对象和习俗所构成的人类条件划分为“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或“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在赫勒看来，整个人类对象化世

① Agnes Heller, “Marx and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Kind’”,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19, Nos. 3—4, 1993, p. 369.

② [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③ [匈]赫勒：《日常生活是否会受到危害》，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第2期，第60页。

界分为三个领域："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和"自在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自在的类本质'代表被'理所当然地'占用的人的可经验的普遍原则，而'自为的类本质'则代表着运用自由意志的对象化领域。"①关于"自在自为的类本质"，即制度化的领域，如政治结构、法律等，由于它们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因此属于"自在自为的类本质"领域。赫勒认为，"自在的"领域是必然性的领域，"自为的"对象化则体现了人的自由，而日常生活领域是"自在的"对象化领域。

这样一来，赫勒通过对"个体的再生产"、"人类条件"和"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逐层次的分析，比较清楚地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涵。

赫勒认为，日常生活有其基本结构和一般图式。在其看来，"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包括三类要素：工具和产品、习惯、语言。它们有五个共同特征，即重复性、规则性、符号系统、经济化、情境性。日常活动的一般图式或归类模式主要有：实用主义、可能性原则、模仿、类比和"过分一般化"（也即单一性事例的粗略处理）。总之，在赫勒看来，整个日常生活是充满惰性的、异化的。

通过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划定及对日常生活基本结构和一般图式的揭示，赫勒进一步探讨了作为其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主题，即日常生活的人道化问题。按照赫勒的看法，一方面，以重复性思维和实践为特征的日常生活结构具有保守性、惰性、束缚个体发展等消极特征，迄今为止的日常生活领域一直充斥着普遍的异化。在赫勒看来，日常生活及其所具有的经济化、实用性等活动图式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基础，然而，如果日常生活的结构过于沉重，日常生活的活动图式对于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的影响过大，必然导致个体创造力的萎缩和社会进步的缓慢。在当今社会，个人尚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他主要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世界；日常交往成为一种不平等的异化的交往，其突出表现是把他人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进行交往。另一方面，赫勒也承认，日常生活和日常活动的内涵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集合的发展，日常生活一直在进步。因而，赫勒肯定并特别强调了日常生活的人道化的可能性。

日常生活人道化的实质在于个性的生成，即日常生活的主体同类本质建立起自觉的关系，通过这一主体自身的改变而改造现存的日常生活结构的自在的和异化的特性，从而使个体再生产由"自在存在"变为

① [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英文版序言，第 4 页。



"自为存在"和"为我们存在",使个人由自发和自在状态进入自由自觉的状态。

赫勒从以下几个方面阐发了日常生活的人道化的基本内容:第一,从"特性"和"个性"的关系上看,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两种基本存在状态,特性反映了尚未同类(类本质)的发展和类的价值建立起自觉关系的个人的存在状态,因而也称排他主义性;而个性则代表了类(类本质)的发展,代表了类的价值,它反映了个人同类本质建立起自觉关系,并且以这一自觉关系为基础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存在状态。日常生活人道化的任务正在于培养自由自觉和总体性的个体。第二,在精神活动或思维活动层面上,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表现为日常知识的"自然态度"的改变。日常知识包括地方语言知识、基本规范知识、特定居住地所特有的习惯和集体形象的知识、操纵在这些场合所使用的生产手段和仪器的能力等,它体现了日常思维的重复性特征和日常生活图式的自在性特征,具有抑制活动主体的创造性的功能,因此,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要求对自然态度的超越或改变,即日常主体由自在的自然态度向"自为的"理论态度的提升。第三,在个体活动及其交往关系上,日常生活人道化体现为日常交往的人道化。有着自在性和自然性的日常交往的各种常见的形式,如偶然或随机交往、习惯性交往、依恋、直接的日常交往、游戏以及通告、讨论、说服、揭露、谈话、闲聊等语言行动的交往等,具有抑制自由个体生成的特征。因而,日常生活人道化所追求的,就是要建立平等、自由和人道的交往模式。其中,"人们之间的交往真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的交往"①。一切人都享有平等的关系、没有等级和压迫的互惠的交往关系。第四,从目的性上看,日常生活人道化是自由个体的生成,是日常生活变成"为我们存在"。在赫勒看来,当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把他人当做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时,日常生活必然倾向于异化,相反,人们越多地视另一方为目的,日常生活就越人道化。赫勒认为,真正的"为我们存在"应该是过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以通过持续的新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为我们存在',以便这一世界和我们自身都能持续地得到更新,我们就是在过着有意义的生活"②。

总之,布达佩斯学派在理论上设计、构造了一个以激进民主为核心的

① [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5 页。

② [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0 页。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其许多主张和观点同传统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有的还偏离或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并且有其实践可行性方面的缺陷，但它在基本精神上则继承与弘扬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根本精神。

三、波兰意识形态学派

从20世纪50代末起，在波兰曾出现一批致力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有的研究者将他们称作波兰的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

(一)波兰意识形态学派的产生

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的理论生涯是以1956年波兰事件为转折点的。在此之前，他们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也都是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阐发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积极批判当时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如利沃夫一华沙学派的分析哲学和以英加尔等为代表的现象学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人格至上论。1956年波兹南事件之后，以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波兰知识分子，积极批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以高度集权、国家政党专政为特征的现存社会主义模式和实践，从斯大林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以1968年“三月事件”为标志，波兰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新的理论阶段。随着他们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的加剧，他们同政界的冲突也越来越多，以至于他们一些人的活动中心不得不由波兰转到西方。在“三月事件”之后，科拉科夫斯基被指责为学潮的危险的“精神代理人”，因此被华沙大学开除，从此他移居西方，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对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反思与批判，而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沙夫由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异化论”而屡遭批判，在积极参加国外各种学术活动的同时，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同党和政界决裂，并一再重申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1984年，波兰党中央监委裁决小组以“违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纲领性宗旨”的罪名将沙夫开除出党。

(二)波兰意识形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主要表现在科拉科夫斯基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沙夫的社会主义异化论之中。



1. 科拉科夫斯基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出生于波兰小城腊多姆,后来到罗兹大学求学,194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49年科拉科夫斯基被任命为波兰最主要的哲学杂志《哲学研究》的主编。1953年获华沙大学博士学位后留任该校,讲授现代哲学。1956年波兰事件之后,科拉科夫斯基被作为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判,1966年他因发表纪念波兰事件的演讲而被开除出党,1968年3月被开除出华沙大学。辗转柏林、加拿大之后,他成为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



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科拉科夫斯基在西方中世纪哲学、基督教哲学、斯宾诺莎哲学、实证主义等领域撰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有:《别无选择的人》(*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1967)、《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Toward a Marxist Humanism*, 1967)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1976)等。科拉科夫斯基认为自己没有哲学,甚至强调自己不需要系统的哲学,其理论观点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不一致性。尽管如此,他因为对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现存世界的批判,而被看作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科拉科夫斯基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他关于"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神话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这两个问题上。

在《别无选择的人》中,科拉科夫斯基详细探讨了科学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他指出,科学所要求的是"不依赖于政治需要的由社会来进行检验的原则",即"客观主义的原则、修正主义的原则、永恒的批判以及经常不断地对一切可能出现的观点加以比较的原则",与现代科学相反,意识形态则适应当时的需要,"从属于各个社会集团、党派或阶级的日常任务"。可变性、顺从性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特征。因而,"意识形态的活动和科学的活动总是相互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决不会由于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就能从世界上消除"①。科拉科夫斯基认为,每一意识形态的核心都是一种关于未来完善社会的技术蓝图,这是一种"社会乌托邦",而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制度化,就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统治力量。意识形态自律发展

① [波兰]科拉科夫斯基:《意识形态和理论》,载《哲学译丛》1980年第2期,第51、53页。

的危险后果，就是专制主义的总体性统治。由于科学并非是万能的，因而人类尚不能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因而，要想避免形成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统治，其根本出路在于弘扬人的批判意识，限制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

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披着科学的外衣”的意识形态，它不顾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对立，将二者等同起来并宣称自己是神圣的科学。由此人们“制造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和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这类神话，并通过绝对可靠的科学成就来证明这种神话的正确性”①。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和其他意识形态相比，这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它给各种无法科学实证的理论与实践都罩上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光环，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逐渐成为绝对的独裁者，由此而为专制主义打开方便之门。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科拉科夫斯基致力于揭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命运问题，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他 1976 年至 1978 年在巴黎相继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这一巨著之中。本书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及其悲剧命运。在这一巨著各卷中，科拉科夫斯基分别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第二国际和列宁主义时期、当代马克思主义时期，批评了几乎所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哲学人本主义”。他注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资本论》是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继续和发展。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人本主义主要表现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如何扬弃人与世界之间的异化以便人能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的问题，其理想前景是人与世界、人与自身和他人最终达到和谐统一；异化劳动是伴随着技术进步而兴起的劳动分工的后果，它在于人屈从于自己的生活并采取了物化形式；扬弃异化不仅要扬弃异化的意识，而且必须涉及异化赖以产生的条件；异化的扬弃就是共产主义，这是属人存在物的总体转变，是人向自己的类本质的复归；共产主义不是与现存世界相对立的理想，而是“当代历史的现实趋势”，作为涵盖生活和人类意识的所有领域的终极变革，共产主义必然是革命的结果，它并不剥夺人的个性，而是为个人力量的发展而提供条件；无产阶级只有对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特殊地位达到自觉，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① [波兰]科拉科夫斯基：《意识形态和理论》，载《哲学译丛》1980 年第 2 期，第 51 页。



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背离了哲学人本主义立场：一方面，恩格斯及其继承者与马克思之间存在实质差别。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所反映的是自然主义进化论和经验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不同于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实践认识论”和“革命末世学”，并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里被看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三个动机或主旨(motive)，即乌托邦式浪漫主义动机、救世主义的普罗米修斯一浮士德动机和理性主义的动机，而它们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因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浪漫主义统一体理论同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相结合，可以成为终极专制主义政治的基础”①。列宁和斯大林把自由当作衡量社会统一体层次的尺度，把阶级利益矛盾看作是社会冲突的唯一源泉，这是马克思的统一体理论的实际应用。由此，他批判性地认为，列宁是“极权主义的思想家”，是“极权主义学说和极权主义国家原则的创始人”。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体制是“列宁主义的继续”，而斯大林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科拉科夫斯基继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最后一卷中分别讨论了布哈林、托洛茨基、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戈德曼、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布洛赫、南斯拉夫实践派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或人物的思想。尽管他对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和戈德曼的评价相对比较高，但是从总体上，他对当代这些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持批判态度。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乌托邦；历史唯物主义有其相对重要性，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命运和宗教功能；马克思主义已经僵死。

2. 沙夫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出生于波兰的利沃夫，曾在巴黎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法律和经济，1945 年在莫斯科获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并回国开始在罗兹大学任教授，1948 年起任华沙大学哲学教研室主任兼教授，1952 年成为波兰科学院通讯院士，1961 年成为波兰科学院院士，1955 年至 1968 年间，沙夫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57 年至 1968 年任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63 年以后在维也纳任欧洲社会科学中心主任。1984 年沙夫被波兰统一工人党开除出党。

① 引自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2 页。

沙夫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人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Man*，1962)、《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1965)、《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1980)、《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Die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am Scheideweg*，1982)等等。其理论主题主要有人的哲学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与社会主义和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共产主义运动等。



沙夫(1913—2006)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整个50年代，沙夫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或哲学流派；二是研究语义学和语言哲学，从而把语言问题或语义学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的研究课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沙夫先后完成了《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由语言学和认识论问题转向哲学人本学或人道主义，他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1956年“十月事件”后，沙夫在《人的哲学》中探讨了哲学人本学或人道主义问题。针对当时在波兰流行的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理论，沙夫指出，人的问题是“每个存在主义流派的中心问题。不是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而恰恰是人的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才是它们的中心问题”①。沙夫认为，存在主义关注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困境，它只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却使它陷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之中。沙夫主张把人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并给予正确的解答。

沙夫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就是研究人的问题的，但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人的问题被忽略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学空场”。沙夫认为，人的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这一关系出发，他探讨了生活的意义、自由和历史必然性、人的存在与历史责任、人类幸福等一系列问题，把“人的个性的最充分的发展”和“个人幸福问题”置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人是出发点、最终目的和社会主

① [波兰]沙夫:《人的哲学》，林波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页。



义思想的实现者:这种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斗争有联系的立场,就叫做人道主义,这种立场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其他立场的人道主义,就其特殊的意义来说,它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①按照沙夫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具有以下主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它区别于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或唯灵论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求助于超人的或外在的力量来解释人的世界,它把现实的人看作是自身命运的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创造者以及人类世界和人自身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它不限于申述原则,而是坚决地要求付诸实践,反对一切压制人的社会关系。②

第二,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异化现象的探讨,主要体现在沙夫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两本书之中。沙夫关于异化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阐述异化和异化现象本身,二是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

在对异化本身的理解上,一方面,沙夫区分了异化和自我异化。沙夫认为,异化指的是人的产物对于其创造者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客观的关系,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变成了与自身相异的东西;自我异化指的是人对于社会即对于别人或对其本身发生变异,这是一种主观的关系,是人对其"自我"发生变异,这种异化发生在人的感情、经验和态度之中。另一方面,沙夫又探讨了异化同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关系。沙夫认为,所谓物化,是指在经济制度下一切都变成了物,结果是"人们彼此关系的非人化,这种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在商品范围内,"这种物化引起拜物教"③。沙夫指出,异化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作为由既定的关系形成的既定形式的异化,随着这些关系的消失,这种异化是可以克服的;异化作为人的对象化(客体化)活动的一种特定形式,由于对象化是人类的根本存在方式,因而"一般性的"异化本身又是无法彻底根除的。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沙夫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第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异化。在沙夫看来,国家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异化形式,因其成员享有物质特权、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往往是没有限制的、

---

① [波兰]沙夫:《人的哲学》,林波译,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11 页。

② [波兰]沙夫:《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载《哲学译丛》1981 年第 1 期,第 48 页。

③ [波兰]沙夫:《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系统(续)》,载《哲学译丛》1979 年第 2 期,第 55 页。

几乎绝对的权力，政党也“可能成为异化的产物”①。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严重的官僚制问题，而党和国家的官僚制度的强化，正是政治异化深化的根本标志。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异化。沙夫认为，自然有其客观性，但它同时也表现为人的创造活动的产物，因而自然也会异化成与人意图相反、甚至威胁人的生存的力量。第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及其社会所形成的个性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异化。沙夫指出，“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人’的模式或理想，但在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我们同时也会看到与这一模式相背离的人和人格特点：罪犯、窃贼、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等。”②

总之，沙夫认为，任何社会形态，包括共产主义在内，都不能免除异化的危险；人类扬弃异化是一项长期性的斗争。

第三，关于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沙夫以社会主义异化论为依据，具体揭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状况、可能的命运及其出路。沙夫认为，目前共产主义运动处在十分关键的历史时刻，处在十分复杂的历史境地，处在转机与危机并存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在沙夫看来，共产主义本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运动，但它目前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沙夫把这一危机称之为“革命的异化”，这主要是指：由于新社会制度缺乏合法性和社会的足够支持，执政党为了避免失败，必然求助于暴力手段，以至于执政党陷入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罗网；执政党成为拥有特权的、脱离群众的党；原有的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敷衍塞责的形式；由于生活上的困难，现实社会中将会存在人们掠夺公共财产、进行投机和接受贿赂等无法消除的弊端。另一方面，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异化现象，沙夫设想了一种新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主要包括：进行整体性的机构改革；实行分权原则，以多元化的机关、多元化的政治和多党制来削弱官僚制；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最为重要的是扩大社会主义的社会自治，实现更高层次的民主制度，各级共同体的代表都由社会选举产生，由社会相应机构监督甚至罢免等等。针对这一社会主义模式，沙夫指出，在国家中直接通过激进改革来实现这一模式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因而应当走间接变革的道路，即寄希望于欧洲共产主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主义，实行多元、民主、人权和自治。

① [波兰]沙夫：《社会主义与异化(续)》，载《哲学译丛》1982年第3期，第9页。
② [波兰]沙夫：《社会主义与异化(续)》，载《哲学译丛》1982年第3期，第13－14页。

沙夫把自己设想的社会主义自治模式看成“与激进的民主原则是吻合的”“唯一现实的社会主义”，其行动纲领虽不失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出路，但显然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表明，现实的历史进程远远超出了沙夫的预想。

本章小结

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阐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苏联解体后，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思潮。在自由开放的研究氛围中，当代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这有益于促成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回归。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发了以人为本的实践哲学、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以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改革纲领或设想，尽管它忠诚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表现出对人的存在与本质、人的命运与未来的深切关注，但又有着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有些地方甚至背离了马克思的观点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以调和。因而总的来说，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这一流派的理论缺少合理性与可行性，也不可能实现实践哲学变革现存世界的要求。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2. 评述布哈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 如何理解斯大林模式？
4. 如何理解南斯拉夫实践学派关于人的实践本质的思考？
5. 如何理解布达佩斯学派提出的“第三条道路”？
6. 试评沙夫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解。

阅读书目

1.《普列汉诺夫读本》，王荫庭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2.[德]凯特琳·勒德雷尔主编：《人的需要》，邵晓光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 [南斯拉夫]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共产主义》，曲跃

厚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4.[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5.[波兰]科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马元德译，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6.[波兰]沙夫：《人的哲学》，林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参 考 书 目

中文部分

1.[英]彼得·沃斯利:《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铁省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2.[南非]格雷泽、[英]沃克尔:《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王立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3.[英]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 21 世纪》,张英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4.[英]罗斯·阿比奈特:《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王维先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5.[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张晓琼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6.[美]保罗·托马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王远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7.[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8.[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

9.[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10.[法]雅克·比岱:《当代马克思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11.[澳]伊安·亨特:《分析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庆出版社 2010 年版。

12.[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3. 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 廖惠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六大思潮初探》，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 衣俊卿：《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7. 段忠桥：《国外马克思主义论丛——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 衣俊卿：《国外马克思主义论丛——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 张一兵：《国外马克思主义论丛——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 王雨辰：《国外马克思主义论丛——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 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论丛——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 俞吾金：《国外马克思主义论丛——传统重估与思想位移》，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3.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4.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5.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6.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7.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1—9），人民出版社2000—2010年版。

28. 曾枝盛：《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的最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9. 文晓明、杨建新：《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概述》，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0 年版。

30. 顾海良、张雷声:《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31. 冯宪光:《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32. 付文忠:《新社会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33. 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4. 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

35. 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年版。

36. 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

37. 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

38. 姜文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

39.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40.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41.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42. 陈学明:《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3.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

44. 奚广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45. 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46. 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47. 张亮:《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48. 张之沧:《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09 年出版。

49. 黄应全:《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50. 任岳鹏:《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51. 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52. 陈振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53.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54. 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

55. 衣俊卿:《20 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

56.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57.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58. 张翼星:《理论视角的重大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

59. 陆俊:《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60. 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61. 袁久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62. 杨玉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63. 张光照、张力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64. 姜哲军、刘峰:《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65.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66. 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67. 潘于旭:《从物化到异质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转向历史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68. 吴晓明:《当代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69. 陆象淦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9 年版。

70. 赵海月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71. 景维民、孙景宇等:《经济转型的理论假说与验证:市场社会主义的传承与超越》,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72. 景维民、田卫民等:《经济转型中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实践检验》,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年版。

73. 姜国权:《市场社会主义劳动产权理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74. 张志忠:《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模式、理论与评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75. 吕薇洲:《市场社会主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76. 吴宇晖:《市场社会主义:世纪之交的回眸》,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77. [英]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姜辉译,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

78. 陈湘舸:《新市场社会主义导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79. 李银河执行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 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80. 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81. 卢之超、王正泉主编:《斯大林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82. 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

83. 吴仁彰主编:《苏联东欧剧变与马克思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84. 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85. 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86. 袁贵仁、杨耕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87.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南]加约·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88. 李忠尚:《第三条道路:“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崛起之真谛》,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9.[匈]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文长春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英文部分

1. Anguilar, L. A. *Marx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8.

2. Bannerji, Himani. *Thinking Through Essays on Feminism, Marxism and Anti—Racism*. Toronto, 1995.

3. Bardhan, Pranab K. and Roemer, John (eds.).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1993.

4. Benton ·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New York, 1984.

5. Bidet, Jacques and Kouvelakis, Stathis (ed.). *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 Boston, 2008.

6. Boggs, Carl. *Gramsci's Marxism*. London, 1976.

7. Bottomore, Tom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Second Edition, Oxford, 1991.

8. Buhle, Paul. *Marxism in the USA*. New York, 1987.

9. Callinicos, Alex.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1976.

10. Carver, T. and Thomas, P. (eds.).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London, 1995.

11. D'Angelo, Edward. *Contemporary East European Marxism*. Armsterdam, 1982.

12. Elliott, Gregory.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Boston, 2006.

13. Fricker, Miranda and Hornsby, Jennifer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 Cambridge, 2000.

14. Fras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Galvano Della Volpe*. London, 1977.

15. Gamble, Sarah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and Postfeminism*. London, 1998.

16. Gillis, Stacy and Howie, Gillian (eds.). *Third Wave Feminism: a Critical Exploration*. New York, 2004.

17. Goldstein, Philip. *Post — Marxist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2005.

18. Goode, P. Karl Korsch: *A Study i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79.

19. Gottlieb, Roger. *Marxism*, 1844—1990: *Origins, Betrayal, Rebirth*. London, 1992.

20. Gray — Rosendale, Laura and Harootunian, Gil (eds.). *Fractured Feminisms: Rhetoric, Context and Contestation*. New York, 2003.

21. Grundmann, Reiner. *Marxism and Ecology*. New York, 1991.

22. Hendricks, Christina and Oliver, Kelly. *Language and Liberation: Feminism,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New York, 1999.

23. Hennessy, Rosemary and Ingraham, Chrys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New York, 1997.

24. Holub, Renate. *Antonio Gramsci: Beyond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1992.

25. Homer, Sean and Kellner, Douglas (ed.). *Fredric Jameson: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2004.

26. Howard, D. and Klare, K. (ed:.). *The Unknown Dimension: Post—Leninist Marxism*. New York, 1972.

27. Jacoby, Russell. *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 Cambridge, 1981.

28. Jaggar, M. Alison.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London, 1983.

29. Jay, Martin.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 Berkeley, 1984.

30. Jones, Steve. *Antonio Gramsci*. London, 2006.

31. Kadarky, Arpak. *Georg Lukács: Life, Thought and Politics*. Oxford, 1991.

32. Kellner, Douglas (ed.). *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London, 1977.

33. Kellner, Douglas.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 1984.

34. Kellner, Douglas.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1990.

35. Kolakowski, Lesz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Origin, Growth and Dissolution*. 3 vol. Oxford, 1978.

36. Kuhn, Annette and Wolpe, Ann Marie (eds.).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1978.

37. Landry, Donna and Maclean, Gerald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s*. New york, 1993.

38. Laybourn Keith. *Marxism in Britain*. London, 2006.

39. Linda Nicholson (ed.). *The Second Wave: A Reader in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1997.

40. Lovenduski, Joni and Baudino, Claudie (eds.). *State Feminism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2005.

41. Macfarlane, L. J.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London, 1966.

42. Mayer, T. F. *Analytical Marxism*.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1994.

43. McInnes, Neil. *The Western Marxists*. London, 1972.

44. McLellan, David. *Marxism after Marx*. Third Edition, London, 1998.

45. McNally, David. *Against the Market: Political Economy, Market socialism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New York, 1993.

46. McRobbie, Angela.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Gender,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2009.

47. Merquior, J. E.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86.

48. Meszaros (ed.).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49. Miller, David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1987.

50. Miller, James. *History and Human Existence: From Marx to Merleau—Ponty*. Berkeley, 1982.

51.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 Yale, 1987.

52.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53. Lichtheim, George. *Marxism in Modern France*. London, 1966.

54. Oliver, Kelly and Walsh, Lisa (eds.). *Contemporary French*

Feminism. New York, 2005.

55. Ollman, Bertell. *Market Socialism: 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NewYork, 1998.

56. Phillips, Anne. *Feminism and Politics*. New York, 1998.

57. Post, Ken. *Regaining Marxism*. London, 1996.

58. Poster, Mark.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 Princeton, N. J., 1975.

59. Roberts, M. *Analytical Marxism: A Critique*. London, 1996.

60. Roemer, J.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1986.

61. Ronald, Grigor Suny. *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 London, 2010.

62. Roosevelt, Frank and Belkin, David (eds.). *Why Market Socialism?: voices from Dissent*. New York, 1994.

63. Sargeant, Lydia (ed.).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London, 1981.

64. Sim, Stuart.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1998.

65. Sim, Stuart. *Post— 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2000.

66. Tessman, Lisa. *Feminist Ethics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orizing the Non—Ideal*. New York, 2009.

67. Theodori, Massimo. *The New Left: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1969.

68. Therborn, Goran. *From Marxism to Post — Marxism?* New York, 2008.

69. Tormey, Simon and Townshend, Jules.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London, 2006.

70. Uchida, Hiroshi (ed.). *Marx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2006.

71. Van der Linden, Marcel.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Leiden: Brill, 2007.

72. Vogel, Lise.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London, 1983.

73. Walker, David and Gray, Daniel (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of Religions, Philosophies and Movements*. London, 2007.

74. Wolfenstein, Eugene Victor. *Psychoanalytic — Marxism*.

London, 1993.

75. Worsley, Peter.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67.

76. Yunker, James A. *Capitalism versus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a General Equilibrium Evaluation*. New York, 1993.

77. Yunker, James A. *Market 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 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New York, 1992.

后 记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是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形势下高师政教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的中期成果，也是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而编写的系列教材之一，可作为高等学校政教专业、历史专业、哲学等本科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等学科研究生的参考书。

本书由铁省林和房德玖两人共同讨论确定全书的写作提纲，由铁省林执笔绪论、第一章至第八章，房德玖执笔第九章至第十一章；孙冠臣参加了本书的前期撰写工作，并撰写了第三、五、七、八章的部分初稿；最后铁省林和房德玫分别审阅了全稿，由铁省林统改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吸收了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的成果，获益匪浅，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表达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的策划、编写和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孙文亮、康淑敏、王继琐、孙晋海、李安增、王维先、聂家华、张英魁等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帮助和支持，国内著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傅永军教授也给我们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同时十分感谢责任编辑为本书的成书所付出的劳动。

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学科还在创建过程中，再加上时间紧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定的不足，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 年 1 月